

定宜庄 著

中国 知青史

——初澜（一九五三—一九六八年）

定直庄， 史学博士。1948年12月生于北京， 1968年10月赴内蒙古牧区插队。后当过中学教师。1978年考入大学。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著作有《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萨满教与东北民族》（与人合著）、《中国知青事典》（与人合著）等。



题签：马文瑞

定宜庄 著

中國知青史

——初 瀾（1953—1968年）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定宜庄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

ISBN 7-5004-2187-7

I. 中… I. 定… III.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历史
IV. D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3877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5.625 插页:4

字数:386 千字 印数:8001—12000 册

定价:23.00 元



本书作者在内蒙牧区放羊

到祖国边疆去





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



向老农学艺



新老兵团战士在一起



在塔里木参加建设的上海知青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第一个回合.....	(1)
一 从头说起	(1)
二 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6)
三 榜样的力量.....	(16)
四 一条可行的道路.....	(27)
第二章 向荒地进军	(39)
一 对苏联“共青团城”的向往.....	(40)
二 “北京庄”和“共青社”	(46)
三 随移民大潮迁往边疆的青年垦荒队员们.....	(54)
四 经验和教训.....	(60)
第三章 不平常的夏天	(69)
一 1957年的升学就业形势	(69)
二 城市中的待业青年.....	(73)
三 统筹兼顾的原则.....	(79)
四 社会的反响.....	(89)
五 改造的历程	(100)
第四章 一条崭新的就业道路	(107)
一 先行者	(107)
二 “摸着石头过河”	(112)
三 下乡以后	(122)

四	创办青年农场	(132)
五	回乡的知识青年们	(134)
六	“大跃进”前夕	(136)
第五章	难忘一九五八	(145)
一	把边疆建设成美丽的花园	(146)
二	各地垦殖场的知识青年	(153)
三	半工(农)半读, 培育共产主义新人	(157)
第六章	大办农业, 大办粮食	(177)
一	城市精简人口	(177)
二	邢燕子, 好榜样	(185)
三	城市知识青年的精简下乡	(193)
四	到国营农场去	(201)
五	江西共大与青年农业生产建设队	(208)
六	问题和特点	(213)
第七章	到农村去安家落户	(217)
一	15年的安置规划	(218)
二	决策出台前的探索	(223)
三	教训和经验	(228)
四	动员和安置模式的正式形成	(234)
五	从集体插队到“集体户”	(247)
六	为农村基层组织树立的典型	(255)
第八章	知青群体的形成	(259)
一	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	(260)
二	青春无悔	(264)
三	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	(273)
四	“出身不由己, 道路可选择”	(286)
第九章	走在与农民结合的道路上	(299)
一	谁改造谁?	(299)
二	靠什么来保护自己?	(310)
三	回乡知青的处境	(324)

第十章 这条路能够走到底吗?	(337)
一 “两种教育制度”	(337)
二 有了准备再下乡	(348)
三 当农民以后	(355)
四 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	(363)
五 军垦战歌	(375)
第十一章 第一次返城风	(381)
一 余波	(381)
二 返城风潮	(383)
三 反对经济主义	(396)
四 “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405)
五 返城风的平息	(409)
六 先驱者	(416)
第十二章 从红卫兵到知青	(428)
一 十七年的教育	(429)
二 真诚的探索者	(440)
三 从天安门起步	(448)
四 吹响上山下乡运动的号角	(456)
五 最初的实践	(465)
六 殊途同归	(472)

附录

前 言

本书作为《中国知青史》的前半部分，迄止时间为1953年到1968年。虽然在后半部分也详细叙述了“文革”期间“老三届”知青下乡之前的探索、下乡的源起以及下乡后的经历，但更多的篇幅，还是集中在“文革”之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上。尽管这一时期并不像后来“老三届”的活动那样轰轰烈烈、有声有色，能够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可是既然本书的宗旨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以严肃客观的态度来思考这段历史，那么，探寻它最初的源起和发展脉络，就是一件不能避开的、必须投入大量精力的工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长达20余年，涉及人数几达2000万的活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对这样一个复杂丰富的事件进行全面的研究，远非这本小书所能胜任。本书不过是择取其中几个侧面，进行初步的拓荒而已。

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除了“文革”期间有过短暂的脱轨之外，总的说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是一场部署得相当完备，组织得堪称周密，操作一度进行得也颇为理想的活动。只有当国家机器非常强大，党和国家在人民尤其是青年中具有很高权威的条件下，这种运作才是可行的。然而，即使一度取得了成功，这场活动却终于未能避免失败的结局，教训是异常深刻的。分析和讨论这一决策产生的原因，国家为贯彻这一措施所进行的各种努力，

并由此探究这一活动最终失败的教训，是本书的主题。

本书的另一个重点，是对知识青年群体的讨论。众所周知，这里所说的知青，并非如字面上的意思那样，是对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人的泛指，它指的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它包括的是曾在学校受过教育，然后在“上山下乡”这个特殊的政策之下，由政府所组织的到农村或连续从事农业生产的那批青年人。这里的学校，指的是中小学，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大学与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即使被分配到边疆和农村，也以干部的身份出现，领取国家的工资。普通中小学的毕业生却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在理论上，他们是被作为农民的。这正是知识青年与其他到农村、边疆工作的人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即使是这样，知青也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系指所有未能继续升学而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的青年。家在农村，毕业后又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回乡青年”也包括在内。“文革”前后曾在党报、团报上名列显著位置，在一代青年中成为典范的知青先进人物，其中大多数，就都是家在农村的“回乡知青”。“回乡知青”与“知青”二者在宣传中并无区别，但在政策与待遇上，却有着严格的不同。回乡知青基本上是被作为农民对待的，对知青的一切政策很少顾及到他们。很少有人想到过，其实正是他们，才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开路先锋，也是人数最巨、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批人。

狭义的知青，特指1962年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成为国家的一项专门工作，国家正式为下乡上山的城市青年学生发放安置费以后，从大中城市下乡的中学毕业生，其中“文革”期间毕业的“老三届”以及其后陆续从中学毕业的城市青年，就成为“知青”的主体。

本书的主题既然是讨论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它所涉及的范

围，当然是广义的知识青年，他们作为同一政策下的同时代人，有过一段共同的人生际遇，面临过实质上相同的问题，所以本书与其他以知青为题材的作品不同的，就是用了大量篇幅讨论回乡知青这一群体和他们的经历。不过，狭义的知青，尤其是“文革”期间下乡的“老三届”，至今仍是知青中最活跃的一群，因此，他们也是本书的重点和注意的中心。

知青群体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不确定性。国家送他们下乡，是希望他们成为一代“新农民”，但对他们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他们最终的倒流回城，说明了他们始终未能融入、消失在那个广阔的天地中间。是农，又非农，今天是农，明天就可能不是农。结果他们便作为社会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载入了史册。这与国家的本来意愿是相反的。

知青问题至今仍是社会上的热门话题，有关知青的回忆文章、书籍已经蔚为大观。从最早的“知青文学”到集体撰写回忆录，直至最近知青书信、日记的结集出版，都引起了世人的瞩目。近年出版的一些文集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对当年经历的追忆，还浸入了多年之后对这段人生道路的严肃的思考。这一过程充分表现了知青一代人对自己那段人生经历，在不断地反省，而且这种反省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也在不断深化。仅仅是这段自我认识的过程，已经足够写上一本书了。但是这种自我认识，还不能代替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作者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又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史学工作者。以自身的经历和感受来探讨这一政策的利弊，以这个群体的一员来认识这个群体的特点，自有局外人难以具备的长处，但也必然会带有种种局限甚至偏见，这一切，就留待后人评说吧。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许多朋友的热情鼓励和热心帮助。在此谨向刘小萌、史卫民、马晓力、张木生、刘汉顺、张力、金佳、张

三杰、庞京生、张景岩、胡岩、徐庭云、矫小红、孙东园、张重、李志伟、童长江、黄以平、陆小娅、方奕、姚安，以及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朋友，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作者谨识

1997 年炎夏

第一章

第一个回合

50年代曾以热气腾腾、充满希望的时代形象留在一些过来人的记忆中，留在文人的笔下。但50年代有50年代的社会问题，50年代形成的模式几十年难以扭转，错误和偏差也影响了以后的几十年。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在50年代作为一项政策的出台，就是这样的大树结下的一个苦涩的果子。

这项政策是从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學生回乡务农开始的。

一 从头说起

50年代前半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有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这都与知识青年的前途紧密相关；但关系最直接的，还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教育制度。

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行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订了“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方针。但工业的起飞却面临着一个尖锐的矛盾：落后的农业经济满足不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更适应不了工业发展的要求。1953和1954两年农业减产，明显地在拉工业的后腿，粮食的短缺已构成牵制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旧社会已经存在的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导致了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自发

拥入城市，使这一时期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城市就业发生困难，终于使国家把注意力又一次转向了农村。

这种情况对教育的发展也构成了影响。解放初的几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很快，至1953年底为止，与1949年相比较，全国小学增加了50%，小学生增加一倍多，中等学校增加了13%以上，中学生增加了近两倍。但这种势头维持时间并不长，问题很快就显示出来。

我国建国初期的教育制度，以学习苏联为主，从一开始就存在几个问题：

1. 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没有摆对。

我们今天通常把教育与经济发展，比喻为母鸡和鸡蛋的关系，人人都懂得“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的道理。这个道理，发达国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认识到了，而且不惜代价地付诸实行，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就是这样迅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并迈入了世界经济强国之列。可惜的是，当时的我国却不知道或不肯接受这个道理。在50年代，我们振振有词地向人民宣讲的，明显与这个大趋势背道而驰。我们强调说，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谈得上大办教育。

刚刚站起来的人民急切地要求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学校虽然已经增加了很多，但他们认为还不够。他们呼吁国家办更多的学校，希望自己的子女得到比在旧社会更多的升学机会以便将来有更好的前途，而国家是这样回答他们的：

情况是这样，要想满足今天所有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不是添办几所或几十所学校的问题，而是要添办几千几万所学校的问题，这不仅需要大量的干部，还需要很大的一笔钱。国家用钱是有个统一的预算的，要想教育经费大量增加，就必须把别的开支大量减少……把哪方面的预算大加缩减好呢？有人想到目前国家用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钱最多，

是不是把这笔钱先拿来发展教育呢？按着这个办法做，国家把主要的财力和人力，不拿去办工厂、开矿山，不去修铁路公路，也不去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而去开办学校。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要我们国家不要什么钢铁、石油和机器。少生产些大米、小麦和棉花。这就是要我们国家的工农业生产永远停留在落后的水平，要我们大家的物质生活永远没有什么改善。这就是要削弱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与经济力量……我们若不首先去发展和巩固这个物质基础，而把主要力量拿来办教育，这就本末倒置了（竟将教育放在“末”的位置上——著者），说要满足人民的文化要求自然会落空。

经济建设经费不能挪用，国防事业费更挪用不得。因为那样削弱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就是放纵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大胆发动侵略战争。战争，我们缺乏防御力量的战争，意味着工厂、学校、城市、村庄大量的遭破坏，老年人、青壮年、妇女儿童大批地被屠杀，我们的学校就是办得再多些又有什么意义呢？

挪用国家任何其它方面的预算来办学校，都会破坏国家的整个建设计划。……这就是说，我们今天无法满足所有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无法满足，这种情况要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力量发展到可以满足这种要求的时候为止。^①

将教育经费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开支描述成这样一种不能相容的关系，未免有些绝对，事实上何至于此？就拿1956年亦即建国初期教育事业发展最快、最为“冒进”的一年来说，教育经费也不过占国家总支出的7.14%。这并不是很高的数字，但有些人已经认为太大了，不得了了。他们将此与行将垮台时的国民党政权相比，说在国民党教育发展最高年份的1946年，教育经费在国家总支出中连1%都不到。基于这种认识，经济发展一遇挫折，首先

^① 《关于如何看待子女的前途问题向家长们进一言》，《中国青年》1954年第14期。

就紧缩教育经费，甚至将大批适龄儿童不能入学、十二三岁小学生不能升学的现象视为“正常”，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失策。

2. 不重视教育本身的规律。

延安时期群众化、大众化的教育模式，给了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而解放后从苏联接受下来的一套教育制度，又是以培养工业和科技方面的精英为目标的，中小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向高等学校输送人才。两套不同模式的同时采用，不能不在招生、教学等种种问题上发生冲突，而时而偏向这方，时而偏向那方的结果，就是教育所出现的不断的摇摆。或追求数量忽视质量，一味贪多求快，或强调通过统一化、标准化提高教学质量。而当后一种意见占上风的时候，不是增加教育投入以求提高水平，而是采取压缩的办法，以减少学生人数、放慢训练教师的速度为代价来进行“调整”，精英教育与普及教育的矛盾，从此便埋下了种子。以后的10余年，这一矛盾越演越烈，不仅在青年中间造成地位上的不平等，也导致了领导人之间严重的意见分歧。

摇摆不定的直接后果，造成了解放后学校招生工作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当经济发展进入高潮时期，或普及教育的意见占据上风的时候，招生人数就迅速增加，甚至超过在校学生的人数；而当经济发展遇到问题需要整顿，或培养精英的意见占据优势的时候，招生人数又会急剧减少，1954、1957和1962年，就是最突出的几次低潮。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在50和60年代却几乎成了规律，而因此出现的“不公平”，正是造成青年和家长严重不满的原因，也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3. 教育形式的单一化。

50年代的宣传媒介在谈到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问题时，一再劝告人们不要一切依赖政府，一切依赖国家，因为国家不可能对毕业生采取将一切都“包下来”的办法。但是，人们的这种依赖思想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正是新中国成立后一切都由国家负责，

由国家安排的做法，给了人们这样的幻觉。

国家确实想将一切都包下来：工矿企业最好都由国营，学校则一律改为公办^①，不如此，又如何保证人才的质量尤其是政治上的可靠性呢？以往的学校有国立，有私立，有社会团体乃至教会兴办的学堂，也有乡村百姓集资的私塾，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各取所需，毕业后也自找门径。这种情况当然有其弊病，它不仅使家境贫寒的孩子难以得到入学的保障，也常常使学有所成者陷入“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于是，国家包办一切，让百姓“生老病死有依靠”，就成为人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这在当时，的确曾起到过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当公办学校面临国家经济困难或教育需要压缩整顿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低潮时期的时候，没有为数众多的民办学校来帮助缓解压力，就立刻会对社会形成直接的冲击。

对“文化革命”之前的情况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种教育上的大起大落并不是孤立的，它不过是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特点的一个反映。由于它与经济上的波动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一旦发生摇摆，幅度就特别大。尤为严重的是，当教育上的调整将大批不能升学的青少年压入社会的时候，却也正是经济处于低谷的时期。工矿企业、机关单位，处处超编，到处都向青年关闭大门，单一的经济和单一的办学体制，不具备自行调节压力的能力，国家就想到了农村。

^① 1952年教育部发出指示，决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据有关方面统计，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前，全国有私立中学1412所，教职员工34000余人，学生53万余人，占全国中学生总数的28%强；全国有私立小学8925所，教职员工55000余人，学生160余万，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3%强。接办工作虽计划到1954年完成，但实际上1956年才基本结束。

1953年，也就是建国的第四年，这样的危机第一次出现了。

解放之初学校迅速增加、学生入学人数持续增长的势头，造成了不少新建学校一味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贪多求快，盲目冒进的问题。教育部遂于1953年提出“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导致了建国以来第一次中小学招生人数的突然下降。大批未能升学的青少年，面临失学的精神痛苦和就业的实际困难，思想混乱不安，也在社会上引起一场波动。由于被整顿的大多数是解放后在农村新建的中学，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尤其是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的问题就比城市中更为严重，而他们成批地、自发地拥入城市谋求出路，使已经被就业压力和粮食紧缺问题压得喘不上气来的城市更加难以承受，动员他们回乡遂成为当务之急。

二 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 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落后的农业拽住了工业起飞的翅膀，这个问题从1953年开始尖锐地显露出来。

国家采取的解决途径，从近处说，是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目拥入，减轻城市粮食供应以及就业等各方面的压力，从长远说，是发展农业生产，当时摆在第一位的，是解决粮食紧缺的危机，采取的方式，是加紧推行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

对互助合作运动的评价，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但上述解决农业问题的措施，都与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有直接和密切的关系。

1953—1954年间的教育整顿，压力更多地是在农村。农村中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与1951、1952等年份相比，明显增加了。如山东省莱西县，1951和1952两年高小毕业生共3390人，升

学和参加工作的除外，留在乡里的是 1310 人；1953 年毕业 3518 人，留乡 2438 人；1954 年毕业 3514 人，留乡 3028 人。再如热河省（后来归入河北省），1952 年暑期全省高小毕业生为 16894 人，未能升学的 9000 人；1953 年高小、初中毕业生 33757 人，有 25404 人未能升学。当时全国各地农村的情况，大抵如是。

很多青年都把升学看成自己唯一的出路和前途。升学考试之前就已经有人声明：“考不上学校，就去考海军——投水，投空军——上吊，或是投陆军——流浪”^①。一旦落榜，痛不欲生，一个青年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这样写道：“8 月 5 日晚上，一个沉痛的不幸的消息无情地来到了——我没有考上学校。我用了极大的耐力，才制止了眼泪的涌出，可是眼眶已经潮湿了。到现在写信时我的手还在发抖。我无法安定下来，因为它关系着我的青春，甚至我的一生……”他表示：“我宁愿在城市里拾垃圾，也要走出农村！”^②这种现象，其实至今仍比比皆是，人们并不会感到陌生。

考不上学的农村中小学毕业生，第一步的反应就是去城市寻找工作，在大量向城市流动的农村人口中，他们一直占据着很大比例。但这一时期城市的控制措施，却使他们的期望成为泡影。许多回乡青年，甚至后来被树立为先进典型的回乡青年，都曾有过四处托人找工作而不得的痛苦经历。总之，问题的严重，还不仅在于学校的压缩，而更在于就业机会的减少。在这里，经济的原因是占第一位的。

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劝阻他们不要盲目流入城市，动员他们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如今我们很难断定这一做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抑或只是权宜之计，但实行日久，便成为一个固定的模

① 周立波：《王秉源和韩文恭》，《中国青年》1955 年第 20 期。

② 魏巍：《创造幸福的家乡》，《中国青年》1955 年第 22 期。

式：凡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一旦未能升学，就应该回乡去当农民，参加农业生产。

当然，事情从来不是绝对的，当经济发展再次出现高潮的时候，城市又会为他们提供大量就业的机会，于是大量已经回乡务农的中小学毕业生会再次离开农村，1956、1958年的情况就是这样。此外，当干部、参军、女青年嫁人，也会使部分青年离开家乡。但总的原则是确定了，而且在此后几十年没有改变。

这里，“回乡”二字，是问题的关键。家在农村又未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只能回到自己的家乡而别无其他选择。毕竟他们只是农民中的一部分，国家对待他们的基本原则与对待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国家不也是动员他们回乡吗？

然而，读过书的农民与大字不识的农民，又无论如何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农民送子弟读书，一向有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取更好的出路，说到底，是为了脱离胼手胝足的田间劳动和贫困落后的农村，做“人上人”，这是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历来的传统。解放初期工业、教育各方面的迅速发展，尤其使农村青年对自己读书之后的前途抱有过高的期望。

不过，也不能把青年希望脱离农村，一概归结为落后的传统观念。人的才能不同，对职业的爱好的不同，对自己的期望也不同，为什么除了回家乡务农以外不能有别的选择呢？受过教育的青年，谁又甘愿终生只看见头顶的一方天？后来团中央组织的青年志愿垦荒队，之所以每在农村组队，总会有超出预期人数成十倍的人报名，抛开其他原因不谈，很多农村知识青年，正是要为自己争取一个选择的机会。

历史上就已存在的城乡间的不平等，由此而在农村中的这些小知识分子身上突出地体现出来。本来城市与农村青年受教育的机会就不平等，此时又由于在毕业之后不能升学而更明显，城市

青年尚有等待和选择的机会，而农村青年却只能被动员回乡这一做法而人为地加剧了。

然而，上面说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个人有个人的理，国家也有国家的理，国家需要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从理论上说，这是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改造农村面貌的根本途径。农村永远需要有文化的新农民，而且多多益善。从实际情况来看，50年代初期，由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这种需要的确显得十分迫切。

1951年年底开始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到1953年已经有很大进展。据当时公布的资料，当年全国已经有43%的农户被组织进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内。这样一种组织机构与个体农户不同的是，它需要大批的管理人才，这是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的农民所承担不了的。因此国家向青年发出呼吁：“今后建设农村需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任、生产队长、会计和技术人员，需要千千万万的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新的事业，首先参加这个斗争的始终是青年”^①。国家希望知识青年回乡能至少起到三种作用：“首先是进行文化上的传播；其次，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所需要的成千成万的具有各种文化水平的初级办事人员，也将陆续得到解决；再次，农业技术水平也会随着他们的宣传、介绍而提高”^②。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看到介绍河南省郑县小李庄乡的材料《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时，针对该乡中小学毕

① 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积极参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农村青年的光荣任务》，《中国青年》1954年第6期。

② 李之钦，《谈高小、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问题》，《中国青年》1955年第16期。

业生回乡后所发挥的作用，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批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段话后来成为每个知识青年都背得烂熟的口号。但其中的第一句，却很少被人引用，当然更少为人所注意。其实毛泽东的话，是明确针对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讲的。

可以肯定，除了减轻人口就业压力，避免引起社会动荡这类较为被动的原因之外，在当时中国农民几乎都是文盲和半文盲的情况之下，毛泽东和当时中国的其他领导人，确实对中小學生投入合作化运动从而改变农村面貌，抱着真诚的期望。这与“文化革命”后把知识青年作为被改造对象送下乡去接受“再教育”，其主导思想还是有区别的。当时农业部已经着手拟订训练生产合作社的会计、农业技术员、农具手和农业技术推广站干部的计划。中央还曾设想做出这样一个规定：为了鼓励青年学生积极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农业生产一定年限后，成绩特别优异并有适当文化程度的，可以由生产合作社保送到中等农业技术学校学习；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毕业生服务一定年限后，又有特殊成绩或贡献并有适当文化程度的，可以由地方政府保送到高等农业学校深造。这无疑是一个对农村发展、对中小學生本人都十分有益的设想。可惜的是，它始终只停留在设想阶段。“文化革命”后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似乎是这一做法的延伸，可是已经大大走样了。

总之，无论对合作化运动作何评价，动员中小學生回乡并期望他们在农村有一番作为，并在未来成为国家发展农业、建设农村的骨干力量，这一做法的初衷不仅具有其合理性，也并非是没有可行性的。当时国家也没有要求回乡的中小學生一定要当普通农民，而是期望他们成为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这至少使不得不

回乡的青年较易接受这个现实。

读了几年书，然后因某种原因未继续升学，而又回乡务农的情况，无论何时都是存在的，但由国家作为一个政策提出来，通过各级组织进行广泛的动员和宣传，并加以大规模实施，则是前所未有的事，因此，我们将这一做法的实行，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开端。

开端从一开始就是“大规模”的：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同时发表《关于山东蓬莱县潮水乡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情况调查》。1954年1月教育部召开中学教育会议，提出了要向小学、初中毕业生宣传“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的道理”。

同年4月22日，青年团中央发出《关于组织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或准备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团委加强对学生的劳动教育，要运用范例教育毕业生更好地准备参加劳动生产。

同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央批示提出，中小学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应该从事工农业及其他生产劳动，这是一种正常现象。目前中、小学毕业生之所以普遍发生紧张的升学问题，主要是由于过去几年中央教育部对中小学教育指导思想上有忽视劳动教育的偏向。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鄙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错误教育思想，继续支配着广大教师和学主，这是中小学教育方针上一个带原则性的错误。

同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强调我们的教育和生产劳动是绝对不可以分离的，不论从小学、中学或大学毕业出来的人，都应该积极从事劳动生产，成为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教养

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同时要求批判那种认为做工、种地“太脏”、“太累”、“太丢人”，搞农业最没有出息，从事劳动生产以后再也不能学习文化和技术等错误思想。

1955年上半年，宣传动员工作继续进行。当年4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报告》，中央在给各地党委的指示中说：“今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的还会有相当大的数量，为升学而引起的紧张状态在一定时期内还会存在。因此，各地党委和政府必须继续加强对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和组织安排工作”，配合这一指示的精神，《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继续动员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紧接着，中共中央又批转了青年团中央《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报告特别强调了中小学毕业生是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和农村文化工作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和后备军。

由经济原因引起的一场运动，却首先是从意识形态上开辟道路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和动员，自始至终都是如此，以至人们往往忽视了它在经济上的真实起因。当然，在下乡务农就意味着放弃城市的物质享受和较之乡村更为优越的生活，意味着放弃自己曾经有过的美好理想的情况下，不如此又能怎样呢？何况发动这场运动的办法，只能是动员而不能是强迫，动员当然就是指从思想上进行动员。党从此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向传统观念的宣战。这是一场艰苦的企图改变人性的战斗。宣传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同样重要、同样光荣，就是这场战斗的第一个阶段。

宣传动员采取如下几个形式：

第一是大造社会舆论。由各地党委、政府按照中央指示布置工作，督促指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青年团和其他有关部门，组织中小学教师、基层干部和报告员、宣传员等广大的社会力量，并

运用报刊、广播等宣传工具，对社会各阶层、学生家长、已经毕业和在校的学生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大张旗鼓地造成声势；同时让全国、全省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这些人在当时社会上很有感召力的）以写公开信、到学校等处与学生座谈并发表讲话等方式，表示农村很需要有文化的青年，对中小学毕业生回乡表示欢迎^①，这些都是发动群众运动的一贯做法。当时的宣传有这样几个要点：

1. 中小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青年一代成为新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劳碌在今天社会中有崇高的荣誉，只有参加劳动才算找到了出路，才有发展的前途。即使升了学，也只是为将来更好地参加劳动创造条件。应该克服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劳动者的剥削阶级思想；不能人人都只想当专家，要知道专家也要从实践中锻炼出来。

2. 工业劳动重要，农业劳动同样重要，新社会的劳动事业没有贵贱之分。我国的农业生产，占国民经济的很大比例，而工业生产这几年来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仍只占很小成分。这样的经济发展情况，就决定了绝大多数高小、初中毕业生的就业方向。这一现实情况，不能一下子改变。

3. 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前景，批判那种认为当农民学的文化知识就没有用了、农业劳动又脏又累等错误思想。

第二是通过各级党、团和行政组织，层层下达文件，进行动员和落实。这是最实质性的一个步骤。其具体措施，一般是责成各地党政部门、尤其是团组织，大力抓好思想教育和安置工作，尤其是要当成经常性的工作来抓，不要像有些地方那样，从防范中小學生不闹事不出乱子着眼，看成临时性的突击任务，甚至像有

^① 《农业劳动模范吴春安等纷纷写信给高小和初中毕业生，欢迎他们从事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人民日报》1954年6月3日。

些地方那样应付一下就放弃，而是要真正重视起来。其具体做法，我们可以拿当年被作为先进经验进行广泛宣传的《辽西省盘山县一九五三年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经验》为例（辽西为旧省名，今已与辽宁省合并）：

该经验称，让干部统一认识，并组织他们深入开展宣传工作，这是妥善处理高小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关键。该县党政领导于1953年7月召开区文教助理、小学校长、教育工会基层主席会议，吸收各区区长、区财务助理及县直属单位准备下乡的干部参加，结合小学的调整整顿工作，说明：其一，国家为了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拿不出更大的财力来办更多的中学，因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小学毕业生的主要出路是参加生产。其二，讲清参加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在一定时期内要把这一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执行。会后，要求各区区区长回区后召开村干部会议，号召村干部正确处理自己子女亲戚的升学和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在群众中起到带头作用。同时，分片集训小学教师，向他们讲清小学教育的目的和任务，指出必须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思想和感情，教师应该以对学生负责的精神，协助学生家长妥善地安定不能升学学生的情绪^①。第三是作好对学生家长的宣传教育工作，这被认为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家长往往是动员工作中所遇到的最大阻力。而中央是在动员工作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

1954年7月11日，《中国青年》编辑部发表《关于如何看待子女的前途问题向家长们进一言》，向家长解释国家不能花费很大力量来办教育的苦衷。随之，最具权威的《人民日报》也撰文呼吁要《向学生家长积极进行劳动光荣的教育》，提出“还有许多家

^① 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初等教育科：《辽西省盘山县一九五三年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经验》，《东北日报》1954年4月19日。

长，包括部分干部、教师、医生、技术人才，依然轻视体力劳动和劳动者，把读书和从事体力劳动看成是两件不能相容的事情，不了解在劳动生产和业余学习中完全可以培养出出色的人才”，并且提到：“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也存在不少缺点……忽视了家长的言论在社会舆论中所发生的重大作用”。对家长工作的重视，就是从此才开始的。

对家长的动员，采取了召开家长座谈会和进行个别访问的方式。《人民日报》曾推荐北京市宣武区的经验，这当然不仅是针对农村家长的，其内容包括深入了解研究家长的思想状况，在领导的重视下开好家长座谈会，从中发现和培养家长积极分子，以此来初步解决几个问题：二是解决要求子女单纯升学的思想问题；三是通过对有实际困难的家庭采取同情态度而使家长体会到政府对孩子的关怀；一是改变对待孩子的错误态度。据说这项经验在该区19所学校推广，收到很好效果，可谓后来办学习班做法的先声。

对家长进行动员，自始至终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老大难，多少有些人生阅历的成年人，不像单纯热情的青年容易为形势所左右，何况事关自己的子女。并且家长包括了社会各种阶层、各种职业的人，认识、觉悟当然不会一样，所以，1955年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曾经特别撰文，提出应分别对待三类不同的家长：一类是农民家长，应该让他们劝说和鼓励自己的孩子在不能继续升学时，愉快地回乡务农；一类是市民家长，应该告诉他们，孩子并非只有升学这一条出路，另外的出路是就业，政府不可能把所有人的工作都包下来；一类是干部家长，他们应该懂得，谁也没有特权，升学并不高于一切。叶圣陶还向家长们呼吁，如果孩子未能升学，第一，千万不要责怪孩子；第二，千万不要责怪政府^①。

^① 《中国青年》1955年8月18日。

将干部家长特别提出来，已经透露出干部家长工作难做的信息。但当时党风尚端正，中央对干部约束尚严，问题还没有发展到像后来那样严重。

三 榜样的力量

国家希望中小学毕业生体谅国家不能多办学校的困难，为国家分担压力；国家还希望有文化的青年回到农村去，成为国家在农村贯彻各项政策的得力助手和骨干。而青年希望国家为他们的前途和幸福提供保障，希望国家尊重他们个人的选择。这就是当年常常谈及的国家需要和个人利益的冲突，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贯穿始终的矛盾。

国家当然希望青年能以国家利益为重，这也是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必须提的原则。但国家不能强迫，只能号召和说服，而这个原则作为一个口号，一种理想境界，一种努力方向固然可以，让它成为个人行动的真实动机并付诸实施则困难重重。人不可能完全抛弃自己的利益，说白了，谁也不肯无偿牺牲，即使青年可以，在家长那里也行不通。当时有人针对青年提出的发展个性和选择个人前途的要求是这样回答的：

既然客观的历史条件还不可能使所有的青年都上中学、大学，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要发展自己的个性，就应该承认这一客观现实，在工作中努力学习。

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一客观现实条件，而要求升学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不可能达到的^①。

^① 马铁丁：《“个性自由”及其它》，《中国青年》1954年第4期。

当时的青年中，也有人直率地表示过自己的看法：

当然，参加革命是为了人民群众，但是也包括着自己，既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为什么不能为了人民也为了自己呢？如果有人问：“我完全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不想什么个人生活享受问题”，那好吧，每天什么也不给他，或者是原来每月是一千分，现在每月给他一百分或几十分，他管保不满意或提出质问。因为过美好的生活是人的理想，也是我们革命的目的，谁都有权利得到它，更有权利想到它。^①

这是在《中国青年》杂志举行的关于“不安心农村工作是否情有可原”的讨论中，“少数”青年发表的意见，这种意见可以被大道理驳倒，但光有大道理却不能吸引青年动身。

唯一的办法是将国家利益与个人好处结合起来，这是要害。

可是回乡务农有什么真实的好处呢？当然，从长远来看，国家利益与个人前途是一致的。国家富强了，人民才有幸福生活可言；农业上去了，国家才能富强起来。但这个道理太大，与每个人的关系太远了。近一点的，是宣传农村发展的美好前景，范例是苏联的集体农庄。国家告诉青年，只要我们努力奋斗，不出几年，我们的农村也会像苏联的一样美好：“将来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农民就要坐在拖拉机的驾驶盘后面耕地，田野里的牛叫声要变成汽笛声，山要变矮变绿，总之，一切都是越变越美、越变越好”^②。这的确打动了不少青年，很多人就是抱着对家乡未来的美好期望，回到农村去的。

① 李楠枫，《谈谈我的认识——马铁丁同志复韩燕同志的信读后感》，《中国青年》1956年第1期。

② 《既不开夜车，也不放松学习，许多学生作好升学就业两种准备》，《河南日报》1957年4月25日。

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对于如此贫瘠落后的农村能在几年之内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很多人半信半疑，他们还希望得到更切实的东西，国家很明白这一点：青年关心的是自己的发展前途。前途是有的，有人可以培养成干部，有人可以成为技术人才，可是，并非人人都能如此，更非一下乡就能如此，国家又怎么能做出切实的允诺呢？

办法也是有的，其中最高明的一着，就是树立活的榜样，也就是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他们也有过苦恼，有过失落，这使其他青年易于与他们认同，但他们奋斗了，成功了，他们得到赞扬，得到荣誉，得到了当时青年所最羡慕的东西：“他们在平常的日子里辛勤地劳动着，可是今年她们突然像长上了一对翅膀，一下子飞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她们原来也不过是小学毕业生，但却享受了许多大学生也享受不到的光荣，这真是鹏程万里了。”^① 国家通过这些榜样告诉青年们，向他们学习吧，你也会得到他们得到的这一切的。

当年的回乡知青大多承认，他们正是怀着对家乡美好前景的期待，抱定向这些先进青年学习的决心，回到农村去的。

这些年轻人的故事已经十分遥远了，这些曾让一代青年热血沸腾的榜样，如今还有谁记得起他们的名字呢？

让我们在这里列举几个典型吧。

徐建春。她是中国知识青年中的第一个明星。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由电视台播放的录像中，有个一群青年将毛泽东拥在中间的镜头，其中有个穿花格布袄的女青年，

^① 《既不开夜车，也不放松学习，许多学生作好升学就业两种准备》，《河南日报》1957年4月25日。

为毛泽东点燃了一根香烟，她就是徐建春。仅仅这个镜头，就足够让当年的青年羡慕和向往了。

徐建春本是山东省掖县过西区后吕村的农家女，1951年于后吕村完小毕业。她也做过继续读书的梦，但家庭困难，缺乏劳动力，母亲不允许她升学，她只好回乡帮助家里劳动。当时村里正在组织互助组，她和村里四户人家组成一个组，由她担任组长，时年仅17岁。不得不离开书本和校园，一度令她思想十分苦闷，但她是个要强的人：“不愿叫人家说我无能，就赌一口气，下最大的劲领导积极生产，但每逢遇到不好解决的困难，又想出去。”在这期间，她也曾报考过公安学校，并且考取，但在互助组组员们的挽留和党、团组织的劝说之下，她下决心放弃了这个机会，从此安心农村，不再动摇。

当地妇女没有下田耕地的习惯，她带头向老农学习，掌握了耕、耨、锄等生产技术。麦收时劳动力不够，她发动妇女下地生产，并把老年妇女组织起来成立农忙托儿所。她利用自己能够识字、读报的优势，带领组员学习书报上的丰产知识，对互助组实行民主管理、分工负责，将小小的互助组搞得井井有条，自愿入组的人越来越多。她的情况很快就被当地党和政府发现和重视，并进行了大力宣传。

1952年10月，在她回乡不到两年的时候，《山东青年》率先以《前年她是个女学生，现在成了模范的互助组组长——模范团员徐建春访问记》为题，介绍了她回乡和担任互助组组长的经过。她在青年团山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受到奖励，成为青年团山东省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还参加了北京国庆节的观礼，第二年又参加第三届志愿军慰问团到朝鲜访问。

当国家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务农的宣传达到高潮的时候，徐建春作为响应这一号召的生动范例，被推向了全国。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山东《大众日报》的文章

《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这是党报为全国知识青年正式树立起的第一个先进典型，从此在全国掀起了向徐建春学习的热潮。

50年代的青年是单纯的，他们把徐建春当成自己的伙伴，短短几个月，全国青年就给她写了2000多封信。他们有的向她倾诉对回乡务农一事的苦恼和疑虑：“为啥叫我们往下坡溜去参加农业生产呢？难道叫我们做一辈子没出息的农妇吗？”^①但更多的人是表示他们从中获得了力量和鼓舞：“我们要向你一样在农业战线上立功”。^②他们想的是，徐建春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徐建春后来入了党，从互助组长到初级社、高级社社长，又成为全国最年轻的人民公社女社长之一。她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是全国人大代表，共青团中央委员。她成为知识青年在农村可以“大有作为”的最有力的例证。如今，在历经各次政治风波之后，她仍然是山东省省一级的领导干部。据笔者所知，这是知青明星中的唯一一人^③。

吕根泽。在50年代宣传的最初一批知青先进典型中，他的知名度仅次于徐建春。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个富饶的稻米产区，教育程度也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据1949年解放时的统计，延边的749个自然村，平均每村有15名中学生；137000余户农户，平均每12户就有中学生1人，延边共80万人口，中学生占1.4%。50年代以后，延

① 辽宁省新民县杏树坨子完小10名女学生给徐建春的信，《中国青年报》1954年4月13日。

② 浙江省萧山县振庭乡12名高小毕业生给徐建春的信，《中国青年报》1954年4月13日。

③ 这里仅指截止至1995年从知识青年典型而升任领导干部的人而言。并不包括那些曾有过知青经历而后走上领导岗位的人，如担任过河南省省长的刘少奇之子刘源等。

边朝鲜族的教育发展尤为迅速，1952年已有小学411所，小学生115900余人；中学37所，中学生24700余人，比建国时又增加了76%^①，适龄儿童就学率达到92%。据1957年报载，该自治州已达到每户都有有文化的青年农民的程度^②。“文化革命”之前能从这里升起两颗朝鲜族的、全国级的知青明星，也就不足为奇了。

吕根泽，该自治州延吉县海兰村人，朝鲜族。1951年春从龙井市中学初中毕业，他聪明好学，家境也不错，本来完全有条件升学，但因体检查出肺结核而不能报考高中。他曾感到“一切都结束了”，情绪极为低落。他想过升学是为什么的问题，回答是为前途。他懂得在新社会前途并不是升官发财，但他认为总该是一条有发展的出路，而这条路在家里是不能找到的。他觉得在家里无论如何待不下去，于是读遍所有能找到的书，这些书很多是敌伪时留下的旧书刊，他几乎误入歧途。就在这个关口，他得到了党团组织的及时帮助，终于认识到自己“并没有失学，而是才开始真正地走进学校。这所学校是丰富的，它不仅是农业大学，而且是社会大学”^③。他从此积极投身于家乡的生产劳动中，开辟一块小小的农业试验田，向当地农民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担任全村的技术研究组组长。他们的互助组由于采用新的种植法，水稻每垧收获比从前的种法增产2000斤，从而有力地推进了全村的互助合作运动。

吕根泽的经历，被当地的青年团组织所发现，他们认为这中间体现了教育青年的一个原则问题——劳动与知识相结合的问题，于是采写了报道文章，原来只打算送到《中国青年报》作为一般先进人物介绍一下，不料立即受到团中央的重视，因为对他

①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延边学校教育情况及学生活动情况》，并参见《朝鲜族简史》，延边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中国青年报》1957年5月7日。

③ 张志民：《一条宽阔的道路》，《中国青年》1955年第1期。

事迹的宣传，“有助于协助党解决一部分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回乡安心务农的问题，而这正是当时农村青年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从而开展起来。1953年12月2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青年团中央写给吕根泽的信：

你热爱农村，投身于农业劳动，刻苦钻研农业技术，并有力地推动了你村的互助合作运动，而得到了显著的成绩……你的事迹，再一次告诉了农村广大知识青年如何与农业劳动相结合，向他们证明了知识青年从事农业有无限光辉的前途。

同时，该报还发表了署名王石采写的文章：《站在建设前列的年青人——记初中毕业生吕根泽参加农业劳动的事迹》，以及社论《用吕根泽的范例教育农村知识青年参加农业劳动》^①。12月30日，吕根泽到县里，在有1000余名青年参加的大会上接受了团中央和团省委给他的祝贺信，从此成为与徐建春齐名的回乡青年的先进人物。互助组转社后，他担任了合作社主任。

1954年2月17日，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栗又文在接见吕根泽时提出，要“让吕根泽到各地去做报告，以自己的体会向广大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说明参加农业生产的重大意义是必要的。把分散的个体农民引导到互助合作的道路，没有一定数量的知识青年参加是有困难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决不该都挤到学校和机关里去”。随后，吉林省团委在全省团县委书记会议上作出具体布置，采取几种方式广泛宣传。方式之一，是通过党报、团报和印发小册子对他的事迹进行广泛传播，其中仅小册子就印发1万多本，发到了各农村团支部，要求作为学习材料；方式之二，组织吕根泽到各县和青年直接见面，做报告，还利用纪念“五四”青

^① 均见《中国青年报》1953年12月25日。

年节时机，组织了一次全省规模的广播大会；方式之三，通过召开各种代表会、举办训练班，广泛进行宣传，全省有13个县70个区召开了知青代表会。据称，“这次宣传的广泛和深入程度，在吉林省来说还是第一次，基本上达到了人人皆知”，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①。

我们在这里如此详细地引述这些宣传方式，是因为这些做法，后来被推广到全国，成为日后动员知识青年必不可少的形式。

在对吕根泽进行大力宣传的同时，该省团组织也强调了对他本人的教育和扶植工作。当地团工委派专人长期住在他那里，对他进行教育，防止可能发生的脱离群众、骄傲自满倾向，“一次他喝醉了酒，谈了一些不妥当的话，群众有些反映，地团工委同志亲自找他谈话，他在团支部大会进行了自我批评”。他的互助组转社，也是上级派专人帮助完成的^②。这种极力把典型人为地往一个固定模子里套，企图将他们塑造成高大完美形象的做法，不仅使还十分年青的典型本人扭曲了自己的才能和天性，不利于他们的发展，而且也使这些先进人物本身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其流弊之深，是当过知识青年的人都深有体会的。

吕根泽后来的生活道路，与徐建春不尽相同。他毕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出名之后，他开始学习汉语，以后又掌握了汉文。1958年各地农村大办农业大学，他进入延吉县东成乡办的黎明业余农业大学学习，1961年被公社党委保送到延边农学院深造，1961年拿到大学毕业文凭。在此期间，他在延边农学院讲师的帮助下，写成《水稻栽培技术问答》一书，并且“进行了各种水稻育苗方法、水稻低产早熟和高产晚熟品种杂交、异种水稻杂交、水稻各种密

① 青年团吉林省委书记徐俊：《我们怎样运用吕根泽的先进事迹推动工作》，《中国青年报》1954年8月3日。

② 《海兰村团组织是怎样培养吕根泽的？》，《中国青年报》1954年7月21日。

植方法对比和水稻需水量调查等一系列的试验研究活动，其中不少项已研究成功或取得一定成绩”^①。他被聘为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特约助理研究员。他成为不同于徐建春的另一类典型：知识青年在农村成长为科学技术方面的专门人才的典型。

吕根泽在各种社会活动中也有活跃表现，1960年也就是三年灾害发展最为严重的一年，他曾代表他所在的海兰生产队，与后来的著名知青典型邢燕子展开“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立功”的友谊竞赛，这场只在报纸上轰轰烈烈，却无多少社会反响的活动如今看来更像一台只为演给人看的戏。此后也曾几经风雨的吕根泽，成为延边农业科学院的一名普通科研人员，直至今今。

杨明汉。他未曾像徐建春、吕根泽那样耀眼，仅仅是当时宣传的大批知青典型中的一个，但他的经历是很有代表性的。

吕根泽出名之后，有了进行科学实验的条件，有了入大学深造的机会，像他这样的重点培养对象，要想“成长为”什么人才都是不难的。可是，以“青年技术革新者”的称号被树立为全国知识青年的典型的杨明汉，当年的道路就艰难多了。

杨明汉是广东省罗定县上池乡田边村人，出身于中农家庭。1950年考入广东西江农业学校，1952年春因患脑病退学，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他说他从小喜欢田间，十二三岁就学会了种地、割禾等简单操作，对回乡生产并无多大抵触情绪。他的家乡是个贫瘠的半山区，粮食产量很低，他在自家的田里搞合理密植，搞“人工降雨法”的实验，还尝试着改良土壤。1953年，他获得了全县丰产模范的称号。

但杨明汉并不满足。他深感自己缺乏科学知识，村里也不具

^① 《吕根泽坚持参加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研究，由一个初中生变成具有大学水平的农业技术人材》，《中国青年报》1960年11月14日。

备搞科学实验的条件，连最简单的工具也没有。同时，他也找不到供参考的理论书籍。于是，他决定先到广州找个临时工作，赚点工资，至少可以添置些实验用的工具。他得到了广州工务段党支书邓汉的热情支持，邓汉为他写了找省农业试验场的介绍信，还发动工友为他凑齐了路费。下面是杨明汉自己写的在广州的经历：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了试验场。

接见我的是该场人事科的邝湘同志。她简单地问：“你到这里做什么？”

我拿出邓汉同志的介绍信和以前他们场里给我的鼓励信，并向她说明我想学习些有关农业的科学知识。她打量了我一番，看我穿的一身农民衣服，就说：“我不认识什么邓汉同志，为什么信内只盖私章？”我说：“介绍信的信封上盖有公章。”

她又盘问着：“你为什么到工务段里来？”

我又详细地把自己在研究中的困难说了一遍。她心不在焉地听着，最后摇摇头说：“人民政府发给我场的经费，只供给我们使用，怎能抽一部分给你另外开支呢？我们也不能抽一套工具给你单独试验，你希望在我场学习，你带来了生活费吗？你怎么不经过县里选派，自己就跑来了……工具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我们不能解决，好吧，就这样吧！”

她既不好好看介绍信，又不好好听我的解释，也未请示他们的领导上，就这样不由分说地把我拒绝了。我想，他们场里在给我的信上，不是说“如果有困难，我们将尽最大力量帮助解决”，为什么她竟采取这样的态度呢？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住处。我躺在床上，急得连饭也不想吃。

这时，邓汉同志又来找我，他已看出我的苦闷，赶紧问我“结果怎样？”我默默地摇了摇头。接着把这趟不愉快的访问详细告诉了他。他想了一会儿，鼓励我坚信党和政府一定会支持我的，并叫我写篇稿子给《南方日报》，要我“狠狠地批评她一顿”。

对，当天我就给《南方日报》写了一篇批评稿。三天以后，未见回音。邓汉同志要我亲自到《南方日报》跑一趟，“直接找他们谈话，也

许能解决问题”。

到了报社，读者来信组的陆梦羊同志接见了。可是，他还没把我的情况摸清楚，就把我当成不安心农业生产，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青年，帮助我解决“思想问题”，并批判我想知道丁颖同志（著名水稻专家）的“千粒穗”经验是窃取别人的劳动果实。我向他解释后他才说：“好吧！你先回去吧！你的意见和要求很不小，我们得再考虑考虑，以后再帮助你解决。”

三天又过去了。在邓汉同志的鼓励下，我又一次到报社去。这次，他们替我给广东农业厅的负责同志写了封简单的介绍信。

我拿着这封介绍信到了省农业厅。我把信交给传达同志，等了一阵，传达同志出来把原信交给我了。信上用红毛笔批了这么一句：“华南农学院李副院长接洽。”

我拿着这封信到了石牌，见到了华南农学院李沛文副院长。李副院长很热心，听了我的要求和意见后，他表示愿意帮助我。并介绍我到省农业试验场稻作场参观了丁颖同志的“千粒穗”的标本（只是看了一下，因没有人详细讲解），帮助我找学习的地方，但由于当时的确有些客观困难，都没有成功。

我想，我是个青年人，青年团的组织一定会帮助我的。在这期间，我到过青年团华南工委两趟。可是组织部的温玉清同志简单地说：“这是农业厅的事，你还是去找农业技术部门吧。”

就这样，我白跑了一趟广州。回到家以后，我的心很久都安不下来……后来，他的母校罗定中学的行政部门和师生们闻知此事，为他送去一些实验用器材和书籍，才使他将实验进行下去。^①

1954年11月，他的实验终获成效，广东省农业厅厅长、华南农学院院长即上面提到的著名水稻专家丁颖等人闻讯后，先后到他村里参观了水稻实验田，肯定了他的成绩，也帮助他解决了许

^① 杨明汉：《仅仅是开始》，《中国青年》1955年第10期；《冷淡与打击——记杨明汉在革新技术中的遭遇》，《中国青年报》1955年4月14日。

多具体困难。杨明汉从此名扬全国，他于是月入团，被评为农业技术革新能手、先进知青典型，各省、市团委也纷纷发出通知，要求青年学习他的先进事迹。

动员的框架就这样大体搭起来了，以“活生生的”先进知识青年典型来教育青年，是这个框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典型不是天生的，它需要组织按照当时政治上的需要来发现和培养，而一个普通青年一旦成了典型，他也要根据组织的需要来成长，在那种能够把“做党的驯服工具”作为口号公开喊出来的气氛下，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不正常。

四 一条可行的道路

在这场运动中，全部工作的重点，都是落实在“动员”二字之上的，就是千方百计把青年动员回乡。从这点来说，到1956年春为止，工作的进展情况还是顺利的，这与当时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的公布以及随之进行的夸大宣传很有关系，很多青年思想中产生了农村就要跨入社会主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错觉。

截至1954年10月为止，据辽宁、河南等11个省、北京等3个直辖市和湖北、四川两省部分县、市的统计，初中毕业生已经从事生产劳动或参加其他工作的有77000余人，占不能升学人数的78%。另据辽宁、北京等7个省、市和江苏等4个省的部分县、市统计，高小毕业生从事工农业生产或参加其他工作的有446000余人，约占不能升学人数的68.5%。没有就业的，大都是家住城市的年纪较小的学生。

从参加生产劳动的具体情况来看，不能升学的高小毕业生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其次才是从事工业生产。如辽宁、吉林、陕

西、青海、甘肃5省已经从事生产劳动的27万多名高小毕业生中，将近88%的人从事农业生产，从事工业生产或其他工作的只占12.1%。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在工业发达的省市或靠近工业发达地区的省，从事工业生产的人数就较多，如河北省初中毕业生参加工业生产的占从事劳动生产或其他工作的63.6%（参加农业生产的只占6.4%），旅大市达到89.5%。与此相反，在互助合作运动发展较快而工业不甚发达的河南省，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只有约17%从事工业生产，其余绝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国家从中总结出了这条动员知青务农的道路是可行的，今后不仅是对高小毕业生，就是对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除了动员一部分从事工业生产外，也主要是组织他们去从事农业生产^①。

对于1954年各省回乡知识青年的具体情况，报刊公布的数字是零散的。今略举几例：吉林省，应届高小毕业生中，参加工业生产的有4750人，回乡务农的有68776人，大多数在互助合作组织里担任各种职务。河南省，1954年高小、初中毕业生投入农业生产的有15万余人，另有13000余人参加了郑州专区举办的农业技术训练班。又如华北，到1954年为止，已有大批高小、初中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组织，其中藁县1953、1954两年据不完全统计有1700余人^②，山西朔县1953年曾有350多名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山东省，三年来已有30余万农村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占三年高小毕业生总数52万的大半，其中文登专区7万余名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中，在乡的6万名左右，绝大部分参加了农业生产。莱阳专区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高小毕业生有34000

① 教育部党组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报告（1955年），载《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华北大批高小和初中学生参加农业生产》，《人民日报》1954年5月17日。

名，其中 24400 余名参加了农业生产^①。总之，从地区来看，大抵北方比南方为多；而从文化程度来看，是“大批小学毕业生，很少初中毕业生，甚至没有高中毕业生”^②。

要统计这一时期回乡中小学生的准确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缺乏统计资料，而尤其是因为这批人的流动性特别大，有人虽回乡，并未参加农业生产，有的是回乡自学以准备来年的升学考试，有的在当地找到工作，有的女青年后来又嫁到城市等等。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确实投入了农业劳动，而且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成为一支“可以依靠的突击力量”。据胡耀邦 1955 年在团中央召开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在现有的 65 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有青年 1.7 亿人，其中担任社长、副社长、社务委员、会计、生产队长、技术员等职务的骨干分子有 290 万人。据团中央办公厅工作组印发的《莱西县在乡高小毕业生工作调查报告》提供，农业合作社的前景吸引着这批学生，在该乡 1954 年毕业的 3000 余名学生中，在合作社、互助组中任干部的有 783 人，还有 1335 人担任了宣传员、教师、卫生员等。报告认为问题在于高小毕业生太少。莱西县一共 10 余万户，按一个合作社（指初级社）25 户计，全县应建 4000 多个社，以每个社平均设置会计、技术员、记账员等各一名计，就需要 20000 多人，在合作化程度较高的乡，高小毕业生已呈“供不应求”之势。此外如吉林省舒兰县，1954 年参加农业生产的 3892 名中小学生中，入社入组的有 3789 名，其中任社主任的 9 名，任互助组长的 64 名，任会计、记账员的 1789 名；山东省荣成县的 198 个农业社会计中，高小毕业生占 103 人，等等。后来名闻全国的劳动模范吕玉兰、周明山等，就都是十几岁

① 《山东三十余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人民日报》1954 年 5 月 26 日。

② 《人民日报》1957 年 4 月 8 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

就当了互助组、合作社的干部，徐建春更是典型的例子。

然而，将青年动员回乡，未必意味着这场运动就获得了成功。从直接效果来说，回乡只是第一步，回乡之后是否能够巩固住，才是更关键的问题，因为这不仅直接关系到青年能否在农村发挥预期的作用，还关系到今后的动员能否继续顺利进行。而正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诸多纰漏。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当时的宣传中最让青年们动心的，是国家为合作化运动所描绘的远景：“老是弄小农经济，确是没有干头，可是搞伟大的合作化运动，这就大有出息，大有干头了。”合作化至少带给他们两个希望，一是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给予他们进一步学习技术和文化的机会；一是农村的面貌会很快得到改观，生活会一天比一天更好。但回乡之后，他们面临的，却是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

首先，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并不像知识青年们想象的那般美好。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它本身的种种失误开始暴露，到1956年，南方各省中有的甚至已将合作社自行解散，使回乡知青产生信心的立足点发生了动摇，很多青年发现“高级合作化不过如此”。加上很多地方发生灾情，生产减产，于是大量农村青年不再安心农业生产，要求外出，其中多半是农村知识青年，很多还担任着合作社的记工员、会计、生产队长甚至社长等工作，有些是青年团员，在受灾减产和城市、铁路附近的地方，这种现象尤其普遍。他们说自己是“身在乡里，眼在城里，心在厂里”，整天想办法到城市找工作。

第二，动员工作本身的失误也是不可推卸的，主管这项工作的人，从上到下，都只把精力放在将青年送回农村这一环之上，只要把人送回乡，就完事大吉，再无人过问。人们大概以为，出现这种大批青年无处安排的危机，只是暂时现象，以后社会主义发展了，一切自然就会好起来，更多的干部则只图敷衍塞责于一时，

根本不关心以后怎样。

青年们面临的具体问题有这样几方面，第一是无人关心和过问，把他们混同于普通农民，一些村干部，将他们视为多余的人物和负担，任凭他们在农村苦闷彷徨。1955年7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纠正不关心在乡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的现象》，提到他们接到不少回乡青年的来信，反映团组织对他们关心不够，有的甚至不管。如山西省潞安县鹿家庄的5个高小毕业生谈到：

回村后人们瞧不起我们，团组织不管我们，连家长也不满意我们。想为大伙办事，得到的却是冷淡。去年做人口登记工作，李文安一不小心，表格填得不够清楚，社里会计就说：“凭你这两下，还想当记工员！”我们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想成立一个学习小组，可是怎样学到，我们没办法。今年社里技术员们听过八九次农业技术传授，我们“没资格”，连一次也没有听。回村上快一年啦，村上团支部没找我们谈谈心。我们还要问问团潞安县委的同志们，听说团县委共有十八、九个干部，团县委机关经常住着五六个人，可是一年啦，我们很少见过他们的面。我们村附近乡住着两个县委的同志，也很少来我们这儿，就是来也是转一转就走了，从来没问过我们的事情。今年这半年乡里团总支收到县委送来的十二三份指示、通知和号召，七八份通报和材料，可竟没有一份是谈在乡高小毕业生工作的。奇怪呀，团县委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黑龙江巴彦县宝山村高小毕业生冯树斌、湖南省衡阳县麓山乡5个高小毕业生等也都写信说，因为没人管，很多人就到处去找工作，有的人还被荒诞色情小说毒害了。这些来信都要求团组织更多地关心这些回乡青年，也呼吁社会各方面帮助和支持他们。

第二，劳动报酬不合理。吉林省舒兰县东兴村东隆农业社高小毕业生杨树春、朱显忠写信说，今年春耕倒粪，队长高玉田分配他们倒一堆粪（实际是一天倒不完的话），答应给5分，因两人

劳动热情很高，中午也没休息，到下午5点多就倒完了。可是晚上评分时，队长却说他们不守劳动纪律，天不黑就回家，给评了2分半工，这样就影响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

第三，农村干部素质差，回乡青年本身期望值又过高，加上年龄小没有社会经验和劳动技能等多种因素，常与干部乃至农民发生矛盾，不仅不能如预想的那样受到重视，甚至处处受到冷淡打击。在杨道纬采写的《三里沟村的知识青年为什么这样苦恼？》一文中提到：山东蓬莱县绪谷乡三里沟村共有回乡青年22人，其中初中毕业生7人，高小毕业生15人，现已有8人出外。这些青年人都是从1953年起陆续毕业回乡的，当时的理想有三条，第一条当农业技术员；第二条当劳动能手；第三条当拖拉机手。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以后，劳动热情非常高涨，1954年积极组织民校，把村里文娱工作搞得很活跃。可是不久之后，他们就慢慢苦恼起来，异口同声地说：“村里、社里不使用我们。”乡长姜恒芝说，青年人没有实际经验，工作上办法少，起作用不大，选干部时总是选不上。现在知识青年中没有一个当干部的，连原来在初级社当记工员的三个知识青年在转高级社后，村干部也不让他们当了。他们还提到，知识青年给干部提意见，受到干部的无理指责。如去年冬天社里不和社员商量，就指定郑富当生产队长，郑富工作上有很多缺点，社员都不同意，知识青年向乡里、县里提意见，要求民主选举，提出乡干部管社不民主、办民校不解决经费等问题，乡干部反而批评青年“太调皮，不服从领导”。加上青年们组织自学小组却因无人过问而垮台，人团问题得不到解决问题，很多青年不再安心务农，而是盲目跑出去找工作。

这些问题，事实上贯穿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始终。存在于中国广大农村落后的传统习惯势力，在本质上是与文化、与知识对立的，它往往通过对知识青年的反感、歧视、排挤等方式表现出来，而在当时那种美化劳动人民的气氛下，满腔热情的青

年对此不可能有充分的思想认识和准备，宣传上过于强调农村对知识和知识青年的渴求，而淡化甚至回避农村存在的落后顽固的习惯势力，尤其使青年在面对现实时感到失望与迷茫。事实上，这种旧势力本来也不是这些刚从学校出来的小青年所能对付得了的，徐建春、吕根泽和吕玉兰那种一回乡就被推选为互助组长、合作社长的情况，并不能说就是当时农村的普遍现象，知识青年若真要在农村发挥作用，还需要国家和当地政府作强大后盾，给予大力支持。

当时一些地区的领导是重视了这个问题的，并曾切实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如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省人委发出《关于积极吸收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示》，就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地方必须重视发挥这支力量的作用，文件规定：

1. 训练各乡办社干部和各种业务技术人员时，必须适当吸收中小学毕业生参加训练。在进行全乡办社规划时，应把本乡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社、组问题同时进行安排，领导他们协助乡人委进行有关合作化运动与各种政令宣传、群众识字教育、业余文娱活动等，不使他们投闲置散。

2. 各普通中学应加强生产劳动教育，增加学生的农业基本科学知识。

3. 各地农业技术指导站和农业技术学校、银行和其他财经机关、人民医院和医务机关、文化馆和文艺团体，应有计划派遣业务知识较有修养的干部，主动、认真地协助训练参加农业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经常和他们联系，使他们迅速成为有用人才^①。

这类指示，若能在各地切实贯彻，会收到很大效果，但影响这些规定贯彻下去的因素实在太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上述很多党、团组织和地方领导对这个问题并不重视，而且在解放

^① 《中国青年报》1955年10月5日。

之初，他们中很多人就是农民，有强烈的农民观念和意识，他们并不认为这支力量有多么可贵，包括较高层的领导中也有人如此，所以《中国青年报》的社论才要呼吁说：“我们之所以再三再四地强调要做好回乡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的工作，不仅因为组织他们参加农业生产是国家安置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办法，也就是他们的主要出路，而且由于国家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发展合作化运动中，迫切地需要着他们”^①。

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并不是一个整体。虽然土改以后不再在青年中划分阶级成分，但每个人身上却都是打上阶级烙印的。青年回乡后，要与自己的家庭在一道生活，出身和成分问题就比在城市中更为突出。

解放初期，能够从初中、高小毕业的贫农、下中农子弟并不多，而在土地改革的硝烟尚未散尽的农村，地富子女回乡的境遇显然是颇为尴尬的。地富分子是否能够加入互助组、合作社，地富子女应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在1954年已被很尖锐地提出来^②，一两年之后仍未得到解决。据《中国青年》杂志载：

有一位在团区委工作的同志来信说，“现在回乡来参加农业生产的初中、高小毕业学生中，有一些是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我们感到很不好办：不明白这些青年能不能入社，因为近几年来对地主和富农，一般是坚决不接收的，也不明白是不是能让他们当民校教师，虽然现在扫盲的民师很缺乏，更不明白团的组织是不是也要去帮助和教育他们；有的基层团组织对其中有些是青年团员，思想很不通，说他们家是地主、富农，怎么能入团呢？”

① 《中国青年报》1955年10月5日。

② 《中国青年》答读者问《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回乡后能否参加互助合作组织？》，1954年第18期。

须知这封信的发表，已经是1956年初了^①。

对于搞基层工作的同志来说，这的确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按照党的政策规定，从原则来说，他们可以入社。可是我国农村原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地进行生产和过活，这就使他们入社的问题和家庭连在一起了”。所以《中国青年》的答复是颇为含混的，说地富子女入社，“原则上说是可以的。由于有一些文化知识，对开展组内、社内文化教育和改进农业技术是会起一定作用的”，“但不免要牵连到他家中其他成员是否也要参加的问题，需要根据具体条件寻求解决办法”，“被雇用是个妥善办法，暂时不能加入，应以正确态度对待”。所谓“被雇用”，其歧视之意已很明显。而“应以正确态度对待”，简直就是一种应付，可以想见地富出身的青年看到这种答复会作何感想。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说：

至于某些经过考察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村里头，是不是可以吸收一些担任文化教员之类的工作？有些地方别的地方知识分子很少，有这么一种需要，让他们在党支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担任文化教员的工作。现在小学教员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只有十七八岁，高小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硬是文化教员都不能当，我看也不必，我们可以用他们来扫盲，教会农民识字。究竟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加以研究。至于担任会计这样的事情就比较危险了^②。

勉强可用来当文化教员，却仍未明确答复是否可以让他们入社的

① 严如平：《不要歧视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青年学生》，《中国青年》1956年第2期。

②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2页。

问题，地富子女在农村的处境可知。这种歧视和不信任，后来日趋恶化，基本上是被与地富本身同等看待。他们在家乡很难再谈什么发挥作用的问题，其千方百计逃避还乡也就是必然的了。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自1955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股中小学生的辍学之风，而且愈演愈烈，在1956年初达到高潮。据1956年初教育部的初步统计，全国辍学的小学生达510万人，初中生达15万人。其中如广西省1955年小学学生比1953年减少24万；黑龙江省小学在校学生退学12万人以上，占在校学生总数的10%；辽宁省个县市中学生退学休学9499人。据当时的教育部长张奚若的讲话，有些地方中学生退学休学的人数竟达学生总数的50%以上，而且仍在发展。他认为，这个问题显然是十分严重的：“目前必须迅速制止这种现象，否则就会严重影响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展，妨碍国家培养建设人才计划的实现，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很大的困难。”^①

张奚若认为，学生的退学辍学，是每年都会有的现象，但这两年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则十分不正常。其原因，据他的分析，一是动员中小學生回乡生产，农民认为反正也是回乡干活，书读多了也没用。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靠计工分吃饭，孩子早些回家，还能多挣些工分。二是部分农民承担不起孩子上学的费用。三是随着1956年又一次的经济过热，到处出现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很多地方乱拉在校中小學生参加工作或到农业社担任会计，由此便引发了这场严重的辍学风。

张奚若的讲话并未取得明显效果，据教育部当年7月的统计，辍学风在河北、江苏、黑龙江等15个省市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

^① 教育部长张奚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并见《人民日报》社论：《不要让中、小学生中途辍学》，1956年3月30日。

河北省公立小学减少了30万学生，福建大田县有七分之一学生流动。

这是人们尤其是农民对动员中小學生回乡务农做法的一次沉默的抵制。既然读书之后仍然要握锄把，何必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地送子弟上学呢？大起大落的发展情况让普通百姓感到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既然遇上一次城市招工的机会，或者遇上合作社有可待填补的干部名额，谁又肯将其白白放过呢？谁能知道赶上自己毕业那年形势会是什么样呢？说到底，还是难以接受了书再去当农民的事实。

很难说当时的决策者是否意识到社会的这种反应是动员中小學毕业生回乡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但即使认识到了，他们也只是将它归结为资产阶级旧思想的影响，并决心从此与这种传统观念展开斗争。

好在1956年上半年经济建设的又一次冒进，使这一切矛盾都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随着基本建设规模的急剧膨胀，城市又开始盲目招收职工。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迄止到1956年9月底，全国已新增职工224万，其中76万余来自农村。到当年年底，全国职工总数已达2473万，比1949年增加了3倍多，不少单位招收了许多本来可以不加的职工。这对于那些对互助合作运动热情大大减退的农村知识青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他们有文化，在招工中有着比一般农村青年更有利的条件，这使他们纷纷丢下锄把重新拥入城市。而这年城市工人、干部进行的评级加薪，造成了城市职工与农民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更加剧了回乡青年的不满情绪和向城市涌动的浪潮。

前面已经提到，经济的过热与教育规模的扩大从来都是同步的。1956年，大中学校招生数量也突然增加。据教育部长张奚若在全国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1956年初中毕业生一共是787073人，而当年高中计划招收新生366120人，中专招生421596

人，初中毕业生即使全部升学也不能满额，只能动员前几届未能升学的社会青年报考，教育部还特别规定，不得限制已经在农业合作社担任了负责干部的初中毕业生报考，他们的工作，可由村中的高小毕业生接任，这不仅使从1954年开始的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回乡的工作遭到瓦解，也为1957年再度开始的动员工作造成强大的阻力。

但是，大幕毕竟已经拉开了，而且开场戏看来还唱得不坏，这使中央坚定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信心。这次动员还为以后的工作，积累了一整套的经验。

第二章

向荒地进军

对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动员，虽然声势、规模都堪称巨大，却总觉缺乏那么一种激情，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而发生在它之后不久的、1955年由团中央发起和组织的到山区和边疆垦荒的青年志愿垦荒运动，尽管投入力量与参加人数都不能与前者相比，却吸引了更多的注意，以至这场参加者更多的是青年农民而不是知识青年的运动，被人一再误认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个浪潮。1955年第一支到北大荒开荒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和它的队长杨华，也被当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驱。

但是，这场垦荒运动，又确实是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笔。这不仅因为的确有为数不少的城市知识青年和农村回乡青年直接投身其中，成为后来“支边青年”的前身，而尤其是因为，它所激励起的精神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许多后来的知识青年看到报刊和各种宣传媒介上浓墨重彩地渲染他们的创业生活之后，把他们当成榜样并心向往之，进而走上到边疆垦荒的道路。而中央的一些领导也受到这种做法的深刻影响，乃至形成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又一种固定模式。每逢需要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杨华等一批老垦荒队员就会被作为榜样提出来，直至今今。著名的“青春无悔”的口号，首先也是在一部描写垦荒队员的电视剧中喊出来的。这种精神上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这场垦荒运动本身。

一 对苏联“共青团城”的向往

农村虽然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可是我国农村事实上却不能容纳太多的人口。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耕地面积有限。我国耕地面积只有16亿亩不到，占土地总面积的不足12%，不仅与美国、苏联的各拥有耕地30亿亩左右相差很远，甚至还比不上印度。在山东、河南等很多省份，地少人多的矛盾，在历史上一直十分突出，这些地区的农民自发地向边疆地区的流动已成传统，一遇灾年就“走西口”、“闯关东”，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中央也明白，不能一味将城市人口压力推向事实上是地少人多的农村。

出路之一，是扩大耕地面积。

中央确实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50年代之初，针对农业发展严重滞后，粮食短缺已牵掣到经济发展全局的情况，国家就曾把有计划地垦荒、扩大耕地面积作为实现农业生产计划的一项重要措施，规定5年之内要扩大耕地面积3800余万亩，同时把垦荒作为一项长远规划进行部署，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积极进行荒地的调查和勘察，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大规模的垦荒准备条件。

垦荒的方针已经确定，由谁来垦？解放后的做法，大体上沿袭了历史上军垦和移民的方式，于是有了10万解放军官兵西进新疆，有了由河南、河北等地向青海、甘肃的大规模移民，就在这一切都按部就班进行的时候，一支十分激越的号角却突然在其间吹响了，这是青年团中央的声音。

团中央的加入，是因为受到了苏联当时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青年垦荒运动的强烈感染和直接影响。

1954年2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和部长会议作出大量开垦荒地

的决定，全苏维埃的青年奋起响应了召唤。2月20日，莫斯科的青年自愿开垦者在克里姆林宫集会，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在集会上发表了富于鼓动性的演说，除了描绘苏联边疆美丽富饶的景色，鼓励青年热爱边疆，建设边疆之外，他的讲话强调了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作出动员青年到边疆垦荒的决定，是因为苏共中央认为这是当时的苏联解决粮食问题的有效途径。苏联拥有大片的荒地，赫鲁晓夫说，这些土地有的比他家乡乌克兰的土地还要肥沃得多。这些荒地多年没被开垦出来的原因是人口太少，而如今能够组织这种运动的前提则是苏联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工业正在以许许多多的机器装备农业。国家已经往垦荒区运去了几万台拖拉机、联合机和其他机器，青年们能够利用国家运到开垦地区去的机器来进行劳动生产。

其二，为什么动员青年垦荒，而不是像一般常用的方式移民？赫鲁晓夫说，因为这可以使所有到那里的人都直接参加生产。在那些既没有住宅，也还没有生活必需用品的旷野上，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要比一大家人到那儿去容易忍受这些暂时的困难。他希望青年在那里安居下来，永远定居下来。希望青年在那里安家。总之，苏共中央认为这是一种花钱少而收效大的方式。

其三，去参加垦荒的，都是城市中有文化的青年。赫氏强调要用城市的文明去改造边疆，他要青年们把自己的城市文化带到草原上去，不仅在生产上做出榜样，而且在生活上做出榜样来，要让旁人一下子就看出这里住的是莫斯科搬来的人，住的井井有条，这是很重要的。要建立起学校、儿童宫、托儿所和幼儿园。没有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应该受中等教育，这很重要。必须做到这一点，在这方面有着一切条件。必须受专门教育，非常熟练地掌握技术。这样，劳动生产率才能达到另外一种水平，社会主义财富的积累才会是另外一种情况，生活才能变得更加美好。

其四，是革命精神。赫鲁晓夫最后说：“我们有技术装备，土地是很好的，知识也有，将来还会更加丰富。还需要什么呢？坚忍不拔的精神。一年不成，不要丧气，争取第二年，在第三年里胜利总会有保证。没有任何困难是人所克服不了的，只要他认识到他是在为什么而斗争，并且不断地充实知识，顽强地工作”。^①

当天夜里，载运着青年志愿垦荒者的第一列列车就向阿尔泰这个重要开荒地区出发了。接着，人的洪流，机器的洪流，各种物资的洪流，就源源不断地向阿尔泰涌去。截止到1955年5月中旬以前，已有2万多人到达阿尔泰地区，所计划生产的粮食，将达到全苏联当年计划的粮食总产量的1/20。总之，苏联这场大规模垦荒活动，在1954年共动员了10.2万人，1955年动员人数达17.2万，绝大多数是城市青年，其中又以共青团员为主体。从城市动员青年到农村已成为当时苏联的一个趋势。

50年代的中国青年，谁不知道苏联西伯利亚的“共青团城”，谁没读过那部冗长的小说《勇敢》呢：

苏联青年在这方面为我们创造了光辉的榜样。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把黑龙江边一个荒僻小村建设起“共青团城”的那些青年团员们。从《勇敢》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从在江边搭起帐篷定居下来，一直到建设起美丽的工业城市。人们也不会忘记十万以上的苏联青年男女，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去，在两年之内，开垦出三千万公顷的荒地^②。

① 《赫鲁晓夫同志在莫斯科青年志愿开垦者的会议上的演说》，《中国青年》1955年第2期。

② 钟群：《到劳动中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赫鲁晓夫同志在莫斯科青年志愿开垦者的会议上的演说读后》，《中国青年》1955年第2期。

的确，这篇文章所提到的这些事实，曾给予当时的中国青年难以估量的影响，他们为未来的美好前景，为献身祖国的自豪和激情所深深打动：

历史是会记住我们这一代人的伟大的事业的：有多少矿山、工厂是被我们发现、建立起来的！有多少土地是我们这一代人开拓出来的！有多少新的城市、铁路，是在我们手中把它加到地图上去的……①

这种理想和激情，不仅存在于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员身上，它也是当时那一代人所共有的。

中国的青年垦荒运动，就这样由青年团中央发起了。

1955年4月，我国的青年团中央组织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苏联学习共青团的工作经验时，详细了解了苏联当时正在进行的开垦荒地的工作情况，还派人到阿尔泰边区进行了访问。回国之后，他们向党中央递交了《关于苏联开垦荒地的一些情况的报告》，党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很有价值，于1955年6月27日予以转发，表示了对这一行动的认可，成为我国青年开展大规模垦荒运动的前奏。

团中央认为，效法苏联的做法，组织青年进行垦荒，在我国也是可行的。我们的国家不但有大片荒地在边疆地区等待着我们去开垦，就是在人口稠密的内地也有不少荒地。对边疆地区，用开荒队的形式去开荒，既可以比成家的移民大大节省国家的投资，又可以一下子就组成坚强的高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然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上面提到的，在苏联“去参加垦荒的，都是城市中有文化的青年”。赫鲁晓夫强调这点，是因为希望这些青年用城市文明去改造和影响偏远的边疆。而我

① 钟群：《到劳动中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赫鲁晓夫同志在莫斯科青年志愿开垦者的会议上的演说读后》，《中国青年》1955年第2期。

们的团中央注意到这点，则主要是发现，它为我国解决城市中未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的出路问题，提供了一条极有价值的途径。

上一章已经提到，1953、1954年间经济、教育的紧缩，将大批既未能升学，又找不到工作的青年压向了社会，国家虽采取措施大力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生产，但对城市中不能升学的中小學生如何安排，却还没找到有效的对策。1955年，仅北京、天津和上海3个城市中，不能升学的中小學生即已达6万人，加上历年未升学就业的为数更多。上海一地没有职业的青年就有30余万，中央已感到不小的压力。

1955年7月6日，团中央在《关于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中说：

请求参加边疆建设的绝大多数是应届、往届毕业的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和部分没有职业的社会青年。今年不能升学的较去年为多，各个部门需要的工作人员较去年少，不仅在今年而且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国家都没有力量解决全部高小初中毕业生的升学就业以及城市中部分无职业青年的就业问题，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一个困难。

中共中央已批准农村工作部“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产粮食的初步意见”，团在这方面应起积极的突击队的作用。我们也打算动员一部分城市中未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及其它失业青年参加垦荒工作。

紧接着，在团中央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又一次提到：

我们觉得，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的、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学生和失业青年的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

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也明确说：

只要我们首先把垦荒队搞起来，就能带动许多城市青年、知识青年下乡^①。

中国自1955年兴起的青年垦荒运动，从整个模式而言，包括组织形式、过程和宣传口号等各方面，很显然地是对苏联做法的直接模仿。它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以“青年团协助政府”的方式，实际是由青年团发起，也是由青年团组织的，不像此前的动员中小学生回乡务农和后来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都是由党和国家亦即政府直接出面负责。作为满腔热血的青年，团中央对组织这场运动十分主动积极，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它并没有注意到中国与苏联在国情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这一点，容我们在后面再作详细分析。

按照胡耀邦设想的垦荒原则，是在自愿基础上，不要国家的钱，并将这个原则作为区别于国营农场与国家组织的移民的标志。垦荒所必需的资金，部分靠贷款，部分靠动员青年们捐献，这种捐献在运动开始时期是不困难的。

据当时参加发起和组织北京第一支青年垦荒队的干部回忆：“当时提出垦荒在北京青年中是很有感召力的，因为当时不仅北京，乃至全国，特别是农村，生活水平都很低，勉强温饱而已，年轻人都有不靠父母，自己出去闯天下的意识。”^②他们对青年团有特殊的感情，愿意把自己的前途信任地交给团组织。家长们也认为：“这是给年轻人找到了一条很有希望的出路。”

^① 《青年团中央关于响应党的号召、组织青年参加开垦荒地的几项意见》，1955年7月27日。

^② 舒展：《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发起片断》，载《荒原上的足迹》，第269页。

二 “北京庄”和“共青团”

为了带动全国青年，团中央希望由北京带头，组建起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1955年6、7月间，北京团市委派遣各区团干部分赴京郊各乡进行动员，最后在青年农民中选定了5名骨干，其中之一，就是京郊石景山区西黄乡的乡长兼团支部书记、23岁的共产党员杨华，此外还有南苑区的李连成、李秉衡，东郊区（今朝阳区）的张生和门头沟区的庞淑英。7月9日，由《中国青年报》记者、同时任团中央垦荒筹备组成员的舒学恩执笔，5名青年以发起人身份，向青年团北京市委递交了申请书：“请批准我们发起组织一个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疆去垦荒，使我们能够为祖国多贡献一份力量。”并提出，只要组成一个60人的垦荒队，就能“不要国家掏一分钱，为国家开垦3000多亩荒地，增产30多万斤小麦”^①。

垦荒队的组织规模、垦荒地点、发展方向，也都是团中央精心安排的。

8月19日晚，胡耀邦接见了5名发起人和垦荒筹备组成员，提出：“因为这是第一支队伍，所以规模不宜太大，先组织60人去，明年以后再陆续增加。”他强调组织工作要在完全自愿的原则之下进行。团市委还动员全市青年为垦荒队捐钱捐物，以实现“不要国家一分钱”的口号。8月下旬，第一支垦荒队正式成立，其中男队员48人，女队员12人，党团员约占83%，由杨华担任队长。

8月30日，北京市青年1500人为垦荒队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胡耀邦在会上作了题为“向困难进军”的报告，鼓励垦荒队

^① 《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申请书》，《北京日报》1955年8月16日。

员用“忍受、学习、团结、斗争”的精神对待困难，在黑龙江的荒原上安家落户，多做贡献。他还在会上郑重宣布，在以后两年，北京市至少将有 1800 名青年参加垦荒队，以后每年还要继续增加。他代表团中央将一面写有“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大旗授给了他们。与此同时，黑龙江省的有关部门也为北京垦荒青年的到来做了大量工作，专门成立了以省团委副书记为首的九人筹备委员会，选定了人称“北大荒”的萝北县作为垦荒地点。9 月 10 日，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达萝北，进入了艰苦的创业期。

为了扩大声势，团中央在北京队出发不久，又在天津、河北、哈尔滨等省市组织了同样的活动。截止到 1955 年底，天津队、哈尔滨队、河北队接踵抵达萝北，联合成立了青年垦区。翌年 3 月，北京市团委又组织了第二批青年垦荒队，共 137 人。同时，哈尔滨等地也陆续输送了一批青年。到 1956 年底，集结在萝北的各地青年垦荒队共 14 批，2567 人。随着垦区规模的扩大，改变了各垦荒队混合编队的办法，按籍贯重新编为集体农庄，共建立北京庄、天津庄、河北一庄、河北二庄、山东临朐庄、山东胶南庄、山东惠民庄、哈尔滨庄等 8 个集体农庄。其中北京庄 205 人，由杨华任主席。

杨华迄今为止再没有离开过北大荒。

继北京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之后，1955 年 9 月 11 日，上海的 5 名社会青年陈家楼、吴爱珍、石成林、吕锡龄和韩巧云，在上海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组织第一支上海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倡议，次日就得到了上海市团委常委会和民主青年联合会的批准，该组织还向全市青年发出了向陈家楼等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的号召。几天以后，江西省农业厅负责人即发表谈话，表示了对上海市青年垦荒队的热情欢迎。

与北京第一批垦荒队不同的是，上海这支原拟由 100 人组成，

后来实际人数为 98 人的垦荒队，成员主要都是城市青年。他们中有刚出校门不久的初中学生，有里弄干部和青年工人，年龄都在 20 岁左右，绝大多数缺乏劳动习惯和独立生活经验。10 月 15 日，这 98 人扛着团市委赠送给他们的“向困难进军”的队旗，前往江西省德安县八里乡一片荒芜的湖滨。到达目的地以后，他们分居在米粮岭、王家湾和小西院三处，建立起一个生产合作社。

1955 年 11 月 30 日，也就是这支垦荒队到达江西仅仅 1 个多月以后，胡耀邦就和江西省团委书记周振远等人到八里乡去探望了他们。当胡耀邦听垦荒队汇报他们预计开垦、种植各种作物一共 558 亩，外加一些副业，约可获得净收入 19000 元，平均每人年收入 200 元的时候说：“我听了有点替你们担心，收入太少了……要想办法多搞副业增加收入。”由于垦荒队员中绝大部分是青年团员，大家要求给自己的合作社取名“共青社”，以鼓舞大家“像苏联青年在荒无人迹的地带建设共青城一样，把荒地变成良田”，胡耀邦接受了大家的要求，为“共青社”题了字，并从此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

垦荒生活对于从小生长在繁华大都市上海的青年来说，的确异常艰苦。这里原是一片草莽丛生、野兽出没的荒地，他们自己砍木盖房，挖井开塘。几个月没下雨，土地龟裂，他们借来农民的水车，车水抗旱，然后又用锄头向交织着密密麻麻野草和树根的荒地展开了进攻。短短几个月中，他们开垦了 260 亩荒地，加上当地农民送的 200 多亩熟田，都种上了油料作物、粮食和棉花。青年们乐观而且真诚地相信只要艰苦努力，这里的将来就会像电影中的苏联集体农庄一样美好。他们批评那些怕苦不愿离开上海的人是“不但远处看不到，近处也没看清楚”，他们认为“不消几年，农村要修建住宅，要采用新式农具，还要逐步实现机械化，坐

在拖拉机上，比呆在家里的滋味，真不可同日而语了”^①。

这就是胡耀邦在一南一北树立的两个典型。中国解放以来几十年政治斗争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凡由“大人物”树立的典型，往往随着“大人物”政治上的兴衰而沉浮，北京庄和共青城的大旗也就这样，几次倒下又几次被树起来。不一样的是，胡耀邦对于自己亲手树立的典型，怀着始终不渝的关切。

北京庄后来的发展道路是坎坷的。1956年7月，毛泽东发动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波及到地处边陲的萝北，青年垦区随之与县合并，各青年农庄也都就近并入各乡，垦荒队的性质因而淡化了。1958年，大批解放军官兵集体转业到萝北，翌年3月建起国营农场，垦荒队员由集体农庄庄员转为农业工人，青年垦荒队不复存在。而胡耀邦却仍然关心着这批垦荒队员的命运，1959年和1960年，他两次给杨华等人亲笔写信，鼓励他们正确对待所遇到的各种问题。1974年，他刚从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中恢复人身自由，就立即写信给老垦荒队员，询问他们的情况。1984年，当部分老垦荒队员致函他，表示希望在北京青年垦荒队北上拓荒三十周年之际举办纪念活动的时候，他更关心的，则是老垦荒队员的生活问题，他说：“如果明年每人平均收入达不到600元以上，开个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会有什么意义？又及：只有几十人，连生育出来的孩子总是几百人吧，帮助一点，很少一点点。钱要用在点子上，不要搞形式主义，作表面文章！”^②

1985年8月30日，黑龙江省隆重召开纪念北京等地青年志愿垦荒三十周年大会，胡耀邦委托中央办公厅向大会发了贺电，高度赞扬“北大荒人”的开拓精神和献身精神具有宝贵的价值和重

^① 《告“呆在家里享清福”的人》，《中国青年报》1958年3月11日。

^② 《荒原上的足迹》第208页。

要的意义，并为向阳农场题写了“**共青农场**”的新场名。

江西的共青社经历了大体相同的过程。

1957年底，“共青社”所在的德安县干部在金湖乡建起了金湖农场，县委决定将“共青社”迁到金湖与该农场合并，陆续到达德安县的第二、三批垦荒队员也被迁往金湖。1958年3月，县委决定将该农场更名为德安县共青综合垦殖场，其志愿垦荒队的性质逐渐淡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这个场的名字与共青团联系在一起，而被戴上“假全民、真复辟”的帽子。土地、山林均被瓜分，办公室、宿舍、医院与学校也被分给了附近的集体单位。原“共青社”团支部负责人周承立被打成“走资派”，胡耀邦题词的本册也被抄去烧毁。1969年7月，306名职工和400名家属，被迫离开自己多年来开垦出的家园，迁到一个高处荆棘丛生、野兽出没，低处芦苇丛生、钉螺密布的沼泽地——南湖，重新建场。1970年，这个场又被勒令下马。这是“共青社”发展史上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全场职工和家属竭尽全力来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但他们没有摘下“共青社”的牌子，终于在荒凉的角落生存下来。

“文化革命”结束后，这个场靠板鸭起家，靠羽绒发家，建成了一座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建和运输、服务综合经营的新兴共青城。1978年，该场有职工1800名，大多数进场前是城镇知识青年。场党委领导班子中，65%是当年的垦荒队员和干部，同年胡耀邦再次为该场题名。1984年12月12日，胡耀邦又一次到该场视察，又一次书写了“共青城”和“有志者事竟成”的题词。1989年，胡耀邦逝世，根据他的夫人李昭的要求，他的部分骨灰就安葬在了“共青城”。

“北京庄”和“共青城”就这样与胡耀邦的名字永远联在了一起。

早在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萝北去垦荒之前，浙江省就组织

过青年到山区和荒地垦荒的活动，团中央提出开垦荒地的号召之后，浙江省青年又一次掀起了垦荒热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56年初由温州青年组成的开发大陈岛垦荒队，围绕这支垦荒队所造的宣传声势，把50年代的垦荒活动推上了最后的一个高潮。

大陈岛分上下大陈二岛，是我国东海最大的渔场之一，总面积1万余平方公里，一年四季出产大量黄鱼、墨鱼、鲨鱼、鳗鱼和带鱼。1955年1月18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距大陈岛西北10公里的一江山岛之后，大陈岛蒋军烧毁了岛上所有民房，将岛上的18000余名居民在第七舰队掩护下尽数运往台湾。为了使“死岛”重新复活，1955年底，中共温州地委决定，组织温州青年志愿垦荒队前往大陈岛垦荒和建设，这一决定得到共青团中央的大力支持和宣传。1956年1月，由226个年轻小伙子组成的垦荒队正式成立，他们大多数是高小、初中毕业生。团中央派专人动身去温州，带去贺信和绣有“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的大红锦旗，赞扬垦荒队员的行动是英勇的爱国行为，号召全国青年向他们学习。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还送给他们一副望远镜，让他们在茫茫大海上打渔时不致迷失目标和方向。1月29日垦荒队从温州出发时，《中国青年报》用整版篇幅刊发了报道，包括垦荒队员给全国青年的一封信和给团中央的保证书，他们保证要做到：1. 一定在那里定居下来，安家立业；2. 要尽快投入生产，争取时间；3. 要努力学习。1月31日，垦荒队到达大陈岛，受到岛上农民、渔民和解放军战士500多人的欢迎。他们决心当年就开垦荒地1000亩，同时开始进行渔业和畜牧业生产。随后，当地政府动员和组织了一部分农民、渔民也登上了大陈岛，到1959年为止，岛上居民达到1700余人。

初到岛上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一切要从“开天辟地”做起。岛上常有狂暴的台风，吹得人直不起腰来。刚到岛上那年秋天，碰上12级台风，房屋猪舍都被吹倒，果树苗被卷得一千二净，整块

整块地的番薯也被刮到海里，但他们没有灰心，苦心学会了多种经营。他们在曾经布满地雷和铁丝网的阵地上开出几百亩土地，又多次出海捕鱼几万斤。到第二年，他们共收入 95600 余元，比第一年多出 5 倍。很多人生病，也有不少人私自走了，但还有人走后又要求回来。他们毕竟为岛上带来了新鲜气息。

虽然从这支垦荒队出发时起，团中央就没有停止过对他们的宣传，已经堪称大张旗鼓了，胡耀邦却仍然认为不够。1956 年 6 月，大陈岛垦荒青年又给胡耀邦写信汇报他们的劳动情况，胡看信后写下了一段批示：“转××、×××同志看看。建议你们适当宣传一下这类不畏艰苦的创业事迹，鼓舞人们特别是青年奋发图强。人们连大陈岛都不知道在哪里，主要变化更是茫然无知，为什么不好好宣传？要多搞这些东西。卿卿我我，插科打诨的东西当然我也不反对，但太多了，不符合时代精神。”

1958 年夏季，随着公社化高潮的兴起，地委决定青年垦荒队应该统一于大陈岛人民公社的领导下，从此不再单独存在。但直到 1960 年，它仍然作为一面旗帜存在于各种宣传之中。1960 年 11 月中共温州地委书记李铁峰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陈岛——为纪念大陈岛青年垦荒队而作》一文中，仍坚持了对这一行动的肯定：“过去的 5 年，由于青年垦荒队的带头登岛垦荒建设，吸引了许多群众要去大陈。因此，青年垦荒队和前后批准搬往岛上的群众一道，开垦了大陈，建设了大陈，其成绩也是巨大的。”^①

在从 1955 年 9 月北京青年垦荒队出发到 1955 年底的一百天中，热气腾腾的场面一个省份接着一个省份地重演：辽宁、黑龙江、吉林、河北、山东、上海、武汉、天津、湖南、广东、浙江、

^① 《浙江青年报》1960 年 11 月 17 日。

福建、河南、云南、江西、广西等 16 个省市以及部分县城，都组织了首批青年志愿垦荒队。1956 年的头几个月，各地都组织的第二批、第三批垦荒队也陆续出发了。

《中国青年报》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1 月 24 日，该报在头版以“青年们，开垦荒地，在那里成家立业吧”为通栏标题，整版报导了各地青年垦荒队的活动；胡耀邦号召青年垦荒的讲话被谱成“青年们，向荒地进军”的歌曲，到处传唱，使这场运动达到了高潮。据有关部门统计，共有 21 万人参加了这场全国性的垦荒活动。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青年们的报名都十分踊跃。在山东、河南等人多地少的农村，青年农民渴望离开家乡，在可以成片开垦的土地上建立新家园；回乡知识青年有的渴望从中寻找出路，有的希望借此避开家乡父老以解脱未能升学带来的耻辱。而最踊跃的，还是城市中未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和待业青年，他们希望借此减轻家庭的负担，也为自己寻找一种全新的生活。

团中央负责人的头脑还算清醒，他们虽然把动员城市青年垦荒作为一个方向，但他们也知道，垦荒毕竟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城市中小学毕业生既无劳动技术，体力也难以胜任。他们要求各地作为榜样和旗帜组织的首批垦荒队，主要是以青年农民为主体，并且特别强调要配备上能够使犁、使耙的，会种菜、烧饭的和喂牲口的，城市青年只能占很少一部分。团中央还提倡一些地区的做法，就是在组织垦荒队时，注意把年龄较小，又没有生产和生活经验的中小学毕业生与农村青年适当搭配，这应该是对双方都有益的，可惜后来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并没有借鉴这一经验。总之，对于城市知识青年，团中央并不赞成他们立即直接参加垦荒，而只是将这作为一个方向，认为在近时，主要还是让他们学习垦荒队员的爱国精神，有条件的还是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各支垦荒队中究竟有多少中小学毕业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青年，如今已经无法统计了，总的说来，第一批少些，后面的则多些；北方少些，南方各支队伍中则多些。

三 随移民大潮迁往边疆的青年垦荒队员们

上面所述，是主要由大城市知识青年和郊区青年农民组成的青年垦荒队。这些垦荒队的特点是人数都不多，一般只有数十到数百人，但影响却很大，是当时新闻媒介关注的热点。而另一类主要由农村的青年农民组成的垦荒队，人数往往多达几万人，却远远没有造成如此的轰动效果，人们更愿意把这类垦荒队员与一般的移民混为一体。

1956 年是国家有组织进行移民的第一年，从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和上海移往黑龙江、甘肃、青海、江西、内蒙古、新疆的移民达 433000 余人。还有广州、福建、辽宁、吉林、浙江、江苏等 18 省在省内移民 290000 余人。国家对这项事业给予很大重视，仅黑龙江、甘肃、青海和内蒙古等 9 个省区，国家投资即达 1 亿余元。于是，在进入 1956 年以后，有些省、区青年垦荒队的活动，就与政府所组织的大规模移民结合在了一起。

但是，他们和一般移民毕竟还有区别，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也打着青年垦荒队的旗子，而且是因为，第一，他们的迁移是团中央组织的这场青年垦荒运动的一部分，他们的经费也主要靠青年和社会各界的捐助和集资而不是靠国家拨款；第二，他们都是单身的青年男女，而不是拖家带口的农民。何况，他们中有很多是回乡的中小学毕业生，如 1957 年《河南日报》报道，从 1954 年以来，在该省参加青年志愿垦荒队赴新疆、甘肃、青海和黑龙江的青年中，中小學生就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组织这样的大规模垦荒队的，主要是北方的河南、山东和山

西等省。

1. 河南省的青年志愿垦荒队

河南省自1956年青年垦荒运动的高潮时期组织第一批青年垦荒队到青海开始，至1958年将2万余名青年迁移到新疆为止，两年期间以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名义，组织了近10万人进行跨省的远距离垦荒，而且大多巩固下来，可算是这场基本上遭到失败的大移民运动（对于移民问题，本文不拟过多涉及）中多少获得了成果的一例。

河南省青垦队的去向，主要有青海、甘肃、新疆和黑龙江等处。

到青海的青年垦荒队，是1956年几万移民迁移青海的大潮中的一支，人数为1015人，以青年农民为主体，党、团员占60%以上。其中不少人掌握一定技术，能担任汽车司机、会计、农具手、铁工、木匠，或能够缝纫、理发等。他们中的积极分子无疑受到了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影响。骨干之一的姚孝花，共产党员，高小毕业生，因家里缺乏劳动力而未能升中学，回乡担任了信用社会计，又因工作成绩突出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55年9月参加全国的代表大会时，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队长杨华的发言，给了她“极深刻的教育和美好的憧憬”，于是在与会期间专门访问了杨华，并在会上就向团省委书记递交了去外省垦荒的申请书。回到河南以后，她成为这支青垦队所树立的样板和带头人。1956年2月17日，这支垦荒队队员分别在郑州、洛阳两个城市举行了誓师大会，并于次日动身。

2月21日河南青年志愿垦荒队员抵达西宁，受到市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24日晨他们兵分两路，每路500人，分别前往海南族自治州的托勒台和海西蒙古、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的查汗乌苏小块农业区定居。这两个地区的选择还是很慎重的，都是水源充足、地势平坦而且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段，与后来不顾自然

条件大规模的垦荒是有区别的。从人多地少的矛盾相当突出的河南到来的青垦队员看到望不到边的荒地，十分兴奋，虽然青海的土地一般到3月底才能解冻，但他们几乎提前一个月就开始下地了。3月21、22日，两处又相继成立了青年集体农庄。

据1959年的报导，到查汗乌苏的500人中，已有99对男女青年结成了夫妇，生了70多个小孩，有300多名垦荒队员把父母亲属接来青海安家，农庄已发展到1200多人，包括了各行各业的人才，俨然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社会。

1956年河南省一共向甘肃移民66000余人，都安置在张掖专区的12个县114个乡内，唯有青年志愿垦荒队的3063人被移往甘肃省民乐县。

这支垦荒队于1956年3月出发，其中有845名女青年。民乐县位于著名的河西走廊中段，当地农民生活比较富裕，平均每户有地几十至上百亩，小麦亩产400—500斤，土豆能到万斤左右，青年们都比较满意。虽然甘肃的生产季节、气候条件、使用的劳动工具都与河南家乡不同，青年们也没有开垦过荒地，但在当地农民的支持和帮助下他们一一克服了困难，4个月就建起了青年新村，当年打粮164万斤。据一年以后的统计，女青年中80%已有了对象，一年之内生下了120个小宝宝，有219名队员已把家从河南搬了过去。

1956年5月2日至7日，河南省召开第二次移民工作会议，决定在当年夏季从信阳、许昌、开封、南阳、商丘5个专区28个县组织有23000名青壮年参加的垦荒队，参加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军垦农场的生产。消息传出，报名踊跃。在巩县，各村各队男女青年社员到处议论、报名，90%的青年提出了申请，表示了决心；在密县，有53户农民为自己的儿女报名，要求批准孩子去开发边疆。这支队伍的主体，是青年农民，也有不少复员军人和离校不久的青年学生，党团员占总人数的32%。他们从1956

年6月到9月陆续到达新疆，被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天山南北各垦区的农场，也有的分配到水利建设工地。这批人的情况比较复杂，初到时颇难管理，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毕竟具备比其他垦荒地区更先进、更优越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如第一批到达新疆的2200多名男女青年，被分配到天山和阿尔泰山之间库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的苏兴滩，着手建设新农场。按照规划，这个农场的12万亩耕地将全部用机器耕种。青年们一到，就有67人被选派到拖拉机训练班学习，他们中很多人说，在学校读书时就想学开拖拉机，能够如愿以偿，自然兴高采烈。问到他们未来的理想是什么，几乎所有人都回答：“建设好国营农场，将来把俺爹娘接来，在这里永远住下去。”又如在新兴的轻工业城市库尔勒到博古西湖荒原，河南的2573名青年垦荒队员，兴建起第一园艺蔬菜农场，他们都高兴地说，在家乡河南很难找到这样肥沃又这样大片的土地。到1956年9月，4万多名河南青年垦荒队员已全部到达新疆。

1958年，河南又派出2.08万青年志愿垦荒队员，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乌苏等垦区的各农场。在河南省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中，这些移往新疆的青年垦荒队员，是唯一基本上没有倒流回去的一批，他们基本都留在新疆并成家立业了。

2. 山东的青壮年志愿垦荒队。

到黑龙江参加垦荒的队伍中，人数最多的就是山东，带有移民性质，时间大多较晚。其中第一批，是山东省团委在莱阳县组织的“山东省青年志愿垦荒建设第一队”，据说消息一传开，仅15个乡和9个村就有2200多人报名，该县第四区报名青年人数占青年总数的90%以上。最后被批准的224名，都是农村青年，最小的只有16岁。他们没有到北京等地青年集中的萝北，而是被分配到集贤县，位于国营友谊农场东面。友谊农场的拖拉机手为他们开垦出成千公顷荒地，集贤县帮助他们搭盖起草棚，准备好生产

工具和生活用品，还有10名青年自愿参加他们的集体农庄，和他们一起生活。1956年3月21日，山东省团委又在济南、青岛两市和历城、蓬莱、即墨、齐河、平阴、邹县等地组织了8个青年志愿垦荒队，共有队员1221名，很多是城市青年，在集贤县和萝北县建立了集体农庄。其中有200余名济南市和历城县青年在集贤。在萝北的，有山东胶南庄，281人；临朐庄，303人；桓台庄，152人；邹平庄，153人。他们是1956年以后10万山东青壮年移民黑龙江垦区的先驱。

3. 赴内蒙古等地的青年志愿垦荒队。

1956年1月，内蒙古做出规划，要在河北、山西两省组织30个青年垦荒队，人数为5000人，到呼伦贝尔盟、乌兰察布盟和河套地区集体垦荒。山西省由团省委出面组织了5支青年垦荒队，共1104人，于1956年3月19日出发，所赴地区与原规划不同，去了巴彦淖尔盟的五原、固阳、狼山（1958年撤消，划归杭锦后旗）、安北（今并入乌拉特前旗）四县和达拉特后旗（今并入五原县），在那里建立了5个集体农庄^①。以当时被树为先进单位的、从晋北迁到杭锦后旗狼山乡的一支青年垦荒队为例：这支队伍共有230人，其中9%是党员，50%是团员，40%是中小学毕业生，30%来自中小城市，仅有30%是农村青年。来自城市的，原来都没有固定职业，只是作些零工过活。他们到达狼山乡的平原之后，第一年因为技术不熟，耕作方法不好，再加上是新开土地，每亩平均产量只有76斤，低于当地亩产62%，1957年改进耕作技术，使亩产达到146斤，但仍低于当地产量26.2%。1958年采取精耕细作方法，终使亩产超过当地水平，成为全旗丰产单位。初到时几人合居一间房，吃的也不好，副食极缺，3年后盖起200多间房，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总之，山西这1000名垦荒队员全部留在当地

^① 《中国青年报》1956年3月23日。

没有返回，而从山西迁到乌兰察布盟的 213 人中却有 157 人返回原籍。

河北赴内蒙古的青年垦荒队员共 1000 名，他们与 6000 名移民一道，被分散安置在呼伦贝尔、哲里木、乌兰察布各盟和河套行政区等地，其中到呼盟的一支，后来的返迁率达到 66.70%。总之，1956 和 1957 两年进入内蒙古的青年垦荒队员一共是 4212 人^①，并未达到原来规划的数字。

当时的一部小说曾这样地描写了这些垦荒队员的情况：

我们集合的时候，一看，十之七八是农村里来的，穿得土里土气，领队的说，每人尽可能地带上小农具，镰刀小锄什么的。我心想糟了，这不跟一般的种地的一样吗？机械化还早着呢，哪里有拖拉机叫我开呀！……谁知一到火车站，挤都挤不过去，那么多人欢送，好像我们是什么英雄，到什么前线去的^②。

虽然是小说，我们可以相信这种场面是大体真实的。

河南到甘肃民乐县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员中，有一个全国知名的先进典型、共青团三大代表孙秋月，当年对她事迹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到了民乐县，她下得车来一看，呀，多么宽阔的地呀！比在车上看到的地大得多了。她吃惊地问队长：“哪儿是我们的地呀？”“这就是！”“那儿呢？”“也是！”“再那边呢？”“还是！”“到哪儿为止呢？”“随你便。开到哪里哪里为止！”“呀，真是太多了。”她拍着手。“这么多的荒地为什么不早叫我们来呢，为什么不多来点人呢！”看到这么多地，她什么

① 《中国人口·内蒙古分册》。

② 林斤澜：《夜话》，《中国青年》1957 年第 12 期。

都忘了。只是想到应当多多地工作，把所有的地都开出来。^①

这是典型的农民热爱土地的感情，也是河南青年垦荒队员中很多人情愿留在这块土地上的原因，但这个原因是难以留住知识青年的。

这些随移民大潮涌向边疆的青年农民们，是这次青年志愿垦荒运动中参加人数最多，也比较成功的一部分。但他们已经走出我们这本书的范围了，我们还是将着眼点，回到对这场垦荒运动曾经倾注了最大热情的城市知识青年身上吧。

四 经验和教训

这场青年志愿垦荒运动，是50年代中期全国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最嘹亮却也是最短促的一声号角，它始终未能成为垦荒运动的主旋律。主旋律是由开赴新疆、黑龙江以及各边疆地区的解放军复员转业官兵奏响的，配合它的是各省的移民，我国广阔的边疆地区为数众多的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主要都是由他们建起的。他们也曾背井离乡，也有过个人的悲伤不幸，也曾为边疆付出了青春，但他们留下来了，没有留下的，是知识青年。

从这场青年志愿垦荒运动中，就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凡是以青年农民为主组成的垦荒队，工作就比较做好，也容易巩固。可以说，这次垦荒运动如果还获得了一些成绩，取得了一些经济效益的话，那么这些成绩，主要应归功于青年农民尤其是随同移民到边疆的青年农民们，而垦荒队中知识青年所占比例越高，结果就越是相反。

1956年9月，在这场垦荒运动已经跌入低谷的时候，湖南省

^① 郑重：《荒原上的姑娘》，《中国青年》1957年第9期。

团委向团中央打了一份《关于青年志愿垦荒队问题的报告》，在详细总结一年来垦荒工作教训的同时，特别提到了知识青年的问题。

该报告称，1955年12月，湖南省首先由长沙、衡阳、邵阳市发起，重点组织了6个青年垦荒队共904人。1956年2、3月间，又相继组织了16个队，共3178人。全省先后组织的青年垦荒队为22个，人数达4082人，其中男3058人，女1024人。半年来，各队都有人请假或逃跑回家。现在队员人数为3862人，其中男3058人，女985人。文化程度，高中毕业的28人，初中毕业的549人，高小毕业的1410人，初小程度的和文盲1875人。可见知识青年所占比例相当高。

在这些垦荒队中，已经有一些难以为继，省团委计划将其缩减或者撤消，而这些都是知识青年占比例高的队。例如在江永县垦荒的衡阳第五队，全队188个队员中，60%是高小以上的知识青年，他们的垦荒地点土质很差，水利不好解决，当年颗粒无收。省团委认为这样的队无法再办下去，只能撤消。又如湘潭地区的青年垦荒队，共有155人，知识青年占73%，这个队的生产虽搞得较好，但知识青年都不安心，省团委认为这样下去发展前途不大，不如缩减或撤消，把已开垦的荒地交与附近农场。再如衡阳市的第二、第四两队共158人，在衡阳市郊区垦荒，荒地只有500亩，本年生产也不太好。其中第二队知识青年占70%。从队伍本身与发展前途来考虑，抽出一部分知识青年，余下的合并到农场较为有利。

与之相反，也有不少垦荒队当年即获得了一定收成，有较好发展前途，队员思想也基本稳定。这样的有7个队共770人，可以加强领导，继续坚持下去。衡阳市第一队虽因荒地条件不好，本年无收，但该队成员绝大部分是农村青年，队员思想也很坚定，只要迁到条件好的荒地，是能够坚持下去的。祁阳队是新近与衡阳市五队分开的，新地自然条件较好，队员大都是农村青年，思想

坚定，虽然是重新开始，但有条件坚持下去。在这些继续办下去的队中，只有高中生3人，初中生73人，高小生237人。

这是个很鲜明的对比，这无异于明说，垦荒队员是农民还是知识青年，是垦荒队能不能坚持、有没有必要坚持的关键。湖南省团委在向中央检讨时，确实将这点作为自己所犯下的一个大错，他们谈到队员的组成问题时说：“我们当时只强调了组织城市知识青年，那是从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出发的，但这些知识青年缺乏劳动习惯，不懂农业技术，当时虽然热情很高，日久则不安心垦荒事业，以致影响了开荒生产和队的巩固。我们认为，在目前用锄头挖土的条件下，过多地组织知识青年是不恰当的，形成了垦荒工作中错误的根源。这些都是省团委领导上的主观、盲目造成的。”

在用锄头挖土的条件下，也就是说在下乡只是被作为普通劳动力的情况下，知识青年还不如农村青年，这个问题就这样，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刚刚出台的时候，被如此尖锐和明确地、让人难堪地摆了出来。

团中央对这份报告提到的各种问题都一一作了详细的批示，唯独对湖南省委特别强调的知识青年问题未予明确答复，他们从一开始，对这一点就没有给予过应有的重视。

我们说过，这场垦荒运动的兴起，是受到了苏联青年垦荒运动的强烈影响，苏联垦荒运动的成败得失，这里就不予评价了，单就中国对这一举动的仿效来看，它至少是忽视了赫鲁晓夫所强调的大前提，那就是“工业正在以许许多多的机器装备农业”，“国家已经往垦荒区运去了几万台拖拉机、联合机和其它机器”。只有具备了这个前提，才需要有文化的知识青年，有文化的青年到边疆之后才会感到有用武之地。赫鲁晓夫还特别强调，要把城市的文明、文化带到垦区去，要在那里建学校，而且，必须受专门教育。而解放初期响应号召前往荒地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员，面对的是条件极差的山地、荒原和沼泽，只能用最落后的工具甚至用自

己的双手与自然搏斗，不仅当其困苦超出了人的承受能力时，很难叫人仅靠精神力量来坚持，即使条件比原迁出地优越，虽然如果只将他们作为一般劳动力、农民青年能够满足，但也难以吸引知识青年，而且，缺乏劳动习惯，不懂农业技术的知识青年也远不如青年农民更能适应，结果是有文化的反而不如没有文化的能干。将城市的文明和文化带到农村去，在最起码的生存尚不能保证时，就更是提不上了。从这些青年垦荒队中的中小学生，到60年代以后大批赴边的知识青年，他们如潮水般涌向边疆然后又退却的现象，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问题在于对这一现象应该怎么看。

湖南省团委认为应该暂不组织他们下乡，但是城市中大批无法升学和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又该到哪里去呢？团中央对他们的意见未予批示，原因恐怕就在这里。而像苏联那样以大工业来装备农业，当时也显然不可能。这是个难题，而且就像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第三世界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问题在于我国当时一些领导在动员知识青年参加垦荒的时候，从增产粮食、从解决中小学生的出路问题等实际问题上考虑得更多些，囿于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他们还不可能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及其意义，有个别人甚至由此对知识青年滋生出一种反感，对他们“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娇骄二气”等等毛病的谴责不绝于耳。还有人竟由此得出了一个很简单的结论：既然有文化的青年还不如农民，那就说明学校的教育有问题，是学校轻视劳动的资产阶级教育把他们毒害了，办法是有的：改造有文化的青年人，让他们像普通农民一样，甘心于从事最简单、最艰苦的体力劳动。让知识青年接受农民的“再教育”的思想，其实从这时起就已初露端倪。

用城市的文明去影响贫穷落后的乡村，还是让城市屈从于乡村的愚昧，这是衡量这个决策是进步还是倒退的一个很重要的标

志。忽视这个问题，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是我国青年垦荒运动的先天不足之处，它注定了这场运动只能停留在一个低水平之上。

大多数青年垦荒队经济效益之差，是人所共睹的。江西“共青社”和大陈岛这两个全国著名典型，每年人均收入都仅在200元上下，甚至不足以维持个人的基本消费，给国家生产的产值自是极其有限。但他们也有成果，那就是“改造”了知识青年。

1956年“大鸣大放”时，大陈岛青年志愿垦荒队之内出现了一场很耐人寻味的辩论，有些垦荒队员对这场垦荒活动提出了疑问，认为“垦荒队吃了许多苦，生产又搞得很糟，在大陈岛垦荒是浪费青春”。反右运动开始后，垦荒队领导组织队员在一个月內针对这种看法召开了20多次大会和小组会，“彻底驳倒”了这种论调，其论据是，其一，垦荒队在缺乏技术、不熟悉海岛气候的情况下，去年仍收获了番薯、马铃薯21万多斤，本年（1957年）到9月底已提前完成全年总收入8万元的计划。队员年均收入去年是180元，本年已达260元。这一产值之低下是显而易见的，很难说服人，所以他们又提出更强有力的驳斥证据，即其二，思想上获得了“丰收”，例如在与暴风大浪的斗争中受到锻炼，劳动观念有所加强，“过去在城里看到粪要掩住鼻子，现在却像过去在学校里使用墨水那样自然”等等。还特别强调“思想上的丰收，也还包括我们的垦荒行动使全国青年从思想上受到鼓舞。我们到大陈岛以来，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信有八百多封，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写信来祝贺我们，并讲到我们给他们的鼓舞”^①。

这就是曾经轰轰烈烈的青年志愿垦荒运动的最大意义吗？

20多年以后，当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经历了从兴起

^① 《生产成绩巨大，思想收获更高——大陈岛青年垦荒队驳倒“垦荒队一团糟”的说法》，《浙江青年报》1957年12月27日。

到落潮的整个过程，大批在老垦荒队员之后下乡的知青已经纷纷返城的时候，他们的先驱者，1955年从上海到江西“共青社”的老垦荒队员，却提出了落实政策的要求。他们说，自70年代以来，到江西插队的知识青年，几乎全部又调回了上海，只有我们这些老知青仍然留在农村，现在农村搞包产到户，“我们这些不懂农业技术的人弄得不好饭都吃不饱。”他们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与后来下乡的知青在政治、经济待遇上同等对待；二是要求吃商品粮；三是要求安排子女的工作。

这就是当年的报刊宣传的那些勇敢热情的青年垦荒者吗？

20多年的艰苦岁月，竟仍然没有磨平他们与农民的鸿沟，他们仍然“不懂农业技术”，仍然不能自食其力，仍然认为自己是“知青”而要求国家特殊照顾。那么，思想上的锻炼，成果又在哪儿呢？

限于条件，我们无法对当年的垦荒队员进行量化调查以得出全面准确的结论，也就不知道类似于江西这些老垦荒队员的情况究竟有多少代表性，但至少他们是代表了一部分人。

到1956年年中，青年志愿垦荒运动的失败已成定局。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体制问题，正如湖南省团委在总结中提到的：

半年来的事实证明，青年团搞起了垦荒队，实际上却领导不了，如垦荒队的建党、生产管理、财务管理、农业技术等问题，都不是团自己能够解决的，必须由当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作为一个基层生产单位去领导。

这个问题也被团中央所认识到并在这份报告上指示说：

现在还有个别青年垦荒队，全部工作都由团进行领导，这不是正常

的现象。垦荒是国家移民的一部分，垦荒队员的权利与义务和当地居民完全一样，它的工作应当由各地党委和政府统一管理起来。当然，有关地区的团委也需要采取负责到底的精神，加以关心和帮助，及时地把情况和问题反映给党和政府。

1956年夏季以后，所有的青年志愿垦荒队都经历了这样一场变动，只是这样一来，垦荒队的性质就淡化了，既然是国家移民的一部分，又有什么必要专门成立这样的青年垦荒队呢？

第二个问题是管理不善，这一方面是由于缺乏管理人才和经验，另一方面更是因为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虽然胡耀邦所强调的青年垦荒队的特点是不花国家一分钱，但实际上却接受了国家为数不少的投资和贷款。再加上出发地和抵达地青年、人民和地方政府的捐助，使他们依赖国家的思想相当严重。北京队有的队员刚到萝北就打听着要买收音机，说“没有钱就再向团中央要，”群众反映说垦荒队有全国支援，要化多少钱就有多少钱。当时报刊也曾披露：“有个750人的垦荒队，在半年内就花费国家投资和贷款60多万元。今年（1956年）播种土地的计划收入也只有50万元，即使如数收获，队员也已欠了债”，该队有大批木料和几十名木工，却花费900多元购置了15套贵重桌椅；原计划为750名队员每人做一套单衣，结果却做了1500套，花费9000元。由于铺张浪费和非生产性投资过大，队员们负债加重，即使得到丰收，实际收入也会减少^①。这并不是个别队的现象。

此外，如有的垦荒队在选择垦荒地点时过于盲目，不肯对荒地的气候、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的认真的研究，只是片面强调人的精神。有的垦荒队仅凭年轻人的一股热情就匆忙组队出发，没有对垦荒工作进行周密的计划、认真的部署，也没有配备必要的农

^① 《垦荒事业中也应当贯彻勤俭的原则》，《中国青年报》1956年6月7日。

业机械和设备。有的地方在动员时进行了片面的宣传，如北京就有团干部公然撒谎，说到了黑龙江就可以当拖拉机手，垦荒地点和苏联的共青团城只隔一条江，星期天还可以过江去买东西，致使有的青年空想加多，失望也就加大，害人不浅。还有的地方审查队员不够认真，如吉林市到萝北的垦荒队就已发现有冒名顶替者一人。还有的混进小流氓，这都影响了垦荒的成功。

1956年夏季以后，随着社会青年和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得到突然缓解，年初还轰轰烈烈的垦荒运动受到严重冲击，各支青年志愿垦荒队都出现了难以为继的局面。而且，垦荒队及其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青年集体农庄也不可能长期独立于当地政府的组织机构之外，尤其是1958年，在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中，很多垦荒队被陆续纳入当地的人民公社或国营农场。这场运动到1956年下半年，就已经宣告结束。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5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屯垦戍边的主旋律，是由解放军官兵奏响的，在这里我们再追问一句：如果这场运动没有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参与，效果会有什么不同吗？回答只能是一一不会。至多是没有如此多的热闹，没有如此多的激情而已。

为国家生产更多粮食的美好愿望并未达到，剩下的只是精神，青年人的热血和献身精神。运动失败了，教训却未被认真思考和记取，甚至对失败不敢正视，不肯承认，只知一味颂扬这种精神，直到60年代，当各地的青年垦荒队都已不复存在的时候，宣传媒介仍然在不断地报道着垦荒队的事迹。试问当时的年青人，都知道青年志愿垦荒运动的轰轰烈烈，都知道杨华等垦荒队员在那里度过了青春，却又有几人知道，安心在那里成家立业的，只是以杨华为代表的青年农民而不是知识青年，更复有几人知道垦荒运动最终失败的结果呢？

于是，失败便一次次地重演，直到酿成“文革”期间那场毁灭了一代人青春的无可挽回的大悲剧。

第三章

不平常的夏天

五六十年代的教育与经济发展一样大起大落，每一次大起大落就形成一个周期，每一个周期过后就会有一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也形成了规律。政治上的动荡，经济决策上的失误，每每要以大量青年的不能升学和被送往农村为代价，一代青年就是以如此独特的方式，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付出了牺牲。

1956年的经济冒进和随之而来的反冒进，在建国以来中共党史的研究上是一个大问题，如今已有相当多的学者和当时的领导干部为此发表过文章，但笔者在阅读这些文件的时候却不无惊讶地发现，几乎很少有人提到这次起落对知识青年造成的影响，而在当年，这种影响曾引起过全社会严重的不安，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并成为影响深远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正式开端。

一 1957年的升学就业形势

1957年的这次起落，与1953、1954年的那次相比，要严重得多。反冒进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否则经济就无法纳入正常的运行轨道。一切都在压缩，一切大门都向青年关闭了。这年毕业的中小學生，面临的是空前严峻的形势。这种严峻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大中学校招生数额急剧下降。1957年暑期，全国高中毕业生共约191000人，而大学招生人数仅为107000，意味着有8万左右的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入大学，约占高中毕业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初中毕业生为1095000余人，有795000千人不能升学；高小毕业生为500万多人，有36万人不能升学。这个比例说得具体些，就是大体上在高中毕业生中，3个里面2个可以升学；初中毕业生中3个里面1个可以升学；高小毕业生中5个里面1个可以升学。这与1956年高中毕业生全部升学还不能满足高校招生的要求、初中毕业生多数升学、高小毕业生升学比例达30—50%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尤其突出的是，几万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入大学，这是解放8年来没有过的新问题。

第二，1956年下半年开始“反冒进”，各项经济指标急剧压缩，工人乃至临时工的需要量大大减少，国家机关也开始调整机构、裁减人员。1956年底，国务院发出关于国家机关停止增设人员的通知，规定各专区、市、县及省直各部门，均不得自行在社会上招收人员，并计划在此后两年内，除了在复员转业军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和少数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少量职工以外，基本上不再招收中小学毕业生。这意味着城里的一切部门，包括工厂、机关、手工业社，都向中小学毕业生关闭了大门。而沉浸在迎接社会主义高潮的巨大热情之中，抱着一切就要好起来的乐观情绪的青年们，对形势的这种急转直下毫无思想准备，不满情绪迅速弥漫开来，更加剧了形势的严峻性。

随着1957年度大中学校招生日期的临近，中小学毕业生就业与升学的问题日益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大热点，成为教育工作上，以至整个社会舆论中的突出问题。

何以到了这种地步呢？

如今不会有人再像当年的毛泽东那样，把罪责归咎于“反冒

进”了。反冒进正是因冒进造成了一系列问题才引起的。

中小学急剧压缩招生人数的直接原因，用刘少奇在1957年的话说，就是因为上一年犯了“一项重要的错误”，“就是去年多招了一部分学生，给工作带来了不少的困难”，教育事业发展的太快了，“超过了可能的条件”。

1955年下半年，全国上下都在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而兴奋异常，毛泽东乘胜提出：

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①

在1956年1月2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提出在5—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7—12年内普及小学义务教育的任务。于是，这一年全国中学生的人数比上一年突然增长了32.3%，小学生人数增长19.4%。结果是师资的成长跟不上，据教育部长张奚若在1956年年底的讲话，1956、1957两年估计中学将缺少师资约9万人，小学缺少师资20万人，“成为目前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困难”，加上教育经费的困难，只好采取“戴帽”的办法，完小戴帽办初中班，初中戴帽办高中班，中师戴帽办初中师资短训班，小学教师教初中、初中教师教高中的现象在所难免，到1957年开学时，学校中已经普遍出现了领导薄弱、教师紧张、设备紧张、图书紧张的问题，亦即数量和质量的尖锐矛盾。加上在学校贯彻“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百家争鸣”，而学校事先思想准备不够，也造成一些混乱，有人发牢骚说：“戴上帽子是不容易的，摘掉帽

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22—223页。

子也不是没有问题的，摘帽子是学校工作中的返工浪费。”还有一些地区，乱拉小学教师离开岗位参加中心工作，做通讯员，或占用小学房舍，已到了非加以纠正不可的程度。

1957年在教育战线上“保证重点、适当压缩”的方针，就是这样制定的，这使我们很容易想起1953年的那次调整，可是这次的影响却大大超过了上一次。所谓“适当压缩”，真正压缩起来，就很难“适当”了。上一次受到波及的，还主要是农村学生，这次却波及到城市；上次无法升学的，还主要是高小毕业生，初中毕业生在其次，这次却有很多高中生也无法升学了。

面对如此形势，国家一再强调：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全部逐级升学的现象，在今后很长时间内都将存在，这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正常现象。中、小学教育是普通教育，普通教育是一种公民教育，它的任务是为国家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教养和健康体质的新公民，培养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大军的后备队和接班人。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各级学校的毕业生一律升学。

这段话就其本身来看并没有错，的确无论哪个国家，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升大学，而且即使具备升学条件，也不是所有中小学毕业生都愿意升学，这确实是正常现象。问题是像我国这样一个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一直相当落后，人民对于受教育的要求也未必就比其他国家更强烈的情况下，压缩招生人数，怎么会在社会上造成如此强烈的不满和反响呢？无怪乎当时也有人感到不解，乃至为政府大鸣不平，说假如在解放前，不能升学的许多人只能怪自己倒霉、没钱、读书不用心考不上，现在政府花这么大力量，反而受埋怨，太不公平。

关键问题就在于，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就业出路越来越窄这一严重问题。在于学生除了升学，再也难于找到其他出路。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使城市经济跨上了几乎是单一的国有化轨道。原有的个体工商业、资方企业、小手工业和服务行业，这些本可以

大量容纳就业人员的地方，现在都被并入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它们原有人员也成为国家职工，而国家大中型企业本来就具有建设周期长、所需录用职工少的特点。长期未获解决的农业问题尤其是1956年出现的粮食危机，更限制了国家对工业企业的投资，也使城市难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尽管有人呼吁尽快把国民义务教育实行起来，即国家只负责保证每人受到义务教育，此后升学、就业均由个人自己解决，不要形成全部由政府包下来的局面，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不管，毕业生自己又如何能解决就业问题？政府既然把一切出路都控制住了，再有哪个地方没有管到，又怎能不受埋怨呢？

这样，问题就不仅仅是因反冒进而引起的暂时困难了，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种种弊端的一个总暴露，中小学毕业生找不到出路，正是这些弊端的一个集中体现。

二 城市中的待业青年

中小学毕业生找不到出路的问题不仅农村有，在城市也同样存在着，上一章我们提到，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满怀热情地参加了青年志愿垦荒队。但是，这毕竟是极少数。1949年解放以后，政府曾在大中城市中倾其全力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并且颇有成绩。但是自1953年始，由于经济工作以及教育工作上出现的种种偏差，大批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并有很多未能参加工作，成为一批新产生的无业待业人员。国家为此采取了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措施，但对于家在城市又不能升学的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应该如何安置，却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新问题。

对于这些青年，文化革命前有个通用的称呼“社会青年”，这个称呼所包括的范围，即使在中央文件中说法不一。广义地说，

它指的不仅有未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还有家庭妇女中的青年、个体手工业劳动者中的青年、摊贩中的青年、尚未安置的复员退伍军人以及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青年等，实际上是个成分很复杂的社会群体^①；而在中央的有些文件中，它又专指“现在城市街道上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停学待业青年”^②。从后来的情况看，将其视为停学待业的知识青年的情况更为普遍，它与其他城市社会青年最大的不同就是，尽管国家始终不肯明确，它事实上就是一个失业青年群体，所以只有它存在被安置和动员上山下乡的问题。早在1955年，团中央就曾以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式，为他们定性为“城市小资产阶级青年”，这一定性决定了国家以后对他们的态度。而从现实情况来看，他们既然是没能考上学校又没能找到工作的人，也就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相对于在校青年更为低下的地位。

从解放初至“文化革命”之前，社会青年不仅始终存在，而且数量一直甚为可观，它一直是困扰着政府而又难以找到有效解决途径的问题。

1954年团中央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虽然城市中升学比例一般都较农村大，但仍有相当数量的中小學生不能升学，据北京、天津、武汉和东北7个城市的统计，这样的中小學生估计有66000余人，他们一般年龄较小，16岁以下的占78%，在城市中的就业机会不多^③。而据1955年在一些城市的典型调查，社会青年一般占城市青年总数的30%左右，大城市和沿海的比重更大些，如上海社会青年70万人，占该市青年总数的52%；广州市社会青年136000人，占该市青年总数的37%；郑州社会青年总数为

① 《青年团中央统战部关于加强社会青年工作的报告》，1955年10月。

② 《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社会青年就业问题的调查报告》，1956年8月2日。

③ 《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和领导城市中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进行自学问题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54年8月20日。

24000人，占青年总数的23%。当时估计，全国有社会青年500万人以上^①，考虑到其后几年内不能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生，社会青年的人数还会增多。

1956年的经济过热，使这个问题一度有所缓和，到当年8月为止，上一年的70万社会青年中，已经就业的已达30余万人，但分散在全国各城市的社会知识青年还有30余万，其中有20万是高小毕业生，另外有初中生15万和高中生2万人^②。他们在家中无所事事，看不到前途，因而思想混乱，怨言很多。已有不少人沦为二流子、小偷、流氓、盗窃犯，有的组织反革命集团。据哈尔滨市西区的统计，1954年1至9月份，在该区发生的571起案件中，由社会青年和少年所犯的就达208件，中央承认，这已经成为城市青年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政府当然在设法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但收效都不大。首先，动员他们在家自学，这无异于一句空谈，十几岁的青少年能有多大的自我约束力？家长和社会又有多少精力能够投入到对他们的管理上？何况很多青年或因年龄已大，家庭困难，或因没有兴趣，已经不想再升学，他们迫切要求的是就业。第二，设法为他们寻找出路，可是能有什么出路呢？一是组织青年垦荒队，动员他们和青年农民一道去开荒，上一章我们已经提到了，用这个办法安置的城市社会青年，事实上微不足道。二是教育和组织有条件的社会青年到农村担任会计员、技术员、饲养员、文化教员等工作，协助农业部门举办各种短训班以适应农业合作化发展的

① 《青年团中央统战部关于加强社会青年工作的报告》。

② 《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社会青年就业问题的调查报告》。按上述所引1955和1956两年社会青年的数目，差距太大，究其原因，第一是1955年报告中所说的知识青年是广义的，而1956年报告中则专指停学待业的知识青年，可参见上文。第二，这两年之间社会青年的变动非常大，尤其是1956年暑期大中学的招生人数剧增，已使为数不少的人离开了社会青年的行列。

要求。这一办法，的确实行了一阵，但动员去的人数也并不多。三是动员他们自谋职业，这些所谓职业，主要是个体的手工业劳动，但是在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已经进行之后，又有哪个青年情愿从事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工作，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呢？何况社会当时对这类行业的不断压缩，已使它的容纳量非常有限了。

1956年本是对社会青年来说就业形势最为有利的一年，但据中央17个部的统计，虽然国家计划招收的徒工达十七八万，而且未包括追加数字，已有很多单位说“没有人了”，但分散在全国各城市的社会青年，却仍有30余万人，其中如江苏常熟，只有6.7万人口，却有300名初中毕业生未能参加工作。一方面是国家急于招人，另一方面许多具备就业条件的社会青年又没有就业机会，产生了两头脱节的现象。为此，团中央于四五月间派人到华东、中南等地进行了调查，这些人回来后向中央提交的调查报告，反映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1. 政治上的歧视。

报告称，在现有的社会青年中，30%左右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有的亲属中有反革命分子，有的社会关系复杂、有海外关系，有的本人历史不清或有其他问题，但多数还是家庭和社会关系的问题，本人有问题的是少数。在这些青年中，很多人能够与家庭划清界限，犯过错误的也有不同程度的悔改和交代，他们绝大部分都很年轻，但许多用人单位却过于强调他们落后的一面。如有的单位不看本人表现，光看家庭成分，对他们不加区别地一概拒绝录用。浙江有个初中生胡××，本人是团员，家庭出身是小商人兼地主，其父在改造中表现不好，被判过刑，现已释放，她曾积极检举其父的罪行，但很多单位都不要她。有的单位不问情由地对有海外关系的青年一律不予录用。如天津知识青年钱××，本人是团支部委员，姐姐是党员，只因有个未见过面的伯父在台湾，各单位就都不要他。还有的单位，对犯过错误的青年，不问问题

大小，情节轻重，是否有悔改表现，一律认为是思想品质恶劣而不予录用。

报告还说，有些基层干部（主要是某些公安派出所的干部）对于社会青年不问本人表现如何，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就一律当成阶级敌对分子看待，不能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对于犯过错误或仅有一般作风问题的，虽然已有悔改，仍然采取歧视态度，在向用人单位介绍情况时乱作鉴定，如“可疑”、“值得考虑”等，弄得用人部门摸不着头脑，不敢录用。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诸培恩是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市青联副主席，派出所竟不同意让他儿子参加停学待业学生高中补习学校的补习，并在登记表上写上“其父是反动分子”。

2. 对女青年的歧视。

很多可用妇女的单位不愿录用妇女。如武汉公用汽车公司招收售票员，就不肯要女的，即使录用也要附加条件。湖北船舶修理厂对男女同样可做的工作，规定男的高小文化程度就可以，女的却非要初中不可。有的单位只要未婚者，已婚、有孩子甚至有男朋友的就都不要。结果是在待业青年中，女青年的比例越来越大，在各城市一般都要占到60—80%。

3. 其他莫名其妙的歧视。

有一些单位，只因青年是华侨、教徒甚至少数民族，就认为是落后复杂，嫌麻烦而拒绝录用。如天津回族青年马××，本人是团员，父亲是集二线铁道管理处处长，大姐、二姐和哥哥都是党员，地质部三局和天津自行车厂却因他是回民而不肯录用。还有的单位在文化程度上要求偏高。浙江省有的单位连养鸡养鹅也要初中高小毕业，理由是将来要实行机械化，没有文化干不了。有的单位只要见青年有些生理缺陷就不要，甚至个子的高矮、胖瘦，以及有麻子、砂眼和狐臭，也能成为不予录用的理由。

这份调查报告说，几年来，这部分青年由于就业无门，前途

茫茫，对党和政府有很多怀疑和不满，有的说“政府连劳动改造的机会都不给我”。上海有个团员在极端苦恼的情况下用刀砍伤手指。苏州、天津、四川等地均发现有青年自杀。在福建、江西一些地区，有的青年形成小集团，发牢骚说怪话，甚至被坏人引诱，走上犯罪道路，是值得严重注意的。

该报告针对这些问题向中央提出建议，将社会青年的数字、情况重新作出全面的调查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排队，搞出档案，然后根据中央关于对社会青年要看本人、对政治历史问题要看现在的精神，对他们予以全面的安排。凡本人政治历史问题已经弄清楚的，都可以吸收就业，如果没有弄清，或者是被管制分子，只要不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或者是坏分子，亦可吸收参加一般性工作，给予劳动就业的机会。家庭出身不好，家庭成员中有被杀、关、管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因犯过错误被机关企业清洗或被学校开除的，以及思想作风恶劣表现落后的，都应视本人表现、问题性质、情节轻重及悔改程度，确定其适于参加何种工作，而不应一概拒绝录用。凡适合妇女做的工作，应尽先照顾录用女青年。对于不够就业年龄的，要组织他们补习^①。

这篇调查报告反映出的问题，其实已经相当严重，它表明在经济、人口等因素所造成的就业压力之外，还始终存在着人为的政治因素，这是对人造成伤害最深的因素。对于身受其害的这些青年来说，经济形势再好，他们也仍然有可能前途茫茫，所以才导致了极度的失望。而对社会来说，将如此众多的年轻而有文化的劳动力人为地排除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之外，无情地漠视他们，不仅是一种劳动力的极大浪费，而且最终成为社会发展的一大阻力。

直到“文革”爆发的1966年，社会青年一直是城市进行上山

^① 《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社会知识青年就业问题的调查报告》，1956年8月2日。

下乡动员的主要对象。可以说，“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主要就是为解决他们的问题而发起的。从上述问题的存在可以看出，动员知识青年首先是社会青年上山下乡，从基点上，就存在着不公平的因素。

当然，在开始的时候，问题的发展还不是十分严重。一则它的殃及面相对说较窄，二则也是更重要的是，人们总认为这是解放初期政权尚须稳定的暂时现象。从这份调查报告来看，当时国家也确实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愿望，否则也就不会有这份调查报告的出台了。该报告所提问题中，有的后来确实得到根本扭转，尤其是歧视少数民族的问题，可是其他建议，在紧接着到来的“反右斗争”之后，已经再无实施的可能，特别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不仅未能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

三 统筹兼顾的原则

1956年是个不平静的年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讲话和随之而来的匈牙利事件，在国内文化界、思想界造成了不小的震荡和影响。到1956年末和1957年初，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骚动甚至采取一些激烈的形式即“闹事”。当然，在“闹事”的起因中，国内因素是主要的，对中小学招生人数的压缩和对毕业生找不到出路问题的不满，就是这次闹事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央在年初就意识到了形势的严重。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对于少数人的闹事明确表态：

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

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你急于收场，总有一天他还是要闹。凡有学生闹事的学校，不要放假，硬是来它一场赤壁鏖兵。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

看起来宽宏大度，实际上丝毫不肯后退一步。

然而，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总要拿出解决的办法。毛泽东提出了大原则：

总而言之，全国6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①。

这个原则，就是“统筹兼顾”。毛泽东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城市知识青年“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边疆去”的方向。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历史的人，往往只注意到毛泽东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却未曾想到这个原则才是指导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关键，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全国人民都由国家“统统管着”。

1957年3月，教育部公布了当年高等学校初定的招生名额，面对可能引起的波动，又同时发出“关于指导中小学毕业生正确对待升学和就业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行政部门把这一工作列为当年上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接着，教育部负责人发表了一系列谈话，针对“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往哪里去？”的问题，回答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第339—360页。

说“就是从事工农业生产劳动”，“凡是家在农村的中小毕业生，如果不能升学，就应该毅然决然愉快地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城市学生也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和可能条件去找职业，如果一时找不到职业，就应当参加家庭劳动和在家自学”，并提出在农村适当发展民办小学，在城里中小学继续推行二部制的设想。可见当时中央还没有公开让城镇中小学生在山下乡的决策。

就在这期间，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在河南、河北、湖北、湖南和山东等五省进行了视察，此行目的，就是要处理学生闹事问题和动员中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也就是落实毛泽东提出的对中小毕业生总要有个安排，也可以到农村去的原则，这里所说的中小学生在山下乡，已不仅仅是家在农村的，而是也包括了城市的青少年。

文化革命期间，很多知识青年把上山下乡说成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决策，其根据就是他在在这次视察中发表的一系列讲话。这些讲话的确颇带个人色彩，但他只不过是在毛泽东提出的总原则之下，加上了个人的阐释与发挥，这用当时红卫兵的话说，就是在毛主席的指示中“塞进了不少修正主义的黑货”，可是，毛泽东的指示如此泛泛，实际的执行者不往里面塞进自己的“私货”，又能怎么办呢？

刘少奇每到一处，都要和教师与学生座谈，他在座谈中的讲话，回京后曾授意杨尚昆加以整理，并以在湖南的一次讲话为主，略加改动，交付《人民日报》发表。这就是当时曾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的《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社论——《关于中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下文简称4月8日社论）。这篇社论比之他的一系列讲话，要更具理论性，更严密，但很多要点的表述则含蓄得多了。

这篇社论的要点包括：第一，指出很多中小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参加生产，这是正常的、长期的现象。而去年和前几年，

高中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学，初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学、小部分不升学的情况，才是一种临时性的现象，是中等教育赶不上高等教育发展需要、高中毕业生数量增长未能适应高等学校招生需要的特殊条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现象。情况的变化，表明我国的教育事业已经开始转入比较正常的状态。因此，今年新出现的这种情况，今后还会有所发展。

第二，我们国家对全国所有的人都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问题是如何安排？就全国说来，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现在中小学生在下乡，客观上有需要，也有可能，问题在于思想，在于学校中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缺点，没有引导学生去切实地充分地认识这种客观上的需要和可能。相当多数的学生对下乡种地在情绪上是有抵触的，他们的态度是消极的。主要思想问题，一曰下乡种地“丢人”、“没出息”，这是由于中国文化落后，知识分子少，现在的青年学生还远远没有摆脱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的那种骄傲自大的劣根性的影响，不懂得尊重劳动和劳动人民，因此必须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点解决这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二曰下乡种地“没有前途”，这一方面是轻视劳动、轻视农民的另一种表现，一方面是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地位、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作用了解不够。如果从今年开始，每年有近百万以至100多万的中学毕业生下乡，5年以内有400万至500万中学毕业生去参加农业生产，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工作和农业的技术改革就将得到一个极大的推动力量，就将促进我国农村实现另一个根本技术改革，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空前地向前大发展。

第三，劝告下乡学生先老老实实去种地，用心搞好自己同农民的关系。这样，讲种地，他们和原来的农民一样；讲文化，

他们比原来的农民更高；讲政治，他们和其他农民群众的关系很好。他们就会真正成为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他就有可能由人民群众选出来当人民代表，当合作社的干部，当国家机关的干部。这样的干部才真正是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而不是从上面硬派下去的。青年人参加生产以后决不要停止自己的学习。大学毕业生并不每人都科学家，科学家也并不每个人都是大学毕业生。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这就是下乡种地的学生的前途，这个前途是光明的、伟大的，然而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和锻炼。劝告一切干部和一切青年，要向那些“傻子”学，从长远说来，光想占便宜，生怕吃亏的人，在最后是要吃大亏的，而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自己吃亏的人，最后将得到他所应得的待遇。

看一看刘少奇视察时在座谈会上的一些讲话，^①对这篇社论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了解。2月，刘少奇首先抵达河北保定和石家庄等城市，当时该省正定县发生学生闹事，刘少奇认为，对于闹事，恐怕是不能不准闹。宪法上写得很清楚，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是合法的，反对闹，就违犯了宪法。对闹事既不能不管正当与否就让步，也不能采取高压政策，因为高压会使群众更有气，他们总会找到哪一年闹一次大的，闹个暴动。所以他告诫当地政府不要再压了，舆论上压力很大，造成了紧张局势不好。要缓和一下紧张局势，做一点工作，有一些裂痕要弥补，不要越弄越宽。

他提到了这年的毕业生面临的困境，就是“一不能升学，二不能进工厂，三不能当干部，四不能当教员。刚才有的同学说要服从祖国需要。祖国说不需要你升学，那么什么地方需要呢？城

^① 刘少奇的这些讲话，曾经刊登在“文化革命”中的各种红卫兵小报中以供批判而搞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参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9—11页。

市需要一些，手工业需要一些。理发、裁缝、饭馆跑堂的需要你们……但是，安排手工业也是少数”，“不能升学干什么？进不了学校怎么办？大家要求就业，找点职业，要求国家有所安排。我想这个要求是正常的，国家对你们应该有所安排。安排你们做什么？一个是进工厂做工。去年工厂工人招收多了，今年增加不了多少，就业就工业的机会很少，明年机会也不多。二是当干部、售货员也不行，现在机关正在精简，现在小学教员也多了，想当也没有小学教员当。有的人会暂时没有工作。毕了业就要马上派工作，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派工作不是很方便的。今后就要挤了。国家是要派工作的，有的需要等一下，这也是常事”。

所以，只能将绝大多数人安排去就农业，就农业也是就业。他强调说，安排你们做什么，我说只能这样安排。你们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如果你们有好的办法，我们就照办。你们示威游行，不安排就闹事，大家能不能想出其他的办法。我们讲，大多数人还是下农村去种地。

为什么要动员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务农，恐怕没有比刘少奇这段话讲得更实在、更明白的了。

在第一章我们就曾提到，动员知识青年下乡，不能只一味要求他们做出牺牲，刘少奇对此再明白不过，他十分清楚知识青年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前途，所以，以下乡种地同样有前途来劝说知识青年下乡，就成为他这一系列讲话的重心。

首先当然要摆出大道理。刘少奇说，有人认为下农村去种地丢人；回家种地结婚有困难，乡村姑娘不要他。还有人说，去年能升学，今年不能升学是自己吃亏了，运气不好，认为下乡种地是倒霉的事，是丢人的事，没出息。认为做手工业也是丢人，也是倒霉的事，吃了亏。你们提出加强学校的政治教育，这一点就是政治教育问题。你们认为下乡丢人倒霉，没有出息，吃了亏，这是什么观点？是无产阶级观点？劳动人民观点？还是资产阶级观

点？剥削阶级观点？我说这是资产阶级观点，这是剥削阶级观点，这些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听到这种舆论就要驳，如果听到不驳，至少是政治上落后。认为理发、大师傅是没有出息、丢人，这是资产阶级观点，是贵族阶级观点，把你们自己看作高人一等，比大师傅、理发的、种地的高一等，这就是贵族阶级观点，就是资产阶级观点。你们的父母都是农民，你们都是农民的儿女，认为种地丢了人，你的父母兄长丢了人，你的祖先丢了几代人，你为什么不能丢人呢？这是脱离了劳动人民，受了一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学校要改变这个观点，农村也要改变这个观点，从社会上把这个观点改变过来。这个观点是剥削阶级的观点，是侮辱农民的观点，至少这是看不起农民劳动者，如果学校不驳，就表明我们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是非常薄弱的。

说到农村种地光荣、有前途，当然不能仅仅是一句空话。刘少奇说，有些学生回了村急于当会计，先不要当干部，尤其不要当会计，当会计有钱，容易出乱子，先当一般农民，跟农民学习，学习他们种地的知识，他们也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的文化，但是你们学习农业容易，他们学你们的文化不容易，等你们学好了技术，农民就信任你们了，就选你们当代表，到县里、到省里，还可以到中央。中央有几个上过大学的？他还更具体地安排说，学生下去后，第一年少做点劳动日，第二三年即当个好劳力，第四五年即可当劳动模范了。高中毕业生也要先种地，种三五年地当个队长，再锻炼当社长、乡长。

3月份在河南的讲话中，他把这点阐述得更明白：

你们刚刚回到农村，不要当干部，不要当会计，要先去种地，犁田、耕地，真正学会做一个劳动农民。种地不是一年能够学会的。你种三年五年地，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好的农民。现在你们大多数还不是农民，还没有农民的资格，还不会种地。学会种地以后，凡是农民能够做的事情，你们都能够做，但是，你们能够

办的事，农民办不了，他们没有读过书。讲种地，你们和农民一样；讲文化，你们比农民高。一会种地；二有文化（你们高中毕业了）；三和农民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人家都说你好，不说你不好，农民赞成你，说你是个好人的，能够帮助群众。假若有这三个条件——会种地，有文化，政治上好，那时候会怎么样呢？乡里不是选举吗！就可以选你当社干、乡干，当乡长，当县长，这样就当上干部了。但是，必须有这三个条件。你们好好在乡里搞，将来还是可以当干部的。也可以进城。将来人都是要死的，北京的人要死，省政府的人、厂长、铁路局长也要死的，你们也要死的，但是，你们年轻不会死得那么快。我问你们，我们死了，省政府的人死了，厂长、铁路局长死了，谁来干呢？就是年轻的人，就是现在的小孩子来代替么。但是，代替不是那么快的，不要性急，急躁冒进是要犯错误的。这些人要死是肯定的，你们年轻也是肯定的。你们有文化，但是差两个条件，一不会种地，二是政治差，只要这两个条件搞好，一个是学会种地，一个是要和人家搞好关系。就要在人家面前吃亏，不要占人家的便宜，不要怕吃亏，这样关系就会搞好，农民就会拥护你们。

你们下乡去种地，前途是光明的，不是黑暗的。我打个比方，你们三个高中毕业生，两个上大学毕业，一个回农村种五年地，将来种五年地的比大学毕业的差得很远，我看不可能，可能还会好一些。不上大学当农民种地，知识水平可能比大学毕业的好，不要迷信大学。我们一百多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大学毕业的很少。当然，我们那个时候是革命时期，你们是建设时期。只要自己有文化水平，初中、高中这一关突破了，能看东西，又会种地，将来大学生是不会种地的，所以你们去种地，不一定比上大学吃亏，又能占便宜。中国农民是没有文化的，现在中国农村很需要一批这样有文化的农民。将来我们农村要改变的，农业要机械化，科学化，需要有文化的人才能把农村搞好。

乡干部你们不是不喜欢吗？假若有你们初中、高中毕业生到农村去事情就可以办得好。每年100多万初中毕业生到农村，农民就有文化了，你们不是说乡干部强迫命令吗？将来农村初中、高中毕业生多了，强迫命令就少了。有了文化办法才多。所以很需要这一批人到农村去，改变我们农村的面貌，这不是祖国的需要吗？

在河南许昌的学生座谈会上，他又一次强调了“第一代”的好处，他说：“你们是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第一代是要讨得便宜的，参加革命我是第一代，现在成为中央委员，第二三代像这样就不成了。”他后来在上海对党员干部谈话中解释这话的意思说：“恐怕这样一讲，他们下乡种田，也就高兴一点，而不是倒霉的下乡种田，垂头丧气的下乡，而是高高兴兴地挺起腰杆子下乡。他会认为我要实现我的理想，发展前途更好。”

显然，这是刘少奇在这次对知识青年下乡的动员中说得最直露的一次，也是他所认为的最能打动青年之处。从此，“做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成为当时下乡落户的知识青年喊得最激动人心的、最响亮的口号。

“文化革命”时的大批判说，在刘少奇的这些讲话中，浸透了他的人生哲学，这话其实不错，这正是他最富个人色彩的部分。譬如，他特别注意和农民的关系问题，一再劝告青年要和农民搞好关系，这虽然被人讥为庸俗，实际上，对于刚下乡的青年，这种劝告恰恰抓住了要害，他说：

回家以后，看见有些不正确的事情，你们不要看到就讲。要观察，暂时不要讲，不要去批评乡干部，要多看，看清楚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城市读书，离乡十几年，你们不了解情况，你们看得不全面，你们年轻，你们没有经验。所以你们至少三年到五年少讲话，多看少批评。看到违法乱纪的事情可以提出来，找上级讲，到县委去讲。能够解决的解决，不能够解决的要等一下，

等到三年五年看清楚了，看全面了再讲。乡干部大部分是做了好事又有缺点，只有一少部分是好人没有缺点，另外有一小部分根本不是好人，而是坏人，这是极少数。农民不占点便宜哪有那回事呢？所以要想做得好，就要等待，不要一回去就批评，哇啦哇啦乱讲一通。如果你们搞宗派主义，那你们是斗不赢的，是会犯错误的。

你们刚才说乡干部不好，不好是因为什么呢？主要是不想吃亏，想占便宜，不想干苦差事，分配的时候，贪污一点，多照顾一点亲戚朋友，这是不对的。你们要想和人家关系搞好，就不能占便宜，要自己吃亏。吃亏一次二次人家认为你不是好人，十次八次也可能还认为你不是好人，一年十年二十年长期做下去，永远做下去，人家就会认为你是好人，就会拥护你。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和人家关系就会搞好的，这是基本的。

回到农村去吃点苦，要受累，你们是年轻人，不要怕受累。刚进大学也要累的。

刘少奇所反复宣传的这一思想，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归纳为“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反动人生哲学，成为他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罪状。事实上，他以老一代革命者虽然历经艰险，丢弃一切但最终获得了很高的地位、荣誉、权利等的经历所给予青年的这种相当明显的暗示，确实是当时动员工作中最能打动那些有理想、有抱负青年的部分。而从以刘少奇为首的国家领导人方面来说，动员知识青年下乡，虽然主要动机是解决城市人口、就业的危机，但从治理国家的角度考虑，他们也确实期望能以这种途径培养出一批农村干部，以作为党和国家在农村推行各项政策的社会基础。

刘少奇这一系列讲话，是指导1957年首批城市中学毕业生到农村落户工作的纲领。而4月8日社论，则是中央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重要文件，“是几年来报刊上向青

年进行关于参加劳动生产的宣传中最有说服力的文章”^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四 社会的反响

接下来的几个月，是个相当动荡不安的时期。据当时报刊估计，对《人民日报》4月8日社论，持完全赞成态度的是少数，完全反对的也是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一部分，不赞成一部分，或者是在道理上赞成，在情感上还有抵触^②。事实上，社会上对这篇社论的抵触情绪恐怕比这个估计更甚。

意见首先集中于教育问题上，在反右斗争开始之前那种政治气氛比较宽松的背景下，很多人在整风中提的意见相当尖锐，仅以报刊公开披露的为例，如河南有人提出：现在是以搞运动的方式办教育，老头扫盲，儿童却不能升学，上边扫着下边出着，一年一个新口号，都是极端。北京市的一些政协委员提出，教育部没有明确的教育方针和全盘的计划，进行劳动教育也是冷一阵热一阵，很不经常，使学生对生产劳动没有正确的看法。南京市很多教师提出，去年招生部门到处抢毕业生，今年再进行劳动教育就存在很多不利因素；湖北省恩施一中毕业生提意见说，思想工作存在很大片面性和突击性，去年号召向科学文化进军时，就说将来都可以当专家，坐“包车”，今年猛转劳动教育，思想就有很多障碍^③，贵州一个中学生给报社写信说：“在最初关于一些对中小学毕业生的文件中说，今年的招生数比去年略有缩减，大部

① 《组织各个岗位上的青年学习人民日报〈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中国青年》1957年第9期。

② 同上。

③ 《恩施各校师生代表在张体学同志召开的座谈会上尖锐批评党政和学校领导上的缺点》，《湖北日报》1957年5月7日。

分同学还能继续升学，最近又说绝大部分毕业回农村从事农业，到底今年国家是否招生呢？《人民日报》4月8日社论使我思想更加模糊，不能升学就是失学，失学是一件很苦恼的事，像工人失业一样吧？现在不但没有向前发展，而且连原来的都不能巩固，还说是国家的知识分子增多了呢！”^①对于这个转得如此之急的弯子，领导和群众都缺乏思想和心理上的准备。对国家教育经费投入太少的不满也有所流露，如有人抱怨说“青年要升学，国家却把经费用去搞维持和加强自己政权威力的重工业了”云云。

其次，在要么升学读书，要么下乡当农民而几乎没有第三条路的情况下，学校的招生人数、录取标准，便成为非常敏感的问题，其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也成为学生和家注意的焦点。不少人对干部在招生工作中的作风提出尖锐批评，如在江苏省人代会上，南京市教育局长提出，去年个别地方有的毕业生平均分数考得很好却没有录取，有的功课考零分的却进去了，甚至有的没通过考试也进去了，群众意见很大。有人说：“共产党一向大公无私，就是招生大公有私。”一位县教育局副局长也提出，当地检察院有位副检察长去年硬要安插一位成绩不合录取标准的学生，教育部门坚持原则，他还告到专署。^②在河南省教育厅召开的非党干部、教师座谈会上，也有与会者提出，厅领导对高级干部迁就，不坚持原则，大干部的子弟考不上学，教育厅就出面“保送”，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还有一些学校的教师提出，有的干部打电话到学校，要求对自己的子女在升学上予以照顾，甚至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使学校深感干部家长工作最不易做；湖北省政协召开座谈会时人们也提出：干部不能有特权思想，建议考学校一律要平

① 寒光：《我的认识》，《贵州日报》1957年5月9日。

② 《要求本着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精神，妥善处理中小学毕业生的问题，紧迫的中小学毕业生问题成为前两天人代会中初等教育专业组代表发言的中心》，《新华日报》1957年5月12日。

等，不能因父母是党员、是负责干部，或是高级民主人士而有所照顾。

对招生工作中存在着不公平现象的意见，已经涉及到家庭出身。如常熟市有学生家长提出，该市招生时，本来考试后已发榜，后来不知为什么，竟把已公布的名单中的工商界子弟剔除。在国务院6月份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参事金汉鼎也谈到，虽然中央没有明文规定对剥削阶级子女有什么约束，但实际上受到歧视和种种限制，他要求对地主、资产阶级子女在读书和工作等方面给予真正的平等待遇。从中可见，在教育中贯彻阶级路线的做法，在反右运动开始之前即已初露端倪，并曾引起当时社会上一些不知深浅的人的反感和抗议。

此外，不满还集中在招生标准的不一致。很多地方要求政府取消保送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入大学的规定（据1957年4月教育部做出的规定，中学和师范学校的保送生以不超过招生总数的15%为原则，但这已是个相当大的数目了）。要求城、乡招生比例一致，反对城市招生人数多而农村少的做法，要求公布招生比例，要求全国统一招生，等等。

对于考不上就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学生、家长和教师普遍想不通。“对4月8日社论，群众思想上都很抵触，认为这是浪费人才，怀疑这种提法是否正确。初中毕业生抵触情绪更大，认为不能升学去当农民，就是葬送了前途、毁灭了理想，因而思想很混乱，学习也不安心”。^①据河南省郑州市对几个学校的了解，解决思想问题的占20%，理论上通，实际还有顾虑的占40—50%，抵触情绪很大的占30%余，特别是干部和高知家长，不满情绪更强烈。又据河南潢川县毕业生指导委员会的调查，在该县应届毕业的900多名学生家长中，有200多人因家中缺乏劳力或其他原

^① 《武汉市是怎样组织城市学生下乡的？》，《中国青年报》1957年8月3日。

因不准备让子女上学，有500多坚决要求子女升学，100多人要求升不上学留原校继续学习，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抱正确态度。一个邮电工人对儿子说，升不上学，下乡生产可苦了，一个强劳力一年只收入100余元，可当上干部一个月最少30元。还有一个哥哥在给他上小学的弟弟写的信中说：

这学期你就毕业了，赶的时机是多么不好啊，我也不明白国家为什么招生这样少，父亲为啥要打你呢？不是想叫你考上中学将来生活有出路吗？如今你睁开眼睛看看，凡是吃好的、穿好的、有钱花的，哪一个不是有文化的人？哪一个不是干部？如果落榜了，我同意父亲的说法——滚出家庭去①：

学生本人的思想也不通，如一个初中毕业生给报社写信说：

上了9年学，是有了一部分知识，但体力很弱，做那沉重的体力劳动是顶不上的。别人每天得12分，而我也就只能得五六分。念了这些年书，是白费了，还不如提前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不升学了，在劳动中锻炼自己，那么到现在也是一个很棒的庄稼汉，倒比中学毕业生强，可以得12分，能够维持家庭生活。这不是由上学引起的不愉快吗？到农村，你有文化不也是锄地？文化有什么用？要是叫我们早种地，既能减轻国家负担，自己也有个劳动能力，不是一举两得吗？如今使我多失望呀！②

言词比较激切的，如广东海康县副县长、民主同盟负责人吴林在高中毕业生座谈会上说，高中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是大材小用，杀鸡怎能用牛刀？可现在没有牛，只好用来杀鸡了。他还提

① 《一封威逼弟弟升学的家信》，《河南日报》1957年5月21日。

② 宋英，《参加农业劳动不是白上了九年学吗？》，《天津日报》1957年7月17日。

出应该让高中毕业生与那些文化水平低的机关干部换班，含蓄地指责政府把知识看成是罪恶，让学生下乡劳动其实就是劳动改造，等等。也有不少学生顾虑重重，普遍反映说，自己思想好通，家庭一关难过，社会压力太大。有的学生要求政府组织他们到离开自己家乡远的地方参加生产，甚至宁愿到边疆垦荒，也不愿回家乡。

与此同时，退学风越刮越猛。湖北有个乡党总支书记把自己已读到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叫回家，影响了18个学生跟着退学，家长们说这叫“学生也要转业”。为了躲避下乡，很多女学生早婚、早恋，一般年仅十四五岁，最大不过十七八岁。如湖北崇阳县药材公司有个30多岁的经理，竟与一个14岁的女学生订婚；很多教师白天在学校动员学生下乡，晚上加紧为自己的孩子补课；有些地方的学生集体求神问卜；社会上又出现了不法分子冒充某厂、某矿招工人员到学校、农村招摇撞骗的现象，如四川大足县有个人冒充永川煤矿机械科科员，到处说永川煤矿技术学校、荣昌电力厂要招收学工，几十名学生被骗，在校学生和已回乡生产的纷纷报名投考，有的连夜赶进城照相，借考试费，类似这种情况在四川内江、绵阳、乐山、泸州等地都有发生。学校和有关部门，面对这种新情况，工作也不时出现问题，有的突击进行劳动教育，占用了很长时间，防碍了正常教学，引起学生反感；有的宣传教育简单化、一般化，以动员学生表态、填志愿表等形式化做法代替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也有些学校怕引起学生思想混乱而影响学习，动员工作迟迟不前。

到5、6月份高考临近前夕，形势已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学生自杀的惨痛事件时有出现，有的地方矛盾再次激化甚至又发展为“闹事”，如上述广东海康县，在副县长吴林的“煽动”下，有一些学生到报社，抗议该报关于毕业生思想都通了的报导；苏州一中的高三学生开会作出决议，要求政府取消保送工农速成中

学学生入大学的规定，将考不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全部包下来，还邀集其他学校代表联合开会，又向全国各地中学发出143封呼吁联合行动的信件；天津47中学生在校内散发传单，扬言“绝不回农村”，要求学校设立高中（该校原来无高中），还制定了游行路线，准备联络外校学生一起游行，到市人民委员会请愿，校内秩序一度陷入十分混乱的状态^①；山西省有的学生声称考不上学就要一起到劳动局要工作，不给工作就捣烂劳动局的大门；河南省也有个别学校发生学生闹事。这些活动，都是在后来的报刊上作为“右派分子”的罪恶活动和反动言行予以报导的，恐有与原话、原行动不符的成分，但学生中酝酿的这股情绪，由此可见一斑。

“闹事”的高潮，是震动全国的“汉阳反革命暴动事件”。据当时官方报纸记载，6月12、13两日，湖北省汉阳县一中有800多名学生（占该校学生总数的2/3以上），听信了“今年升学比例只有5%”的谣言，举行罢课、游行，提出许多反动标语和口号，捣毁汉阳县委、县人委机关，绑架殴打革命干部，还拥到兵役局，企图捉拿兵役局长，事后又分头下乡进行欺骗宣传。据说，这场事件是由该校副校长王建国（共青团员）、副教导主任杨松涛、教员钟毓文、民盟盟员杨焕尧等“十多名历史反革命、历史特务分子、对党不满分子组成的反革命集团”煽动起来的。

针对这一系列事件中央一直在积极寻找对策。早在4月8日社论发表之时，政府就已预见到会有“闹事”的可能：

目前学校工作是党的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最突出的是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处理不恰当，是可能发生闹事的，应该当改进学校工作的一个全面的问题来解决，万一发生闹事，领导应该保持清醒，本着处理人

^① 《天津市中等学校反右斗争获重大胜利》，《天津日报》1957年9月29日。

民内部矛盾的立场予以解决。

从中央到省、市一级领导都动员起来投入了这项工作。

按照从1954年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生产一事所取得的经验，第一步照例是进行声势浩大的宣传、教育和动员。

社论发表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小学应届毕业生举办了特别节目。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向全国中小学毕业生作了“勇敢地投入劳动者的光荣行列”的讲话，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谈了“学习和劳动”的问题。各大报刊也纷纷发表社论，报道各地回乡青年和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先进事迹。宣传的调子，当然是根据4月8日社论而定的。

各地党政部门发出通知，要求所属部门的党、团员和群众认真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很多省、市闻风而动，召开了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座谈会，领导亲自参加，回答代表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4月12日，南京召开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会，江苏省副省长管文蔚向高中毕业生谈了升学就业问题，提了三点意见：一到生产岗位去，主要是农业生产，把所有的农业生产经验都接受下来；二是把自己锻炼成为不怕苦、不怕困难、爱劳动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统一的完整的人；三是到艰苦环境中去求经验，求实际知识。14日《新华日报》全文刊载了管文蔚的讲话。4月19日，江苏省委书记刘顺元、许家屯又接见了9名参加生产和工作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对他们说：“你们是带头人，你们是方向。”“能吃苦头的，过去是解放军，现在是你们。”接见时无锡县后宅乡建中农业社主任周根英说：在农村参加生产的初中高小毕业生中，有许多人跑出去了，只有积极分子被组织上留了下来，因此群众反映“先进分子农业化，落后分子工业化”，刘顺元回答道：“你们加紧工作，努力把生产搞好，农业化并不比工业化差。”南京市鼓

楼区丁家桥街道办事处王素珍说：“在居民工作的岗位上还有1950年的毕业生，他们都是很积极的，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就业。群众有怀疑，他们自己也有顾虑。”许家屯说：“积极干居民工作不是吃亏，虽没就业，生活上差一些，但受到了锻炼，不比就业的差。”王素珍说：“他们就是怕没出路。”刘顺元说：“出路有，多得很，如江宁刘天有的合作社，还缺少70个劳动力。我们还有很多荒地，可以开垦。我们想办法组织一下。”^①

4月22—27日，广东省召开中学生代表会。省委书记陶铸亲自出面向学生做思想工作，“使学生代表心服口服地”接受了“从事农业生产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针”的政策。会上有学生问，城市学生怎样在农村安家立业？陶铸回答说：“这个问题好办，现在农村高级合作化了，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只要参加劳动就有工分。城市学生家里没有田地没关系，毕业到农村去，政府会和农业社商量好安排的办法。”陶铸还告诉大家：“到农村去要做三条准备：一要劳动；二要农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这样就不会饿肚子；三要有房子住，不会露宿在外面。几年以后，生产搞好了，就可以成家立业。”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改变社会上轻视体力劳动的风气的办法，陶铸说，除了在社会上造成舆论以外，还要规定几项制度：一是全省不再增加干部，今后只能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干部；二是军官、干部不能到中学找学生谈恋爱；三是干部、教师有子女升不了学，要带头从事农业生产。据报道，通过这次会议，消除了到会学生各种各样的抵触情绪^②。合浦县学生钟庆来开会前，同学们吩咐他来“挽回大局”，他说：“我把同学的问题都一一提出来，但一一得到解答，我驳不了，全都被说服了”。

① 《江苏省委书记刘顺元、许家屯接见9名参加生产和工作的初中高小毕业生》，《新华日报》1957年4月19日。

② 《广东、上海召开中学生代表会，陶铸、柯庆施同志和学生代表座谈》，《中国青年报》1957年4月30日。

河南一直是人口最密集的一个省，自1955年始就一直致力于向边疆地区的移民，1957年教育紧缩之后，它也成为毕业生压力较大的省份之一。刘少奇亲临河南视察并向应届毕业生代表发表讲话之后，郑州市委书记刘必向全市中小学毕业生传达了讲话，在学生中引起不小反响。当月，省委书记处书记杨珏又在宣教工作会议上作了《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加强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提出要将今年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生产的安排问题，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郑州、许昌等城市和其他城镇，都组织中学生对《人民日报》社论、刘少奇讲话和杨珏的报告进行了讨论^①。

4月26—28日，上海市召开了1957届中小学毕业生代表会，上海市长柯庆施也和学生代表进行了座谈。代表们反映同学们对社会舆论压力很有顾虑。柯庆施说，这种社会压力，我们一定在会议上、报纸上想办法消除它。社会上还有一些阿飞，这也是压力，要作斗争。有个学生说：“我早就知道这次会议是打通我的思想的，我打算不让你打通，但听了报告以后，觉得的确对我有帮助。”^②

重庆的气氛要比上海轻松。市长、市委书记出面与学生一道开了“家庭会”，强调说这不是谁打通谁的思想，而是家长和子女坐在一条板凳上商量家务事。武汉市也由共青团、政协等部门出面召开各种座谈会，希望中小学毕业生能达到三个要求：一是认识到中小學生少部分升学，大部分参加农业劳动是正常现象，认识从事劳动是光荣的，具有很大意义的；二是做到对自己的出路有三种准备：升学、劳动、暂时自学；三是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

① 《郑州两万多学生讨论升学、就业问题》，《河南日报》1957年4月9日。

② 《广东、上海召开中学生代表会，陶铸、柯庆施同志和学生代表座谈》，《中国青年报》1957年4月30日。

并强调虽说毕业生的主要出路是从事农业生产,但并不是唯一的,无论就什么业都将出于学生自愿。总之,各级领导的态度还是缓和的,以劝解为主的。

与此同时,对于群众意见较大的干部在子女入学上特殊化的问题,有些地方也采取了措施。如中共江苏省委发出通知,严禁干部通过私人关系解决子女升学问题,刘顺元特别指出,升学问题要公事公办,一律不准徇私,省教育厅长吴天石也表态,如果儿子考不上学校,就参加生产或自学^①。中共湖北省委也发文件提到,目前已开始发现,有的干部对待自己子女升学问题,采取某些不正当手段,各级党委应该严格地监督和制止这类行为,展开批评,必要时还应当执行纪律^②。

一些省市已经行动起来,开始进行组织城市学生下乡的试点。

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安排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的指示》,明确提出:“对于不能升学的学生安排,除开华侨子女由国家负责适当安置,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原则上应该由原单位或人事部门安置外,基本的方法是动员说服(绝不能强制)他们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和在家自学等待就业或升学。这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所必须采取的方针。”

6月26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

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过去这个方针是不够明确的。我们的中小学学生毕业后除了一小部分升学以外,多数都应该参加工农业生产。高等学校中也应该加强劳动教育,学生毕业后一般地应该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今

① 《升学问题公事公办,一律不准徇私》,《新华日报》1957年5月9日。

② 《中共湖北省委通知各地认真学习〈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文件》。

后应该对此定出一些制度，逐步实施。

表明中央在要求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的问题上，决心已经下定。

但是，在8月以前，尽管中央投入了大量精力和人力，整个工作的进展情况却不尽人意，阻力不仅来自社会和家长、学生强烈的抵触情绪，而且来自那些直接负责此事的干部。《中国青年报》曾针对此事批评说，有些地方在宣传参加生产重要的同时，更大谈升学同样重要；谈参加农业生产是主要出路的同时，也谈存在其他种种出路，如可以参加其他方面的生产和组织自学，而且特别强调自愿。在一些干部的思想中，也是“对组织自学，办补习班，安排到手工业、服务行业去考虑得多，甚至想靠办补习班和民办中学来把毕业生包下来”^①。

北京市委的态度就是典型的一例。这也可能是北京市的毕业生压力毕竟较小的缘故。就在《人民日报》4月8日社论已经明确将城市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作为一个方向提出来之后，北京市委仍然认为，下乡主要还是家在农村的学生的事情。5月4日，市人委会举行行政会议时提出，对于考不上学校的中小学毕业生，除了农村子弟要尽可能回家生产之外，其他的学生应该分别用自学、就业或等待就业等多种方式来进行安排。5月8日，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在市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更进一步指出：“愿意就业的人，应该耐心地等待机会，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新建厂职工都已满额，加上目前各单位都在紧缩编制，精简机构，所以就业的机会不多，需要在家自学，作家务劳动，等待机会。”可见尚没有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打算。

刘仁对当时大张旗鼓地宣传让中小學生下乡务农还颇有微词。他强调说：“现在进行这方面（指动员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参加

^① 《组织城镇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中国青年报》1957年7月6日评论。

农业生产)的宣传中,似乎又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单纯地鼓励中小学毕业生去参加劳动生产,忽视了对他们学习的帮助和鼓励。应该认识到,学生愿意投考高一级学校,这种愿望是好的。学校和家庭首先应该鼓励和帮助他们投考,而不是说叫那些自己愿意升学也能够考入高一级学校的学生去参加农业生产。”^①

相当一批干部对组织城市中学生下乡一事态度消极,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因子女也是这年的毕业生,唯恐这一做法危及到自己子女的前途;有的认为“动员城市学生下乡,要组织,要安排,太麻烦”,而视为畏途;然而更多的恐怕还是转不过弯来。的确,这个办法与人们通常的习惯、想象相差太远,让城市里的学生去当农民!这太激进、太大胆了。人们觉得,这只是迫不得已才做的事,即使真的将它付诸实施,也不会是一天两天的事,他们没有说做就做的思想准备。这样一来,4月8日社论中明确提到的“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出路是参加农业生产”的思想,就被大大冲淡了。

五 改造的历程

反右运动的开展,使很多人们原来认为不可能的事变得可能了。如果没有这场反右,我们很难设想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务农的动员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当然,历史是不存在假设的。

8月以后,中央的态度转而变得严厉起来。在当月由教育部和团中央联合召开的8个省和8个大中城市关于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工作的汇报会议上,针对学生的闹事问题,中央提出:

^① 《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小学教育的任务,各方面共同负责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北京日报》1957年5月8日。

部分学生企图用闹事的办法来出气或迫使政府让步。目前虽然由于考期紧迫，学生忙于准备升学考试，表面还属平静，但许多地方实际仍很紧张，若干地方已闹起事来，小孩子不知深浅，感情冲动，容易一触即发，或为坏分子所利用，各地应实行釜底抽薪的方法，即做好思想工作 and 自学、就业工作，积极防止闹事。其措施，1. 继续武装学校干部和教师的思想，加强对家长的宣传，正确阐述城乡关系和工农生活对比。2. 消除各种可能引起闹事的导火线，今年比较突出的问题，首先是坚持中等技术学校今年不招收中学生的方针，必须上下左右统一口径，反复解释清楚，不要含糊。其次是干部子弟的入学问题，必须实行公事公办，一视同仁的原则，不得有任何特殊照顾，江苏省提出去年从后门进去的，今年要从前门出来，经过考试再进去，我们认为既往可以不必深究，但今年务必照章办事，高干和军官必须起模范作用，不提要求照顾。再次是升学考试问题，出题必须合理，评卷必须公平，发榜还可以适当分散一些，以减少集中大闹的可能性。总之，各地应明确，中学生不能搞鸣放，各级党委都应当检查一下本地区可能引起闹事的原因，及早加以消除。

该报告还特别强调，要教育中学生，不要把搞大民主当游戏。中共中央在对这份报告的批示上说：“升学考试这一段时间，最容易发生问题，各地必须切实注意积极想办法，多做工作，尽可能地防止学生闹事。”^①

此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加上新生考试揭榜的临近，中央决定采取措施。8月6日，教育部和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共青团组织和学校加强领导，严密警惕右派分子在毕业生特别是不能升学的学生中进行煽风点火的挑拨活动。教育学生认清右派分子的阴险面貌，及时揭破他们所散布的各种谰言，教育毕业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升学和从事生产劳动的问题，要

^① 《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和青年团中央〈关于当前中小学生工作的一些情况和问题的报告〉（1957年8月）》。

他们相信党和政府，紧密依靠组织，而不要去听右派分子的话，接受他们的煽动。对于一些流氓、不法分子借招工、介绍职业为名在毕业生中进行招摇撞骗、违法乱纪的行为，各地应当严密注意，一经发现，即应协同有关部门严肃处理。同时，也要嘱咐学生不要上当。

通知说，在新生考试发榜前后，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以及共青团组织，应即组织力量，开展对毕业学生的教育工作和对他们家长的宣传工作。原毕业学校尤其要着重对那些思想问题较突出和实际困难较多的学生给以关怀和帮助，消除他们的悲观情绪。

通知还说，组织城市学生下乡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项艰巨、复杂、细致的工作。各地应根据已有的经验，分期分批地进行，每批的数量不一定太多，但必须使其巩固下来，为今后组织城市学生下乡参加农业劳动打下可靠的基础^①。

把组织城市学生下乡务农与反右运动联系在一起，把原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升为敌我矛盾，性质发生了突变，气氛一下子就变得紧张起来。

这个通知并非是说说而已的，就在通知下达的当天，打击右派的行动就开始了。

8月6日，汉阳县在蔡甸镇举行了有3000人参加的揭发控诉大会，将汉阳一中近千名学生为升学问题举行的罢课和游行事件，定性为由反革命集团煽动和组织的反革命暴乱事件，将王建国、杨松涛、钟毓文、杨焕尧等人定为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分子，予以逮捕。其中的民盟盟员杨焕尧，被作为这场事件的幕后策动者。仅仅一个月之后的9月7日，在蔡甸镇举行了宣判大会，该事件的主犯王建国、钟毓文、杨焕尧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主要分子

^① 《做好中学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和具体安排，教育部和团中央发出通知号召严密警惕右派分子挑拨活动》，《天津日报》1957年8月7日。

杨松涛等也被分别判了刑。其实，王建国等主犯都是共青团员，都很年轻^①。

对这场“小匈牙利事件”的处理，其产生的威慑力是不言而喻的。

于是，许多学生对升学、下乡问题发表的激烈言论被视为右派言论，“闹事”更是在右派分子煽动下的反革命行动。如上面提到过的广东海康县副县长吴林的言行，被说成是阴谋煽动学生闹事；苏州一中学生是受右派分子煽动进行反革命串联；天津47中则揪出了两个教员作为学生闹事的幕后操纵者，据说他们曾在学生中散布农民生活苦的谣言，而且说过“为了就业闹事不算犯错误”一类的话，才使学生愈加肆无忌惮。总之，处理办法不外乎是揪出几个成年人、教师，作为为首的煽动者，将其划为右派，予以严惩。

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到“目前有些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有反动思想的学生，极力向没有升学的毕业生散布挑拨性言论，妄想煽动学生闹事”。《中国青年报》也随之发表社论《中小学毕业生决不上右派的当》，针对太原三中初中学生刘金珠（19岁）组织反动的“中华革命党”，鼓动毕业生到劳动局要工作一事，明确告诉大家，中学生中也有右派分子，要提高警惕，不要让坏人钻了空子^②。

教育大多数是更重要的。为此各地都组织了应届中小学毕业生和家长，学习教育部和团中央的通知以及各报发表的一系列社

① 参见《汉阳群众粉碎反革命集团》，《提高警惕，不让坏人钻空子——评汉阳一中反革命暴乱事件》，《中国青年报》1957年8月10日；《逮捕幕后策动汉阳暴动事件的杨焕尧》，《蔡甸举行宣判大会宣判汉阳暴乱事件罪犯》，《湖北日报》1957年8月9日、1957年9月7日等。

② 《中小学毕业生决不上右派的当》，《中国青年报》社论，1957年8月12日；《中学生中也有右派分子》，《中国青年报》1957年8月15日。

论，并将汉阳一中的“反革命暴动事件”拿来作为反面教材。

每人都有个立场问题。早在7月1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妥善安排中学生毕业生下乡》中，就已明确告诫大家，要接受右派教训，与群众打成一片，站稳立场。接着，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在给北京崇文等区县的初中毕业生做报告时，也一再叮嘱中学生要警惕右派分子利用升学问题煽动闹事的阴谋，要学生站稳人民立场，服从祖国需要。把是否拥护政府提出的“中小学生就业途径主要是农业”与立场问题联系在一起，十几岁的中学生也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看待毕业后的出路问题？”成为各种讨论会的中心问题。具体的题目有“是谁使我们翻身的？”“我们是由谁养大的？”等等。会上往往要请老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忆苦思甜：很多劳动人民子女解放前念不起书，如今能读到初中或者高中毕业，这是国家培养的结果，所以劳动人民子女千万不能忘记党的恩情，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即使其他出身的人，也应该算清一笔账，那就是国家每培养一个中学生要花费千余元，如今毕业后只考虑自己的前途而不顾及国家利益，岂不是“恩将仇报”吗？如果从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以工人阶级的立场来看待个人毕业后的出路，又有什么“吃了亏”、“想不通”的问题呢？

那么多的知识青年在“整风”期间跳出来给党提意见，那么多中小学毕业生在升学就业问题上只从自己前途考虑而不体谅国家困难，这一切使党和国家痛切感到，解放多年，很多知识青年和党还是没有做到一条心，这说明了，对于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青年来说，还有必要进行锻炼尤其是“改造”。从此，中国的知识青年，从踏上人生旅途的十几岁开始，就走上了被“改造”的漫长艰辛之路。这已经与刘少奇几个月前对知识青年下乡务农的说法大异其趣了。

锻炼改造的“根本道路”，就是让他们到农村去。安子文在

《千锤百炼，改造自己》一文中说，知识分子有两大缺点，一是脱离体力劳动，一是个人突出，有这两点，就容易滋生资产阶级思想，发展个人主义。解决办法，一是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培养劳动观点；一是与集体相结合，培养群众观点^①。另一篇文章也说，解决知识青年的根本政治立场不稳的问题，办法是下放，必须采取坚决态度，这不是排斥他们，而是为了将来可以对他们重用^②。这些话不是专门针对中小学毕业生说的，但中小学毕业生无疑正是知识青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用劳动者，主要是农民来改造知识青年，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这一思想被明确提出并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付诸实行，正是从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开始的。知识青年，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从此地位发生了巨大转变。

在毕业、升学考试结束、新生录取工作基本就绪的8月，全国终于正式掀起动员中小学生到农村去的热潮。动员的重点，是家住城市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许多劳动模范、老英雄、著名作家纷纷撰文宣传劳动光荣，在社会上造成一股声势，不少毕业生，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子女纷纷报名下乡。应该强调的是，他们的下乡，不能仅视为迫于反右运动的压力，大多数人确实有听党的话，做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的一腔热血^③。

10月，《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四十条正式公布，其中规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85%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

① 《中国青年》1957年第23期。

② 李丛，《今后知识青年锻炼改造的根本道路》，《中国青年》1957年第24期。

③ 《党的教育方针的胜利——教育、动员高中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前前后后》，《人民教育》1957年第9期。

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正式将其作为一项长远规划。

与此同时，另一项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这就是干部的下放农村。到1957年底，全国的下放干部已达81万，其势远比知识青年下乡来得汹涌，甚至很多城市的机关干部也在“争先恐后”地要求到农村去作农民；此外，复员退伍军人成批地回到农村，还有大批城市的“消费人口”也纷纷返乡参加农业生产，仅山西一省就达10多万，河南也有十几万，可见下乡务农已成大势所趋。在这种形势之下，到这年年底，城镇下乡知识青年人数已逾1万，中央经过几个月的紧张鏖战，终于让全社会接受了这个事实。

第四章

一条崭新的就业道路

把从小在城市长大的中小學生送到农村去当农民的做法，确实大大超出了人们通常的预料。除了借助反右运动的东风之外，刘少奇“第一代”的说法，也的确激动人心。第一步是最难迈出去的，但是在1957年，1万余名勇敢者迈出了这一步。是他们，正式揭开了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一 先行者

他们并不是到农村去的第一批知识青年。早在延安时期甚至更早，就不断有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发动农民、组织农民进行革命。解放以后下乡工作的城市青年为数更多，但他们都是去工作，去战斗，而不是去当农民，在那时革命和当农民还是两回事。

我们就以此点，作为我们本书特指的“知识青年”与一般意义上将有文化的青年统称为知识青年的区别。

即便如此，也有比1957年的城市知青下乡更早的。

如果将农业社那些靠工分吃饭的会计也算在农民范围之内的话，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有组织地下乡当农业社会计的城镇中小學生，可以算作是最早的下乡知识青年了。

1955年下半年，在毛泽东的极力促进下，全国出现了所谓的

“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短短几个月间，全国已有60%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一阵风般匆忙建立的合作社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乏管理人才，尤其是缺乏会计。以每个合作社需要一个会计来计算，全国需要的，就是几百万名会计。于是，照毛泽东的话说，没有会计，就成为反对合作化迅速发展的人们的借口之一。

毛泽东当然有办法：

（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问题是要迅速地加以训练，并且在工作中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水平^①。

虽然在此之前已经有大批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回乡生产，虽然这些人中已经有相当多的人担任了合作社的会计和记工员，但是在解放初期教育的布局还很不平衡的情况下，能够有中小學生回乡务农的，还仅限于那些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近郊和交通便利地区，而遥远偏僻的边疆和山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因很少有人读书，就出现会计人才奇缺的问题。与此同时，各大中城市积压的未能升学又找不到职业的知识青年，人数已达十数万。50年代，城市和农村的界限，还不像后来划分得那样严格，应召到农业社当会计，就像参加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疆垦荒一样，激起了城市青年为祖国贡献青春的热情。

毛泽东的按语写于1955年9月。10月底，这项活动就正式开展起来。直接出面组织的还是共青团。最早行动的是那些有落后山区的省份，如山西、福建等。随后也有不少地区组织青年跨省

^① 《一个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的经验》一文按语，《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54页。

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

仅从报刊公开报道的零星材料中，也可看到这一活动开展规模。这些青年所至之处，都是贫瘠落后地区，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十分艰苦，让他们最感困难的是，他们不可能像垦荒队员那样过集体生活，只能分散地居住在陌生的农民家里。我们可以从他们中一些先进分子介绍的情况中，窥见他们当年生活之一貌。

曾经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刘玉琼说，她是初中毕业生，1956年2月自愿到广西隆林县革步区平农农业社做会计工作。刚去的时候，到处看见的都是陌生的人，说话听不懂，住的是茅屋，吃的是玉米饭和野菜，吃水要从岭头到岭脚好几里路远的地方挑回来。她住在一个农民家里，那家的女主人对她很冷淡，甚至有时对她冒火，她感到非常难受。但她还是坚持下来，她主动接近房东，帮她干活，搞好了关系，会计工作做得也很出色，成为先进典型^①。

自愿从北京到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当会计的张孝孔说，他被分配到北山藏族自治区的巴扎乡，那里到处是山沟，居住非常分散。他一去就住在藏民家里，语言不通，生活很不习惯，非常后悔，决心要离开这个地方，后来学习了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先进事迹，加上乡亲们对他的热情关心，才决心留下来^②。

河南省甲等劳动模范申学仁说，他是初中毕业生，1956年5月，南阳市号召青年到农业合作社做会计工作，当时报名十分踊跃，最后从100多名报名者中挑选了40多名，他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跋涉400多里路到达桐柏县，他被分配到铁木山下的双明合作社。这个社位于距县城140里的大山沟里。在平原上明明是小道的地方，这里的人偏说是大路，草木齐腰深，不时还可见到毒蛇和老八子（豹子）。全社只有90多户，就拉开16个庄子，大的9

① 刘玉琼，《在少数民族的农业社里生根》，《中国青年报》1957年5月26日。

② 《叫我惭愧的三封信》，《青海日报》1956年4月27日。

户，小的只有1户，稀疏零落地挂在山腰里，他来之前，已有两个会计受不了，被吓跑了。他也有过动摇，心想怎么偏偏分到这么个地方呢？地偏僻，人也冷冰冰的。一齐进山的许多人开了小差。申学仁最后还是坚持下来，被评上了劳模^①。

1956年到海南岛五指山区当会计的范高隆，是文昌县的初中毕业生，到山区之后一句黎族话也听不懂，不到1个月又患了疟疾。3个月后，他父亲在文昌县城为他找到了工作和未婚妻，但他却坚持没回县城，半年以后，他学会了黎话，熟悉了会计业务，3年后又把未婚妻接来，终于在山区扎下了根^②。

十几岁的城市青年孤单一人置身于这种环境，结果如何可想而知。大多数人没有坚持下来。1957年刘少奇再次谈到知识青年下乡务农的问题时，强调让青年们不要先急于当干部尤其是当会计，还是先从当农民做起，以使自己了解农村、了解农民，并与农民搞好关系，很可能也是接受了这次活动失败的教训。

也有自己主动跑下去的。他们的行为与后来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几乎20年之久的知青明星侯隽非常相似，其热情与勇敢也不在侯隽话下，可是他们早已被人们遗忘了。

梁玉女，家住吉林省汪清县，朝鲜族，初中毕业生。她的父母早死，一直与兄嫂生活在一起。她的哥哥是该县石岘造纸厂的工人，家里生活很好。梁玉女读中学的时候，从课本上知道了苏联的植物学家米丘林，又看了关于他的电影，从此对园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三的时候，她又看了苏联电影《金星英雄》，影片中苏联农村幸福美好的生活给了她非常深刻印象；

① 《在山区生根开花——记初中毕业生、省甲等劳动模范申学仁的事迹》，载《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 《范高隆建设山区六年如一日》，《南方日报》1962年7月25日。

苏联农村的美好生活，时时展现在她眼前。她闭上眼，就好像看见在祖国的原野上，拖拉机在开动，宏大的水电站放射着光芒，广阔的麦田像一片金色的海洋，粮食很快堆成了山……

1954年她20岁，初中毕业了，她曾想报考农业技术学校，但这个学校只用汉语授课，她不会汉语。于是就想直接下乡。可是，农村路途遥远，而且也有自己的组织，不是随便就可以下去的，人家收不收呢？在哥哥的鼓励下，她给中共延边地委书记朱德海写了一封信，叙说了自己参加农业生产的心愿。很快地委就回了信，批准她参加了延边的黎明集体农庄。这个农庄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先进单位，她到农庄之后，曾到苏联参观过的农庄主席经常给她讲苏联农庄庄员的生活，农庄经常接到全国各地的来信，农庄主席就让她帮助回信，使她了解了很多事情，眼界大大开阔了。她与庄员一道劳动，托土坯盖房，还担任夜校教师，5个月后就提拔为农庄生活指导部的副主任^①。

马良全。与梁玉女相比，马良全的故事就沉重多了。他是湖南长沙市人，出生在一个资本家兼地主的大家庭，虽然家里很有钱，吃穿不愁，但他父亲早死，母亲改嫁，也没有亲兄弟姐妹。1954年，小马从长沙二中初中毕业，自以为功课很好，升学没有问题，不料没有被录取。年仅16岁的他在街头流浪了几天，不得已回到家，又受到大伯父的奚落，他与大伯父大闹一场，冲出家门，走投无路，曾萌生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在姑姑和表姐的劝解下，又听到关于农村迫切需要知识青年的宣传，就决心到农村去。他曾在报上看到长沙市郊石岭塘农业社社长陈锡兆在报上写的文章《读书就是为了劳动》，于是动笔给这个社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① 《“到共产主义之路”——记黎明集体农庄女庄员、初中毕业生梁玉女》，《光明日报》1954年4月22日。

“我虽然是一个资本家兼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但我终究还是一个孩子，请你允许我到你的社去做一个农民。”陈锡兆见信后，征得郊区常委的同意，答应了他的要求。小马到达农业社，每天一个人住在办公室，晚上附近没有人家，清静得像荒野，使他倍感孤单寂寞，后来他主动走到农民中去，与他们搞好关系，终于得到他们的认可。1955年5月，社员大会接受他为正式农民，初级社转高级社之后，他又担任了主管会计^①。

如果没有国家对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的大张旗鼓的宣传，很难设想会有这样的故事出现，但是在1954年，这样的青年还是太个别了，他们自己大概也不会想到，他们所走的道路，仅仅几年以后，会成为一代知识青年的方向。

二 “摸着石头过河”

《人民日报》的4月8日社论，将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作为一个方向提了出来，这可是比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要远为艰巨复杂的事。说它艰巨，不仅在于这一提法的激进和难以让人接受，同时还在于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复杂烦琐的工作。动员家在农村的学生回乡，工作做在“动员”二字上，只要动员下去了，其他问题可以再说。而城市学生在农村没有家，他们通过什么途径下乡去，到了农村以后怎么办，都是需要具体解决的问题。正如当时南京市的一位中学校长所说：“有些学生反映希望到农村去，怎么走法呢？学生问老师，老师不知道。老师问行政领导人，也无法回答。”一位教育局长也曾焦急地问上级：“不知现在有没有和工农业方面联系？是否心中

^① 《小马的新家》，载《在农村落户的知识青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有数？”^①江苏省还有人建议赶快把全省工农业生产战线上究竟能安插多少中小学毕业生，做一次摸底工作。

从当时的种种迹象来看，至少是没有人做过较大范围的、认真细致的摸底。中央仍然像上次动员农村中小學生回乡一样，把精力放在动员二字上。

既然人人都心中无数，那就“摸着石头过河”吧。

江苏省作出决定，要求所有农业社和城市各行各业向中小学毕业生开门，城市毕业生可通过亲友或同学介绍下乡，还可以组织城市毕业生到山区和沿江、沿海地区进行小规模开荒，政府可以适当帮助^②。其他各省也大多作出了此类规定。

确实有些人以各种方式自行与农村进行了联系，就像我们上面提到的梁玉女和马良全一样。如当时报刊上作为榜样刊载的：

莫列，林业部副部长张克侠的三女儿，时年22岁。她14岁参军，后来转业，1956年考入杭州化学工业师资训练班。因身体不好，读了半年即休学回家，在家温课准备考大学。张克侠对她说：“我请中共北京市委介绍你到农业社去学习吧。”经市委书记刘仁的大力支持，她到北京郊区的星火农业社当了见习社员，在四队队长家里吃住。她表示不能当见习社员太久了，总叫爸爸负担生活费，她要学习几个月生产基础知识，再学习掌握新农具，好当正式社员。莫列还自豪地说：“将来会有很多人以及我们的后代，用羡慕和骄傲的口气，谈起我们这些祖国的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因为我们是充分理解和最先投入农业生产劳动的知识

① 《要求本着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精神，妥善处理中小学毕业生的问题》，《新华日报》1957年5月12日。

② 《吴贻芳副省长谈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出路问题——政府将帮助他们参加生产》，《新华日报》1957年6月2日。

青年。”^①

侯俊英，天津二中应届高三毕业生，她给中共山东莱阳县委写信说，反复学习了4月8日社论以后，我决心参加农业生产，做一个祖国第一代有知识的劳动农民。我从小在城里长大，参加农业生产没有一定的去处，因此我便在伟大祖国的土地上选择了莱阳县，我预备在贵县的任何一个村参加劳动。中共莱阳县委在6月30日给她的回信中说：我县实现高级合作化已有一年多，有的社已办了5年，有千户以上大社，也有六七十户的小社，一般在百户以上，大部分以农业为主，也有一些渔盐农、林农、果农、菜农相结合的社，请你参考准备，并提出你愿意到哪一种社的意见，及早告诉我们。7月22日，侯俊英果然从天津到莱阳县去当农民，该县组织了600多人集会，对她表示了热烈欢迎^②。

当然，像这样下乡的人毕竟是个别的积极者。照这样做法，动员不了很多人，因为大多数人还在观望，在等待着组织解决。于是，一些城市着手进行了由组织出面安排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试点工作，其中动手较早也较有成效的是武汉。

武汉市的工作从5月就开始了。

湖北省1957年有2500余名高中毕业生、25000余名初中毕业生和14万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压力很大，对安排这批人出路的问题也较为重视，为此动员了相当多的人力。5月中旬，武汉市组织了有990名自学青年参加的下乡学习工作队，分三批到郊区农业合作社参观访问，每批都由干部、辅导员带领，活动3天，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这个活动，许多学生和家長看到农民生活不比一般工人差，而农村却更需要人才，表示愿意

① 《林业部张克侠副部长送三女儿莫列到北京市东郊六里屯星火农业社》，《中国青年报》1957年5月19日，7月15日。

② 《“我决心参加农业生产，我在祖国的土地上选择了莱阳县”》，《中国青年报》1957年7月10日。

到农村去，从而培养出一批积极分子。5月已有4名学生自愿下乡，6月又有81名初中、高小毕业生到农村去落了户，可算是第一批。

这批的81人是从260多个报名者中挑选出来的。直接负责此事的中共武汉市委毕业生领导小组为搞好这一试点，强调第一批必须保证质量，完全做到本人自愿、家庭同意，决不勉强。这批青年的家长，职业有工人、干部、教员、摊贩、城市贫民等，家庭经济情况一般比较困难。他们都是1954—1956年间未能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年龄都在16—19岁之间（据后来报导，实际有年仅15岁者）^①。

6月18日，武汉市热烈欢送这批青年下乡，他们由区长和副区长分别带领，下到武汉郊区的合作乡群力一社、二社，长丰乡建群社，和岱山乡建设社等四个合作社，这些都是领导力量较强，社员觉悟较高，需要劳力而且收入较好的社^②。

8月8日和9日，武汉市武昌、汉阳、汉江、江岸、汉阳等区第二批中小学毕业生和社会青年共322名下乡。其中武昌、汉阳两区170人到洪山区南湖乡、建设乡，汉江、江岸两区1997人到汉桥区解放乡、岱山乡，汉阳的55人分在本区的兴胜、五星、先进三个农业社。在这批下乡青年中，有江岸区的市六中高中毕业生欧阳春，是武汉市第一个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高中毕业生。他说从几个月前团中央罗毅同志来武汉做报告起，他就考虑这个问题，7月底到农村去实习了3天，就没打算再考大学，报名下乡终

① 《新式农民故事小集（一）——记武汉市第一批下乡青年在农村的生活》，《中国青年报》1957年8月19日。

② 参见，《武汉市是怎样组织学生参加农业生产的》，《湖北日报》1957年7月12日；《武汉市是怎样组织第一批自学的历届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湖北日报》1957年第13期；罗明安：《武汉市是怎样组织城市学生下乡的？》，《中国青年报》1957年8月3日。

被批准。他被赞扬为全市高中毕业生作出了良好的榜样。

9月14日，第三批知识青年共3500名下乡，其中有1500名城市知青。29日，第四批725人到达郊区，其中有大学肄业生、高中毕业生、代课小学教师，也有社会青年。在他们的主动要求下，其中的284人离开武汉下乡到条件较武汉郊区为差的鄂城。到10月底止，武汉市下乡的3000多名城市青年，大部分已在农村初步巩固下来，在鄂城的劳动模范名单中，已出现了武汉市下乡知识青年的名字。

8月，在教育部和团中央联合召开的8个省和8个大中城市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工作的汇报会议上，特别总结了武汉试点的经验。此时中央已经认识到，在4月8日社论和中央关于安排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的通知下达之后，如何准备和组织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已成为当前最突出的问题。

中央的看法是，这项措施的实行，虽然阻力很大，困难不少，但从武汉试点的经验来看，道路还是可行的。第一，农村可以容纳。现在大中城市的郊区和不少农村都缺劳动力，1956年工厂、学校大量招人，已回乡的外流不少，农村感到对劳力特别需要。第二，由于目前学生的疑虑很多，总之是对城市的依恋和对农村的畏惧，所以一般应首先选择那些家境比较贫寒，本人思想觉悟高的先下乡。从武汉的经验来看，自愿下乡的学生有几种情况，一是家庭生活困难，自己又长期没找到工作，看到今后城市里找不到出路，愿意下乡来减轻家庭负担；二是自己年龄大了，长期没工作，老呆在家中不好，到农村可以使自己经济独立；三是与家庭关系不好，如是继父、继母或寄养在他人家中等；四是有热情的，听了报告，知道农村需要人，了解了农业生产的意义，想到农村将来大有前途，而自愿下乡。有这样一批人肯于先行一步，后面的工作就会好做一些。第三，由于郊区与城市相差不远，首先组织学生到郊区去是较合适的。选些基础较稳固的社，把学生首

先分散安置在积极分子家里住，才便于巩固下来。

从7、8月开始，安排城市中小學生下乡的试点工作，在天津、上海、南京、重庆各大中城市也逐一展开了。

这些城市的学生，大部分是由政府帮助联系安排之后分批下乡的。

天津市。天津当时还不是直辖市，其行政区划范围比今天为窄。该市人口密集，就业机会有限，历来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首当其冲之地。1957年天津的情况，是小学毕业生绝大部分能升初中，高中毕业生将有半数以上能升大学，只有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小，约有21000多的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这是与其他城市以不能升初中的高小毕业生为最多的情况有所不同的。2万余名初中毕业生构成很大压力，天津市政府对此问题当然不敢等闲视之，因而采取了一系列安排措施。

7月，市人委会做出大力动员中小學生到农村参加生产的决定，同时一面在津郊各农业社进行工作，一面加紧对城市中小學生及其家长进行动员。继年初请著名的知青先进典型徐建春为中小學生做报告之后，市委此时又将河北省著名劳模王国藩请到天津，与南开、城厢、红桥、河北等区8000多名中小学教师和毕业生见面并做了报告，并自7月中旬开始，陆续组织应届毕业生进行学习讨论，其间市委书记李耕涛、王亢之都亲自为学生做动员工作。各街道和有关单位也组织家长进行了讨论。

首先行动的是天津郊区的塘沽区。8月11日，该区74名中小學生毕业生到郊区的邓善沽、新河、大梁子三乡落户，该区组织了有2500多人参加的欢送大会。

市区的动员从8月正式开始。8月17日，天津市中小學生毕业生升学就业指导委员会在《天津日报》刊登了答读者问“关于中小學生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其中规定，天津市中小學生毕业生下乡，主要安排在天津四个郊区及河北省的一些农业合作社及

塘沽区的渔业合作社。只要是年满16岁以上、身强力壮的本届初中毕业生，本人自愿，即可以向学校报名。报名后填写入社申请书，由有关单位把申请书转交给有关农业社审查。审查期间，将组织一部分同学、家长到有关农业社参观，最后在学生、家长愿意的情况下，农业社考虑批准。

8月20日，天津市第一批自愿到农村的初中毕业生124人出发^①。他们中有55人被分配到河北省宁河县军粮城乡的共产主义之路农业社（后来曾名闻全国的知青典型赵耘就是分到这个社的知青之一，当时还有报道提到他下乡时非常兴奋，一再说“这里照顾得比家里还好”^②云云）、金谷农庄、山岭子农业社和李庄子乡的新元庄农业社。另69人分到东郊区赤土乡曙光农业社、务本村东方红农业社、四合乡共同幸福农业社，和西郊区的李楼乡红光农业社、新桥乡工农联盟农业社。这批下乡学生，据说都是觉悟较高的知识青年，绝大部分是党、团员。天津市为他们召开了热烈的欢送大会^③。在随后的一二天中，又有100多名中学生下乡，使这批下乡的城市知青人数达到298名，一同下去的，还有94名回乡知识青年。

9月20日，第二批中小学毕业生去农村落户^④，其中有城市知青290余名，农村回乡知青50余名。城市知青被分别安置到静海县和东郊区的白塘口乡和塘沽区的渔业生产合作社，这些青年下乡前都在郊区实习过。

10月5、6两日，天津市1957年最后一批下乡的中小学毕业

① 《124名知识青年获准参加农业生产，到农业战线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天津日报》1957年8月20日。

② 《当他们到达新家乡的时候》，《天津日报》1957年8月24日。

③ 《市内人民热情欢送，农业社员冒雨欢迎，首批下乡学生昨到农村落户》，《天津日报》1957年8月24日。

④ 《津市又一批学生去农村落户》，《天津日报》1957年9月20日。

生 254 人动身前往津市郊区和河北、河东等区的农业合作社。到此为止，该市本年到农村务农的中小学毕业生已达 2092 名^①，分布于该市和河北省 20 多个乡的农业社，不仅为这些社增加了有文化的劳动力，也给农业技术改革以及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

上海市。上海 1957 年共有应届中学毕业生 7 万余，是压力最大的城市之一。该市的安置计划主要有三个走向，一是上海市郊和邻近各县的农业社预计要招考一批会计和记工员；一是到产茶的安徽南部山区；还有一个是上海附近的江苏省宝山和奉贤两县有不少荒地，计划招收一批青年前往垦殖。8 月 4 日，上海郊区各农业社组成的联合征求社员委员会发出了征求第一批社员的通告，预计要招收 3000 名新社员，条件是常住市区，年龄在 16—25 岁之间，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到 8 月 8 日报名截止时，有 860 名中学毕业生应征，其中还有从 1953 年毕业后就一直未能就业的社会青年。各农业社对这些学生进行了妥善安置，与原计划略为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都当了会计和记工员，很多就是去当了普通社员。在上海市第一批到农村落户的城市知青中，有后来一度闻名全国的高中毕业生浦锦文，以及与他同时到宝山县落户的他的妻子，以及单身一人到上海县的罗家桥务农的胡桂芬等。

河南省也是毕业生压力较大的省，1957 年全省中小学毕业生共 53 万，其中高小毕业生 45 万，将有 35 万不能升中学；初中毕业生 7 万余，将有 5.7 万不能升高中；高中毕业生 9 千人，将有 5 千余人不能升大学，40 余万毕业生等待分配，问题相当严重。年初刘少奇来省视察并且发表讲话，使该省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7 月 26 日，郑州市组织了第一批城市知识青年 33 名，分别去该市

^① 《两千多学生参加农业劳动，最后一批下乡的中小学毕业生今明出发》，《天津日报》1957 年 10 月 5 日。

郊区的古隶、老鸦陈、石佛三个农业社参加农业生产。8月，第二批109名城市青年又根据“学生和家长完全同意”的原则，到郊区农业社安家，其中男65名，女44名；高中生8名，初中生70名，小学生31名。他们中有79名是省、市机关干部、教师和各工厂职工的子女。

辽宁省。7月8日，沈阳市集会欢送第一批17所中学的85名初中毕业生到郊区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其中有辽宁省副省长黄达的女儿、实验中学初中毕业生黄建行。到7月底，已有600多名应届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前往郊区的蔬菜合作社务农。同时，该市还组织了400多名高中毕业生下乡实习，为将来参加农业生产做准备。此后，有204名高中毕业生自愿报名下乡。8月4日，首批41名作为先头部队动身前往农村。29日，又有72名高中毕业生和10名初中毕业生前往盖平、昌图等县农村，据说那里有很多可以栽果树的荒田等待他们开垦。仅到7月底为止，辽宁省沈阳、旅大、锦州、鞍山、本溪等8个城市就有近千名中小学毕业生在农村落户，他们中有工农子弟，也有省、市负责人、工程师、教授的子女；很多市的领导人都下乡探访了这些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

四川省。1957年，该省家在城镇的中小学毕业生共有3万余人，也属压力较大的省份。成都市在招生考试发榜前后的半个月內，就组织了几百名报告员和几万名居民积极分子，就中学毕业生升学就业问题向全市居民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社会宣传。随后，成都市有130名城市中小学毕业生自愿下乡，该市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大会，市长亲自为他们送行，勉励他们在这条路上走到底。据称，这些先行者是从申请下乡的学生中五里挑一挑出来的。到9月，又有40名学生下乡。重庆市第一批120多名志愿参加建设新农村的中学毕业生，于7月中旬被分配到市郊农业合作社，其中有重庆大学校长的儿子、41名初中毕业生郑平章等。9月，重

庆八中团委书记罗利云、十三中团委书记郭培德，跟随该市第三批 700 多名中学毕业生到巴县和重庆市郊的南桐矿区农村务农。此外，该省自贡市等地还有一批初、高中毕业生前往正待开发的西昌专区，其中部分被分配到该专区的农场。据不完全统计，该省共有几百名城镇学生集体或自行下乡务农。

北京市。8 月份，北京市委对城市中小学生的下乡务农问题进行了部署，通县专署同意协助安置家在本市城区的中学生几百人参加农业生产。9 月份，城区先后有二批中小學生下乡。1958 年这项工作一度继续进行，如郊区的南苑公社就有 30 多名城区的中学生下来落户。这些农村都是交通方便、生活也较富裕的地区，知青虽有回流现象，但在当地结婚安家或生活了较长时间的也大有人在。

内蒙古。7 月 8 日，包头二中有 30 名家在城市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其中有 7 名女生）到郊区大树湾乡黄河农业社当社员。8 月，海拉尔市也有 18 名中学毕业生，其中四名是团员，到呼盟西部陈巴尔虎旗牧业区当牧民，消息传开后，又有 50 名中学生报了名，成为草原上第一批具有中学文化水平的牧民。在内蒙古这批城镇下乡知识青年中，后来也树立过一个先进典型，名叫郎秀云，是蒙古族。她高小毕业后没考上学，就到陕北姐姐家闲住，帮助姐姐看娃娃、料理家务，心情烦闷不安，听到党号召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做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之后，她与 13 个高小毕业生一道，到当时的临河县永华农业社安家落户。初去时人地两生，不仅生活习惯不同，而且言语也不通——她不懂汉语。但她一一克服了困难，不仅掌握了生产技术，还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汉语。一年以后，她与当地青年社员、高小毕业生高志强结了婚，到 1960 年被树为典型时，她已有了两个孩子。

此外，吉林市到 9 月统计，已有两批 300 余名城市学生到市郊农业社落户，湖南省有 5500 多名中小城镇学生下乡落户。江苏

省、山东省和广州市等也组织了城市高中生下乡的试点。

这项运动在有些地区一直持续到1958年的上半年，至此为止，全国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人数，已将近15000人。

三 下乡以后

真正的难题是下去以后怎么办。

国家对从事这项工作的干部们要求，要认真查明农村情况，了解农业合作社用人的实际需要。究竟能够安置多少人，什么时候下乡，下乡后住宿、吃饭、入社、人社基金、劳动和学习等问题如何解决，要同有关的农业社达成协议，不能往乡下一送了事。很清楚，这是个非常空泛的大原则，在这个大原则下，各省往往就自行其事了。由于武汉市是最早进行试点的，并且大体得到了中央的首肯，所以各省基本都参照它的方式进行，我们如今就以武汉市的做法为主并参照其他城市的情况，叙述如下：

第一，安置经费如何解决？

武汉市首批城市学生下乡时，蚊帐、被褥和日常生活用品，是由所在街道居委会和学生亲属协助解决的，市、区都没有出钱为学生置办物品，以免影响以后的工作。该市还规定，学生下乡后的伙食费，前三个月由合作社贷款解决，秋收分配后，再由合作社分期扣还。下乡后，一律不作正式社员，住一段时间后，由社员大会讨论通过入社，并评定其人社基金的多少，逐步收清。在未分红之前，学生所需的零用钱由合作社解决，一般一个月预支一次，个别社经济困难，尚待研究；小病由社解决，重病尚待研究。

天津市规定，由于今年（1957年）下乡时已过农忙季节，农活不太多，有些农活受学生技术条件限制又不能干，所以劳动收

人可能暂不足维持个人生活，生活费用采取三种途径加以解决：其一，家庭经济情况较好者，争取家长自愿予以资助；其二，经济条件较好的合作社，垫付学生不足部分的生活费用，将来在他所得工分中扣还；其三，以上两种办法不能解决时，由市募捐筹款，经农业社贷给经济困难的学生，以后逐渐扣还。在到乡下后的待遇上，原则是不占农民便宜，双方不吃亏。粮食、食油、棉布等供应标准与农民相同，疾病治疗与社员同等待遇。

规定又说，按社章规定，学生必须入社成为正式社员，才能参加该社农业生产，享受社员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学生下乡首先要入社（填写申请书后被农业社批准就算入社为正式社员），社员基金据各社规模大小、财产多寡有所不同，学生可以缓交，在今后3至5年内扣还。

天津各界对下乡务农的中小学生的确给予了相当的关注。9月2日，为给下乡学生筹款，天津的文艺工作者在中国大戏院举行音乐会，艺术家们表演了19项内容丰富多彩的节目，最后是著名音乐家王莘指挥的大合唱，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①。

北京市规定，凡家在本市郊区各镇的非农业户的毕业生，由郊区各区人民委员会负责安置；在本市城区非农业户的毕业生，凡年满16岁，身体健壮、品行良好，本人自愿并经家长同意，可向学校报名，经批准后下乡务农，入社后要从事农业体力劳动，按劳取酬，生活要完全自给。入社初期生活所需费用，可向银行贷款。

还是当年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做法：不用国家的一分钱。

可是，与垦荒队那种热火朝天的运动不同，这种下乡活动不可能完全指望社会募捐，负担最终全部压在学生本人、家长和所

^① 《为参加农业生产的学生筹募基金、音协昨天举行音乐会》，《天津日报》1957年9月2日。

去的合作社身上，包括下乡行装、入社基金、头一年的生活费用。这显然为个人、家庭和接收学生的农业社带来压力。中央也承认，武汉市郊区因收入较高，学生估计不久即可自给，所以采取这种方式尚属可行，而在收入较低的地区，则需由社会团体出面予以适当补助。然而，凭这种自愿的、临时性的补助来维持的做法，终非长久之计。尤其是上面已经提到的，自愿下乡的学生本来大多来自贫寒的家庭。

尤其难的，是还要偿还入社基金。农民是带着自己的土地、牲畜等财产，以入股的形式入社的。城市青年如果空手加入进去，农业社就吃了亏，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农民，无论是贫农还是雇农，都已经在土改时无偿分得了土地和牲畜，没有人像城市知青那样一无所有。让知识青年交纳入社基金，让他们在下乡三五年之内用自己的劳动工分偿还这笔钱，不仅是不公平的，其实也难以真正做到。例如，根据对湖南衡阳市郊北塘、五一两个农业社17个城市下乡青年的收入统计，一般每人每月能挣到15元，最多的有30元，当地宣传机构据此而下结论说，照当地伙食费标准每月9元计，城市下乡学生只要安心生产，一般都能维持生活并有节余。但事实上，伙食费只是生活资金的一部分，如果加上需偿还的入社基金、预支的头一年的伙食费、零用钱，已经难以维持，更不用说生病了。何况从长远计，还有将来结婚、盖房、养家的种种需要。从农业社一方来说，本为农民集体所有，拿出钱来供养学生，即使是贷款，也属额外负担。

所以出现像湖北沙市那样的抱怨就是必然的了：过多地照顾学生，农民不满，对学生卡得过严，学生又不满，左右为难。

第二，生活安排问题。

从延安时期甚至更早，我党就有派干部下乡工作时分散居住，与农民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传统。这种传统日久就成为一个定式，城市知识青年初下农村，也概莫能外。

武汉市规定下乡青年不集体住，由合作社安排到农民家居住。大部分住在社干部、党团员和觉悟高的农民家中。俟劳动收入多了，再安家。如该市最早下乡的四个学生，合作社为他们选择了觉悟较高、妇女贤惠的农民家庭，分派他们去吃住，据说几个月来他们都做到了“对吃住不挑剔，很随便，下工回来，很勤快，帮着带孩子、挑水、浇菜园，把自己当作主人”，受到社员的赞许。

重庆市的做法：在食宿问题上，他们认为，分散居住容易解决问题，要尽量使每个学生食宿在一个地方，并要尽量安置在党、团员和干部的家里，女同学两人住在一起。要做好这一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做到三通：干部通；搭伙户、住宿户通；群众通。各方面安排妥当后还需再进行深入细致的检查，对安排不妥的及时调整。

天津市对知识青年下乡后的安排较为灵活。他们大多采取分散住到农民家中的方式，与农民同吃同劳动。但也有的集中吃住，由社里派五保户为他们做饭。由于是第一次，颇受到农民的欢迎，许多老大娘远接近迎，积极腾房子给知青住。军粮城乡的一名高小毕业回乡的青年，听到城里知青要来的消息后，主动要求安置一名中学生到他家吃住，他说：“我那儿条件好，中学生来了以后，我可以向他学文化，一块儿工作，一块儿吃，多好啊。”

湖南衡阳市的5名家在城市的往届中小学毕业生，在自学指导委员会与学校行政的协助下，自己到郊区农业社接洽好以后下乡，也是采取在农民家吃住的方式。如第一个下去的城市学生邓素蓉，就住在农民家里，与农民同吃、同劳动，每天可评得劳动工分7分多，从5月中旬到7月。她已得到100多个工分，自己还种了许多南瓜、茄子等蔬菜，声称不久便能自给自足^①。

也有些地区，则采取了“过渡”办法，如南京市的有关领导

① 《湖南衡阳市40多名学生回乡生产》，《中国青年报》1957年7月2日。

认为，对于学生的吃住问题，今后总的方向是分散到贫农、下中农或社队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家里，但是由于学生初到农村，一下子就分散到农户家里有困难，因此采用多种过渡形式，让学生在农村过一个短时期的集中生活，等他们在劳动中和农民交上朋友，搞熟悉了，再分散开来。过渡形式有以下几种：1. 集中吃住，分散劳动；2. 分散住在农民家里，七八人组成一个小组，借农民的锅灶，与农民分开烧饭菜；3. 分散在农民家里吃住，分散劳动，但在一定时期内有集体活动，以便进行教育^①。南京的这种安置方式，已初露 60 年代集体插队的雏形。

武汉市试点的报告说得不错，如何安排青年下乡后的生活，是巩固学生在农村安家落户的一个关键。知识青年与一般干部毕竟不同，一方面，他们还是刚出校门的孩子，没有社会阅历；另一方面，他们是以普通社员的身份下去的，而且说是要去“安家落户”（尽管很少有农民真的相信这点），不像干部只是暂时的，而且带着自己的工资。所以，对干部是可行的办法，是可以密切群众关系的办法，用到知识青年身上，效果却适得其反。分散到农民家庭，长期占用农民住房，又一同吃住，实际上是对农民的一种无偿剥夺。虽然农民因一时新鲜，也会表示欢迎，但从人之常情来说，任何家庭也难以容忍外人对自己生活如此的长期涉入。如湖北沙市的调查报告说，有的农民为给学生腾房子，一家五口挤在一间房里，让两个学生住一间，为农民家庭造成的不便可想而知。但即使这样，农民也宁愿让住，而不愿让吃，有的农民说，自己家人，早吃晚吃、冷吃热吃、好吃坏吃都没问题，学生一来就不行了；还有的农民怕学生交的伙食费不够，顾虑很多。当时很

^① 《关于教育和组织、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一些做法〔综合稿〕》，《人民教育》1957年第9期。

多地方针对这个问题，教育学生自己动手改变环境，主动多做家务事，与农民搞好团结。如南京市教育局在召开新农民代表座谈会时，就强调要知识青年服从社干部领导，不了解情况就不要乱提意见，不要和老农竞赛争工分。但是事实上，对于年仅十几岁，又离开家庭置身于一个陌生而艰苦的环境且劳动非常劳累的中学生来说，提出这种要求是相当过分事实上也难以达到的。至于让领导加强管理，且不说农村干部本来有各种各样的工作要做，根本忙不过来，就是真的有心管理，囿于当时农村干部的文化水平，又能产生什么效果？事实上，直到“文化革命”以后大批知识青年下乡，结果都是放任自流，所谓的“加强管理”从来就是一句空话。

总之，这种种做法，使那些想把下乡当作一个职业来解决家庭生活困难或使自己经济独立的城市青年希望落空，而这种希望本来是非常合乎情理、并不过分的。所以，60年代再次组织学生下乡时，就接受了这个教训，改为由国家统一负责、一包到底的方式。

第三，农业社是否需要这些城市青年？

武汉市最早下乡的4名学生，被分别安插到市郊的红旗、建设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这两个合作社的干部、社员对于是否需要他们，大多持怀疑态度。有人以为这些学生是城里要不了，政府把他们推到农村来的，有人公开反对接纳学生，也有的干部有“惜才思想”，认为城里的中学生下乡来可惜，认识不明确。后来他们对劳动力、文化技术、增产潜力和远景规划等各方面算了一笔细帐，大家相信了城市学生不会成为合作社的包袱。如以后要实行大面积技术改革，开展多种经营，实现精耕细作，劳动力需求的伸缩性是很大的。再如很多记工员记不清帐，需要补充记工员，需要会防治病虫害的技术员、兽医，还要有人负责扫盲工作，这类情况在武汉市郊农村是有代表性的。有的社劳动力目前

虽然够了，但在实行精耕细作和发展副业生产后，也可以安插一部分劳动力。据当时派出调查人员的报告称：据了解，其他大城市郊区与武汉市郊区有类似情况，就是一般农业地区，随着农业技术的改革和多种经营的发展，也是需要增加劳动力的^①。再有，目前合作社搞得不好，主要是财务管理方面有问题，很多社帐目混乱，他们需要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去当会计。有个合作社主任说，社里若是有2个初中生当会计，10个高小生当记工员，就不会凭脑子记工分了。据湖北省黄冈县占岗乡的例子，全乡16个社主任，只有2个扫过盲，生产队里没一个识字的。总之，“乡下什么都好，就是缺少有文化的人”^②。城市青年下乡是农民所需要的，这就是结论。武汉市副市长熊飞说，仅据本市洪山、汉桥两个郊区655个农业社的统计，就需学生（劳力）3501人。

这里对农村是否需要知识青年的预测，存在着两个误区：

1. 这个预测是建立在生产发展之后，农村实现技术改革和多种经营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而后来的事实已经证明，直到十年动乱结束的70年代末期，这些设想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村中并没有实现。我国农村存在着大量过剩劳动力，这是个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城市中小学生下乡，使这一矛盾更加突出，也因此在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农民方面的阻力。

2. 上面所述合作社缺少会计的情况，主要是在边远山区。当时组织城市知识青年所去落户的农村，却都是城市近郊生产、收入都较好，学校也有一定普及的地区，本村的回乡青年往往已经足够使用，所以缺少会计的情况至少不像边远落后地区那么严重。这种宣传往往使得对自己期望很高的青年因下乡后得不到重用而

① 《从几个先行者探讨城市中小学毕业生下乡生产问题》，《中国青年报》1957年7月13日。

② 《武汉市第一批自学青年今日光荣走上农业生产岗位》，《湖北日报》1957年6月18日。

产生失落感。

这个预测也从反面说明了，在农村仍然维持着本来面目的情况下，增加人口只会给农民带来额外负担，何况许多农业社还要负担他们的部分口粮和生活费用。但在最初，因为下乡知识青年人数很少，这个问题还不显突出。

第四，农业社干部如何处理与城市知识青年的关系。

城市知识青年既然是到农村安家落户，就与下放干部不同，他们将正式成为合作社的一员，也将与农村的干部和社员产生种种利害上的关系，农村干部对这点是非常敏感的。

有些社干部采取了积极态度，主动协调这些关系。如重庆市九龙坡区的石堰农业社，在得知城市知识青年即将到来的消息之后，提出了“全面考虑，统一安排”的总原则，又根据总原则确定几条具体原则：1. 既要安排重庆市区来的毕业生，还要安排本社未考取学校的毕业生；2. 不能调动社里原有干部，让学生取而代之，但可注意培养；3. 既考虑到社里现在要人，还考虑到今后五年、十年社的规划远景；4. 既考虑了目前的需要，也考虑了社的可能条件；5. 将学生尽量安排在领导强和能增产的队里。为准备城市学生到来，社里先召开党支部大会、社干部会，强调说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然后在广大社员中进行反复宣传，号召大家热烈欢迎学生入社。

只要细看就知道，这几条原则其实围绕的是一个内容，那就是怎么处理知青与现有干部的关系：既不能让新来者危及现任干部的地位，又不能把学生的一切出路堵死，至少要暗示他们，将来总有他们当干部的一天。可是农村干部心里非常明白，过上几年，谁知道会怎么样呢？谁真的相信他们会在农村落户一辈子呢？几条原则的规定，透露出的是农村干部的紧张心理。其实，这也正是刘少奇一再强调要下乡学生先学种地，老老实实地、勤勤恳恳地种地的真实含义之一。

对知识青年提出这个要求，说明了刘少奇的深谋远虑，不如此，农村干部一定会以为上面派这么多有文化的城里人下来，是要夺他们的权，他们必然会千方百计地进行抵制。那样，城市学生在农村就将找不到立足之地。

从1957年刘少奇提出的让学生先当普通农民，到10年之后毛泽东提出的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实都有这一隐衷在内。让农村干部肯于接纳他们，或者哪怕是暂时容忍他们，是这场运动能够进行下去的最基本的前提。

还有，就是安置地点的选择问题。几个大城市安置城市青年，选择的都是城市近郊，出发点都源于便于对知青进行动员和日后便于巩固。如天津选择来安置知青的东郊区，是个盛产稻米的地区，交通方便，对于一些家境贫寒的城市青年来说，在这里安家并非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又如天津塘沽区知青下乡选择的邓善沽乡，专为城市供应各种蔬菜，每个劳力年收入为600—700元，多的能达到900元，收入之高为一般农村所望尘莫及。北京知识青年下乡，选择的也是近郊比较富裕之地。所以，的确有一些知青在这些地区结了婚，建立了家庭。

然而，这里存在的问题却是，在全国广大农村中只占少数的这些大城市的近郊区安置知识青年，能否成为一个方向？在这样的地区，知青的工作虽然相对好做一些，但是农民一方呢？他们要接纳自己的回乡青年，要接待源源不断的下放干部和城市其他人员，他们对城市下乡知青究竟真的是否需要，他们又有多大的承受力呢？

即使这样，各地1957年首批下乡务农的中小学毕业生中，仍然有很多人思想上一直动荡不安，很多人抱着“临时站站脚”的态度，自称为“暂时牌新式农民”。因此到11月1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要在农村中安家立业》，批评“有些地方”忽视对下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注意了安排生活，要求各地党团

组织围绕“热爱祖国、热爱农村、热爱劳动和爱社如家”的中心进行教育，并要求对他们的人社股金，一般应容许缓交，在记工标准上应公平合理，不要歧视刚参加生产的学生。同时，还要求对乡社干部和农民也进行必要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本着热诚欢迎的态度，像爱护自己的子女或者弟妹一样地关怀这些下乡学生。这说明我们上面论述的那些问题，在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以后的几个月，就已经暴露出来并已为中央所察觉。但是，城市的危机一旦安然渡过，还有千头万绪等待处理的国家，便不再将此事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而只是责令下面的干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而已，其收效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据共青团中央 1964 年给党中央的报告，1957 年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约有 1/4 后来巩固在农村。以下乡的城市青年为 15000 人计，最后留在农村的不过 4000 人左右，而我们上一章说到过，当年未能升学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一共是 80 余万，高小毕业生有 300 余万，即使这些学生中有大半家在农村可以不计，这个几千人的数字，与一年来上上下下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所做的宣传、组织工作比起来，也太微不足道了。

大多数还是设法在城市进行了安排，例如动员工作进行得较好的天津，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城市学生为 2000 余名，而到当年年底为止，在市内安排到服务性行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却有 6000 余名，还有一些则仍然在家中等待。这使响应号召下乡的那少数人产生“吃亏”的感觉，也是不足怪的。

无论怎样进行论证，事实却是，这条路并没有走通。唯一可以算作成果的，是扭转了社会风气，像 1957 年上半年那样的闹事现象，从此再未普遍发生。

四 创办青年农场

其实还有别的路可以尝试。北京就这样做了，那就是组织了一个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茶淀青年农场，这在全国是第一个。

这一年的升学形势的确严峻。在北京市未能考取高中的落榜者中，不乏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如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之子、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之侄张盛钦，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之子南新平，女将军李贞之侄女姜毅南，烈士子女李仪等，甚至还包括了刘少奇的儿子，他所在的北京市重点中学、也是高干子弟最为集中的学校——北京101中学，那年的高中只招收了两个班，而在一般情况下要招收四到六个，于是，仅在这个学校就读的干部子女，落榜的就不下百名。他们中的一部分如刘少奇之子，后来上了良乡的农业学校，也算是走上了参加农业生产的道路，但一所农校，容纳不了多少人。

创办青年农场的目的，就是为安置1957年不能升学的中学毕业生。决定是由党中央和中共北京市委作出的。

8月14、15两日，是该市中学和师范学校发放录取通知的日子，当天的《北京日报》即以《每个家长都来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群策群力安排中学毕业生的出路》为题，报道了一些中学生家长鼓励子女正确对待升学和就业问题的事例，并发表社论《家长要正确地对待子女的升学和参加生产问题》。15日，市委召开有关负责人会议，要求各部门妥善安排未被录取的中学毕业生。会议宣布，要举办茶淀青年农场，招收家住本市城区的非农业户的初中、高中毕业生2000人。

这个决定公布之后，北京市“非农业户”的毕业生纷纷向学校提出申请。在最后被批准参加的1900余名青年中，有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子女，如我们上面列举的那些人，此外还有几十名归

国华侨学生。该场的建立，受到北京市各级领导的特别重视^①。

茶淀农场的前身，是清河农场第三分场，有可耕地 13000 亩，除 7600 亩稻田外，还有 1000 余亩萝卜田，50 余亩果园和畜牧场。

10 月 5 日，茶淀青年农场举行建场典礼^②，市长彭真亲题“青年农场”四个大字，市委教育部部长廖沫沙、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杨海波、市教育局局长翁独健和团市委书记王照华等都到会并讲了话。会后，青年们怀着豪迈的心情试割水稻。翌年，中共北京市委决定在农场实行半工半读，计划开设农业科学技术课程，如农学、农业气象、农业机械、畜牧等专业，并聘请了 20 位专职教师。场长说：“再过三、五年，这些青年学生将是我国第一批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际经验的农业干部。”^③。

这是个带临时性质的农场，存在时间并不长。但实践证明，在经济发展陷入低谷、知识青年的升学就业再遇危机的时候，举办这种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农场，是安置青年的最为可行的方式。之所以可行，对知识青年来说，一是作为农场职工，政治地位多少要高于一般农民，尤其是当时青年所最看重的政治前途较去农村似乎更有保证；二是农场归国家所有，一般采用工资制，不存在如入社股金一类麻烦事，生活也更有保障一些；三是符合青年愿意过集体生活的心理，令青年在感情上更易于接受。对国家来说，首先是动员和组织工作要容易得多，一个农场，一下子就可容纳几千人，而动员下乡，先要与农业社和各有关单位协商，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然后在城市中敲锣打鼓几个月，几批下来，有时也不过几百人；二是下去后也便于对他们进行管理。当然，这么

① 《送他们去干一番英雄的事业》，《中国青年报》1957 年 8 月 31 日。

② 《茶淀青年农场昨天举行建场典礼》，《北京日报》1957 年 10 月 6 日。

③ 纳一，《青年农场见闻》，《人民日报》1958 年 3 月 10 日；宋钧，《新型的农民——访中国茶淀青年农场》，《中国新闻》1958 年 5 月 15 日。

做也有问题，主要是国家方面，在城市知青到农村去的一切费用都由本人、家长和社会承担而国家不管的情况下，办知青农场，需要国家大量投资，相比之下显然大大加重了国家负担，这就大大限制了这种知青农场的发展。

还有一些城市安排知识青年的主要走向是国营农场。如上海将一批知识青年安置到安徽的各园艺场，仅歙县园艺场就接纳了305名青年，据报导他们两年以后普遍掌握了园艺技术，还有人被评为特等劳模。另外如云南昆明市当年9月底有应届毕业生79人奔赴西双版纳小勐养和曼普等地的国营农场。国营农场作为安置知识青年的场所，无疑有诸多优越之处，但在1957年，我国国营农场的建设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很多大规模的农场还正在筹建，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失败已经告诉中央，在农场尚处于最艰苦的垦辟阶段的时候，接纳过多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知识青年是不实际的。所以，能够以这种方式安置城市知青的城市，在当时还是极少数。

五 回乡的知识青年们

不该忘记的是，在1957年这场动员下乡的活动中，首当其冲的，还是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

对于城乡学生升学比例不一致的不满，是那场震动全国的“汉阳暴动”的起因之一。反右运动开始以后，政府对这个问题做了如下回答：“这是个历史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城乡经济上的差别，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不平衡。旧中国相差得还要更多。”^①当家在城镇的学生尚且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失学比例大于城市的农村学生，只有回乡这一条路。

^① 《中小学毕业生决不上右派的当》，《中国青年报》1957年8月12日。

4月8日社论发表以后，很多干部对动员城市青年下乡的工作尽管疑虑重重，踌躇不前，但对动员家在农村的学生回乡，却积极得多。甚至还有人认为，这篇社论主要就是针对农村的知识青年讲的。北京市的态度就非常明显。

5月4日，北京市人委会举行行政会议，提出对于考不上学校的中小学毕业生，除了农村子弟要尽可能回家生产之外，其他学生应该分别用自学、就业或等待就业等多种方式来进行安排。

为动员农村知识青年回乡，北京市各有关部门邀请了郊区一些农业合作社的干部在报刊上发表谈话，这些人普遍提到农村缺少劳动力尤其是有文化的劳动力的问题，表示非常希望中小学毕业生能够回到农村去。如南苑区金星农业社的社干部说：“去年我们乡里的小学毕业生没有一个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我们社里只有几个有文化的青年人，到外面学什么技术都得找他们几个去，他们简直忙不过来。如果我们能有一些中小學生那就太棒了。”南苑区区委书记张还吾也说：“农村劳动力很不足，有些农业社的干部感叹地说，10年以后，我们农业社都要变成老头社了。年轻人一上学就溜了，不愿意留在农村参加劳动。我们南苑区今年就需5000人，可是没有人去。”8月，《北京日报》又出面邀请郊区各农业社社主任座谈，仍然强调农村需要大量知识青年的问题。这些话，都是针对农村中小學生说的。

8月，在大学和高中的录取工作结束，动员城市中小學生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工作繁锣密鼓地进行之时，中央又特别提醒各地干部：在组织学生下乡的时候，千万不可忽视家在农村的学生仍是大多数，不要放松了教育和组织他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工作。至此，动员农村知识青年回乡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高潮。

北京市委提出要求，凡家在农村的，考不上学校又找不到职业的应届中学毕业生，都应该回到本乡参加农业生产。在这一号召下，7月中旬就有学生回乡，到8月中旬，据东郊、南苑、昌平、

丰台几个区的不完全统计,已有近2000名中小学应届毕业生放弃了升学考试而直接参加了农业生产。很多学校的学生是几个、十几个组成小组集体回乡的,为了便于管理,有些农业社也把回乡青年组织在一起,编成青年生产队。《北京日报》在报导知青回乡的情况时说:“过去几年虽有不少学生陆续参加农业生产,但是成批的毕业生下乡,今年还是第一批,光荣的一批(8月11日)。”发榜结束后,应届高中、初中毕业生回乡参加生产的,更增加到4000人。

河北省到7月底,就已经有1万余名初中毕业生参加生产,绝大部分是家在农村的学生,8月份的回乡人数更多。据黑龙江省的不完全统计,到8月为止,该省回乡的中小学毕业生已达16000余名;湖南省的本届毕业生中,也有60%左右到农村安家落户,其中5500余名是中小城镇的学生,其余是家在农村的青年。据辽宁省10个市、38个旗、县的不完全统计,到8月中止,已有大约135600名中小學生,参加了农业生产。而据湖北省10月底的统计,参加农业生产的中小學生已达12万人。

六 “大跃进”前夕

当历史进入1958年时,这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务农的势头,不仅仍在继续发展,而且因为两个因素而有所加强了,这两个因素,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正式颁行,一个是为时十分短暂的控制人口政策的实施。

这两项措施的实施,都源于城市人口的压力。以当时最大城市上海为例,虽然建国以来,上海已经动员了108万人口支援外地,但在从1956年6月到1957年10月的短短1年零5个月间,上海市的常住人口从607万增加到686万,临时人口从6万增加到34万,共计增加112万;其中除自然增长的30万以外,有外

地流入的82万。这显然已经使该市多年来动员人口外迁的努力付诸东流，而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据估计，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该市人口还将增长100万，其中新生长的劳动力将达50万^①，如果不采取措施，人口的压力只会越来越严重。

措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拥入；第二，是将城市剩余劳动力清理到农村；第三，是控制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也就是节制生育。在这三项措施中，至少有两项即前两项，与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有直接关系，而后一项即节制生育进行得好坏，又与日后的知青问题密切相关。

一 《户口登记条例》

采取这项措施的目的，是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拥入。

虽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10年，但农村人口向城市涌动的浪潮，已经出现过几次。每次都对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建设造成严重的冲击，而尤以1956年这次的后果为最严重。国家因此而采取了一系列制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以保证城乡间经济发展平衡的措施，直至最后决定以强制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即公布《户口登记条例》。

这个户口条例，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于1958年1月9日通过的，次日刊登于全国各大报刊，并附有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对这一草案的说明。说明直言这个条例所针对的，正是近几年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现象，并声称进行严格的户口管理，是制止这一现象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农民们不仅再不能轻易地获得城里人的身份，而且连在城市寻找临时性的工作或者较长期地逗留在城市，也是无法办到的了：

^① 许建国：《动员城市剩余劳动力，支援社会主义农业建设》，《文汇报》1958年1月8日。

公安局不为他们进行入户登记。

城乡间的界限，从此被严格地固定下来，中国人被划成了两类：持有城市户口的城里人，和只有农村户口的乡下人。虽然从原则上说二者是平等的，但实际地位却判然有别。一般地说，只要有城市户口，就可以合理合法地在城市里找到工作，于是凡生老病死等等一切，就都有了保障。即使未找到工作，也享有由国家固定给与的口粮、副食等一份福利，这都是乡下人所不能得到的。

按照当时规定，凡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就具有了“国家干部”的身份，国家会负责分配给他一份固定的、有保障的工作，即使下放农村，身份也仍然不变，不会与农民混同；所以，回乡或下乡务农的任务，便历史性地落在了高中以下，还不足以成为国家干部的中小學生身上。

“知识青年”这一名词，至此也便有了明确的限定。

受户口条例影响最大的，是农村知青。他们也曾以写信给报社或上级部门等方式，表示过他们的疑问和不满，如广州一个知青写信给《南方日报》说：

我是今年在阳江一中高中毕业的学生，因为考不上大学，便到广州住在表叔家里自学，准备明年再考。但是派出所不批准我入户。我知道目前国家动员大批干部和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问题在于面临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是否一定要服从国家利益，其他个人利益都无话可说呢？这个矛盾是否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呢？

《南方日报》这样回答他：

有的同学认为乡人委会和广州市的派出所不准转移户口是违反宪法关于公民有迁徙自由的规定。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不对的。宪法的

基本精神就是保证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宪法的精神也是体现在党和政府的一切重大方针政策中的。公民的一切权利必须在保证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之下，才能逐步得到满足。因此，我们不能撇开宪法的这一总的精神而侈谈公民的个人自由。……一些中小学毕业生在自己的前途问题上，的确是存在两条道路斗争的。他们不响应国家号召，强调自己要补习。国家限制农业人口外流，他们却强调“自由”，强调自己是“非农业人口”，坚决不干农业生产，说明这些同学对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是全然不关心的，而对于个人的出路，却非常计较，要国家服从他们的愿望，而他们不能接受国家的指导。

不是完全反对继续升学，但不一定要到广州市。在农村一边劳动，一边自修，也能达到目的，问题在于自己的努力，而不能只怪环境的优劣^①。

这是当年司空见惯的解答问题的方式。它虽未明言，但却不容置辩地告诉青年：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之时，个人利益就是无话可说。在这里，“公民的一切权利必须在保证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之下，才能逐步得到满足。因此，我们不能撇开宪法的这一总的精神而侈谈公民的个人自由”是问题的核心。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当然也被置于这一总的精神之下。

二 清理城市剩余人口与计划生育

新中国成立后，人口的年增长率持续提高。到1957年前后，已由解放前的1%提高到2%以上，人口学家已经提出了要注意控制人口的忠告。

国家并非全然漠视这一问题，当时注意的重点，首先是落在大中城市，尤其是上海。1958年1月该市召开人代会，会上通过了动员城市剩余劳动力支援农业建设的决议，和将该市人口控制

^① 《到广州来补习是唯一的出路吗？》，《南方日报》1958年1月6日。

在 700 万左右五项措施，并且提出了将该市人口出生率降到 2% 的目标。

这五项措施是：

1. 全民动员，认识今后城市就业方向应是到农村去，要把“上山下乡”，“支援新农村的建设”变成群众性的行动口号。

2. 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和广大职工带头说服盲目流入城市的家属、亲戚和朋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3. 对盲目流入本市的农村人口，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动员返回原籍。

4. 必须动员、说服城市中等待就业的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一方面满足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劳动力和文化科学日益增长的需要，促进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一方面使青年知识分子经过体力劳动的锻炼，成为又有生产知识又有文化的劳动者。今后城市中高级中学、高等学校的招生，必须优先录取这些经过劳动锻炼的考验而及格的知识青年。

5. 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使人口自然增长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末从目前的 33% 逐步下降到 20% 左右^①。

这些提法中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点，其一，虽然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实动机是清理城市剩余人口，但却特别强调了知青年有必要进行体力劳动锻炼。这一观点，在广州市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时表达得更为直率。该市副市长在接见立志下乡务农的青年时强调：“青年都是曾经在旧社会里生活的，不免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腐蚀，假如不好好改变立场和观点，就不能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②

这一点后来有越来越强化之势，并显然波及到了并未在旧社

① 《上海人民的光荣任务》，《文汇报》1958年1月6日。

② 《广州社会青年要求到农村去》，《南方日报》1958年2月2日。

会生活过一天的建国后出生的青年，而且早在“文革”前夕就已发展得相当极端；第二，大学和高中可以并且要“优先”录取参加过劳动锻炼的知识青年，这可以说是发“文革”期间工农兵学员之滥觞。应该说，如果这一做法在当时能够得到切实贯彻，如果“优先”选拔的标准不是出身或其他莫名其妙的政治条件，而是文化程度和劳动表现，这一做法对于日后的知识青年下乡动员工作，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可惜的是，事情的发展却与人们的期望恰恰相反。

广州市对这一问题也比较重视。当年2月，该市人委会召开有关部门，专门讨论布置这项工作，成立了“广州市动员人口回乡生产办公室”，制订了一整套工作方案。他们计划当年要动员10万该市剩余人口回乡或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并计划在从当年到1961年的4年中，共动员回乡或下乡人口21万。他们划定的动员范围包括：1. 原属农村的人口；2. 干部、职工的家属；3. 无业、失业的一般市民和社会青年。

这个时期，一些决策者对于城市人口、城市发展规模等问题，曾有过比较认真的规划和考虑，可惜的是，这一时期过于短暂，影响也太有限了。节制生育措施在一些大城市实行至多只有几个月，在广大农村尚未及正式展开，就因为越来越热的“跃进”浪潮而宣告夭折，待到这个问题被再度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历史时机已经失去，一切都已不可挽回，人口压力终于成为以后整整30年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动因之一，并使一代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三 下乡务农运动的持续发展

上海市继1957年动员一部分应届毕业生到市郊和邻近各县的农业社务农之后，自1957年底开始，又着手动员部分知识青年前往产茶的安徽南部山区，这一做法在1958年初达到高潮。1958年的新年元旦，从该市前往皖南的1200名知识青年抵达安徽省芜

湖，又从那里被分配到宁国、寄溪等9个县的农业社。1月底，第二批上海青年200余名经过短期培训后也到达芜湖，被分配到繁昌、祁门、旌德、太平4个县的各农业社。

4月，湖北省新建的大批国营农场和安徽省农业社组成了联合征收委员会，决定在上海征收12000名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其中到湖北荆州、黄冈、孝感等专区的为8000名；到安徽芜湖、淮南等地农业社的共4000名，报名时间是4月19日到20日两日，计划于5月初即将征收工作全部结束。征收的具体条件是：1. 思想进步，品行端正，身体健康，年龄在17到26足岁之间，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包括同等学历具有证明）者；2. 自觉自愿下乡上山，能吃苦耐劳，立志做一个新农民，全心全意建设社会主义；3. 自愿遵守农业社章程及农村生活秩序者；4. 系本市常住居民，并具有正式户口者。

正式报名的前一天，4月18日，上海市举行了动员大会，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曹荻秋为青年们描绘了一幅十分美丽绚烂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景。他说，许多地方已经提出要在三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内改变农村面貌，现在看来，这是完全可能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也到会并在会上发了言。他说：新中国是争来的，社会主义也是争来的，年轻人的前途也要靠斗争，要争前途，争为祖国服务。他提醒大家防止三点：一是防止依赖思想，不能依赖党、依赖政府，也不能依赖爸爸妈妈、教师、干部，依赖老一辈；二是不能只有短期打算，在农村一二年是搞不出大名堂的；三是要刻苦锻炼，越是吃得苦，吃得亏，将来本事就越大些^①。

这些动员讲话对上海青年无疑产生了很大鼓舞，他们再一次

^① 《上海万余知识青年活动分子集会，立志到湖北安徽农村落户，胡耀邦勉励年轻人争前途争为祖国服务》，《文汇报》1958年4月18日。

表现出了令人感动的热情，2天之内报名者就达20000余名，其中除了历届高初中毕业生、参加自学广播学校学习的知识青年外，还有为数不少正在补习班和学校上学的学生。

从5月开始，这些青年分成10批如期出发了，这是50年代的最后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

广州市动员知识青年下乡的工作从春节过后也已开始。2月团市委和市青联即召开了该市各区团委书记和青联办事处负责人会议，专门研究和布置有关问题。会议要求下属各部门除了要协助有家庭或亲戚在农村的青年返乡之外，凡家庭和亲戚都不在农村而自己又有务农要求的，团组织要协助他们到郊区、广州其他县或海南岛等地参加农业劳动。另外，团市委还在广州市郊的九佛乡筹建了一个青年集体农庄。

虽然兴起于50年代中期的青年志愿垦荒运动至此已经基本中止，但广州市在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务农时，却仍然采取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名义，由此也可见青年垦荒活动在青年中所造成的影响。当年3月，广州市的一支由184名18到20岁的青年组织的垦荒队从广州出发，插入到海南的崖县、澄迈、屯昌三县的青年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们中高中毕业生的人数高达总数的47%；到广州市郊建立青年集体农庄的青年共358人也于2月底3月初分批到达，都自带了铺盖、小农具和粮食。这个集体农庄拥有土地4万亩，绝大部分是山地和坡地。一些小城镇青年也群起效法，到各山区去建立青年农场，这与正在兴起的城市下放干部的开荒建场，汇合成了一股热闹非凡的潮流。

空气越来越燥热，这是“大跃进”前的动员时期。5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了，它正式宣告“大跃进”的开始。

它同时也标志着自1957年才起步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务农运动的结束。

上海等大城市的青年仍在一浪又一浪地离开家乡，奔向祖国的各个角落。但他们已不是去务农，去垦荒，而主要是去新建的工厂、电站，他们是支边青年的一部分，但与我们这里谈到的“知青”已不能划等号了。

回乡不到一年的青年又裹挟在更巨大的农民进城大潮中回到城市，《户口登记条例》也无法抵御，这一条例真正显示出它的作用，是在1960年以后。

第五章

难忘一九五八

50年代后半期是个让人目不暇接的时代，反右运动刚过去，大跃进就开始了。

人们大多认为，1958下半年和1959年是知识青年下乡运动的低潮。但低潮并不意味着中断，它就像历史上的很多处于低潮和动荡的时期一样，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这个时期既是1957年知青下乡运动的伸延，更是下一阶段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知青运动的前奏。

号召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做法，在有些地区真正达到高潮，是在1958年的上半年。而从这年的下半年开始，由于大跃进造成的种种干扰，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一事，显然已经大不合时宜，因而一度中止了。但是，有城镇知识青年参加的与后来的上山下乡有关的种种活动，却借大跃进的东风，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大跃进给1960年以后再次开始的知识青年下乡务农运动，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大跃进期间的百万复员转业军人和下放干部，在全国辽阔的边疆和内地大大小小的荒山野滩上，开辟了大规模的军垦农场和数不清的国营农场、垦殖场，为以后的安置城市知识青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基地，大大拓宽了知识青年下乡务农的出路。大跃进期间为动员青年支援边疆社会主义建设，而由国家统一规定动员和安置经费的做法，开日后为上山下乡知识

青年统一发放安置费的先河。雨后春笋般兴起在全国农村的农业中学和红专大学，为刘少奇后来的“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这场大跃进，很难设想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会如此波澜壮阔地发展。当然有人会说，若不是发动这场热昏头的大跃进，1957年反冒进的阵痛过去之后，经济肯定会稳步地、持续地向前迈进。那么，也许再没有必要搞什么知青运动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当时那种特定的环境之下，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

大跃进搞起来了，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大破坏。这是后来不得不在城市进行精简人口，乃至让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同时，大跃进也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深度上和广度上都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这就是当时的历史事实。

一 把边疆建设成美丽的花园

在从1958年1月开始由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毛泽东就已经开始向党内一些领导人的“反冒进”做法发难了。他说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因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和李先念都为此而做了检讨。此后的一切，就开始与“反冒进”对着干了。

但大跃进的正式开始，时间还要晚一些。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6月，中央召集了成都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国家经委提出的“反映大跃进新形势”的《国家经委关于1958年第二本帐的报告》，竟把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提高到33%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紧接着，《红旗》杂志便发表文章推波助澜，号召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是“大跃进”在全国轰轰烈烈地真正开展起来的标志。

建设规模的扩大，投资的急剧增加，导致了劳动力不足的假象。为满足大跃进对劳动力的需要，中央批转了国家劳动部《关于当前工业企业补充劳动力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改变职工人数的冻结政策，大量增加劳动力，以适应生产大发展的需要。并决定把劳动力的招收、调剂权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自行管理，不必再报中央批准。结果使人口迁移一下子“活跃”起来。审批权下放地方之后，不久地方又层层下放，使国家失去了对新增职工必要的有计划的控制，各部门、各地区不仅从城市、也纷纷从农村大量招工。

事实已经证明，在大跃进期间种种狂热举措中，这是最具灾难性的一个。从1956年开始国家为制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以保证城乡间经济发展平衡的一切努力，因此而一概付诸东流；工矿企业的人事不再冻结，学校的招生人数不再压缩，各城、镇迅速建起的企业都喊着缺人，纷纷四处招工，各行各业都向青年敞开了大门。农民重新从乡村拥向城市，全国又一轮的人口大迁移开始了，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就达到高峰，以至如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到了告急的地步。8月，北京市劳动局发出紧急通知，声称：“近日来不少农村青年纷纷盲目来京要求工作。这种现象，不仅影响农业生产，而且影响首都社会秩序。”通知要求各有关部门立即停止自行招收外地人员，劝告农村青年立即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以有效地制止这一现象的继续发展。可是，一纸通告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国家惨淡经营了一年有余的动员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运动，也随之而瓦解了。我们这样说，根据有两条，第一是各地的大量从农村招工以及各高校、中专的扩大招生，不仅使城市难以找到剩余劳动力，而且使原已下乡的学生主要是农村回乡青年也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城镇涌入，国家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尤其是城市学生下乡务农的政策，已经随之而自然消解；

第二是虽然城市中不在少数的知识青年，包括社会青年和中小学毕业生，或随干部下放的大潮奔上各省山头去建立垦殖场，或与移民一道前往边疆和内地省份支援建设，但他们只是这股大浪头中的一支，并未构成一场独立的运动。当然，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可以也应该被归入到我们的“知青”范围之内的。这支赴边疆、上山头的队伍，为日后的知识青年安置工作，开辟了又一个广阔的空间，也因此而与“下乡”相对，被称之为“上山”，这也概括了安置知识青年的两大去向。

下乡务农的运动虽告中止，上山以及支边的活动却搞得如火如荼。

自1957年11月开始，“掀起一个规模巨大的农业生产建设高潮”的口号，就响彻了全国。到1958年8月毛泽东在全国视察之前，各地正在兴起大放粮食“卫星”的热潮，最大的一颗小麦“卫星”已经达到亩产3812斤的荒唐地步。而更为荒唐的是农民出身的毛泽东，竟会相信这种谎言并真心地为之欢欣鼓舞。没放出像样“卫星”来的省坐不住了，尤其是本来的优势就不在农业方面的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为了也来凑上这场热闹，让自己的农业也实现“大跃进”，他们要求内地支援劳动力。

这一要求立即得到中央支持，全国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怎么也不能让这些地区拖住后腿。于是，在8月于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计划从1958年到1963年，从内地动员570万青年到这些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开发和建设工作。使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逐步地同内地一样获得迅速发展，并责成农垦部负责此项工作。具体计划是：河北去内蒙古50万人；河南去青海65万人，去甘肃15万人；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去新疆200万人；浙江去宁夏30万人；山东去东北三省80万人；四川省由川东去川西100万人；广

东省内动员 30 万人去海南等地。

文件一经下达，各省立即行动起来。10 月 15 日，国家副主席朱德在中央国家机关积极分子大会上勉励青年去边疆大显身手，特别要到西北和内蒙等地去。他说，这些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50—60%，人口却只占 6%，为着建设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幸福的新中国，全国广大的青年，包括机关青年，必须到这些地区去，把这些地区的资源迅速开发出来，把这些地区建设成为祖国的美丽的花园。这就使这项活动，大大扩充了范围。

11 月 27 日，农垦部部长王震接见了农垦战线上的 100 多名青年积极分子，在赞扬他们的业绩并号召全国广大青年向他们学习的同时，也发出“到边疆去”的热烈召唤。

共青团中央立即响应，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动员数百万青年前往边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计划。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这一决定，1959 年 2 月，中央又专门召开了动员内地青年前往边疆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会议，对动员和安置工作作了具体部署。这已不是以往那些由共青团所组织的规模有限的、零零星星的垦荒活动了，这样企图在短时间内远距离调动上百万人的大手笔不可能仍然“不要国家的钱”。这是国家第一次直接出面组织青年的移民垦荒工作，也是第一次对动员和安置经费作出了统一的规定：安置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解决”，列入中央级预算开支的有车船费、冬装费、途中伙食补助费和医疗补助费、宣传费、抚恤费等共八项，其余开支由地方解决。在这项活动进行的 1959 和 1960 两年，据不完全统计，国家财政一共支出了 2 亿元^①。

这一措施大大促进了动员工作的开展。报名非常踊跃，使这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第七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0、793 页。

次支边活动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此后，每週动员知青下乡、或城市精简职工等活动，中央多采取由国家财政拨款，统一规定安置经费的方式。

参加这一行动的，除了10万复员转业官兵之外，主要都是青年，他们从1958年开始陆续前往垦区，在1959到1961的3年中，除河北、内蒙古未按《决定》行动之外，其他有关的16个省（区）和部队一共动员和安置支边青壮年和退伍兵青年93万，随迁家属43.8万人。

上海市闻风而动。1958年6月，已有一批知识青年奔赴即将成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支援建设。中央文件下达以后，8月底，更有12个省区联合到沪，招收大批社会知识青年。从9月初开始，录取通知书就陆续发出，第一批1000多人于9月7日动身，前往福建和安徽，这一活动随之便形成了高潮。据报道：

上海正尽一切可能输送大批知识青年支援边远地区和内地的工农业和文教事业。这几天，在车站和码头上，几乎每天都有大批青年出发到外地去。4万多名被批准到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陕西、云南、贵州、河南、安徽、江西、福建等12个省和自治区的知识青年陆续离开上海。为了尽一切可能满足外地在上海招收知识青年的需要，招收对象不仅包括未升学的社会青年，而且也包括各种补习班（校）和民办中学的在校青年。

11月11日，上海市召开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动员青年到各地参加建设成为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参加安徽建设的青年向全上海青年提出的“青年儿女志在四方”的口号，很快就响遍了全国。

那个时代的口号是“力争上游”，所以没有哪个省市甘居人后。

河南提出了“要人有人，要啥有啥”的口号。截止到1958年12月中旬，该省永城、夏邑、沈丘、项城和淮阳五县就有上万名青年以“支援边疆建设社会主义青年突击队”的名义，前往青海和甘肃，其中女青年占总人数的21.96%。人员质量之好，任务完成之圆满超出所料。究其原因，与1956年以青年志愿垦荒队名义前往边疆地区的移民在那里的生活情况有很大关系，很多人希望也能像他们那样，把家属接去过丰衣足食的生活。另外，与当时的夸大宣传也有关，很多人以为到那里可以“挣大钱，吃的好，穿皮袄”，国家又统一发给迁移安置经费，何乐而不为呢^①？

河南青年移往人数最多的地区是青海。1958年底，该省撤销了移民垦荒局，成立省农垦厅，专门负责青年移民垦荒任务，计划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移民65万。1958年底到达的一批，都被安置在海西、海南、海北和黄南4个自治州。1959年6月，又从河南动员了男女青年45000人，全部安置在上述4州以及玉树、果洛两处，这六个州全以牧业为主。1960年，河南又迁移了31000人，仍然安置在上述地区。前后几批从河南迁移来的青年，共计10余万，他们中有6400人被分配参加了工业建设，5000余人参加青海湖滨水利工程，其余的都参加了农业生产。青海省原计划以这些青年为主建立起32个国营农场。

另一个接受这些青年最多的地方是宁夏。宁夏回族自治区于1958年10月成立，面临的重大困难就是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从自治区筹办开始，先是有为修三门峡水库而从陕西朝邑、大荔、华阴等县迁往的移民，然后又不断有京、津、沪、陕、辽、吉、豫、川、鲁等省市的青年前往参加建设，中央作出决定之后，各省加紧了动员工作。到1959年初，到宁的各地青年已达10余万人。此

^① 《共青团中央批转团河南省委关于永城等县团组织协助党动员青年参加边疆建设的经验报告》，1959年2月。

后工作更加抓紧，仅浙江一省，在1959年一年就分两批动员了56700余青年及其家属赴宁^①。宁夏各级常委和安置机构根据“以农为主”，“分别归口”和“大分散，小集中，自成一个生产、生活单位和经济核算单位”的方针，除将各省市前来的青年，一些安排参加文教工作和从事服务性行业，另有一些分配到宁夏新建的发电厂、机械厂以外，对于来自浙江的，主要将他们组成浙江来宁青年生产队，安排在379个安置点上从事农业劳动。当地各公社一共划出了近10万亩的基本农田，使每个来宁青年得到2.7亩土地。国家还为这些青年发放了每人每月15元，家属10元的定期生活补助。

这些青年，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专门名称，就是“支边青年”。凡解放后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去支援建设的各行各业青年，包括移民中的青年，都被如此称呼。最早的，甚至可以包括1950年起为解决新疆屯垦官兵的婚姻问题而在内地招聘的几千名青年女兵。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成千上万的建设者奔赴青海、甘肃、新疆等边疆省份，其中有工人、科技人员，也有大中学校毕业生和农民，他们在那里兴建工厂，开发矿山，也有从事干部、教学和财贸等各种工作。当时人们将这一行动，统统称之为“支边”。1958年的几万青年和移民奔赴边疆，也是这一行动的组成部分之一。但参加支边的人有的原来就是国家干部或国家职工，到边疆之后并未改变原来的身份，到边疆的大学生也是如此；而移民中很多人没有进入过校门，所以这些人虽然都是支边青年，却与我们本书所说的“知识青年”，不是一个概念。只有那些中小學生，到了边疆之后或到农场，或到农村去参加劳动，

^① 刘镇寰：《作“五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宁夏》，载《浙江青年在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并未享受到国家职工（国营农场的职工亦即农工除外）待遇的，才可划入我们的知青范围。所以，知识青年只是支边青年的一部分。只是在60年代以后，他们在支边青年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大到几乎可以在二者间划等号的地步，人们才把支边青年看成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部分，不过那是后话。

还可补充的一点是：这些“盲流”中的中小学生的比例，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高得多。以新疆为例，1961年的进疆盲流中，学生占总人数的18.6%；1962年则占17.5%^①，他们中主要是应该回乡而未回的家在农村的中小学生，这是个至今仍未引起人们注意的群体。

二 各地垦殖场的知识青年

自1957年10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干部下放农村的热潮，这一热潮进入1958年之后又有了烈火烹油般的发展。事实上，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往往是全国各行各业下乡支援农业浪头中的一个，即使在“文革”期间，它也与大批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的做法结合在一起。

到1958年2月底，全国下放干部已达130万，大批人不仅被下放农村，而且随着“面向山区，向山区进军，全面发展山区生产”号召的提出，还有被大量派到各处山头 and 荒滩，去兴建国营农场和垦殖场。其中规模较著的，有上海3万大军去崇明岛围垦芦滩，兴建了新海、东平等国营农场；北京的下放干部经艰苦奋斗，在京郊荒沙滩上建起南口、长阳、卢沟桥等农场；江西全省5万机关干部由省委书记方志纯带头，分赴全省各个山头，建立了200多个综合垦殖场；广东省下放10万干部，大多被派遣到山区

^① 《新疆通志·民政志》第四编第四章，“自流人员收遣安置”。

去，其中去海南岛的，就建立了几十个国营农场，等等。跟随这些干部前往参加劳动的，也有不少城市中的社会知识青年。很多后来就留到了当地，如北京的南口农场，就有知识青年1300多人，都是在1958和1959两年去的。参加这一活动的知识青年虽然是少数，但这些农场的建立，却为1962年以后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供了最适宜的基地。

我们前一章提到，在1957年动员城市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务农的时候，国家就已经意识到，举办青年农场，或者把青年安置到国营农场，是远比动员他们到农村务农更加简便可行的方式，最早进行这一试验的，是北京创办的青年农场。进入1958年以后，随着大批干部下放农村和上山开荒，青年团中央便又一次想到了组织类似于当年垦荒队那样的方式，然后再在组织青年开垦荒地的基础上，兴建青年农场。1958年初，他们为此进行了试点，并树立了两个典型，就是包头市青年农场和上海市组织的修建海塘。

包头市青年农场是由市人委和团市委组织建立的。其初衷是为下放的青年干部们开辟一个劳动锻炼基地，同时种植大量蔬菜以满足新建设的包钢的需要。这个农场由郊区的副区长任场长，团市委将下放的书记、部长等12名干部从农业社调来工作，成员主要是下放的机关干部。以后每年计划吸收一批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半工半读，参加农业生产。今年就准备由市教育局为农场配备数名教师，在农场内开办一所学校，吸收400名初中、高小毕业生（该市当年未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一共是2800余人，该场决定吸收的占这一人数的1/7），并预计在3年后能发展到1000人。接着，市团委着手动员街道知识青年去郊外荒滩建场，参加者有不少是为了投入新建的包头钢铁厂，而从山西等地兴致勃勃前来的中小學生。

江苏省奉贤县（今属上海市）位于东海边，距上海市约65公里。1954年建立了奉贤国营农场，共开垦了1万余亩荒地，剩下

的5万余亩荒地，因为没有海塘保护，一直未能开垦。1958年上海市决定派出3000名城市知识青年到该县，修筑一条长达10余里的海塘，向大海争夺土地。并计划在海塘修好后，拨出1000亩土地，建立一个共青农场。2月份，“上海知识青年志愿参加修建奉贤海塘工程办事处”正式成立，报名的青年达13000余名。

共青团中央在推出这两个典型时说，在城市附近为青年建立劳动锻炼基地，这是一个创举，是一举三得的好事。除了为青年干部开辟劳动锻炼场所和为城市提供农产品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得，就是为城市不能升学的中学生开辟了一条就业的门路。我国城市每年约有200余万知识青年要求就业，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矿企业、国家机关只能吸收几十万人。1957年各地已经组织了一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插社，这是一个可以广泛采用的办法，但是还必须想出更多的办法和门路。在城市附近选择荒地建立农场，就是大有可为、大有希望的一条出路，如果全国有条件的其他城市都能这么办，就能帮国家解决更多青年的就业问题。

团中央还认为，有荒地可垦的城市近郊还是不少的，就是没有荒地，也许会有荒山，如北京市的西、北两面，就都是荒山。即使城市近郊不行，也可组织青年垦荒队到离城较远的地方去建立。总之，为城市知识青年寻找就业门路，是团组织应该关心并加以倡导和组织的工作。至于具体做法，可以因地制宜地加以选择^①。

一些以知识青年为主的国营农场、垦殖场，就这样建立起来。如黑龙江省伊春市在此不久就“誓师出征”，在该市附近的伊东建立起一个包括农、林、牧等综合性的农场，并决定在那里定居。又如1958年，200名上海青年曾前往湖北洪湖一带的大同湖、大沙湖，建立了两个国营垦殖场并得到了巩固；此外，很多山区县也以公社为单位，组织了以知识青年为主的小型农场、园艺场。

^① 《只要想办法，办法多得很》，《中国青年报》1958年3月3日。

这一做法后来被作为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重要方式之一，而沿袭下来。

在这类大大小小星罗棋布于全国，又旋起旋落的农场、垦殖场中，江西的各垦殖场由于与全国著名的典型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相关，而特别引人注目。

1957年10月，在空前规模的全国下放干部高潮中，江西省委、省人委召开了全省山区工作会议。省长邵式平在会上发出了“开发山区，建设山区”的号召，要求全省人民特别是广大干部动员起来。会后，省委决定建立农林牧渔综合垦殖场，设想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把井冈山、怀玉山、庐山、云山、西山、蒙山、油山、九连山、彭公山、东固山等20个大山区全部建成社会主义的林业基地，并以这些基地为核心，把全省山地全部开发利用起来。12月，南昌市10万人集会，欢送上山下乡的5万垦荒者开赴山区、红壤岗地、湖滩和沼泽地。这些垦荒者包括省、地级以上机关干部、复员转业官兵，也有江西本地和从外省市前来的知识青年。其中的机关干部大多是出身不好或者本人有历史问题（如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等）以及犯下生活问题等错误的人。省里向他们进行动员时曾说，你们去农村，三四年就可以回来，等于读一个劳动大学，有的还不需要四年，二三年就可以回来嘛。但是这些干部中的绝大多数，后来并没能重新回到城市。

自1958年起，上海、扬州和江西本地各城镇的知识青年，陆续来到这里的井冈山、云山、武功山、九连山等分场。其中，到达井冈山地区的上海青年有300余名，他们与下放干部和复员转业军人一起建起的井冈山国营垦殖场，所辖范围包括宁冈全部、遂川县的茨坪乡、永新县宠拿山乡，人口达5万人。在东乡县以西6公里处的红壤丘陵上创建的红星垦殖场，接收了从扬州等地到来的知识青年130余人和错划右派分子120人。在原省委书记、副

省长方志纯带领下创建的大茅山垦殖场，接收了从上海、扬州等地前来的知识青年 300 人，他们在荒坡野岭上开地造林，还建起了小发电厂。云山、武功山和九连山等垦殖场，也都安插了上海知识青年，与江西当地的知青一起，共达上千名。金坪山垦殖场，也有 200 名中小學生。到 1963 年为止，参加江西山区建设的知青已达 3 万多人，其中 90% 是本省各城镇的中小学毕业生，也有部分是从上海等其他省市前往的知识青年。仅在 1958 年一年，全省就建立起这样的综合垦殖场 220 个，拥有耕地 131 万亩。1962 年春季以后，垦殖场又经历了一次大发展。这些垦殖场的建立，除了经济上的意义以外，还有两大作用。其一，是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供了一个基地。在“文化革命”期间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的 10 年中，这里一共安置了知青 8 万人，占全国农垦系统安置知青总数的 3.6%，在全国各垦区中位居第八。其二，是垦殖场的创立者们在创业之初就办起了 76 所劳动大学，亦即名扬全国的江西共大的诸所分校^①。就文革前来说，这些垦殖场所安置的知识青年究竟是有限的，但是在垦殖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大，对于承担不能升学的城市中小学生的出路这一任务，却曾受到一些中央领导人的特别重视，并成为共大办学的主要目的之一。

三 半工（农）半读，培育共产主义新人

“反冒进”的一大罪状，就是以保证质量为借口，砍掉了大批学校。即使是暂时的也罢，这确是这项措施的不得人心之处。大量适龄儿童不能入学，大量高小毕业的还不具备劳动能力的少年不能升初中，据中宣部长陆定一 1959 年的统计，13 岁到 16 岁的

^① 陈宪主编：《江西农垦经济的昨天今天明天》第二章“江西农垦经济的历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孩子，全国约有 3700 多万人，全日制初中却只能容纳 700 多万人，3000 万少年不能升学，参加生产劳动又为时过早，群众对多办学校的要求十分强烈。而国家又不愿将更多的钱投入到教育上，这就形成一个尖锐的矛盾。要是不花钱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了，这就是国家所希望的。大跃进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一切不可能的事似乎一下子都变得可能了，这就为国家不花钱或少花钱而大办教育的幻想，提供了一个实现的背景。

一 教育方针的确定

反右运动之后，毛泽东对教育工作特别重视起来。他认为青年中出现那么多的右派，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教育为什么人的问题，必须提到日程上来并且要抓紧。1957 年，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党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 年 9 月 19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据此共同签发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将其作为全国统一的教育方针并在全国公布，这是个对以后 10 余年的教育工作具有深刻影响的关键性文件。教育的面貌，从此为之一变。

《指示》的特点，一是强调教育的政治性，也就是阶级性，包括在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教学中强调革命教育和生产劳动等等。这里要提出的是，这时所谓的贯彻阶级路线，与 1962 年以后所说的内容并不尽相同，这时指的，更多的还是本人的成分，也就是本人是工人农民，当然工农子弟也占相当的比例，而且这一比例越来越大，最后，出身便代替了成分^①。二是重视普及，以示其教

① 如当时报刊纷纷报道的“山东各高校贯彻阶级路线，工农学生将近半数”；“南京九所高校今年将招收大量工农子弟”等；又如《文汇报》发表社论：《坚决贯彻高等教育的阶级路线》（1958 年 1 月 27 日）。

育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宗旨。《指示》提出，从1958年起，要在3—5年之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在这一时期内，每个农业合作社（即公社以下的生产大队）都要有一所中学。15年内要使每个具备必要条件、自愿入学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在此后的又一个15年中，高等教育的质量就能得到提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使用多种办学形式，包括国家办学与集体办学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以及收学费的学校与免费的学校并举等等。

贯彻阶级路线和注意普及二者是一致的，出发点都是为“无产阶级”其实就是工农服务，它既是大跃进的特殊产物，也对大跃进的狂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能脱离大跃进来探讨这场教育革命问题。

对此事特别关注的人中，有一个是刘少奇。1957年为处理学生“闹事”和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等问题到全国各地的视察，使他对青年学生要求升学的强烈愿望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他当时给这些中小學生指的出路是到农村去从事农业劳动，并把自己一个在北京读书的远房侄女刘维孔动员回到湖南农村，以进一步说服人们。但他也承认，广大青年和学生要求继续学习的愿望“是正当的，国家应该想法子，创造条件，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升学要求。我们国家不怕知识分子多，不怕学校多，而怕学校太少了”。他清楚不解决教育和就业问题，只是一味要求中小學生下乡务农，阻力太大了。不仅当时难以让大多数人接受，而且从长远来看，这些青年学生下乡后也并非可以一劳永逸，同样存在一个要受教育和培训的问题。怎样才能既解决这个问题，又尽量少花国家的钱呢？

刘少奇此时对这个问题注意很多，也多次与人商讨此事。1957年11月8日，他看到《参考资料》上刊载的《美国大学生有三分

之二半工半读》的报导之后，觉得对我国很有借鉴作用，于是作了批示，“此件送团中央一阅。中国是否可以个别试办？请你们研究。”据他自己说，搞勤工俭学，要学生和青年不依靠国家和家庭，而依靠自己设法读书和升学的方案，以及办民办学校，即组织群众集体办学，不只民办小学，而且民办中学的设想，就都是那时候提出来的。

刘少奇说，1958年，他对这个问题又想了一下，又有所发展，那就是搞半工半读：

我想，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现在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此外，是不是还可以采用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并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

现在农村已经大搞半工半读，农业中学就是半工半读学校。农业中学可以半日读书，半日种地，也可以一日读书，一日种地，还可以考虑半年种地，半年读书。现在是办农业初中，那么初中毕业以后势必要办农业高中，高中毕业之后势必办半工半读大学。如此看来，乡村里面，城市里面，都可以搞半工半读。就是说，势必会有这么两种主要的劳动制度并行：一种是现在全日制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

如果半工半读的制度能够普遍实行起来，那就可能解决很多问题，可以比较充分地满足许多人的升学要求，工厂里人多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劳动就业的人可以多些。这是采用群众路线，多快好省地培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训练大量有文化的技术工人、技术员、大学毕业生^①。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半工半读，亦工亦农》。

就这一想法，刘少奇曾于当年5月25日专门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各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并无异议，他很快作了批示：“此件已看过，同意你的意见。”于是，刘少奇将上述意见在5月3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正式发言，这就是收入刘少奇选集的文章《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后来刘少奇在视察江苏城乡时发表的讲话，对这一设想有了更进一步的、更带时代色彩的阐述，即“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就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贯彻这个制度最彻底的办法之一是把工厂和学校合起来办”。它标志着我国的教育方针开始发生转化，从教育只为升学服务，转到为工农业输送劳动后备军的方向上来。这与同年中央所制定的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是合拍的。

两位领导人，在兴办半工半读学校的问题上，似乎达成了一致，但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出发点不尽相同。毛泽东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让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受到教育的问题。对于刘少奇想得很多的青年学生毕业后升学和就业等具体问题，他没有讲，恐怕考虑的也不多。谁也没想到这个貌似细微的差别，后来竟会发展成“不可调合”的裂痕。

按刘少奇的理解，这种做法的意义，就在于将普及群众教育的任务交给了半工半读学校和业余学校，因为这些学校能够在自立的基础上兴办，不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他们也不需要专职的教师班子，可以实行“能者为师”的原则。而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专门人才的任务，则交给了城市中的正规学校，这些学校有完备的教学设施，宽裕的教学经费和最好的师资。这就是他所谓的“两条腿走路”的教育方针。当然，这一思想的最终形成和完善，是在1964年以后。

二、全民办学和江西共大

1958年的全民办学，就是按照这个新的教育方针进行的，走

的是毛泽东所最热衷的群众运动的道路。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工农群众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劳动化被认为是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必要前提，兴起了省、市、县、乡都来办学的局面^①。其形式，一种是公办高等学校，绝大多数是在原来中专的基础上建起的，师资一般从原有大学中抽调，质量总还算有一定保证；第二种是民办普及性大学，用当时的话说，是发动全党全民大办大学，这些学校当然都是非正规的，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半工半读或半农半读的农业大学，这种大学名称各各不同，有的叫红专大学，有的叫农民大学。其教学水平，其实与农业中学并无多大差别，报上报道河南某农民水利学院的学员经两个多月的学习，学会了开方和圆柱体积、容积的算法，就是一例。

这些所谓的大学及其办学的宗旨和口号，的确是充分发挥了劳动人民的想象力。譬如，有的地方根据当地特产来设置学校，于是就有了三湖渔业大学、金州苹果大学、景德镇陶瓷学院、宽甸石柱乡人参学院等等名目。很多大学按生产队设系，按主要作物或专业分科分班，把学习和生产完全“拧”在一起，如河南办的鸠山大学，在5月种洋槐时就讲洋槐的种植方法，6月种红薯时就讲红薯的种植方法。更有甚者，如湖北省孝感县长风农业社，办起一所“水稻双万斤大学”，学员入学的第一课上的是“如何实现亩产两万斤”，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是自己种实验田，哪个学员在自己的实验田中把水稻的年产量提高到了亩产两万斤，方才可以毕业^②。

这些异想天开的大学，其实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当时中央一些领导的推波助澜密切相关。如当时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就曾公然宣称：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搞（亩产）1

① 《省市县乡都来办大学》，《中国青年报》1958年8月9日。

② 《劳动人民走向知识分子化的伟大一步——农村办大学形成群众性运动》，《中国青年报》1958年8月22日。

千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他夸耀河南的鸠山大学是一所真正继承了革命传统的学校。10月29日，他还在安徽合肥工业大学说：“你们有一个基础，再加上一条，就是敢于胡搞，胡搞就是科学研究^①。”有这样令人瞠目的胡言，胡搞自然就有了合法的依据，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恶劣的。

与这些胡搞的所谓科研相比，成立于1958年8月1日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至少要严肃一些^②。它从创办初期起，就明确宣布自己是一所新型的、与资产阶级大学有着根本区别的学校，其标志是共产主义加劳动^③。它是根据发展生产、建设山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为满足广大工农子弟的学习要求，适应农村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创办起来的，这是它的办学目的。它首先向工农开门，从创办初期起就大量招收工农青年入学。它的直接任务，就是为占该省面积70%以上的山区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劳动技术大军，充分满足加速建设山区的人才需要。由此可见，它是党新提出的教育方针的具体图解，也是中央所着意培植的新型大学的样板。

共大初办起来的1958年，曾计划招收学生5万，其中一半由当地各农业社保送。到8月1日开学时为止，已录取2万。当时已经到校的有11000人，其中有工人、农民、手工业社社员、农业社主任、转业复员军人，还有来自山东、江苏、四川、广东等8个省市的青年学生。据共大自己公布的数字，到1960年为止，该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页。

② 《共产主义教育事业的一朵大红花，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开学》，《中国青年报》1958年8月6日。

③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兼共大总校校长刘俊秀，《我们是怎样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载《半工（农）半读育新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学经验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65年版。

校共有总校一所，分校 88 所，附属劳动技术学校 14 所，学生近 5 万，迄未达到 1958 年计划的当年招生数。1962 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之后，学校对规模、学制等方面进行了调整，到“文化革命”开始之前，学校有以办大专为主的总校一所，办中专为主的省属、专（专区）属分校 23 所，办初级技术学校为主的县属分校 23 所，学生一共有 14000 人左右。从 1962 年起，学校开始向农业战线输送毕业生，其中县属技校的毕业生，大部分回农村社、队作不脱产的技术工人和基层干部；总校和省属分校的大专和中专毕业生，绝大多数到国营农林企业、事业单位作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学校声称反对不加区别地把学生推出校门自行就业或各自还乡的做法，由学校负责到底。大专和中专的学习年限，均为 4 年。

共大各分校是在遍布全省山头的国营垦殖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是该校的一个突出特点，它与各垦殖场形成网络，各分校成为垦殖工作不可缺少的部分，这是共大得以生存下去并贯彻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宗旨的前提。建校初期，面对的是一片深山、荒地，一无设备、二无校舍和经费，学校要求学生和教师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根据省农垦局布置的任务，开垦荒地，种植树木，靠学生和教师的劳动建造校舍。在 1958 年到 1962 年间，学生花在学习和劳动上的时间大约各占 60% 和 40%，1962 年以后，学习和劳动时间之比，在四年制系科，大约是劳动为六、五、四、四，教学为五、六、七、七，就是第一年劳动占 6 个月，教学占 5 个月，第二年劳动占 5 个月，教学占 6 个月，第三、四两年劳动各占 4 个月，教学各占 7 个月。其课程设置，主要有农、林、牧、渔等专业，根据生产基地的情况而加以增减，如设在山区，就以林业为主，设在滨湖地区就以渔业为主等。共大的师资，大部分是 1958 年的下放干部和转业军官，也有一部分是正规大学的毕业生。

无论江西共大，还是其他的农业大学，它们的兴办，都有安置和培训知识青年的目的在内。以共大为例，建立之初是曾被作为安排知识青年的一个方向加以考虑过的，它虽然也招收垦殖场的干部和职工，但生源主要还是当地农村的基层干部、回乡知青，以及省内外的中学生。它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四川、广东、广西等 18 个省市招收而来的。共大校长明确谈到过：“目前城市青年中普遍存在着爱城市、厌农村，重工业、轻农业的思想，但他们迫切要求学习。吸收他们到共大来，经过教育与劳动锻炼，毕业后分到人民公社和国营垦殖场、农场，有利于改造城市知识青年，安排城市知识青年就业，使他们为社会主义的农业建设服务。”^①

与共大相类似的，还有延边的社办黎明半农半读大学。这是最早的一所农民大学，于 1958 年 5 月 4 日建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县东盛公社。这个社自初建起就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社，共有 3100 多户，15700 多口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教育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该社的几万人口中，已经有 91% 的青壮年扫除了文盲，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初中毕业生每年有 200 多名。此外还有回乡参加生产的高中生 49 名，业余高中的毕业生 40 多名。他们都迫切地要求学习。乡党委认为，这个公社已具备了办大学的条件：学校招生有来源；附近有延边农学院、社内有农业技术推广站、兽医站和拖拉机站，在教学上可以得到他们的经常帮助。学校就这样兴办起来。据报道，这个大学的学生都经过考试和严格的政治思想审查，都是近年来参加农业生产的高中毕业生和在基层工作了 3 到 8 年的、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农民和乡干部，共 51 名，都是朝鲜族。邻近的延边大学农学院，为这所

① 刘俊秀：《我们是怎样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

大学派去了 11 名讲师和助教担任教师。^①

开始，这所大学是业余性质的，每周学习两个半天，后来学生感到学习时间过少，往返走路耽误时间较多，学校便把学生集中起来编成一个生产队，公社拨给他们 50 多亩劳动基地，从此成为半农半读的劳动大学。这个大学实行社来社去，半农半读，大部分学生来自本公社，小部分来自邻近公社。共设有 5 个班，其中一个为预科班。教师和学生都参加生产劳动，学生有的在校劳动，有的在队劳动，农忙时大部分回队劳动。教学面向生产，重点学习本公社的常种作物，以高等农学院校的统一教材作参考，吸收当地的生产经验，采取教师、老农、学生三结合的形式。本着农闲多学习，农忙多劳动的原则，把一年分为四个阶段，集中学习，集中劳动。著名的回乡知青先进典型吕根泽，就是这个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

这两所大学，以及塔里木农垦大学，是 1958 年全民办学中硕果仅存的几个。可见，至少在办学之初，的确有人曾把举办这类大学视为安置城市知青或培训回乡知青的一种可行的方式。即使是那些昙花一现的大学，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如由原来下乡或回乡知识青年集中的生产队改建的、曾经风靡一时的“新型大学”——南京农业专科学校，前身就是一个由高中毕业生组成的生产队。这个由南京市教育局兴办的大学，共有 300 名学生，他们的毕业标准，不是分数，而是能否种出亩产 10000 斤的小麦，亩产 15000 的水稻和养出每头 1000 斤的肥猪^②。又如被称为“荒原上的大学”的齐齐哈尔大学，原是由市郊一个青年集体农庄的 15 名男女庄员创立的育成学校，他们都是高中和初中毕业生，也是

① 《第一所农民大学成立》，《中国青年报》1958 年 5 月 4 日。

② 《新型学生新型劳动者——新型大学南京农业专科学校见闻》，《中国青年报》1958 年 8 月 29 日。

这所学校的第一批学生。1958年5月4日，在这所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齐齐哈尔大学，第一批就招收学生450人^①。这些在浮夸风中建起来的学校，很快就垮台了。

垮台也好，坚持下来也罢，这些大学之所以一度能顺利地兴办起来，表明了它的确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基础，那就是因种种原因未能升学的下乡或回乡知识青年，一直渴盼再次获得读书的机会。所以，他们曾对这种大学寄予过巨大的期望和热情。

这些不像大学的大学至少起到了一个作用，那就是它使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看到了，除直接下乡参加农业生产以及到边疆支边以外，还存在着一条安置知识青年的道路，这是一条特别适用于城市中文化程度较高的中学生尤其是高中生的一条路。1961年12月，当上山下乡运动重新兴起的时候，胡耀邦在谈到城市青年就业出路问题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赞成江西的办法，还是下定决心，由小到大，上山下乡办国营垦殖场和劳动大学。江西经5年艰苦奋斗，已建立了一个规模了，其他省如采取，也得3年。江西的国营垦殖场已容纳148万人，其中48万是全民所有制的。前几年我们就讲，今后城市里每年要有300万学生毕业了不能升学，就业问题怎么办？明年工业上是不行了，根本出路是什么呢？中国的好处是山，山又多，山上的财富又多，弱点也是山，山上人少，没有很好开发。我看，将来起码20年内，最大出路就是上山。

江西的国营垦殖场和劳动大学，初看起来好像意义不大，但它为今后城市辍学青年的就业，为农村培养干部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解放以来，我们搞了11年了，现在看起来这是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

^① 《克服困难，劳动，学习——介绍荒原上的新型大学——齐齐哈尔大学》，《中国青年报》1958年12月14日。

安置城市不能就业的青年的一个好办法^①。

刘少奇 1964 年重新大力提倡半工半读，也是在城市知识青年的安置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看清了这是一条最为可行的道路。

三 遍地开花的农中

农业中学的兴办，从时间来说比红专大学还要早些，最初是从江苏省开始的。这是中宣部长陆定一搞的试点。1958 年 3 月，该省海安县双楼乡和原邗江县施桥乡开始试办半耕半读的农业中学，当即受到上级党委的重视。3 月 17 日，陆定一参加了江苏省委举行的关于农业中学的座谈会，并在会上明确提出，农业中学的兴办，对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和实现农业技术改造具有重大意义，他要人们充分认识到，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施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②。3 月中旬以前，江苏全省只有两所农中，从这次会议的召开到 3 月底，短短十几天的时间，竟一下子办起了 2000 多所，其中南京市到 3 月 23 日已办起近 200 所。到 4 月，该省已有 3000 多所农中陆续开课，暑假期间更有了迅速发展^③。8 月，中共江苏省委和省人委又召开全省农业中学教师代表会，进一步推波助澜，提出了要让农业中学“教学超普中（即普通中学），生产赛老农”的口号。

4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量发展民办农业中学》，在论述民办中学发展的意义时说，自 1953 年暑期以来，各地中小

① 《胡耀邦在南昌召开的十二个省市团委书记座谈会上的总结》，1961 年 12 月 20 日。

② 《以农业中学为职业中学的主要形式，教育工作找到大跃进的钥匙》，《文汇报》1958 年 3 月 22 日。

③ 《农业中学好处说不完》，《中国青年报》1958 年 8 月 26 日。

学中不能升学的毕业生，其升学和求学的愿望是很强烈的，显然是承认了这一问题迄今一直未能得到妥善有效的解决。社论说，办农业中学，将使小学毕业生的升学问题获得基本解决，各地就不再会感到小学毕业生对教育工作的冲击和压力。社论赞誉农中的兴办是教育大跃进的一项重要标志。到后来，更将农中誉为“早晨的太阳”。

兴办农中的热潮从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上海郊区在得知这一精神之后，也于4天内兴办了109所农业中学，到4月初更增加到400多所。到1958年年底，据报道，广东、四川等省的农中都已达到几千所。而作为典范的江苏省，已有6500多所农业中学，学生34万人，还说这些学校的建立使该省没有入学的高小毕业生中有三分之二被吸收入学，到1959年，这个省已经基本形成全省的中学网，满足了高小毕业生的升学要求。看起来，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正如陆定一后来的总结说，这是“浮夸风”吹起来的结果，主观上是一办起来就要办得大，越大越好，要大到把所有高小毕业没进中学的学生统统收进农业中学的地步，连袁世凯时代的高小毕业生，60岁了，也要叫他上农业中学，结果是一哄而起。他认为这是教育思想上出现的“左”倾错误：“这个理想很好，可是办不到。”

这些学校都有一条坚定不移的原则，那就是政治挂帅。几乎每所学校都由所在地的党委书记兼任校长，这是党多年来想在正规学校做而不可能一下子做到的。同时，强调贯彻工农子弟入学优先的原则。这非常符合当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所一再强调的党的教育方针，和为了实现这个教育方针，必须由党来领导学校的原则。

这些学校的师资，原则上是本着毛泽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教导，根据“以民教民，能者为师，就地取材”的方式解决的。强调的是知识的实践性。农中聘请有丰富生产经验

的老农和劳动模范为教授、教师；同时，抽调了部分下放干部，采取“土洋结合”的方式。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办教师的主力，其实是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以作为典型的江苏省为例，在它的11000多名农业中学教师中，专职聘用的约有6600余名，大部分是历届未考上学的高中毕业生，少数是初中毕业生，因师资缺乏，该省还特地从江南地区动员了一批城市知识青年，到徐州、淮阴、盐城等地任农中教师。在一些小型、简易的农业中学，教师分常备的和季节性的两种，如作为先进典型的邗江县方巷农中，全校连校长在内只有5名教师，教4个班，70个学生，教师中有2个是常备的，3个是季节性的，后者农闲时来校上课，农忙时回队生产，学生则农忙时放假劳动，农闲时全日学习。在这些季节性教师中，就有从城市来的女知青^①。

四川省一些县的民办中学的专职教师，最初是以聘用下放干部为主的，后来发现干部中心工作忙，流动性大，缺课多，这才转而从农村中的高中、初中毕业生中选聘，如乐至县举办农中师资训练班，在86人中，有往届高中生37人，社会知识青年32人，下放干部仅为17人，可见其比例。再如荣县采取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落户的做法，让他们一面参加生产劳动，一面担任农业中学的教学工作；重庆市郊各农业社则从下乡落户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择有条件的人，让他们边教边学^②。1958年上半年到安徽芜湖专区各农业社参加农业生产的上海知识青年，也有不少被聘为农中教员。

从后来的零星报道来看，当这些一哄而起的农中在一年以后迅速垮台时，大部分农中教师也或升学、或回城找到工作，倒流

① 《一所洋溢着革命朝气的学校——记邗江县方巷农业中学》，《新华日报》1964年3月18日。

② 《本省大量发展民办中学》，《四川日报》1958年5月14日；《采取有效措施，巩固农业中学》，《四川日报》1958年5月23日。

回了城市。留在农村的，只是极少数人。江苏省泗阳一所农中的教师曾这样叙述自己的经历：

1957年我高中毕业，本想报考水利学院或新闻专业，但都没有考取，就怪三怪四，怨天尤人。1958年春，我离开常州到泗阳县当农中教师，可到了这年夏天各行各业大发展，原来和我一起来的，有人回常州进了工厂，有的考上了大学，我也很想考大学，但又怕背上“逃兵”这两个可耻的字眼，几度权衡之后，还是留下来了。两年前（即1962年）有一批农中教师调动工作，也有去考大学的，我还是没有去考……①

1959年3月，当中央已经开始对全民办学的后果有所检讨并决心对这种乱糟糟的局面加以整顿的时候，江苏省委有人就农中的前途，给陆定一写信询问，陆定一的答复是明确的，他希望这种学校能够继续发展，因为从当时的国情来看，这是十分必要的，他在信中说：

我看，我国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需要这种学校。13到16岁的孩子在农村中可以做些辅助性的劳动，但他们还没有成年，我们做父兄的，应该让他们多读些书，到将来，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电气化实现之后，应该让他们进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全日制的初级中学读书。

我们的全日制初级中学还不够发达，13到16岁的孩子，全国约有3700多万人，全日制初中只能容纳700多万人。我国小学教育已快基本普及了，但全日制初中是不能发展太快的，大概今后5到10年中，农业中学将会发展到最高峰。在今后5到10年间，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就可以发展到相当规模了，用机器、用电，要有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千

① 俞洁民：《丢掉包袱，轻装前进》，《新华日报》1964年1月31日。

部，谁来培养这么大批的初级技术干部？农业中学要担负很大的责任。

这也就是农业中学的作用，不仅弥补全日制中学的不足，使还没有劳动能力的孩子得到读书的机会；而且培养能够胜任一定技术工作的劳动后备军，为以后进行职业教育打下必要的文化基础。

陆定一提出了农业中学办学的方向、原则：

现在农业中学的大多数，就文化程度来说，相当于初级中学。教的文化课程是初中的最基本课程。就技术教育方面来说，它培养初级的农业技术干部。就学校的类别来说，它是半日制学校。就学生的年龄和文化程度来说，是13岁到十六七岁的高小毕业生。

他要求农业中学遵守四条原则：一是文化课程必须是初中最基本的课程；二是技术课程应以培养初级的农业技术干部为目标；三是坚持半日制。四是原则上吸收13到16岁的高小毕业生，不要过多吸收超龄学生，这样做是为了不致过多地占用农村劳动力^①。

与上一年的口号相比，这封信显然已务实多了。它的主要精神，与毛泽东热衷推行的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并不相符，后来却在60年代刘少奇再次提出教育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时得到贯彻。但在1959年的形势下，农业中学大体未能按他的设想去发展，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地方根本不具备办学条件，既无设备，也无师资；另一方面，无论设想得如何完善，这种学校想达到自给自足的程度，总是需要一个过程，初办时总不可能不花钱。钱从何来？国家不给，就只有靠地方政府或群众集资了。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尤其是广大农村，农民对这种学校并不欢迎。落后的一

① 《在相当长时期内需要农业中学，陆定一同志写信谈农业中学发展前途和办学的四条原则》，《中国青年报》1959年3月23日。

锹一锄的生产方式，使农民还无法看到科学文化对于生产发展的必要性，长期处于愚昧状态的农民以为文化只是用来谋求更好出路的途径，如果子女读书之后仍然回来劳动，他们是绝对不肯为此付出任何代价的。下面举的两个要求退学的中学生的信，是很有代表性的：

家里把劳动工分看得像命根子一样重要，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会不会影响劳动收入？进农中究竟能学到多少知识呢？许多大学、高中毕业生都下农村来了，上农中又有什么用处？学完了还不是照样去担扁担？^①

我来学校是为了念书的，要劳动不如回家去，在学校花了不少时间劳动，影响了读书，学不到足够的知识。既然在学校也是劳动，将来出去也是劳动，还不如现在早点出去劳动好。到工厂或农村也可半工半读，而且，上学要花钱，在家劳动或进工厂当学徒却能挣到工资。所以，与其拿钱劳动，不如劳动挣钱^②。

“与其拿钱劳动，不如劳动挣钱”，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总之，以中国当时“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要搞美国那种发达国家的半工半读，是不现实的。但当时中央并未从这个角度认真探讨失败原因，而只是简单地归结于头脑发热、准备仓促，至多认为是过“左”的结果。

这些一哄而起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大学以及农业中学，绝大多数在成立一二年之后就因三年灾害的发生而垮台了，其实有些可能只坚持了一年不到，还有一些，索性就是在浮夸盛行的风气之下虚报的，是否真正建立起来了还是疑问。从1959年初开始，

① 《农村青年大有前途》，《中国青年报》1958年5月20日。

② 《怎样认识中途退学的问题？》，《中国青年》1959年第3期。

国家着手对全日制学校加以整顿，强调要在普通学校加强课堂教学，减少劳动时间，以确保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而农业大学和中学的垮掉，主要还是因经济上的原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活动，到1959—1961的三年灾害时期，进入了真正的低谷，而尤以1959年的下半年到1960年的上半年为最。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说是天灾，其实完全是不顾客观规律人为地盲目蛮干造成的恶果，这在党史上已是定论的了。

1959年初，各种恶果已露端倪，中央也曾想采取措施制止这一势头的发展。在庐山会议上，提出要将“三权”即用人权、财权和商权收归中央，但对彭德怀的批判，使反“左”变成了反右，结果是更“左”，全国职工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继续增加，迄至1960年的3年中，职工人数共增加2500多万，其中1430万来自农村，这极大地增加了城市的压力，造成工业企业人浮于事，劳动生产率下降，市场供求比例失调的恶果；也削弱了农业劳动力，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发展。

在这种盲目冒进的气氛之下，高校的招生规模也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不断扩大。1958年全国各地放手大办高等学校的结果，使江苏省一年就骤增28所大学，湖北省当年的高校也陡增两倍，从原有的16所一下子达到36所。即使如教育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的内蒙古，也新增了高校13所，原有的18所高等院校，也分别增设64个系科和专业。

从1958年暑期开始，高校招生生源不足的问题，就又一次出现了。由于一批新建的专科学校纷纷开始招生，使当年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达到26.6万人，比1957年多招收10万人。国家不仅希望应届毕业生全部报考大学，而且动员往届高中毕业生和工、农踊跃报考，还动员一部分中专的应届毕业生也参加报考。国家还特别提到，已经参加农业生产和担任了民办

中学教师的知识青年，凡是具备了报考条件的，只要所在单位领导同意，经批准也可报考，对城市待业的社会青年，也没有名额上的限制。这是我国高校大门敞开得最大的一次，而这次一敞开，就是3年。

1960年，自然灾害已发展得极其严重，但全国高校招生人数却有增无减，当年计划招生28万，教育部还在要求千方百计扩大大学生来源，争取超额完成招生任务，结果实际招收的新生人数竟达到32万^①，成为建国以来的高峰，比已经很高的1958年又高出近两倍！以上海为例，高校比上一年增招10.5%；中专增加21.8%；高中增加23.4%；初中增加26.4%；小学增加27.6%，适龄儿童基本都能入学。如此盲目扩大招生，造成了解放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生源不足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地区甚至决定，除了动员高中毕业生全部报考高校，还要适当抽调一部分高二学生，让他们提前毕业，同时抽调部分优秀的中专和师范生，再通过内部招生的办法，从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农场牧场、人民公社选送一批合乎报考条件的职工、干部、社员，到高校学习^②。其情形，比1956年曾出现过的招生数量与在校学生数几乎相等的现象更甚一步，以致各地都将动员学生报考大学当成一项政治任务。

遍地开花的农业大学、农业中学，也吸收了为数相当可观的知识青年。

一切都欣欣向荣，共产主义似乎指日可待，一年前还令青年和家长烦恼不堪的升学、就业问题，似乎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可惜的是，这种兴奋、燥热的日子并没能过上多久。

① 《高校今年招生28万，要求完成招生数量、质量》，《人民日报》1960年6月4日。并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6页。

② 《内蒙古日报》1960年7月3日。

大量人口拥入城镇，造成城乡人口比重的严重失调，更使当时的社会经济无法承受。经济越是膨胀，为以后造成的创痛也就越深，历史很快就证明了这一点。

第六章

大办农业 大办粮食

大跃进的狂热过去之后，国民经济一片凋敝。从1960年8月开始，新一轮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始了。但这一次是在一个新的水平、新的起点上的重新起步，并不仅仅是前次的简单重复。

大跃进是一场大灾难，它所造成的国民经济的巨大破坏，让人至今想起仍怵目惊心。但还有不太受到人们注意的一点，那就是，它使解放以来一直存在的各种矛盾一下子加剧了，从而导致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危机。其中，就包括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城市就业出路越来越窄的问题和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家采取措施，将城市中受过教育的，最年轻而最有活力的一部分劳动力下放到农村去，这从长远来看，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素质的提高，都弊大于利，国家和知识青年，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一 城市精简人口

大跃进造成的最直接、最严重的恶果，就是粮食的极端短缺。国家采取的应急措施，是精简城市人口，也就是把沉重的压力尽可能地转移到农村去。

一 压缩和顶替

1960年是天灾人祸为害最甚的一年，当年的农业总产值为415亿元，比1959年下降了12.6%。粮食产量只达到2870亿斤，比1957年下降了26.4%，跌到了1951年的2874亿斤的水平。人均占有粮食，农村人口在1960年为264斤，而1957年为409斤，减少了35.3%。农村粮食奇缺，在一些大城市粮食几乎脱销，饥荒正在全国范围内严重蔓延，而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大跃进的势头却仍在发展。为了解决极端严重的粮食问题，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其势已经非常危急：

这种严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必须在保证钢铁生产的同时，坚决采取有力措施，保证粮食生产。

同时还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口号，这标志着经济发展方针上的重大改变。而在大办农业的“有力措施”中最重要的，就是大量减少城镇人口，亦即中央所指示的，坚决认真地清理劳动力，以加强农业第一线。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说：“要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粮食紧张问题，非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不可，……要把精简职工队伍，下放城镇人口当作一件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来抓。”这项措施从1960年开始到1963年，贯彻了好几年。其具体办法，就是压缩和顶替。首先是压缩，将国家投资和政府开支大幅度缩减，把成千上万的工矿企业关闭，各级机关也被裁并机构，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关停并转”。在这场行动中被精减掉的职工，1960年底为872万人，被精简的城镇人口共计1000万；1962年又精减掉职工935万，共计精简城镇人口1200万。1963年，继续精减职工100多万，城镇人口300多万。

同时，还压低了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精简，据当时具体负责此事的劳动部长马文瑞回忆说，这实在是一件难以下手的、极其困难的工作。1960年精简的1000万，因为大多数是进城不久的农民工、合同工，所以还算顺利，但当中央要求第二年再精简1000万时，牵涉到的很多都是城市中的技术工人，就十分为难了，好在当时党的威信非常高，我们才能完成这个任务。事后周总理也感叹说，这事真了不起，等于是把一个国家搬家了^①。

在这场大规模精简中，值得提到的一项措施就是顶替。就是在城市中，采取以弱代强、以女代男、以老代壮的办法，顶替出来大批青壮年劳动力，以加强农业第一线。据团中央的统计，在抽调劳力前，全国青年的分布大体是城市占30%，农村占70%，而这次被精简下来的青壮年劳力，据1960年估计，即高达1500万至2000万，在精简人口中占据了大多数^②。

事实上，这种性质的顶替早在1958年就已开始了。以北京市为例，1957年底全市的职工人数为108万人，1960年底已达185.2万人，3年时间增加了77.2万，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增加人数等于过去7年增加人数的总和。在新增职工中，大约2/3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家庭妇女以及新成长的劳动力。1961年以后，北京市花大力量进行精简，1962年净减职工14万，使城市人口比上年减少了13.2万。

在农业生产负担不了的情况下，城镇人口数量的减少未必是坏事，但城镇人口素质的下降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却是不言而喻的，1960年的精简，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造

① 《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动员青年投入农业生产第一线和广泛开展热爱农业劳动教育向中央的请示报告》，1960年10月22日。

② 本段内容，根据1995年12月与原劳动部长马文瑞的谈话记录，并借此机会向马老致谢。

成的客观效果偏偏就是如此。

首先，以什么为主，精壮劳动力就该投入到什么上去，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中央强调：“农业劳动力必须要用在农业生产上，当前更要集中地用在田间作业上，只有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才合乎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原则”。^① 这使国家将动员下乡的重点，一直放在青年身上。

其次，为了尽快缓解城市迫在眉睫的问题，最简捷的办法，也是“顶替”。例如，以女代男的“女”，主要指的是城市职工家庭的家属，她们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国家不必另外提供住房和其他设施，还可以提高家庭的工资收入，减轻因职工工资过低对政府造成的压力，有助于国家将个人的工资收入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这比安排青年就业要划算得多。而“老”、“弱”，即使从工作岗位上被淘汰下来，也无法将他们送往乡下，仍然得在城市占一份口粮和户口，而且单从口粮的标准看，他们的定量也要大大低于青壮年，在粮食极端紧缺的关口，仅此一点，就不是毫无意义的。

总之，从经济的长远发展来看，将城市中最有活力、最能够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这部分人口送往偏僻落后的乡村，对城市的发展将会造成何等样的损失，当时并未加以认真考虑，这也许因形势急迫，无暇顾及，也许是对城市发展在现代社会中举足轻重的意义没有充分的认识所致。

二 学校的精简

削减教育经费，裁减学校和在校学生人数，降低招生数量，也是这次精简的重要内容。“大跃进”以来教育的急剧膨胀，更使这次精简的幅度加大了。

1960年各校还在盲目扩大招生，还将动员学生报考高一级学

① 《把主要劳动力用在田间》，《人民日报》1960年7月27日社论。

校当做一项政治任务，仅仅一年以后，形势就发生了突变。1961年7月3日至1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及中等学校调整工作会议，决定当年压缩在校学生100万人左右。另外采取学生自带粮食、改寄宿为走读和下放劳动一年的办法，减少吃商品粮的人数为160万人左右。

会议的具体规定包括：初级技术学校、初级师范学校可以逐步收缩停办，但是一些面向农村为农业服务的学校要根据情况处理，不要一律撤销。对家在农村的城镇普通中学的学生，根据各地具体条件，有的可以采取自带粮食的办法，有的可以采取转学、改寄宿为走读的办法，既可以使他们继续学习，又能够达到减少城镇粮食销量的目的。一些未被压缩的中专，因确实有困难，可采取暂不招生，休学一年等措施。对于被精简下来的学生，采取的处理办法一般是：对农村来的学生动员回农村参加生产劳动或工作，对家在城市的学生，则分别到厂矿企业等单位，将从农村来的职工顶替出来，放回农村。

如此大规模的精简，看来还是没能使形势根本改观，于是在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市人口的决定》，提出在文教事业方面，还要继续停办一批学校和文化事业单位，进一步减少大中学校的招生人数。压缩的重点仍是中等专业学校，这是因为中专生都要纳入由国家统一分配的计划之内，毕业后一般即可以捧上“铁饭碗”，吃商品粮，投考中专的，很多都是家在农村的学生，读中专比读大学毕业早，他们将此视为获得城市户口的捷径。而60年代的精简，却几乎堵死了他们的这条出路。

以山西省为例，经1961年调整后，中专仅余69所以及一个附设班，到1962年，省人委会认为保留学校仍然过多，决定“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方针，节约人力、物力支援农业生产，缩短战线，切实按需要培养人才，着重提高教

学质量”，对所属中专再作调整，又停办了山西地质学校等 21 所中专，还有三所学校被合并。被停办的学校大多是农业机械学校、农业中学，以及体育和艺术学校之类。省人委规定，停办学校的学生，均由学校发给肄业证书。家在农村的，动员他们回乡生产，家在城市的，先动员回家。此外，因粮食和财政仍存在一定困难，凡已于上年休学的学生，今年仍不复学^①。

山西省的规定与上述教育部会议的决定之间，一看便知存在着出入，出入主要在于对裁减下来的学生如何安排。中央决定将他们分配到工矿企业，把那些从农村招收的农民工顶替出来回乡，而山西省却采取直接把学生动员回家的做法。产生这一出入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将已经进城当了工人的农民顶替出来，牵涉到诸多利益纠葛，是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哪个干部肯找这样的麻烦呢，当然是把学生往家里一送了事最简单。

一个从上海到北大荒的中专生曾这样回忆起学校解散的情景：

曙光镇过去是八五三农场的老场部，牡丹江农垦局畜牧兽医学学校曾设在这里。我们 100 多名从上海来的学生，在这里就读三个春秋寒暑。1962 年 5 月，我们刚从畜牧场毕业实习归来，忽然听说因国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学校奉农垦部命令停办。这对满怀热情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专业学生来说，无异是当头一棒。一时，校舍里朗朗书声、欢声笑语没有了。不少学生准备打起背包回上海。学生三三两两，在土公路上踟蹰，怨声唉叹，路怎么这么窄呢！

这篇文章说，虽然上级规定他们可以回家，可是在八五三农场老场长的动员下，他们想到“南征北战屡立战功的老战士尚在

^① 《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关于 1962 年进一步调整中等专业学校的通知》，1962 年 4 月 27 日。

为开发北大荒而出力，而我们这帮小知识分子又有什么本钱去逃避呢？思索再三，既来之，则安之，许多同学毅然留在了北大荒^①。

中专生尚且如此，不在国家计划分配之内的普通中学尤其是农业中学学生的处境，就更可想而知了。

未被精简掉的大中小学校，都压缩了在校学生的人数。据上述教育部会议的计划，从1961至1963年的3年内，要继续缩短教育战线，压缩城镇中等以上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到1963年为止，全国的高等学校已从1960年的1289所调整到407所（其中本科359所），在校学生由1960年的96万人，压缩到75万人。中等专业学校由1960年的6225所，裁并为1355所，在校学生由1960年的222.6万人，压缩到45.2万人^②。压缩的主要方式，是控制每年的招生指标，总的做法是多出少进。由于每年多毕业少招生，在校学生就会逐年有所降低。这种做法，意味着每年要新增加几百万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而且他们几乎找不到在城市就业的出路。于是，精简下来的青年职工、大中专学校学生以及不能升学的普通中学毕业生加在一起，使城市的人口和就业问题异乎寻常地严重起来。

还有人数更为广大的农村青年尤其是农村知识青年，他们更无出路。1960年国家就规定，为了保证农村有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和不断补充农村劳动力，必须在每年毕业的小学生和中学生中给农村留下一定的比例，不要全部升学。随着灾情的日趋严重，1961年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文教小组《关于1961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报告》中提出，今后三五年内，农村16

① 廖庆祺，《缕缕情丝意深切——记黄振荣同志》，载《拓荒者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319页。

岁以上的在校学生占农村全部劳动力比例，应控制在2%左右^①。到1962年，国家更进一步规定，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招生名额的分配，应该照顾城市，主要照顾大城市；中等专业学校一般不招生，只有少数学校或专业由于特别需要，才适当安排招生，但一律只招收学校所在城市的初中毕业生^②。这等于就堵死了农村学生升学的出路。

从农村考入大专和中专的学生，在学校停办后被一律要求回乡，这是毫无疑问的，而这时数量特别多的还是几乎全部停办的农业中学的学生。在大跃进期间建立的农业中学，很多本来就不存在办学的基础，是自动垮下来的。1960年，全国的农业中学大约有3万余所，在校学生人数约为290万人，到1962年，农中的总数已减至3700余所，仅余在校学生26万。1963年继续缩减，据陆定一一次讲话宣称，最后保留下来的只有15%左右。名震全国长达10余年的知青典型邢燕子，就是从这种农业中学出来之后到农村务农的。这些都大大扩充了农村知识青年的队伍。据1962年的统计，全国农村已有高小以上的知识青年近3000万，也就是说，在1亿农村青年中，每4个人中就有1个是小学或初中毕业生。

小学也被大量压缩，1958年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为80%，到1962年却仅有56%的儿童能够入学。失学少年儿童数目在增加，据团中央调查结果，仅河北的天津、保定等5个城市的统计，就有102000余人。天津已占到人口总数的2.93%，而甘肃农村入学儿童仅占学龄儿童的40%，且学龄儿童中能读到初小毕业的仅占儿童总数的16%左右。

急剧精简和压缩的结果，使大批被裁撤学校的学生流失到社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289页。

② 国家计委、教育部《关于1962年各级学校招生计划和执行招生计划时应注意问题的通知》。

会上，引起学生的强烈不满，有些地方发生了学生请愿的事件。这让人很容易回忆起1957年的形势。

二 邢燕子，好榜样

从1960年8月党中央提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的时候起，号召知识青年下乡一事就再次被提了出来，报刊上有关这方面的宣传一下子增多了。但是这些宣传以及与之相应的政策，首当其冲还是针对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的。

这是农村的饥荒发展最严重的年头，很多农民包括回乡知识青年纷纷流向城镇寻找活路，为制止农民向各地的盲目流动，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限制措施，户口和粮食供应关系，从那时起几乎成了每个人的“生命线”。但仅仅靠这些手段，很容易激化矛盾，国家还需要以一种精神力量来鼓舞人民，来保持局势的稳定。这时最需要的就是先进典型。

在中央拿出“发愤图强”的口号来激励青年和全国人民的这个时代，最光彩夺目的英雄，是一个回乡女知识青年——邢燕子。对她的宣传所定的规格，为宣传她在全国所造的声势，不仅为以往宣传知识青年时所仅见，就是在宣传其他英雄模范人物中也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在那个最困难的年代，知识青年对于国家渡过难关，曾经起到过何等关键的作用。

对邢燕子的宣传是从缺粮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河北省开始的。中央关于大办农业的文件签发于8月10日。8月15日，邢燕子的事迹就已见诸于《河北日报》^①。8月19日，共青团河北省委和河北省妇联又发出了要求在全省青年和妇女中开展学习邢燕子

^① 《发愤图强，埋头苦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邢燕子创大办农业范例》，社论：《发扬邢燕子发愤图强的革命精神》，《河北日报》1960年8月15日。

活动的通知。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党中央关于大办农业文件的决定向全国人民正式公开。9月2日,该报就刊载了关于邢燕子的长篇报道^①。所有的报道,都是在第一版以套红的通栏标题刊印出来的,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重视。仅仅几天时间,邢燕子在全国就家喻户晓了。与中央文件的发布配合得如此紧密,她就是中央提倡的大办农业、发愤图强精神的具体化身。

邢燕子原名邢秀英,一个非常普通的农家姑娘的名字。事迹本来也很简单。她的父亲是天津华北搪瓷厂的副厂长,母亲在天津一个缝纫厂做工,全家20多口人,大部分都在城市。燕子从5岁起被父亲送回家乡——河北省汉沽市(今属天津市宝坻县)大钟庄公社的司家庄,她在那里长大,读完高小又上了农中,这时她年已18岁,因为灾害的发生,她没有读完农中。1958和1959两年,司家庄连续受灾,几乎绝产,乡里人们纷纷外流,爷爷也让她赶紧到天津去找父亲,可是这个全村最有条件进城的人却偏偏不走,决心留在这里与乡亲们共同渡过难关。为了搞好副业生产以增加队里的收入,她串联了村中7名青年妇女,组成了北大洼第一支妇女治鱼队。她们在两尺厚的冰上打冰洞,冒着刺骨严寒从水中拽网,还坚持在晚上点起马灯为队里打苇帘,这样苦干了3个月,仅这两项副业就收入了近4000元,对全队顺利渡过灾荒起到很大作用。党支部在全村的群众大会上表扬了她们,还将这个队命名为“燕子突击队”,燕子成为这个队的队长。

县里的通讯干事得知此事,为她写了稿子,立即为正急于寻找这方面典型进行宣传的上级发现,这个朴素的故事一下子就被提高了。在《河北日报》刊登燕子事迹的同时,还刊登了中共唐山市委第一书记马力的文章《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邢燕子》,文中谈到:

^① 《邢燕子发愤图强建设农村》,《人民日报》1960年9月2日。

(一部分青年)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认识不清,对农村的光辉前景认识不清,他们认为农业没有工业重要,农村没有城市好,甚至认为参加农业劳动“没出息”。有的城市里的青年不愿意到农村去,也有些农村青年不愿意呆在农村,托亲靠友地在城里找事,或者盲目地往城里跑。

他明确指出,邢燕子之值得宣传之处就在于,她“不愿利用方便条件到城里去找事,偏偏为公忘私,在农村里带头苦干”。他说:“我们要高速度地发展农业生产,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就是需要千千万万个邢燕子。”^①当时的原则,使很多事情都不准上报,从报纸上不仅几乎见不到这场严重灾害的痕迹,甚至还高调依旧。这篇文章对当时农村已经很严重的外流情况只能采取轻描淡写的态度,点到为止,大家心里都是明白的。

学习邢燕子的活动,首先在河北省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在该省展开。到1960年9月,也就是邢燕子事迹上报后1个月,据唐山市和张北、巨鹿、藁城、唐县等17个市、县的不完全统计,就有80余万青年被组织参加了这一学习。她的事迹见于《人民日报》之后,更在全国造成了空前的声势,不仅拍成电影,几个剧团同时编演有关剧目,甚至大文豪郭沫若也写《邢燕子歌》为其推波助澜^②,其歌曰:

邢燕子,好榜样!
学习王国藩,学习铁姑娘。
全家都在城,自己愿留乡。

① 马力:《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邢燕子》,《河北日报》1960年8月15日;马力:《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中国青年报》1960年8月24日。

② 《中国青年报》1960年9月17日。

园中育苗苗成行，
冰上治鱼鱼满网。
天寒地冻，抢种垦荒，
使石头长出粮。
吃苦在前享乐后，
一切工作服从党。
北大洼变成金银窝，
燕子结成队，奋飞过黄河！

邢燕子，榜样好！
青春献农村，青春永不老。
一马能当先，万马齐赛跑。
立下雄心天样高，
鼓足干劲风力饱。
克勤克俭，有说有笑，
能把劳动当成宝。
为国为社多打粮，
国好社好大家好。
司家庄变成鱼米乡，
燕子结成队，奋飞过长江！

团河北省委在发出学习邢燕子的通知时就曾要求各地“要和发现、培养、总结自己地区的‘邢燕子’结合起来，要在全省青年、妇女中出现千千万万个‘邢燕子’”^①，这也是中央对各地干部的要求。实际的粮食问题、生产问题甚难解决，但寻找和推出几个先进典型却是不难办到的，于是各地争先恐后，这一时期的《中国青年报》和地方报纸，几乎每隔几日，就在第一版以显赫位

^①《团省委和省妇联发出通知，开展学习邢燕子运动》，《河北日报》1960年8月19日。

置推出一个“大办农业”的先进集体或先进个人，为表示重视，往往还配以照片，并发表社论，其声势之大，可谓前所未有。宣传媒介的喧嚣热闹与农村实际生活的萧条冷清之间，形成了鲜明而又颇为尴尬的对照。

在各地推出的先进知青中，有不少是1957年响应号召下乡务农的城市知识青年，他们中有的昙花一现，也有的曾经红极一时，我们列举几人如下：

王培珍，天津女七中高中毕业生，1957年没考上大学，与天津市的一批城市青年一道，到河北省静海县团泊洼公社去做了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这批城市知识青年，据后来的报导，1958年因水稻区受灾，一部分回了城。1960年又遇更大灾害，又走了一些人。其他的，陆续被安排在当地任小学教师等工作。据1964年统计，留在农村的还有87人，有的担任了党支书、生产队长等职务，有的还是普通社员。从到达团泊洼之日起，他们一直是天津市的重点宣传对象，1960年出于形势需要，对他们的宣传又有所升级，如《光明日报》在1960年8月27日曾以《农村大有用武之地》为题，对他们进行了长篇报导，说他们落户两年来，支援了农业，锻炼了自己，受到了农民的尊敬和爱戴。虽然有人上阵不久就当上了“逃兵”，但大多数人留了下来，经受住了考验。但这篇报导也同时承认，这批知青下乡，也存在一些问题，下乡时间一久，党团组织都放松了对他们的工作；由于他们下乡后工作变动较多，在农村发挥作用方面并不突出；有些青年结婚后，考虑个人生活多，缺乏远大理想，等等。事实上，天津的东郊区是个盛产稻米的地区，交通方便，条件远较一般农村优越，对于一些家境贫寒的城市青年来说，在这里安家并非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至于有人“缺乏远大理想”的问题，既然希望他们甘心情愿做普通农民，又要求他们有比普通农民更多的所谓理想，这要求本身就毫无道理。

王培珍就是被作为这批青年中的优秀代表树立起的。她的出名甚至还要早于邢燕子，在1960年前后，她在全国的知名度也仅次于邢燕子而位居第二。

王培珍与邢燕子不同，她从小在城市里长大，她的下乡务农，经历了与家庭的斗争。到农村后，又经受了艰苦劳动的考验，并且与老乡搞好了关系。但她的特别出众之处，还在于她在农村“扎下了根”：

我们第一批来农村的女同学，有的经不起考验，当了逃兵；有的转了工作岗位，现在只有我们两个女同学仍在农业战线上。有的老乡对我们是不是永远在农村还有问号。有的说，她们呆不长便要走了；有的说，别看现在干，将来一结婚就走了；有的开玩笑说：“王同志，什么时候复员哪！”这些都促使我全面考虑如何在农村安家落户。今年不少同志给我介绍对象，我在实际劳动中和工作中认识了一个农村青年，经过一年时间的交往，我俩最近结了婚。这本来是一件普通事，可是竟成了团泊洼的新闻，各村都传开了，县剧团还排了戏。人们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担心我走了^①。

王培珍于1959年2月入党，成为公社党委委员。1960年河北省团委发出号召要全省青年向她学习，她的名字很快便传遍了全国。

另一个也是从1957年第一批下乡的城市高中毕业生中推出的先进典型，是上海的浦锦文，他一度也与王培珍一样全国闻名。

浦锦文1957年从上海同济中学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遂到郊区宝山县江湾公社落户。他和老农一起成功试验了40多种蔬菜瓜果的嫁接杂交，还总结老农种菜经验编写了讲义。下乡第二年，

^① 王培珍：《我在农村安了家》，《中国青年》1959年第21期；又参见《中国青年报》1963年7月6日。

他就出席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59年出任江湾农场副场长。公社决定调他去读大学，他却决心留下来。直至1962年以前，他一直是全国最著名的知识青年先进典型之一。他曾多次在上海和全国的重要报纸和刊物上发表文章，讲述他下乡的收获和体会，在青年中具有很大影响^①。

当然，先进典型中更多的还是回乡知识青年：

韩志刚，陕西省兴平县西吴公社北马大队人，1957年高中毕业后回乡。他在学校时品学兼优，回乡后拜老农为师，积极钻研农作物栽培、土壤等科学知识，把自己掌握文化知识的特长与老农丰富的生产实践相结合，做出了一定成绩，被任命为生产队长。1960年《陕西日报》开始报导他的事迹，随后其他报纸纷纷予以转载^②，他在1963年以后名声大噪，报刊对他的报道一直到“文化革命”期间仍可不时看到。

这是个浮夸风盛行的年代，对先进知青的报道也排除不了虚假浮夸的成分。这里列举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1962年5月19日，《中国青年报》在第一版头条发表了《易美素等知识青年朝气蓬勃建设家乡》一文。由于这篇文章所报道的河北省行唐县城宅公社小凹子村的人数、地点、时间都不符合事实，引起当地群众和被报导者本人的不满。诸如，这个村共有11名知青，报导却写成“易美素和全村17名知识青年”；村子离江河水库和牛王山还有七八里，却写成这些知青“战斗在江河水库周围和牛王山岭”。通讯第一大节（占全文一半）写公社党委书

① 褚德文：《新社会的经历》，《文汇报》1959年12月9日；《在农村劳动的洪炉中锻炼成长》，《解放日报》1960年7月18日；《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解放日报》1960年10月11日；《我以作一个庄稼人而自豪》，《中国青年报》1960年8月8日；《为农业的现代化贡献力量》，《中国青年》1960年第16期；《农村落户五年散记》，《中国青年》1962年第12、13、14期。

② 《韩志刚一心为农业》，《中国青年报》1961年1月24日。

记与易美素坐在水库大坝上谈心，给她讲王羲之一笔勾断江河的故事，易美素因此决心安心留在农村等情节，纯属虚构。第二小节写易美素办夜校，把大家自学、她辅导高小班，写成她教全校的珠算、语文和政治，等等。易美素看到文章后说：“我没有报上说的这样好，心里怪不是味儿。”这篇文章，是该县的团县委副书记刘致勤写的。据他说，1月份县里要召开知青代表会，他到小凹子村去了解一般情况，觉得易美素的材料不错，下笔时虽感到有些事把不准又说不上圆，还是信笔写了。写好后，他把文章寄到《河北日报》、《石家庄日报》和《中国青年报》，想碰碰看，没想到就发表了。此事在当地引起群众议论，城宅小学一位党员教师说：

刘秘书这样写，是为了培养易美素，启发和鼓舞大家。报纸上这样登，是免不了的、必然会有的。其实邢燕子就真有那么好吗？

为赶上当时形势需要，作者凭想当然，信笔写来，而像《中国青年报》这样重要的报纸竟对投稿不加核实，就轻易刊载，办学一哄而起，制造典型同样是一哄而起，于是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从各地一下子“涌现”出数不胜数的先进典型，可信与否不论，造成声势就成^①。尤为过分的是，很多党员、干部还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上述小学教师的话，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树立和宣传知识青年先进人物时的这种恶劣做法，后来更有发展的趋势，在群众中造成过很坏的影响。

至今谈到邢燕子，还有人发表这样的议论：

每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全新的、充满时代精神的典型。从这个意义上说，典型也像新闻，是“易碎品”。这当然无须悲观，因为每个对人

^① 《新闻的真实性不能打折扣》，载《我们走过的路》，中国青年报社1981年版。

民有益的典型，在历史中都会有自己恰当的位置^①。

30 余年过去了，仍然有人与那个小学教师抱有同样的看法，既然时代需要，就该人为地树立，也就是“培养”。时代一变，他们也就失去了价值，而且还“无须悲观”，可他们不是新闻，是人，是年轻人，这二者之间能划等号吗？

宣传、动员加上城市招工、升学的限制，从 1960 年开始，确实又有成批成批的农村知识青年离开学校，回到家乡，宣传媒介为此而欢呼“壮丽的行程开始了！”

这时期家在农村的知青回乡是与城市精简人口的运动一起进行的，所以很难从报刊的报道和文件提供的数字中将回乡知青与其他下乡人员的人数区分开来。总之到 10 月底，据 18 个省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 600 多万中小学毕业生和各行业青年上了农业第一线^②。

三 城市知识青年的精简下乡

一 城市社会青年问题的严重

制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只是解决困境的一个措施，城市也存在自己的问题。

我们上面说过，把城市中的青壮年劳动力精简到农村去，已是一种很消极的做法，而更糟糕的是，很多被精简下来的青壮年，并未真如最初所设想的那样去农村加强了“第一线”，相反却回到

① 张小琳编，《一言难尽》，团结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中国青年报》1960 年 10 月 23 日。

了街道，成为无所事事的社会青年，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城市中闲散无业人员的队伍急剧扩大着，耐人寻味的是这支队伍主要的组成部分竟是青壮年，尤其是有文化的青年。

到1962年底，全国的社会青年已达200万，其中上海约7万人，如果再将当年暑期毕业不能升学的近4万高、初中毕业生计算在内，则达11万。四川省成都市有社会青年1万余，重庆市有8万；辽宁全省未升学就业的城市青年有10万左右，加上当年暑期毕业不能升学的3万，也将达到13万人^①。湖北省的社会青年约有7万，占全省人口的2%，其中武汉市有47000余人，且还有当年不能升学的中小學生18000左右^②。

这些社会青年，绝大部分是未升学就业的学生和精简下来的青年职工。以上海为例，大体由这样几种人组成：一是历届高、初中毕业生和极少数不服从分配的大专毕业生，共约2万人，占社会青年总数的30%；二是被精简、退职或支援外地又自发跑回的人，共3万，约占45%；三是因各种原因中途辍学、退学的，共15000人，占20%；四是被学校、工厂清洗下来的，共占5%。

至于这些青年的出身和家庭情况，可以参看团中央对武汉市桥口区一个街道的595个青年所做的个案调查。据该调查报告称，这些青年中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占73%；剥削阶级家庭的不到10%。他们中大多是学生，包括没能升学的、因病休学的、自动退学的和被学校开除的，共366人，占总数的61%。其中初小文化程度的91人，高小的190人，初中的209人，高中的70人，大学18人。他们的家庭经济普遍困难，按家庭收入计，平均每人每月20元以上的37人；16—20元的92人；11—15元的249人；10

① 《王伟在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上关于城市青年下乡问题的发言》，1962年6月25日。

② 《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城市社会青少年安排问题向中央的报告》，1962年11月8日。

元以下的 217 人。这种家庭情况并非个别，从天津、武汉两个城市的调查看，全家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不到 10 元的青年占 1/3 左右。

如此大量的青少年滞留在城市，无所事事，甚至生活无着，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据上海市的报告，自 1961 年夏秋两季开始，闲散在家的部分社会青年品德败坏问题发展相当严重。从四马路会乐里的情况看，81 个社会青年中，品德不良者达 27 人，占青年总数的 1/3，其中情节严重者 9 人。所谓品德不良，一是指生活作风腐化，参与流氓阿飞活动，共 13 人；二是有投机倒把、敲诈勒索行为，如有五六个青年帮外地商贩从上海套购缝纫机、呢裤、皮鞋，以及布票、粮票等；三是经常偷摸扒窃的，共 6 人。又据四川重庆市对 106 名堕落成暗娼的妇女情况的调查，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滞留在街道的社会青年。当然从现在的观点看，上述有些情况属于因生活所迫不得已寻找生路者，如“投机倒把”，未必全属于道德败坏，但对社会造成消极影响，则是毋庸置疑的。其他青年，也大抵精神不振，“从外地倒流回来的，后悔当初不该出去，出去后又不该轻率地当了逃兵”，于是“每日开门三件事：吃饭、睡觉、荡马路”^①。团中央发现，社会青年已成为青年工作中最薄弱的环节。

二 对安置城市青年问题的再探索

我们这里说“再探索”，是相对 1957 年的那次动员城市青年下乡而言的。那一次的经验和教训，似乎并未给再一次兴起的上山下乡运动留下多少可资借鉴的东西。再一次起步，起点似乎更低，至少并未一下子就提出让城市青年到农村去。

国家此时对城市知识青年采取的政策，是凡能在城市安排的，

^① 《家长要帮助未升学子女作好安排》，1962 年 8 月 14 日。

尽量在城市安排。“除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人自愿下乡外，对不能下乡和暂不愿下乡的，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协助政府在城市安排他们自学，或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和其他劳动”^①。国家尚没有组织城市青年开展大规模下乡运动的打算，至少还没有把城市知青的上山下乡作为一个总方针、总方向，明确地提出来。

做法是小心翼翼的。这次安置工作的一个非常特殊之点，就是很多问题不上报纸，不做公开宣传。也许是习惯性的家丑不可外扬，或者是国际国内形势过于险恶之故，还有可能是不愿激化矛盾，所以，在公开见到的宣传上，更多的是树立先进典型，这是最有效也最主动的做法，如上述的宣传邢燕子。而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具体情况和所行政策，却采取低调处理，公开的提法，比上述文件更为缓和，如《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张键的文章称：

家在城市的家长，假如农村有亲戚朋友，也可以劝说那些具有一定劳动能力而又能参加农业生产的子女，下乡加强农业。假如农村既无亲戚朋友，或者虽有但子女年龄很小，一时无法下乡的，就在城市设法随家长劳动就业或者在家自学。如父母兄弟是理发师、鞋匠、木匠、裁缝、厨师等人，子女弟妹就可以跟随家长当学徒，即使一时不能当学徒，也可以利用早晚时间，帮助家长做一些辅助性的劳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将会尽可能举办一些函授、广播学校、夜校，也积极提倡群众自行办理各种形式的学校，还有一些需在家中自学，一两年后再考也是可以的^②。

广州市则对应届毕业的中学学生们这样说：

对于应届毕业生的出路，政府已经作了多种安排，多数将奔赴农业第一线，一部分到手工业、服务业当学徒；一部分担任夜校、民办学校

^① 《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关于当前任务的决议》，1962年6月19日—7月9日。

^② 《关于青少年道德品质问题调查专刊》，《团的情况》1960年第3期。

或儿童识字班、简易小学教师，不能从事这些工作的毕业生，可以读夜校、广播学校，或参加街道自学小组进行自修。在目前，参加农业生产应该是毕业生们考虑自己出路的一个主要方面。^①

直接负责青年工作的团中央，对于怎样安置这批人数还在持续增加的社会青年，确实绞尽脑汁。他们一再要求团干部尽可能地多想几条出路，例如征收一批义务兵和警察，对象是大中城市的高中毕业生；又如允许有手艺的人招收学徒。胡耀邦还特别提出，凡属专收城市学生的中学和小学，以及城市初中、小学的升学数字，以不要削减为好。容纳这些人既不增加商品粮，国家所费又不多，在这样的问题上如果搞得过紧，给人们以每况愈下的感觉，实在不合算。

显而易见，在当时城市人口尤其是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人员正在被大量精简的前提下，上面提到的为应届毕业生安排的种种出路，实在没有哪一条是能让他们满意的。谁都知道，所谓在家自学，并非长久之计。而去商业服务业和参加家庭手工业生产，又实在提不起知识青年的兴趣。

60年代初期的城市青年无论什么出身的人，都把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重于一切。有没有前途，首先就是有没有政治前途。青年们认为，只有当了国家干部，或者进入国营企业和工厂，也就是成为国家职工，才有可能进步，才有政治前途，这是当时不能回避的社会现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最看不到前途的，就是在城市里从事个体经营。谁都知道，个体经营从1956年起就是被改造的对象，到文化革命，这些人重的被划为资本家，轻的被当成小业主，几乎无人能够避免挨批挨斗或被遣返回乡的下场，无怪乎知识青年们对此顾虑重重，有人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唯恐

^① 《广州市中学毕业生代表会议结束》，《南方日报》1962年8月3日。

将来会被改变成分；有的怕市场情况复杂，把自己熏染成坏人；也有的担心政府把这种暂时的谋生之路当作永久的安排，再不给升学就业的机会。真正甘心与父兄一起从事这一行当的人只是极少数。至于当小学教师、商店售货员及从事其他服务性行业，也为很多青年看不起，认为没前途，针对很多青年的不满情绪，一些报刊如《北京日报》还曾专门展开过“服务性行业是否低人一等”一类的讨论。正因如此，许多城市一再对青年进行安排，却安排不下去，即使安排下去一些，人数也有限。结果是青年对自己的未来丧失信心，有些青年甚至产生敌对情绪，张贴反动标语，组织反动集团，矛盾发展到相当尖锐的地步。

可见，意识形态、思想观念方面的问题，使得本来就很狭窄的就业出路人为地变得更窄了。从这一情况也可看出，70年代末80年代初回城的知识青年组织劳动服务公司，靠卖大碗茶起家，并最终以这种途径解决了待业问题，帮助国家渡过一场严重危机，正说明了十年动乱以后社会观念的大进步。

城市安排不下去，只能另寻出路。1961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在南昌召开的有12个省市团委书记参加的座谈会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对城市的街道青年，特别是一部分辍学没有就业的青年的社会风气问题、教育问题以及他们的就业的出路问题，要抓一抓……前几年我们就讲，今后城市里每年要有300万学生毕业了业不能升学，就业问题怎么办？明年工业上是不行了，根本的出路是什么呢？

他首先想到的，还是青年垦荒队。所以这一时期才会有对1955年到黑龙江的北京青年垦荒队的再一次大张旗鼓的报道与宣传，而他们此时已沉寂了好几年。同时被宣传的，还有贵阳、湖北等地的青年垦荒队，这当然都是一种提示。胡耀邦坚持认为，解决这

个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上山^①。

这一方式确实立即就付诸实行了，但这只是出路之一。

1962年6月，共青团召开了三届七中全会，会议对于在安置城市知识青年问题上，应该注意不拘一格，尽量多想几条出路的提法和随之采取的一些措施，的确大大开拓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路。这比1957年动员时只知到农业社安家一途，有了很大进步，也许是“解放思想”的成果吧。当然，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大跃进以后的客观情况，也为出路的多样化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在这次会议上，很多代表对地方上普遍存在的只抓精减，不管安置，城市青年的安排工作无人过问的情况，反映十分强烈，对有些地方将大批青年一轰而起地动员下乡，结果少数在当地表现不好，造成很坏影响，有的则成批往回跑的现象，也很有意见。他们要求把精简与安置工作结合起来，以尽快缓解这一燃眉之急。

团中央认为，从长远来看，动员城市青年离开城市去参加生产劳动，是他们的出路，只是希望能多为他们想出几条具体路子来，在王伟就城市青年下乡的问题所做的专题发言中，他提到了：由于国民经济的调整，有大批社会青年急需安排。这些社会青年绝大多数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主要是学生，文化程度都比较高，家庭经济很困难，迫切要求参加工作。而他们的出路，是逐步动员和组织从事农业生产。

他概括了从事农业生产的13种形式，包括长期的、临时的、和过渡的。即：

1. 萝北式的远距离开荒。
2. 举办江西共大式的大学。

^① 《胡耀邦在南昌召开的12个省市团委书记座谈会上的总结》，1961年12月20日。

3. 经过“抗大”式学校的训练，然后到农村去。
4. 集体安置在生产队，分散地进行生产。
5. 到农村投亲靠友。
6. 在大队下新建核算单位。

7. 有组织的集体近距离开荒，广西南宁即试办了三种，一是以户或人为单位，到郊区指定地点开荒，二是组织青年突击队，集体种，集体经营，按劳分配。三是自愿结合开荒。

8. 统一分配到原有的国营农林牧渔场或机关农场。

9. 开办新的国营农林牧渔场，上山、下乡、下海。

10. 组织到国营农场当临时工，经过一段时间，合格的留下来当正式工人。

11. 农忙季节组织下乡，当季节工。

12. 举办锻炼性农场，组织青年轮流参加劳动，使他们逐步地适应农业劳动，为长期到农村去做准备。

13. 在全民所有制农场中，建立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单位^①。

几乎包括了此后近20年安置知青下乡的所有形式。只有成批加入生产建设兵团一项除外。

这次会议之后，7月，共青团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给走向农业战线的团员和青年的一封信》，旨在表达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关心，引导城市下乡青年正确认识当前形势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回答在知青中普遍存在的城市知青到农村有无前途、如何对待农村的艰苦环境和条件困难等问题，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影响。

1962年11月8日，也就是会议召开的几个月以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城市社会青年安排问题的报告。

报告称，据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旅大、重庆、

^① 《王伟关于城市青年下乡问题的发言》，1962年6月25日。

西安、武汉、广州、南昌、南京、杭州、福州、济南 15 个城市的统计，共有社会青年 50 万，已作安排的 20 万中，上山下乡的近 5 万，在城市就业的 10 万余，人民办学校的近 5 万，还有 30 万未得到安排。

团中央向中央建议了三条安排城市知青的出路，一条是上山下乡，一条是在城市就业，一条是组织自学，并且认为，从目前和长远来看，安排的主要途径，是上山下乡：要“动员一批青年学生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不能升学但已经具有劳动条件的青年，有一部分可以安置到现有的国营农场、牧场、林场、渔场；一部分可以去组织新的农场，开垦荒地，还可以去组织新的林场、牧场、渔场”。具体说就是三种方式：

1. 到国营农、林、牧、副、渔场。这是青年比较乐意，也较易巩固的方式。前一时期由于投资问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安排的人数还不多。最近国家已经决定，要在国营农场安置一批知青，现在各地都在动员。

2. 到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好处是国家花钱少，容纳的人数多。问题是知青多系单身，生产生活上有困难。不少地方发动青年投亲靠友，和亲属一起下去。也有的暂时编为小组，集体生活，分散劳动。

3. 试办半工半读学校、青年农业生产建设队，经一段时间的锻炼，再到农村长期落户。

以上三条显然是王伟所提 13 种方式的概括。

四 到国营农场去

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共青团，而是政府各部门。在这次精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农垦部。它所管辖的各级各类国营农场，成为吸收接纳精简下放人员和城市知识青年的主要基地。

几乎在团中央向党中央提交报告的同时，1962年10月16日到11月6日，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召集各大区农办和各省、市、自治区主管这项业务的负责同志到京，召开了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的汇报会议。谭震林、杨尚昆到会作了指示，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接见了到会代表并作了指示。按周恩来要求，由国务院农办负责组成了专门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农垦部、林业部、水产部联合组成，办公地点在农垦部。各大区由农办负责管理，各省、市、自治区也成立专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经常工作。中央还要求各级精简领导机构和水利、交通、商业、粮食、文教等有关部门积极参加工作，共同完成这项任务。可见其重视的程度。

这次会议明确了几个重要问题，首先就是要把国营农场作为安置不能升学的城市学生的主要出路：“在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下放的职工和不能升学的青年学生的工作，是完满地完成这次精简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具体内容包括：

1. 安置对象：应限于家居大中城市、在这次精简中减下来的、具有下乡条件的职工和应届毕业未能升学或就业、年满18周岁有独立生活能力的青年学生，以及下放的闲散人员。闲散人员系指以往几年精简下来未得到安置的职工和毕业后未能升学就业的青年学生。注意后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青年。

2. 安置方式：首先应在原有的国营农、林、牧、渔场采取顶替、增补的方式安置；在有条件的地方，也可采取扩建的方式安置。新建场因为投资大、收效慢、安置人少，不宜多办。应充分考虑到粮食等物资供应的可能，量力而行。

3. 要求各省市把精简下放计划与接收安置计划统一起来。安置的步骤，一般先去劳动力，打下安家基础后再接家属。

4. 财政部预定今明两年安置经费为3.5亿元，这是一笔专案

拨款，列入地方预算管理，但必须专款专用，不准挪用。如有节余，准许跨年度使用。经费开支项目，有工资差额补贴，学生生活补助费，家具补充费，新建、扩建场的基建投资和流动资金5项。

据这次会议的报告称，1962年22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已经安置了10万余人，其中农垦系统87000余人，林业系统15000余人，这个数字中当然也包括了职工，而不仅是学生。这次会议也是上一年安置精简人员和青年学生到国营农场工作的一次整顿和总结。会议计划在下一年再安置112万人，其中包括青年学生38万余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计划，其准备动员的人员总数，比1962年竟多过了10倍，仅其中拟动员的青年学生，就已是1962年精简人员总数的3倍。但从后来的实际情况来看，国营农场并没有如此大量的容纳能力。到1963年5月，共安置了城市知识青年15万余人，仅为原计划人数的46%，所以在7月召开的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上，安置方向就有了改变。

当然，在短短两年，能安置下去几十万城市知识青年，成绩已经相当可观。与精简职工一起，主要安置在国营农场，正是这两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特点。

建立国营农场的工作，50年代一直在进行，而到1958年达到高潮，各省都兴建起大量的国营农场，如辽宁全省就有国营农场127处，林场104处。湖北省由省、地、县所有的农场有200多所，农场生产情况的好坏这里可以不提，但在当时，它们容纳人员的潜力还是相当大的。

安置城市青年到国营农场的工作，早在1960年就已开始。只是这时的人数还不算太多。其中规模较大的，如山东青岛、烟台、淄博、临沂等地3000名知识青年，1960年春前往渤海垦区参加建设。这是我国沿海最大的垦区，位于黄河下游入海处，面积430多万亩，原是一片肥沃的黄河冲积平原，由于海潮长期侵袭、河水泛滥而未得治理，变成遍地盐碱的荒原。1952年以后，国家在这

里修建了长达100公里的防潮堤和引黄灌溉工程，建成12个国营机械化农、林、牧场。知识青年到场时，条件仍十分艰苦，吃水都要定量，甚至用海水煮饭，他们自己动手砍树割草，两个月搭盖了上千间房屋。至1963年为止，到这里参加建设的知青已达10000余人。国家先后拨给这个垦区443部标准台式拖拉机。知识青年成为驾驶和修理这些拖拉机的主力，全垦区2000名机务人员，知青占80%^①。又如1960年10月，江苏镇江市有580多名青年到新民洲去安家落户。新民洲是长江中的一个孤岛，面积20000亩左右，原先仅有40多户人家，号称该市“北大荒”。这些青年是全镇江市被批准到农业第一线去的4000多名青年的一部分^②。

动员青年到国营农场，并未遇到很大阻力。首先，做国营农场职工，毕竟与到农村当农民不同，容易为城市青年所接受；到农场有固定工资，生活至少是有保障的。再者，农场过的是集体生活，对青年也有吸引力。有些地方的知识青年为去农场总结了9大好处：是国营，前途大；是工人，不是农民；有固定工资；机械化，有技术；8小时，工作轻；集体生活，热闹；有食堂，不用自己做饭；文娱生活好；领导强，进步快。这代表了当时青年的普遍想法。对于很多充满抱负和理想而又不谙世事的青年来说，与其在城市从事那些既让人看不起，在政治上又看不到前途的工作，倒不如去国营农场，也许更能有一番作为，生活也更富于新鲜感。据中央于1963年的统计，一年来安置到国营农场的知青，返回城市的仅有2%，巩固程度还是很高的；而辽宁省同年的统计，1962年去农场的城市知青，80%比较稳定，有20—30%已准备长期扎

① 《三千青年艰苦奋斗建设大孤岛》，《大众日报》1960年9月27日；《山东一万多知识青年参加渤海垦区建设》，《人民日报》1963年6月9日。

② 《镇江500多青年到荒岛创业》，《中国青年报》1960年10月15日。

根，倒流回城市的仅占10%左右；而同时去农村插队的，则只有50%还算稳定，20—30%已经回流或在城乡间经常来往了。

一直到“文化革命”期间，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各种途径中，去国营农场仍然要算是最理想的一种，当然国营农场后来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但那是后话。

据团中央1963年11月对辽宁、吉林、陕西、江苏、浙江、福建、江西7省和北京、上海两市的统计，1961年以来动员下乡的青年共有148673人，其中到国营农场的就有115126人；1963年也有一批。此后，除中小城镇的知青被分配到附近一些小型农场的情况不计，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知青，再想得到分配在距城很近的农场的机会，就很困难了。

以北京为例，1958年的大跃进，使北京的职工人数急剧增加，从1957年底的108万人，增长到1960年底的185.2万人，3年时间增加了77.2万，迫使北京市在1961年以后下大力量进行精简。仅1962年一年，就净减职工14万，使城市人口比上年减少了13.2万。在这种背景之下，大量在这一期间毕业的中小學生和社会青年的安置，便成为一个很急迫的问题。

不过，在1962年底以前，北京市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还是不多，一共只有3000多人，主要被安排在城郊的国营农、林场。

巨山农场。位于京郊西山脚下，以种植果树为主，条件较好，离城也较近。1962年130名青年被分配到这里，他们大多是初中毕业生，年纪较小，且女生居多。农场对他们还是非常重视也相当照顾的，每日劳动8个半小时，每月4天假期可以回家，工余时间农场也注意为他们组织各种活动。据报道，一年后仍留在农场的知青有118人，走的虽不多，但斗争却十分尖锐，因为每个走的都想拉几个人一起作伴。也有些女知青通过谈恋爱的方式设法回到了城市。

龙泉寺家禽场（即今天的西山农场）。位于离城将近100里的

老爷山。1957年建立养鸡场，但也只有几间破庙。1961、1962两年，相继有200名知青来场，大多是本市的初中、高中毕业生，他们向荒山怪石进军，在河滩上开垦出390亩土地，开采花岗石砌成长达3500米的渠道，盖起砖瓦房。又栽种了几万株果树和绿化树^①。

南口农场。位于北京城西北50多公里外靠近长城的南口。是1958年由几千名下放干部在一片荒石滩上建起来的。农场的800多名知青，有600多名是1961、1962两年去的，绝大部分是高中、初中毕业生。经几年的艰苦劳动，已建成一个以果树为主兼营农、牧、副、渔的大型农场。知青们经过各种形式的业余学习，也有很大进步。1958年建场时全场只有4个果树技工，1963年已有100多人能独立担任各种果树的技术工作^②。

京郊天堂河、长阳、卢沟桥等农场，也都安置了一些城市知识青年。

1962年下半年以后，按照中央安置工作会议的要求，北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较前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他们被集中安置到北京的各国营林场，1962年暑期以后到郊区去当林业工人的中学毕业生为3000多人，1963年又有一批，两年到林场的知青人数共计5000多名。这些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青年人和1000多名干部、老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在荒山和沙滩上建立起20多个国营林场，开辟了60多处造林基地，到1965年止，已造林10万多亩，抚育幼林7万多亩。其中800多名知青在由顺义到通县70多公里长的潮白河两岸、由卢沟桥到河北省交界处90多公里长的永定河两岸栽种树木800多万株；还有知青400多名参加了八达岭林场的建设；全市林场的生产队长、组长已大多由知青担任，造林大

① 《二百知识青年在龙泉寺家禽场劳动成长》，《北京日报》1963年5月4日。

② 《本市八百城市青年战斗在南口农场》，《北京日报》1963年3月22日。

队队长和副队长，也有二分之一是知青。许多知青成为林业技术骨干，被派到郊区各社队作技术指导，还有 600 多名参加了北京林学院的函授学习。

再如天津，1962、1963 两年，有 2500 名城市知识青年被安置到天津专区所属的 8 个国营农场。他们大部分是高、初中毕业生。在这 8 个农场中，除 3 个是 50 年代建立的老场如 1954 年即建立的国营青光农场之外，其他都主要是为安置城市知青而新建扩建的农场。

文安洼国营农场。位于天津市西南文安县文安洼地区，距天津 60 公里，东依子牙河，西靠大津河。该场所属有 5 个分场，即新桥、李庄、界围、黄甫和小务农场，筹建于 1961 年。在全场 1000 多职工中，只有几十名老工人，其余都是 1962、1963 两年到场的天津知识青年。1962 年到场的知青当年就经艰苦劳动，使大洼的 5 万亩荒地变成了农田。

里自沽国营农场。位于宝坻县里自沽洼，距天津 70 公里，东依导流河，南靠青龙湾河，秀针河横贯其中，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洼地。该场于 1962 年 4 月开始筹建，职工大部分是知识青年。

尔王庄国营农场。位于宝坻县西南，东依青龙湾河，西南傍金钟河，隔河与天津市北郊区相邻。1962 年开荒建场，当时全场的 50 多名职工大部分是天津知青。1963 年又有一批天津知青前来落户，使职工人数达 140 多名，拥有土地 6000 多亩。

大中庄国营农场。位于宝坻县城东南 25 公里，东南北三面为蓟运河、箭杆河环绕。该场于 1963 年底才开始筹建。

天津的这些新建场都位于低洼的盐碱地区，条件相当艰苦。城市知青大多是在秋收大忙时节即匆匆到场，往往在到场仅一两天后就参加了劳动。两年期间，他们开垦了大量荒地。

除国营农场之外，各地还兴办了一批集体所有制的青年农场，如湖南长沙市的有关部门于 1963 年冬天曾组织了 2600 多名知识

青年，在长沙周围丘陵地区的荒山秃岭上，兴办了43个小林场，这很明显是沿袭了1958年团中央曾大力提倡的在城市附近选择荒地建立青年农场的思路。而在有些地区，小农场更是直接在1958年建立的基础上扩大发展的。

这些农场由国家和公社或生产大队联合经营，属自负盈亏性质，知识青年是主要劳动者，合营的集体单位也派出少数社员和知青一齐劳动，国家对这些小农场采取了优惠政策，规定3—5年不征购、不派购，产品可由小集体自行处理，副食品一年内仍按城市居民定量供应，耕牛、农具、种子等原则上自己解决。这类小农场，安置了大量中小城镇的知识青年。

五 江西共大与青年农业生产建设队

这两个名词，一个是指学校，一个是指生产组织。看似不同，但二者却有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属于一种过渡性的安置知识青年的方式，即先把青年集中起来，经一段时间锻炼，再送到农村或农场去。这个方法，最易为青年学生所接受。

一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1958年一哄而起的种种大学纷纷下马之后，各地都已经明白，巩固一所学校并不容易，它需要国家付出相当多的人力和财力。因此，除了如江西共大这样得到国家最高级领导人全力关注和支持的学校之外，真正坚持办下去的半工半读大学，在60年代初期寥寥无几。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办学目的实质上是双重的，一则是“劳动人民知识化”，给当地贫下中农子女以读书的机会；一则是为不能升入正规学校的知识青年提供一条出路。在三年灾害以后的几年，它偏重的是后者：

共大总校最初是面向省内外公开招生的，最多时曾有 19 省市的青年报考，人数高达 2500 余人。从 1962 年中共江西省委和江西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招生问题的指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在容纳不能升学的青年一事上所发挥的作用：

今年暑期，我省有部分高、初中应届毕业生不能升学，除了家住农村的应尽量动员回乡参加生产之外，其中家住县城以上城镇中的学生约计有 15000 人左右，加上城镇中撤并的一部分学校多余的学生，和一部分中专不能分配工作的学生，为数就更多。党和政府对这部分青年的升学和就业问题，应当十分重视和关怀，积极地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妥善安置；有的可以组织自学小组和补习班，帮助他们继续提高学业；有的可以组织民办学校安排他们学习；有的可以安排到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工作，除此以外，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和一部分条件较好的分校，也可以从城镇青年中招收一部分学生，动员一部分城镇中的不能升学的知识青年到共大去学习和劳动，参加山区的开发和建设事业。省委、省人民委员会认为，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出面，在城镇中招收一部分不能升学的学生，既有利于减少城镇人口，又有利于安置这些不能升学的知识青年，不使其在社会上流浪，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而且还可以用这种方式，加强农业战线，组织和动员一部分家住城镇的知识青年转到农业战线上去，这是一举几得的好事，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今年暑期招生，以招收城市和县城以上集镇中应届和历届高中毕业生为主，也可以适当招收一部分应届和历届初中毕业生和具有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社会青年。凡家住城镇，年龄在 17 至 25 岁，身体健康，历史清楚，志愿参加农业生产，愿为建设山区服务的城市男女青年，均可报考。

共大还规定，凡经录取的新生，每人发给开办费 150 元，招生费和车旅费 30 元。

总校和省属分校的这项费用，由省财政厅发给共大总校转发

给招收新生的学校统一掌握使用。新生入学后，其粮、油供应，自入学之日起至1963年7月底止，仍由国家供应，总校新生由南昌市供应，省属各分校由所在县供应，列抵上调粮、油指标；调出学生的市，应相应地扣减粮、油指标。1963年8月以后，应当努力做到粮食自给，到时自给确有困难的，可继续予以一定补助（办法另订）。各地对于省属分校按省计划招收的新生，应积极帮助安排，使这些城镇知识青年在农村安置下来，不得加以拒绝阻拦。行、专、县（市）所属分校如果决定招生的，名额应报省批准，其待遇与省的标准相同，经费从处理城镇人口的安家补助费中解决，如仍不足，可编报预算，报省财政厅核拨，粮食、食油可从调出学生的城镇供应粮、油指标中划拨^①。

胡耀邦对江西共大在安置知青方面的作用，曾备加赞许，上海等城市也确曾把到江西共大作为安排知识青年的一条出路，但实行的具体过程却远未达到他们的想象。首先，共大办学初期对生产自给要求太急，全力搞生产挤掉了学习时间，引起学生不满，许多从上海等城市去的学生吃不消，纷纷跑回去，在社会上造成江西去不得的印象，甚至“江西去不得”在上海几乎形成一种条件反射，下次再动员时，工作就十分难做，人们宁愿去新疆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学校后来也承认，当时对自给范围没有明确规定，有的分校为了增加经济收入，大抓多种经营，粮食则靠买商品粮解决，结果赶上三年灾害，粮食供应紧张，给学校的巩固带来困难。有的重视了粮食生产，却未兼顾多种经营，影响了经费自给。这一切都使不少师生对学校的发展前途产生了动摇。后来学校明确规定，粮食，要做到学生、工人和家属自给；经费，做到学生生活费、工人工资自给；干部和教职员的工资、教学行政经费、必要的基建经费则由国家给予必要的补助。可见，出大头的还是国

^① 《江西政报》1962年9、10号合刊。

家，若没有国家的特别关照，而任这所大学像其他这类大学一样自生自灭，共大的前途确实是令人怀疑的。

其次是分配问题。1962年，共大的第一届毕业生分不出去，出去的很多都改了行，也给这个学校以很大打击。

精简也波及到了这所学校。有的地方以压缩吃商品粮人口为名，将共大学生几乎压缩一空。有的公社和生产队因为要固定农业劳动力，动员学生回家。这一年江西共大共精简了62所分校和20000多名师生，整个学校面临危机，出现了“58、59 轰轰烈烈，60、61 冷冷落落，62、63 关门歇业”的悲观论调。它之所以没有关门歇业，只是因为它得天独厚，受到了中央的支持。

1961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开会期间，为江西共大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的确是很好的。”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毛主席“七·三〇指示”，也是共大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毛泽东还进而强调说：“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地也应有这样的学校。”明确表示了有将这样的学校在各地推广之意。当年9月18日，周恩来在南昌接见了共大总校师生代表，传达了毛泽东的这封信。江西共大因此而平安度过了1962年的严重危机。

二 上海的“青年农业建设队”

这也是一种比较新的形式。

1959年，中共崇明县委曾带人围垦了部分芦滩，翌年上海市又出动3万大军开赴崇明岛进行围垦，在那里建立了国营农场。在此基础上，1962年“一二·九”运动纪念日前夕，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号召，经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提议，上海团市委组织了“青年农业建设队”。它专门招收高中毕业生，参加为期一年

到两年的农业劳动，作为以后长期下乡务农的准备。当时的报名相当踊跃，很多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毅然要求离开城市，还有的青年放弃现成的教师工作不干，或放弃在城市从事商业工作的机会。1962年12月3日，首批397名队员从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负责同志手中接过大旗，庄严宣誓，然后奔赴崇明垦区的新安沙农场。据一年后的报道，到场后，他们自己动手安排生活，又历经了冬季平整土地、春播、夏种和紧张的三秋劳动，生产了80多万斤粮、4万多斤籽棉，思想面貌也有了显著变化。要求在垦区长期落户的青年，从最初的14人增加到238人，还有不少人要求延长劳动期限。正式评定工资时，也有不少人主动要求评得低些。他们中很多人积极参加“垦区业余农业专科学校”学习，还有7人参加了上海市国营农牧场先进会议^①。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些省市试办的“半工半读进修学校”，说是学校，其实都办在农场或城市郊区，以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为宗旨，由农场技术员担任教师，学生一面劳动，一面学习。以广东省为例，在1962年下半年，就有番禺县建立的半工半读学校，附设在县办的海傍农场，这个农场原有场员300多人，其现金和所产粮食除自给外，足够维持学校的经费。学校计划招生400名，其中专科招收高中毕业生，中等技术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修业期为二年；再如梅城镇举办农业专科进修学校，附设在国营三角农场，招收城镇的高中毕业生入校学习，规定一年结业后或由学校根据需要分配工作，或留在农场学习劳动或自找职业。北海镇城镇公社和镇教育局联合举办半工半读劳动补习学校，吸收未考

^① 《上海青年农业建设队在斗争中成长》，社论：《胸怀壮志，脚踏实地》，《文汇报》1963年12月9日，《芦苇滩上创大业——上海青年农业建设队劳动生活片断》，《中国青年报》1963年12月27日。

上高一级学校的高、初中毕业生复习功课，学校设在镇附近的沙湾农场，计划招生150人，毕业后可留校参加劳动或工作。这些主要建立在中小城镇的学校，从它们的招生宗旨来看，其临时性是显而易见的。

也有不少城市知识青年自发地、零散地到农村去落户，还有一些地方组织了到农村集体插队落户的试点。

六 问题和特点

这次动员城市青年下乡，显然带有紧迫性、临时性两个特点，还谈不上是一场精心组织的运动。

这里存在一个尖锐的矛盾：由于形势紧迫，国家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如何使青年尽快疏散离开城市之上，而对于青年来说，此时的形势，却已经与1957年有所不同，那就是，所有下乡务农和到国营农场的城市知识青年都面临着一个最切身、最敏感的户口问题。户口和政治待遇，是当时人们的生命线，再没有比这二者更重要的东西了。城市户口一旦被取消，就意味着断绝了回城的一切后路，知青们很难下决心迈出这一步。前面说过，1957年动员城市中小学生下乡务农时，这个问题就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而这时随着城乡间界限的愈加严格，生活差别的更加扩大，就显得更为突出了。

从1960年开始的两年来，各地在动员青年下乡的做法上出现的种种问题，更加剧了这一矛盾。有的地方曾经规定，户口转到农村后就不能再转回来，结果知青顾虑很大，动员工作难以进行；有些地方已下乡的青年，因种种原因又返回城市，却报不上户口，生活发生困难，社会治安也受到影响；还有些农村人民公社，出于种种动机，不许下乡青年报户口，青年的生活没有着落；也有些地方如四川，有些知青索性就不转户口或只办理临时户口，住

在农村亲友家参加几个月劳动，结果来来往往，难以安心。

好在国家当时对于以哪种形式下乡，下去之后如何安排，具体地说，粮食如何供应，户口是否带走，也没有统一的规定，尚处于一种尝试性的甚至救急式的状态。国家的要求是，就目前来说，各种形式都不要排斥，只要能安排一些人就好，安排一个是一个，好的形式会在实践中逐渐形成起来。在宣传上也比较实际和坦率，明言要青年帮助国家克服困难，要精简城市人口，要为青年找出路，与后来主要宣传发扬革命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高调不同。

于是，直接负责此项工作的干部们，就从中找到了诸多空隙。当然，他们中很多人也不是有意要钻空子，他们确实将此举仅仅视为一种暂时性的措施，很多下乡青年也以为，形势好转之后，他们这些曾为国家分担了压力的人，还会有回城并得到工作的机会。

为了减少动员知青下乡的阻力，对于下乡知青的户口问题，各地都自行其是，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各种折中的做法。河北省规定可以先在农村报临时户口，但要带走粮食和副食关系，以减少城市商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的压力。重庆市则在劝告知青作长期打算的同时，许愿说城市将来在农村招人时，可以优先录用他们。广东省中山县的多宝农场，1961年曾从当地接收一批城镇知青，镇长在进行动员时就明确宣布，今后凡是要求退场回镇的知青都可以迁回户口，消除了他们怕到农场后再也不能脱身的顾虑。有的地方在动员时还提出，知青下乡，原则上是应该一辈子为发展我国农业生产而奋斗，但如有特殊情况，经批准后也可以回城。广西负责安置工作的干部就曾对青年说：“你们下乡是去锻炼，如果干得好就能升学或做别的工作，即使不离开农村，将来也能当干部”等等。而其中最大胆的，是广州市。据说，1961、1962两年动员城市青年下乡时，广州市有关的政府机关曾与知青订有协议，即政府保证，在知青下乡一段时间后——这段时间依所去地区条

件好坏不同，分为2至4年不等——可以返城，重新得到城市户口，由国家负责安排工作。为了使这一协议确实发挥效力，很多知青在出发前，还拿到了当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

与户口形影相随的问题是口粮，这只存在于下到农村生产队的青年中间。为城市尽量节省出一份口粮，本来就是这次动员的重要目的之一，很多地方采取能省就省的办法，以减轻城市的负担。如有的对知青和返乡人员一样待遇，只发一两个月口粮，以后就参加生产队分配，生产队有意见，下乡青年的基本生活也得不到保证。对此，重庆等地采取了由国家销售口粮到第二年夏收或秋收，然后再按当地社员标准由生产队分配基本口粮的做法。辽宁省委则规定凡到农村插队的，口粮标准按原在城市时的标准，由国家供应到接上下一年的新粮，将当年劳动所得的粮食作为劳动补贴，后来各地基本都采取了类似做法。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知青下乡后，是否还可以再参加升学考试的问题。各地当时的做法一般比较开通，即容许报考，考不上仍可回原劳动单位。

与后来城市知识青年的安置政策相比，这时各地的做法，显然是相当宽松的。且不说这与当时中央的精神并不相符，单是从引起的后遗症来看，其弊端就已十分明显，而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当1963年以后中央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项长期的、正式的政策提出来以后，一切几年后回城、优先安排工作等等许诺都成为空谈。知识青年认为自己受了欺骗，思想上产生各种不满和混乱，直接影响了以后动员安置工作的开展。

广州市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当形势改变而使市委与青年达成的协议不能兑现的时候，市委便陷入了被动之中，被惹恼的下乡知青们，在十年动乱期间还为此而组成造反组织，一直闹到北京，可当时陶铸已被打倒，知青们要求履行协定的目的当然只能落空。

事实上，这也是导致“文革”爆发后知识青年兴起“返城

风”的主要原因之一，知青们反对上山下乡的最有力的理由，就是他们是被“骗去的”。的确，为了尽快将青年动员下乡以完成任务，许多干部不惜许愿乃至说谎，甚至不择手段，公然采取欺骗、威逼等手段的，也所在多有。但更多的，却是各地那些日后使自己陷人数不清的麻烦和被动的“土政策”。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酝酿阶段。

据当时报刊的报导，从1962年春到1963年8月为止，我国有10多万知识青年下到了国营农、林、牧、渔场，他们绝大部分是家居大、中城市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然而，这毕竟还是一个开创的时期，城市知青所去之处，距城都很近，条件相对说较优越，即使是去农村落户，也大都选择城市郊区附近，或条件较好，被作为先进而备受领导重视的公社、大队。动员工作与后来大批下乡的动员相比，也比较谨慎。据后来政策规定，1962年以后下乡的城市知青，可享受知青待遇，而在此之前到农场的，则大多属于分配工作，成为农场职工了。

第七章

到农村去安家落户

历史进入1963年以后，最艰难的日子终于过去，一切似乎都开始复苏了。

大规模的城市精简人口工作已经停止，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及在城市等待分配的社会青年都松了一口气，他们以为终于盼到了回城和在城市就业的机会。

让他们再也预料不到的是，真正的、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却正是从此时才正式开始的。我们说“真正的”运动正式开始，意思是说：第一，它已成为国家的一项长期性、经常性的工作，而再不像50年代以来那样，随着经济发展的起落和学校招生数量的多少而波动了。第二，它已作为国家的一项专门任务，而与其他运动如以前的干部下放、移民支边、市民精简等等分离出来，并因此而成为国家经济计划中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第三，随着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命题以后，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被赋予越来越强烈的政治色彩，以至于将它所根源的经济原因完全掩盖了。直至今今，人们在评价这场运动的时候，仍然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它的政治内容之上。

其实，如果追本溯源的话，这一政策就是1958年初“动员城市剩余人口支援农业建设”做法的延续，这一做法刚刚被付诸于

实施，就因“大跃进”而中止。如今15年过去了，当时一些专家预料会出现的种种危机，不仅被不幸而言中，而且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实际问题。但是，控制城市人口的最好机会已经失去，当一切不得不重新起步的时候，任务却要艰巨10倍。

一 15年的安置规划

1963年9月30日，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头条刊发了新华社的消息“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这是一条令全国人民都感到欣慰的消息。自1960年以来响应号召陆续到农场和农村去的知识青年们尤其欢欣鼓舞，持续三年的城市精简工作业已停止，知青们以为终于等到了回城和在城市就业的机会。已经有知青给报社及有关部门写信，提出“形势好转了，知青可以回城吗？”^①的问题。

答案却是否定的。在新华社消息刊发前不久的1963年6月29日到7月10日，中央召开了六个大区城市精减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了，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他要求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要编制出15年的安置规划。^②

10月18日，周恩来在对国家计委、教育部、劳动部、团中央、

① 参见《形势好转，知识青年可以离乡进城吗——王保京同志给农村青年王智学的回信》，王保京是当时陕西省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王智学在信中说：“为支援农业，1960年我下乡，时间已过三年，是不是可以回城呢？我们队劳力也用不完，走了我一人也没啥影响。”王保京的回信说：“现在形势能够好转，正是因为认真贯彻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这是长期的，应该下决心在农村干一辈子，而且干出成绩来。”见《陕西日报》1963年3月26日。

② 《关于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的报告》，1963年7月30日。

全国妇联等部门的负责人的讲话中更明确地指示，要长期地抓紧城市知识青年的下乡工作。同日，他在《中国青年》创刊40周年的晚会上又提出，我们国家现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已经比过去增加了很多，今后，每年还要有大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就需要解决他们的精神食粮问题。《中国青年》杂志的方针应该是“面向农村，兼顾城市”，这也应该是整个共青团工作的方针。今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主要由共青团来做。这是政策上的一个重大转变。^①

周恩来特别强调，知青下乡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长期不是三五年，要搞18年。18年的算法是，从今年（1963年）算起，节制生育二年生效，1965年以后出生的人16年以后就业，大体上可以解决问题。在此之前每年全国有300万人需要安置，其中城市各方面可以安置200万，还有100万必须下农村。按18年计算，就是2000万人左右。这个工作还必须和计划生育通盘考虑，如果城市计划生育工作搞得不好，出生率还是70%的话，18年以后还有问题，时间就要更长一些。

将城市知识青年下山下乡的安置工作从城市人口精简工作中单独划出来，并明确将其作为长期性工作，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我们可以将此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端。

这场运动恰恰开端于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城市精简工作宣告停止的同时，说明了这个问题的深刻性。

我国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高的后果，此时已经开始显露。据中央估计，解放14年来出生的孩子，在这以后的15年内，将分批逐年达到劳动年龄。单就200个左右大中城市计算，每年就约

^① 《团中央书记处关于贯彻执行周恩来同志对团的工作的指示向中央的简报》，1963年10月23日。

有200多万人。^①我们上面提到，50年代中期，国家对这一问题一度有所警惕，但1958年以后，随着“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说法的盛行，以及对生产力的三要素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的错误理解，控制城市人口、节制生育的呼吁被作为马尔萨斯的反动人口理论受到批判，最佳时机被错过了。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刚刚从三年灾害的重创中爬起来的大中城市，已虚弱到连自己原有的人口也难以承受的地步，就更不用提为新增的劳动力提供饭碗了。而对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片面的、绝对化的批判，使城市就业出路越来越窄，几乎走入死胡同。加上就在这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调整市、镇建置，缩小城市郊区的指示，使农村人口向镇的移动也受到了严格限制，原来起着调整城乡间人口流动作用的镇，从此趋于萎缩，本来已经很紧张的青年就业问题，更呈雪上加霜之势。

解放十几年，全国中小学校的数量一直在增长，中学生的基数越来越大，随着教育工作的逐步纳入正轨，1956、1958等年份那样所有的高中生都能升大学的现象，从此不复存在。可以说，高中生升大学已经越来越难。按照周恩来的话说，高等教育要为突破尖端服务，不能削弱。每年的中学毕业生，能升到高等学校的只有十几万人，今后15年内，一年最多也只能发展到30万人上下。而最近几年，全国每年进入小学的新生，约1500万人。这就是说，如按进入小学的学生计算，只有1%到2%能升到高等学校，绝大多数都要陆续就业。每年进入小学的1500万新生里面，农村约占1200万，城市约占300万，城市每年最多只能增加就业人数100来万，再加上高等学校最多招生30来万人，合起来才有130万人。高等学校还不能全部从城市招生，还要招收一部分农村学

^① 《关于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的报告》，1963年7月30日。

生。所以，大中城市出生的人，大约每年仍要有180万以上的人等待安置就业。农村出生的人，除去每年有少数进城就业和升大学的以外，绝大部分要留在农村就业。

升学难，就业难，结果是1963年当年各大中城市暑期毕业不能升学，也不能在城市就业的高、初中学生，就达30余万人，加上历年积压的社会青年，为数更大，成为使城市感到莫大压力的紧迫问题，更何况以后年年都会如此，每年都会有百万左右的人需要安排。所以，中央认为，有计划地将他们大批地、长期地安置到农村，实在已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尽管这将是一项长期的而且十分艰巨的任务。

15年（或者说是18年），对于一个青年来说，几乎是个看不到尽头的数字，每个青年都感到了这与自己密切相关。还在读书的，知道自己一旦落榜，就有可能下乡；已经下乡的，想在几年之后返回城市的希望，已十分渺茫了。

自1957年以后经多方探索而最终找到的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最好方式——去国营农场，在知青上山下乡成为长期的、大量的任务之后，因为其容量有限以及费用大，已经不再适用。如中央文件所说，原有的国营农、林、牧、渔场，从1960年以来，已经接收了大批城市知识青年、精简下放的职工和复员转业军人，多数老场的劳动力已达饱和，到这时已经没有很大的潜力。而再新建和扩建国营农场，因为投资大、收效慢、能够安置的人数有限、还要经过勘察设计，要考虑粮食供应的可能性等诸多问题，也不宜多办。有些地方又想步大跃进的后尘，搞大规模的围海、治沙和开垦大片荒地的活动，均被中央以工程量大、投资多为由制止了。其实，除了中央文件所列举的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这时上山下乡，已经不像50年代时一切由知识青年本人和家长负担，而是沿袭1958年动员青年支边时的做法，

由国家发放安置经费，到国营农场，不仅安置费高于到农村，而且以后无论农场盈余还是亏损，工人总要领取工资，实际上仍是要由国家“包起来”，而国家所希望的，却是卸下这个沉重的包袱。

容量大而且省钱的地方也有，那就是到农村生产队安家落户。中央认为，全国有540多万个生产队，在15年内，如果每队先后插入两个人，就可以安置1000多万人。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也是多快好省的办法。同时，到农村落户，每个知青花费的安置经费，也较国营农场为少。中央因而决定，从1963年开始，以到农村生产队插队，作为安置城市知青的方向。

1964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城市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问题。邓小平总书记在会上又一次强调，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要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安置费不到200元，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一年有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十几亿元，这怎么得了？他说，要到那些地多、需要劳力的地方，给青年们搞个理想，治山治水，改换自然面貌。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并对做知青安置工作的同志说，我们脑子里要有国家大、人口多这个概念，考虑问题就要从这里出发。他说，关于下乡的组织形式，主要要搞好插队。今后18年内，要有3500万知识青年，主要采取插队的方法，到农村去^①。

为了顺利地把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政策贯彻下去，中央要求从各省、市、自治区以下，都要设立安置工作领导小组，要这一机构把插队工作统管起来。同时，作出了具体的安置工作的安排：其一，今年（即1963）下半年原定安置18万人的计划，要力争超过，不能减少。在保证实现原定计划的前提下，可以作适当调整。安置下乡的学生，年龄可以由18岁放宽到16岁，条

^① 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

件是能够独立生活。主要是安置大中城市的学生，县城里不能升学和就业的学生也可以适当安置一些。要坚持自愿原则，做到本人思想通，家属思想通，思想不通的，就不要下去。其二，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以安置城市里不能升学的、达到劳动年龄的青年学生为中心，制定出15年的安置工作规划。其三，今后安置下乡人员的主要方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此外，有的山区过去被国民党破坏，人口锐减，至今仍未恢复，可以采取“国家扶助、集体所有、集体分配”的办法，安置一部分人。其具体原则，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在省内就地安置，县城接近农村可以自理。^①

前面的一切都是序曲。现在，正幕揭开了。

二 决策出台前的探索

将插队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提倡方式，到这时为止，即使从1960年算起，也已经又经过了几年的摸索。

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并不是这几年才出现的新事物，我们曾详细叙述过1957年各地对此进行过的探索。1960年以后，虽然到国营农场（包括插场、建立新场、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举办劳动大学等等）被国家作为安置城市知青的主要方式，但采取各种方式到农村安家务农的，也不在少数。如1962年一年，武汉市被安置到国营农场的城市知青共计5200余人，计划还可再安排9700人左右，而到农村生产队插队的有1229人。另有3645名家在郊区农村的知青回家参加了农业生产。

再如辽宁省，1962年家住城市未能升学就业的学生，共计约

^① 《关于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的报告》，1963年7月30日。

10 万名，除了可在城市安置的以外，尚有 5 万困在城市。从当年春天开始，当地着手动员这些青年上山下乡，到年底统计，共动员下去 20000 余人，有 14000 人（注意这里包括家在城郊而在城市上学的回乡知青和以各种形式下乡落户者）到农村各生产队，7000 余人到国营农场。其中到生产队的，有 50% 左右比较稳定，20—30% 已经回流或在城乡间经常来往；而到国营农场的，巩固率达 80%，回流的仅为 10%。^①

据北京、上海两市和辽宁、吉林、陕西、江苏、福建、浙江、江西 7 省的统计，自 1961 年以来动员下乡的知识青年共达 148000 余人，其中有 115000 余人去国营农场，采取各种形式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约为 33500 余人。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准确的数字，因为其他数字中，往往将回乡青年包括在内。^②

这一时期下乡落户的青年，情况比较复杂，采取的方式，则五花八门。

从 1960 年起再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起，零散地到农村去投亲靠友，就被国家作为最经济也最省力的安置方式，而一直采用着。不少城市青年跟随被从城市精简下来的家庭一道下乡，也有一些中小城镇的青年，由于在城镇中难以生活，加上他们与农村本来就有较密切的联系，而纷纷到农村去投亲靠友。在当时许多城市处于粮食极度危机的情况下，无业青年与其在城市束手待毙，倒不如下乡找条活路，所以国家这一措施的贯彻，并没遇到多大的阻力。

精简职工都有国家发放的一笔安家费，国家无须再为与父母一同到农村落户的子女们付出什么费用，再者全家一道下乡，生

① 《辽宁省 1962 年组织城市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工作总结》，《团的情况》1963 年第 7 期。

② 《共青团中央青农部召开的动员城市青年下乡上山工作汇报会议纪要》，《团的情况》1963 年第 11 期。

活和劳动也都好安排，的确比较容易巩固，但能这样做的人数本来有限，何况到1963年时，城市精简工作已到尾声。投亲靠友一度进行得相当顺利，因而被有些地方认作是应该大力提倡的最好方式，但事实证明效果也不理想，投靠近亲还好一些，投靠远亲，时间长了就有问题。加上此时动员的重点是大中城市，而大中城市中在农村有亲戚可以投靠的家庭并不多。以重庆市一个街道的统计为例，在219名街道青年中，在农村有亲友可投的为32人，占总人数的15%，而具备下乡条件的（即年满17岁，没有重病，品质不太坏）有117人，占总数的53%；在全市能下乡的七八千社会青年中，可以返乡和投靠亲友的仅占15—20%。^①在京、津、沪等大城市中，这一比例肯定更低。

大多数青年只能单身下乡。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很少见哪个地方提到借鉴了1957年的经验，一切似乎都是从头开始。这样下乡的青年，采取的形式也如1957年时一样有两种，第一种是老办法，就是青年单身插队，或分散住到干部或社员家里，一起吃饭，或单独居住，自己起伙。国家坚持认为，前者是最方便的方式，只要双方觉悟高，生产队再多做些工作，就可以住下来；对于后者，因为青年初到农村，人地两生，参加劳动之外，一天还要做几顿饭，困难不少，是不可取的。而农村干部和社员却希望知青下乡，最好一户一户地搬下去，或三五人编成小组，自己开伙，他们不欢迎知青单个地插在社员家里。这种几人组成小组的方式，就是第二种。此时这一做法刚刚推行，国家的原则是，不拘哪种形式都欢迎，安排一个是一个，安排一批是一批。

这最早的一批插队知青是什么样，我们可以选两个典型的例子：

^① 《因重庆市委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团的情况》1962年第18期。

第一个：1961年8月，共青团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组织一批街道青年到户县营头公社，作为下乡落户的试点。到1962年为止，这些青年中尚留在生产队的有35人，其中8名是全家或夫妇在一起，还有4名女青年已与当地青年结了婚。走的人中情况则多种多样，一部分是年龄太小，单独生活有困难，或者体弱多病，不能长期参加劳动，这些人经省精简办公室批准，都被调到附近的国营农场去参加了劳动。还有一些是家庭拖累太大，如女青年王某，带了两个孩子，无法参加劳动，队里不欢迎，本人也感到有困难，坚决要求回西安。另一些，则属“成分不纯、道德败坏者”，如下乡之前就是西安某盗窃集团的成员，或曾因道德败坏被单位开除，其中有人插队不久，就盗窃生产队的粮食，还到县城去冒充西安某工厂职员，假装招收工人，骗取了上千元，影响很坏；有的插队后仅在队里住了七八天，就一直在外乱跑，下落不明。此外，有4个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后经批准复学，5人参军，还有3人与外地农村青年结婚后转到了外地。从陕西这批下乡务农青年的情况看，多是城市急于将其“处理”掉的，下去后回流现象也较严重，效果无法与安置到国营农场的相比，陕西省团委总结教训说，以后再组织城市社会青年下乡插队时，一定要注意三种人不要动员，一是年龄太小的，一是有严重疾病的，还有一种，就是品质不好的。^①

第二个：成都市。该市1962年积压社会青年1万余人。是年7月，搞了第一批城市知青下乡插队的试点，到四川彭县楠木公社插队落户，共28人，此后又组织了一批，使这年到楠木公社的成都插队知青共达45名。由于动员时注意了选择两种人，即一、家庭生活十分困难的；二、思想觉悟高的。一年以后，这些人中除了迁走、逃走、死亡、因旧案被捕各一人外，还有42人，队伍基

^① 《组织城镇青年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团的情况》1963年第3期。

本上稳定了下来，情况要好于陕西的那一批。

但即使如此，这些青年的“稳定”，也只是相对而言的。据市团委的报告说，他们下乡一年，产生过4次大的波动：

第一次，刚下去不久，对劳动不习惯，怕艰苦。

第二次，1962年冬天，城市的市场经济有所好转，适逢国家发给他们的生活补助费用完，有的人连菜都吃不上，尽吃炒盐饭。于是后悔，认为困难已过，该回去了，一些人跑回成都去做生意。经党委组织他们进行学习，又为他们解决了零用钱以后，大多数稳定下来。

第三次，1963年春，青黄不接，生活又一次发生困难。

第四次，大春分配以后，一部分人不仅没分得钱，反而要倒找，有的家长抱怨：“出去了一年，没拿一个钱回家，还要倒找，有啥搞头！”知青也发牢骚：“天天苦做，还要倒找，硬没想头，今后我要做一天要一天了。”

这几次波动，明显都是由于生活过于艰苦，何况这些青年中很多都是在城市中生活就十分困难的，家长和青年本人有所不满，本是理所当然之事。而当地党委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则是从政治入手的。党委把知青们集中起来学习了几天，强调说，这些知青中有半数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每产生一次波动，背后都有坏分子的煽动，有资产阶级势力的引诱（由此可见，从当时下乡知青的人员构成和领导对他们的做法来看，文革期间不少地区出现将知青当成坏分子加以打击驱逐的做法，是不奇怪的）。同时也承认，实际困难确实存在，帮助他们解决了超支问题。到当地向团中央送交这份报告时为止，有一部分人分得了少量现金，但仍然有一部分人要倒找钱，加上多数人的家庭副业未发展起来，每月称盐打油、理发的零用钱仍然没出处。针对这一问题，公社采取了如下办法，一是由生产队酌情少量借支；二是有山林的队允许他们每月砍两三次柴卖；三是在春节前组织他们上山砍柏千子卖

了1000元左右，公社还先后批准特殊供应他们猪肉，每次每人一斤，等等，才使他们中大部分初步稳定下来。^①

这是被作为成功经验介绍的一个例子，但明眼人都能看出，在这种处境之下，“稳定”究竟能够维持多久。

的确，对于动员城市知青到生产队插队落户一事，很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一开始就疑虑重重，至少是信心不足的。周恩来也承认，在农村就业，并不那么容易。他说，从条件来看，我国有两大弱点，第一是耕地少，不到16亿亩，在全国土地总面积中不到12%。第二，我国的森林覆盖面积也很小，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0%。所以每年要有那么多人在农村就业，也不是很容易的。^②在当时尚未完全摆脱灾荒所造成的饥饿阴影的中国农村，每年再添上几十万人，“多人多筷不多菜”，为农民造成的负担是相当沉重的，他们比起1957年的农业社时期更不欢迎这批学生，甚至称他们为“蛀米虫”。

连最基本的生活自给都保证不了，就不能算是一条“就业门路”，也就很难令知识青年安家落户，这已为上面所列举的事例和统计数字所证明。

正因为如此，到周恩来讲活之前，各地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一事，一直是阻力重重。

三 教训和经验

周恩来在向下面宣布今后要将插队作为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

① 《在劳动、生活、分配三个环节上多做工作——四川彭县楠木公社对下乡青年的巩固工作》，《团的情况》1964年第8期。

② 周恩来：《重视中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4页。

主要形式时，并没有发空议论，在1963年6月到7月召开的六大区城市精减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上，他就向与会者推荐了浙江省嘉兴县细致安排下乡人员的经验。从1962年1月至1963年6月的一年半时间里，这个县共组织了4141户、8709人下乡，插到2000多个生产队里，到1963年6月为止，这些人的生活安排基本落实，开始参加集体劳动，其中思想初步稳定下来的有8239人，占94.6%。思想不稳的200人，倒流的270人。周恩来认为，这个经验证明了，这种分散插队参加农业生产的做法是可行的，是安置久居城市的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的一种主要方式，好处是花钱少，收效大，多快好省。

重庆市团委更是具体地总结了分散到农村插队的几点好处，即1. 耕地、住房、农具和生活具体问题都好解决。2. 国家投资少，容易自给自足，见效快。3. 和农民一道劳动，易于学会生产本领。4. 安家落户易于巩固。他们在给上级的报告中谈到，1957该市市中区曾组织700多户3000多人到南桐区插社，4年来没有一户返回。他们还在长寿县进行了一下匡算：全县有6400个生产队，其中30—40%的队可以安置知识青年，如果一队仅安置一户，就可以安置7000到9000人，再加上组织自负盈亏的青年生产队和国营农场，仅在该县就可以安置1万人。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这两项经验中所提到被动员下乡并在农村巩固下来的，并不是，至少大多数不是知识青年，而是城市中合家一道下乡的精简职工，在当时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粮食、副食控制之下，一旦合家迁出，再想返城就难上加难。何况，知识青年对于生活、前途的各种希冀和要求，与成年职工也是不能划等号的。

但这类成功经验还是坚定了中央的决心。

周恩来的指示引起了团中央的极大重视，他们向党中央汇报

说，这几年来，共青团虽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与周恩来的要求相比，还是认识不足，下的力量很不够——事实上，当时不论是团中央，还是政府的各级部门，对于仍然要大量地、长期地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是思想准备不足的。

团中央向党中央汇报说，他们准备组织3个小组，分别到苏州、杭州和成都等地进行调查、试点，并马上大张旗鼓地宣传模范人物，立即同他们中的50—100人建立通讯联系，还准备于第二年“五四”时召开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便在夏秋时掀起一个热潮，虽然这些设想，后来并未全部落实，但团中央确实将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尤其是到生产队插队落户，当成了此后工作的重心。

10月下旬和11月中旬，团中央青农部分别在北京和苏州召开了两个关于动员城市青年下乡工作的汇报会。参加北京汇报会的有辽宁、吉林、陕西3个省团委和北京、天津、沈阳、长春、西安5市以及北京西山林场团总支的负责同志。参加苏州汇报会的有江苏、浙江、福建、江西4个省团委和上海、苏州、杭州、福州、南京、厦门6个市团委以及嘉兴镇团委、海宁县团委的负责同志。各地汇报的情况，虽然问题多于成功经验，但在大方向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唯一的做法，就是尽量拓宽路子，将工作做得完满些。

在苏州汇报会上，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路金栋做了总结发言。这是一篇非常实际而且很坦率的发言，我们在这里不妨让它多占些篇幅。

路金栋说，上一阶段通过动员城市知青下乡，减少了城市人口，支援了农业生产，锻炼了人才，更重要的是为以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闯开了道路。但是，过去对知青下乡的长期性，认识很不够，今后要在这方面加强。我们希望知青能在农村干一辈子，但“干一辈子”只能做为一个口号、一个号召，不要把它当做宣

誓口号，如果形成宣誓口号，压力就很大，而压力是要逐步来的，所以，宣传时还要提“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农民”。

他针对有人对插队抱怀疑态度的问题说，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大量的还是要靠插队，别的形式都容纳不了。现在各种形式都可以，大的方面各种形式都不排斥，但在思想上要清楚，主要形式是什么。不管采取哪一种形式，目的都是为了使青年在农村巩固下来。插队是比插场困难一些，但只有把这条路走通了，才能大量解决问题。有的同志反映说，下去的人仅仅巩固了一半，巩固了一半也不错，现在下乡的知青，要百分之百的巩固下来是不可能的。只要把工作做好了，今后的巩固率会高一些。要用培养幼苗一样的精神来培养青年，既要注意下乡青年自己搞，又要与农村青年结合起来，如果什么东西都单独搞，就有个特殊思想，城市知青就始终是个小圈子，这不利于他们与农民的结合。

他将座谈会上反映出的各种问题，归纳为如下几点：

1. 开始动员知青下乡，还是搞得纯一点好，品质恶劣的人，不要与好人搭配在一起，以使这条路越走越宽。这正是总结了前一阶段试点的教训。

2. 对已动员下去，又倒流回城的人，还是说服教育，动员回去，回去后不要歧视，更不要斗争，他们并没有做什么坏事，不要用强制的办法，更不要给以处分，这样可以更好地教育一些人。

3. 如果青年要求继续升学，一是说服动员，既来之则安之，二是说服不了不要勉强，还可以给他们一些方便，同时教育他们，考不取还要好好干。这样做，从效果上看，对今后的教育工作是有利的。我们上文提到，1958年初，上海市在将城市剩余人口动员到农村去的时候，就考虑过日后大学招生时，要对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予以一些优待，以此作为鼓励知识青年下乡的一个政策，但这时再度动员时，却还未曾顾及到这类问题。

4. 如果需要，下乡青年可以当会计、计工员，但要参加劳动，当领导干部，一般应该迟一点。

5. 对知青，我们提倡晚婚，但对已经出现的问题，要掌握两条，一是自愿，二是年龄相当，只要具备这两条，支持比不支持好。

6. 对于评工记分，短期内对知青照顾一些是可以的，但时间长了农民就会有意见。

7. 城市招工问题，这从一开始就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从路金栋的讲话看来，也处于两难境地。他说：不从社会青年中招工不好办，但城市招工又会对下乡知青的巩固工作造成影响。而如果都从农村招也有几个不好办，一是有些人就是不下去，逼着下去也不行；二是每年从农村招，有个往回走的问题，对农村的影响也会很大；三是每年知青下乡，国家都要付出一笔安置费，工作量很大，经济负担也很大。总之是没有找到答案。

路金栋说，总的精神应当是，作为长期工作，要有长远观点，要越做路子越宽，一年比一年顺利，而不要越做阻力越大，完全硬碰硬，关系搞得很紧张是不好的。

这篇讲话全部围绕着动员和巩固这两个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如何尽快尽多地将城市知青动员下乡，并如何让他们下去后能不再回城。这里已涉及到了这场上山下乡运动中最具根本性的一些矛盾。

首先，如团中央所希望的，品质不好、年龄太小、身体不好的人，暂时不要下乡，这在进行小量试点时是可行的，但一旦需要将大量城市青年动员下乡的时候，难道也不让这些年轻人下去吗？事实上，被学校和城市就业所淘汰的，首先就是这些人，每逢动员下乡，街道所最急于甩出去的，正是这些“包袱”。这里可以以山西省为例：

到1963年6月底为止，该省的知青安置计划，仅仅完成了

21%。总理讲话传达之后，上上下下自然紧张。8月2日，省委召开了有副省长和各有关部门参加的工作会议，要求下面将这一工作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切实加以重视和落实。为了完成计划，会议特别决定，此后安置条件不要过严，年龄要由18岁改为16岁以上，只要没病就算合格，体弱的可以在劳动中锻炼。妇女应占一定比例。此外，也可以吸收刑满释放的犯人和劳教人员。^①

这样不顾及被动员者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不给学生和家长充分的考虑和准备时间，甚至将刑满释放人员与学生一起动员下去，造成了学生和家长的强烈不满和社会上的种种混乱，也为日后的动员工作造成很大阻力。但安置任务如此沉重和紧迫，地方上也只好不择手段。这类问题的不断大量出现，甚至使社会上尤其是农村中，竟将知识青年与“社会渣滓”、“坏分子”划等号，并成为“文革”期间知青回城风的最直接原因。

再一个矛盾，是招生与招工，而以招工为最甚：国家经济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当时的水平上不予发展，国家工矿企业也不可能不招收新鲜血液，若从城市招工，势必使已经下乡的青年觉得“吃了亏”，新毕业的学生也将不肯下乡，宁可耗在城里等待分配，但从农村招工，由于知青在下乡时国家已经支付了一笔安置费，如果未过几年又回城，这样上上下下，就如路金栋所说，国家的工作量太大，经济负担也太大了。再说，国家既然希望知青中的大部分人就在农村安家落户、生儿育女，成为真正的“新农民”，那么少数人的被招工，就会影响到大多数人的稳定，是否是得不偿失呢？

将农村作为劳动力的蓄水池谈何容易，那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十年动乱期间大量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已经使这一矛盾展

^① 《山西省安置城市籍筒人员和青年学生工作会议纪要》，1963年8月13日。

露无遗，但在1963年，中央还未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

四 动员和安置模式的正式形成

上述种种，都可算是这一不同凡响的、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准备阶段，高潮是从1964年初掀起的。

一 安置计划与安置经费

围绕总方针的明确，一系列具体措施也陆续出台了，动员和安置知识青年的一整套模式终于形成，并且成为人所共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特征，在此后的将近20年间大体相沿未改。这个模式，概括地说，就是在国家的统一组织和严格计划下，在动员上采取政治运动的形式，在物质上采取由国家包下来的办法，或集体分配到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或集体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确切意义上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它确实如周恩来所预期的一样，实行了15年。

高潮掀起的标志，是1964年1月16日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发布的《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十年动乱之前关于知识青年安置工作的最重要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文件的要点是：

1. 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城乡青年结合在一起，既有利于稳定农村青年从事农业生产，也有利于更快地形成一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的新型农民队伍。也为城市未能升学就业的知识青年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就业门路。

2. 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动员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

可能的。在新社会里教育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都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革命理想，只要积极加以教育和引导，就会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勇敢地走上农业战线。

3. 必须看到这项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必须从动员、安置、巩固等方面，坚持不懈地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

4. 必须充分做好宣传动员工作，造成声势，形成舆论，号召负责干部以身作则。对城市青年动员时，既要指出这是知青走向革命化的一条广阔的道路，又要充分讲清可能遇到的困难。要坚持自愿原则。对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要交底，说明国家对这项事业专有一定的投资，不会措集体和社员的油，而且还会带来很大的好处。以消除他们怕背包袱，减少收入等思想顾虑。

5. 对下乡青年，要两三个、七八个、十几个或几十个，因地制宜地、成组地安置下去，不宜过于分散。安置的方向，主要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其次才是插入现有的国营农场。插队的地区，应当主要选择那些地多人少、需要劳力、领导力量较强、生产门路较多、有发展前途、收入比较稳定的专区、县和社、队。

6. 农村的党、团支部和生产队长，应当把下乡知青的巩固工作当做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必须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纲，抓住活的思想，抓住关键时期，经常不断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生产队应当指派有经验的老农，带领知青劳动，帮助他们尽快地掌握生产技能。要珍惜他们的每一点积极性，从各个方面发挥他们的应有作用。

7. 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拿出一笔专款作为安置经费。插队安置费主要用于解决住房问题，其次用于生活补助、小农具购置、旅运费和专职干部的工资等费用。这项经费列入各省、市、自治区地方预算，专款专用，并允许跨年使用。

8. 加强各级党委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是做好动员和组织城市知青参加农拥生产工作的根本保证。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

小组由谭震林负责，安置办公室设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内。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有任务的地、县也应由一名主要领导干部负责，组成领导小组。团中央和省、地、县各级团的组织，都必须把自己主要的工作阵地放在农村，切实地加强对农村青年工作的领导。文化教育部门 and 科学技术部门，应当贯彻面向农村、为农村服务的方针，认真做好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

9. 要求各地编制安置计划，作为整个农业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这个决定发出的同时，中央下达了《1964年安置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的人数、经费及拨款计划控制指标》，对插队知识青年的安置经费作出了具体的安排和规定。

这是在几年试点基础上，经过缜密的规划研究而做出的决定，其中特别明确了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央专门派副总理一级的领导人负责这一工作，表示了特别的重视，说明这一运动还将进一步升级。

第二，设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安置工作办公室，作为常设的办事机构，表明上山下乡从此成为国家一项固定的制度。

第三，本着周恩来多次强调的“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在具体的安置方式上，明确采取了将知青下乡的一切费用，由国家包下来的办法，以减轻来自各方面尤其是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方面的阻力，以及下乡知青和家长的顾虑。这一由国家发放安置经费的做法，遂成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并使农村生产队肯于接纳他们的必不可少的经济前提。

第四，这项工作被纳入国家经济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年的下乡人数，都由各地根据情况向中央上报，然后由国家计委汇总，确定人数后，再层层下达各省。总之，这是一场完全由国家安排的、受到国家严格控制的运动。事实上，“运动”二字只用在宣传上，国家采用的名称，是“安置工作”，这比称为运动更为

确切。

这四点，构成了此后持续十余年的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性质。

安置工作办公室的建立，始于1962年。前面说过，在当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农林办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议的报告中，就特别强调了要加强领导的问题，并指示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各中央局农办与各省、市、自治区应组成专门领导小组，设立专门办事机构。国务院的领导小组，由陶桓馥、姜齐贤为正、副组长，组员有申平、郝占元、李哲人、王耕今、惠中权、金城等人。1963年更进一步强调，要在各级领导小组下建立办公室，作为常设的办事机构。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谭震林负责，安置办公室，设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内。到1966年3月最后一次中央安置工作会议上，又进而提出，各大区安置办公室归农口领导。这一常设机构的逐步建立和健全，使安置工作得到了推行的必要前提和保证。还应提到的是，在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建立的安置办公室内工作的干部中，有相当一批人在经历了“文革”期间短暂的被打倒或“靠边站”之后，又重新进入了新成立的安置办，他们的加入，使“文革”前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具有了延续性。

关于安置经费，这里应该多说几句。

从国家开始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时候开始，就存在一个安置费用的问题。青年团中央发起组织志愿垦荒队，倡言“不要国家的钱”，其实只是一种理想，实际还是要靠国家贷款和社会募捐。1957年各地初次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落户，安家费用由家庭负担，下乡后的口粮等，则是由农业社负担的。我们前面讲过，这一做法决非长久之计，让家长解决，家长就有理由不让孩子下乡；让生产队负担，生产队也有理由拒收知青；由地方财政支出，更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总之，连第一步的动

员都会非常困难，尤其在三年灾害刚刚渡过，人民普遍还十分贫困的情况下。

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作出的《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中，国家第一次对青年支边垦荒的动员和安置经费，作出了“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解决”的统一规定，此后城市精简职工乃至被分配到国营农场的城市知识青年，也都由国家统一发放了安置经费，“国家负责”在当时已成为国家和人民双方的共识，但是对插队经费作出明确规定，还是在这个决定中，并且成为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固定模式。

安置经费采取一次性发放的方式。国家规定，这笔经费主要用于解决住房问题，其次用于生活补助、小农具购置、旅运费和专职干部的工资。与后来相比，排除物价的波动因素，还是很低的。国家最初规定在南方插队每人140元，北方插队每人185元，用这笔钱，要做到路费、住房、口粮、农具、家具件件落实，当然是不够的，所以当年5月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其具体数额为：

插队的，华北、东北、西北和山东、河南两省，平均每人225元；华东、中南、西南平均每人185元。国营农林渔场安置的，原有农场增补安置，华东、中南、西南平均每人400元，华北、东北、西北和山东、河南两省平均每人450元；农场扩建、新建安置的，本省安置平均每人900元，跨省安置的平均每人1000元；江西、福建、湖南建立小型农场，平均每人700元。林场增补安置平均每人1050元，新、扩建安置平均每人1150元。渔场增补安置平均每人800元，新、扩建安置平均每人1500元。水土保持专业队平均每人1327元。其中插队经费，的确比其他安置方式节省得多。^①

^① 中央安置领导小组，《1964年安置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计划表说明》。

这一规定，后来又小有调整和增补，具体到各省市，也不尽相同。以山东省为例，1964年规定的安置经费是：省直辖市的下乡插队知青，每人242元，回乡知青每人55元；专区辖市的下乡插队知青每人240元，回乡知青每人50元，县或镇的下乡插队知青为每人237元，回乡知青为每人45元。这一规定迄至1968年一直未改。可见该省制定的安置费标准要略高于当时中央的规定，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回乡知青也都得到了数额很小的补助^①。

这一措施的实行，尽管不能完全解除家长和生产队的经济负担，但对于缓解来自学生家长 and 农村生产队方面的阻力，保证运动持久进行下去，还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它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使国家背上了一个越来越沉重的经济包袱，到十年动乱结束时，国家花费在这一运动上的经费，已高达300个亿，所以人们盛传邓小平有“国家花了300个亿，换来了三个不满意”之语，这是一笔纯属消耗性，而不是生产性、建设性的投资，浪费是惊人的。其二，具体到学生家庭和个人，即使这笔钱足够使青年在农村安家，但由于当时农村的贫困，往往多年不能自给，此后的生活，仍是家长们一笔负担，何况这笔安置费常常用不到知青身上。因为按规定，安置费是不发放到学生手里，而部分由基层、部分由生产队掌握的^②，由于始终未能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挪用知青经费留作它用，甚至被当地干部侵吞，遂成为普遍性、长期性的痼疾，反而加剧了知青与地方的矛盾。再者，由于回乡知青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安置费，而使城

① 《山东省志·劳动志》第三章。

② 仍以山东省为例。在每人240元左右的安置经费中，发到知青手中的，主要是生活费，规定每人每月6—8元，共发放3个月。出发时由城市发给他们的锄、镰等农具和生活用品，主要是靠借用或由群众互助互济来解决，必须购置的由国家给予酌情补助。每人所能到手的安置费比例，见《山东省志·劳动志》第三章。

市下乡青年和回乡青年之间，划出一道鸿沟，造成又一种人为的不平等。

至于安置计划，从大的方面看，中共中央、国务院1965年在转发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批示中，曾经明确强调：

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下乡上山，是城乡劳动力安排上的一个方面，必须纳入城乡劳动力整体规划之中。目前在城乡劳动力安排上存在着分散现象，需要加强统一管理。^①

安置计划还与安置经费联系在一起，按年列入国家的财政预算中。具体到下面，则称之为“落实到两头”：

一头落实到城市，落实到准备安置下乡的每一个人，根据城市需要安置到农村去的人数，以及这些人的思想情况和动员工作的情况，提出分期分批下乡的具体安排。一头落实到生产队或农场，摸清由哪个公社生产队安置，由哪个农场安置，能够安置多少户，多少人，接待的准备工作做得怎样，什么时候去比较适宜。然后把这两头的安排对对口径，使城市人员下乡的安置同生产队、农场的接待准备工作衔接起来，实行城乡挂钩，地区挂钩，双方联系好，有组织地把需要安置的人员送到生产队和农场落户。^②

从1963年起直到爆发十年动乱的1966年，国家每年都要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和落实这一问题。如在1963年7月的会议上，计划当年下半年安置18万人，“要力争超过，不要减少”；1964年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1965年4月24日。

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1964年1月16日。

的计划，是安置 78.6 万余人，其中有 83% 计划安置到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1965 年的计划，是 54.3 万余人；1966 年，是 67.4 万人。除了 1966 年之外，大体上还是按计划完成了。至于中央要求各地做到的“两头落实”，实施起来则不可避免地要打些折扣。后来“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更是一度出现失控状态，此后经调整虽有好转，但再也做不到如“文革”前那样计划周密，有条不紊了。

二 促进青年革命化的重大措施

1962 年以后的特点是，经济形势的好转伴随着政治形势的日益严峻，人们已经能够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在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危险”这一思想指导之下所进行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以及在青年中以“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为目的进行的关于红色接班人标准的教育，都为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涂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以致至今仍有人认为，这就是毛泽东为改造一代人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而忽视了导致运动兴起的最根本的经济原因。

这种政治气氛笼罩了方方面面，对于知识青年来说，理论是这样演绎的：首先，既然沾了知识二字，就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就有改造自己的必要，改造的唯一途径，就是毛泽东早已指出的，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结合的方式，首先是进行体力劳动，而体力劳动，以当时人们的正确理解，就是农业劳动——只有从最脏最累的体力劳动做起，才能了解劳动人民的感情，才谈得上热爱劳动人民，才乐于为他们服务，这是“屁股坐在那一边”的最根本的阶级立场问题，也是革命化的第一步。而在当时，要想在社会上成为一个正式公民，有户口，有饭吃，就必须是革命的，因为按照当时的逻辑，不革命的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是要被专政、被

制裁，为社会所不容的。当时人们的思想，就是这样简单和不可思议，而当时的青年，又哪一个不是从心底里认为，自己是要革命的呢？

上山下乡是革命的，有着光荣的远大的前途，待在家里，则是不革命的，就没有前途，当学生和家长都逐步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一运动，就已经带有了某种政治上的强制性色彩。

这种特点贯彻在安置工作的方方面面中，城市的动员工作推动不下去，往往会被说成是知青本人或家长被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甚至是有“阶级敌人”在暗中破坏捣乱。而当知青下乡之后，首先要对他们进行的，是阶级斗争的教育，当他们遇到各种困难而思想不稳定时，要追查根源，尤其是阶级根源。我们上面曾提到四川成都一批青年到楠木公社进行插队试点时，产生过4次波动，而每一次，就都被公社党委归咎于坏分子的煽动和资产阶级势力的引诱。

团中央曾总结这一做法说，过去动员主要从精简城市人口、安排就业出路方面宣传，动机也的确主要是找出路，现在强调要发扬革命精神，就使青年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转变。所言不虚，在开始的时候，这种宣传，对于满怀革命热情的进步者，是非常鼓舞人心的，而对于并不情愿下乡的“落后者”，又造成一种无形的政治压力，这都相当有效地推动了运动的开展。

1964年4月6日，共青团中央召开座谈会，讨论和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决定，并于会后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①，这一报告已经明显表现出了要将政治运动的方式贯彻于

^① 《高举革命的旗帜，做好下乡上山知识青年的工作，共青团中央召开座谈会，讨论在做好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工作中的任务》，《中国青年报》1965年4月6日。

全部运动的精神。

报告回顾了1955年以来知青上山下乡的情况，认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确实是建设现代化农业、进行农村文化革命和促进知识青年革命化的重大措施。表示共青团中央一定要以最大的决心和力量，协助党做好这项工作。

报告对当时的一代城市青年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说他们一方面生长在和平建设时期，缺乏艰苦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也受到旧社会轻视农业观念的一定影响，有不少人对于到农村去，不容易一下子下定决心。但另一方面，他们多年来接受党的教育，有理想，有志气，识大体，肯听党的话，是愿意为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而英勇奋斗的。

具体到动员，报告提出，这主要是一项政治工作，要实行五个结合和五个为主，即：轰轰烈烈的宣传运动和精雕细刻的个别发动相结合，以个别发动为主；临时的集中动员和经常的教育相结合，以经常教育为主；自上而下的教育和群众自我教育相结合，以自我教育为主；动员青年和说服家庭相结合，以动员青年为主；政治动员和必要的物质保证相结合，以政治动员为主。报告特别说到，有的地方用物质引诱和欺骗的方法，到处许愿，又不能兑现，结果引起青年反感，给以后的动员和巩固工作带来麻烦，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知识青年下乡之后，农村共青团组织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帮助他们锻炼成长。要做好几件工作：一是不断加强青年的社会主义教育，阶级教育，不断解决思想矛盾。要上阶级和阶级斗争课，讲“四史”，要善于根据知识青年思想波动变化的规律，抓青年活的思想，不失时机地进行教育，坚定他们“在农村干一辈子”的思想。二是热情地帮助他们掌握劳动技能，养成劳动习惯。在最初半年到一年内，生产队要把他们当学徒看待，不要把他们当强劳力使用。三要经常关心他们的生活，帮

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从烧火、做饭到喂猪、养鸡，都要把着手教。下乡青年没有家底，要达到生活自给有余，一般得三五年时间，生产队要多方面帮助他们增加收入，尽快自给。有不少女青年早婚，对她们的进步影响很大，应该加强晚婚节育的教育。有的地方发生过逼婚、骗婚、侮辱妇女的现象，应当及时处理，并防止今后再发生这类问题。四是关心他们的学习和进步。要有计划地组织青年自学，组织他们上业余学校或广播、函授学校。凡够团员条件的要及时接收入团。对于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华侨青年，更要抓紧教育，不要在政治上歧视他们。五是关心他们的娱乐和休息，活跃他们的生活。

报告也注意到了怎样才能使下乡知识青年真正发挥作用的问题，认为这是有关培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后备骨干的一个大问题，也是知识青年十分关心的问题，只有当他们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既用上体力，又用上文化科学知识，各得其所，各展所长，确实看到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又真正大有可为时，才能牢固地把根扎在农村。可以组织下乡青年参加一些工作，但选拔做领导干部，最好等他们已参加了一定时期的劳动，已与农民有了一定的联系之后再说。

报告要求，凡是有动员和安置知识青年任务的地方的团组织，都要认真抓好这项工作。报刊要不断地宣传下乡、回乡青年中的先进典型，树立榜样。今年“五四”前后，各省、市、自治区团委可以召开一次知识青年代表会或下乡青年积极分子会，以便推动今年夏季的下乡高潮。

从公开的宣传来看，这已经完全是一场政治运动了，此后，随着全国政治形势的越发紧张，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宣传调子，更是日益升级。我们可以从1965年元旦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路金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广播讲话中摘选几段作为例子。

这篇讲话第一段的标题是“你们走的道路是斗争的道路，革命的道路”。他要求知识青年在动身下乡之前和在农村遇到困难之后，都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对待这些问题：

党号召你们走革命化的道路，下乡上山同农民相结合，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力量。而资产阶级和社会上一部分落后势力，包括你们中间一些人的家庭在内，却向你们散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引诱你们走另一条道路，同革命化背道而驰。引诱无效时，他们又采取各种手段阻拦你们，向你们施加种种压力。值得称赞的是，你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党所指引的革命道路，取得了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但是，这并不是最后的胜利，斗争仍在继续着。到农村去以后，广大农民，首先是贫下中农，热情地欢迎你们，接待你们，帮助你们，鼓励你们，希望你们成为他们的人。农村的地富反坏分子和一部分落后势力，想挫伤你们的积极性，讽刺你们，打击你们，甚至企图拉拢和利用你们。因而在一部分人中，引起了思想上的波动。

他重点向青年阐述了“参加农业劳动就是革命的”这个命题：

当然，一个知识青年，如果有机会到工厂去，直接同工人结合，向工人阶级学习，那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不仅现在，就是将来，知识青年也不可能都去从事工业劳动，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劳动，是知识青年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同农民相结合，是知识青年同工农相结合的主要形式和途径。

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农业第一线，同农民一起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就是革命。是去革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的命，革农业落后的命，革农村文化落后的命。你们还将在与天斗争、与地斗争、与人斗争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又是革自己的命。知识青年的劳动化，是知识青年革命化的重要内容和条件……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弄清楚……如果你们在农村，只是为工分而劳动，不问政治，不分敌我，不站在贫下中农一边，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反对资本主义道路，那你们就是不革命的，甚至可能反革命。这一点，是值得你们时常警惕的。

在第二段“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中，他劝导知识青年不要“念念不忘升大学”，要对自己作实事求是的估计，还批评了那些下乡是为了“镀一镀金”以取得一点实现个人目的的资本的想法。他说：

由于同工农相结合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又由于脱离了工农而返回到不革命或反革命的道路上去，这样的知识分子，过去有，今天有，将来也还会有。因此，你们不仅要记住毛主席指出的“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民众相结合”这个唯一的标准，而且还要记住“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这个中肯的告诫。一定不要中途停顿，停顿是要落后的；更不要半途而归，半途而归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希望农村的知识青年，都能够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朝着革命化的目标奋勇前进。

最后他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任务，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青年的任务，就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把我国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农村，是你们的课堂，是你们的战场，是你们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①

^① 路金栋：《在知识青年革命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中国青年报》1965年1月7日。

花费如此长的篇幅引用这篇文章，是因为文中所述的理论非常具有代表性。此后不久，共青团中央又在部分省、市团委干部座谈会上，将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说成是“一件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工作，是一项世代绵延(!)的长期工作”。^①它对团的各级干部提出要求说：“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决不像有些同志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安置工作，而是一项重要的革命工作，是我们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②这一切，都为“文革”期间对上山下乡的宣传，定下了一个极“左”的基调。

五 从集体插队到“集体户”

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这一大方向已经明确了，但插队的形式也有多种，采取哪一种最好呢？这是城市青年到农村后能否巩固住的一个关键问题。

1957年首次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时，并没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第四章提到，知识青年挤住在农民家庭中，与农民同吃同住，不可能不妨碍双方的生活，侵害双方的利益，这绝不是靠思想政治工作能够解决的问题。1960年以后各地组织青年到农村插队时，团中央提倡的是“不拘一格”，要各地对哪种形式都不要排斥，好的形式会在实践中慢慢产生出来，所以采取的方式多种多样，集体插队，也是其中之一。

集体插队，后来已经成为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主要形式，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甚至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孰不知在当时，这竟也算得是观念上的一个小小突破。因为只要下乡，就要与

① 《高举革命的旗帜，做好下乡上山知识青年的工作》，《中国青年报》1965年4月6日。

② 《共青团组织要把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工作抓起来，抓到底》，《中国青年报》社论，1965年4月13日。

农民实行“三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与他们结合，这一从延安时期就已经延续下来的传统，在有些人思想上已是根深蒂固，他们看不得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青年学生下乡之后还“抱团儿”。有人虽然看到集体插队有诸多便利，但也认为它至多只能是一种过渡形式，时间不能太长，长了不利于同群众打成一片，不利于他们本身的改造。他们认为，知青终归还要成家立业，生活以家庭为单位。再说，青年集体住在一起，像个什么呢？既不算家，又不算个户，他们强调说，只要这种形式存在，临时思想就会存在，因此，这就叫“两步走”吧，第一步可以这样走，但还是要第二步，即慢慢地向成家落户过渡。

但是青年欢迎这种形式，当他们突然置身于一个陌生环境的时候，“抱团儿”乃是人之常情；负责具体工作的干部也因为这样便于管理，而乐于采用这种方式，浙江嘉兴县在1963年总结的经验中就曾建议，单身青年最好采取三五人集体插队的办法，以便互相照料生活。农村社员对此举更是欢迎，重庆市团委向团中央的汇报中就曾说过，社员的意见是，最好一户一户地搬下乡，或者三五人结成一个小队，自己开伙，不要单个地插在社员家里，因为这可以大大减轻他们的负担。于是，就像团中央所说的那样，“好的形式在实践中慢慢产生出来”了。

1961年，已经有些地方将单身青年三五个人，七八个人组织在一起，集体安置到生产队里，吉林叫“青年集体户”，福建叫“青年志愿队”（如厦门市就于1962年8月组织过一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青年志愿队”，一共26人，高中生18人，大专生1人，初中生2人，小学生5人，分两个队到同安县集体插队落户），后来这种名称被统一起来，取了一个新名字，叫“集体插队”，从此便一直沿用下来。

1963年团中央书记路金栋在各地汇报知青工作的总结会上，对于集体插队，也表示了赞同，他说，插队也有几种插法，青年集体插形式较好，四五人，六七八人搞一个小集体户，集体生活，分

散劳动，青年赞成，中央安置工作小组也赞成。青年下乡人地生疏，集体生活可以互相照顾，有些分工。

在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提到了对下乡青年，要两三个、七八个、十几个或几十个，因地制宜地、成组地安置下去，不宜过于分散的问题，这是中央对集体插队形式明确表示的肯定。决定公布一个月之后的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辽宁省下乡知识青年集体插队的经验和浙江省嘉兴县细致安排下乡知识青年的经验，并且为此发表了社论《继续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两个经验各有侧重，前者即辽宁省的经验，旨在向全国提倡和推广集体插队的形式，它强调了两个问题：

1. 集体插队的好处。

辽宁省从1962年起就采取由十几个、二十几个青年集中安置在一个生产队（或为他们单独成立一个生产队）的方式，组织城市知青下乡，他们在生活上安排集体伙食单位，在生产上与老社员一起劳动，在组织上配备一定数量的骨干力量，加强领导。他们总结了这样做的几大好处：

第一，可以充分发挥青年的突击作用，有利于发展生产。

金县三十里堡公社台子大队梨树沟生产队，地处山区，多种经营条件很好，生产潜力很大，但全队只有27个劳动力，生产潜力得不到发挥。去年春天有27名城市知识青年到这里插队，增强了劳动力，全队500亩耕地不仅做到铲趟及时，而且锄了四五遍，还新栽植果树600多株，新修梯田740多丘，集体积肥和副业收入也比上年增加两三倍，说明下乡知识青年只要加以正确的组织领导，就可以在生产劳动中发挥巨大力量。

第二，便于安排生活。

这批下乡青年具有较高革命热情，但是缺乏独立生活经验，由

国家和公社生产队帮助他们建立集体伙食单位和集体宿舍，他们就不致为吃住问题操心，可以更好地劳动。海城析木公社羊角峪大队安置了18名中学毕业生，大队根据这些青年缺少独立生活经验和全大队居住比较集中的特点，采取集中食宿，分散在4个生产队劳动的办法，安排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最多的一个队6人，最少4人，既适合青年特点，又为生产队所欢迎。由于安排生活好，这批青年和家长都很满意。

第三，便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便于组织下乡青年进行政治、技术、文化各方面的学习。

凡是组织下乡青年集体插队的地方，有关领导部门都抽调比较强的领导骨干带队，并且负责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开原县上肥地公社腰堡大队，1962年有38名下乡青年集体参加生产，大队党支部把他们组成一个青年队，派共产党员、转业军人金元柱为队长，公社党委又派团委副书记蔡庆青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做思想工作。这批青年两年来在劳动锻炼中表现都很好。

第四，因为集中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文化娱乐活动开展得好。

2. 对插队地点的选择问题

这一点将这场运动之由国家计划、国家组织的特点，体现得再充分不过。“文革”期间“老三届”知青下乡时正值一片混乱，谈不上什么选择地点，就曾因此而出现很多问题。

这一问题对于回乡知青和以投亲靠友等方式下乡的知青，都是不存在的。而此时插队人数将持续地、大量地增加，对于地点的选择，就必须有所计划和安排。这里要考虑的，主要是两方面的承受力，一是知识青年，至少要让他们能够生活下去，能达到中央希望的在几年内生活自给的目标；一是当地生产队，至少要让社员不感到自己的生计受到严重威胁（一点没有影响当然是办不到的）。此外，还有些其他考虑，所以中央曾规定：“重灾地区

或回乡人员多，劳动力已达到饱和程度的社、队，暂时可不安置。对不同的插队地区，还必须考虑到插队人员的不同条件：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一般只宜安置少数民族下乡插队的青年；对边疆地区，必须切实保证下乡插队青年的政治质量。”^①

在这里，中央又推荐了辽宁省的经验，即注意结合本省治碱、治山、治水，以及建设商品粮基地等发展生产的实际需要，把下乡知识青年集中安置在急待开发又能较快获得收益的山区生产队，地多人少迫切需要劳动力的平原生产队，果树和蔬菜等专业队；在地多人少、发展生产条件较好，而当地生产队又无力发展的平原或山区，则组织青年在国家和公社的扶助下，集体垦殖和开发，建立新的生产队。

《人民日报》还发表按语，对这一经验加以具体阐释，说“插队”落户的方式，主要应当是根据各地发展农业的长远规划，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每省选择若干有条件的县，每县选择若干有条件的公社、生产队，对下乡上山的城市知识青年作适当集中的安置，每个队可以安置几名到几十名，像辽宁省金县三十里堡公社台子大队梨树沟生产队那样，让下乡知识青年集中“插队”，集体生活，一下子就安置了27名（按实际上，最初安置到梨树沟的知识青年共35名，到1963年，有3人在当地结婚，1人当兵，1人投亲，1人因病死亡，还有1人不安心，所以只剩27人）。梨树沟生产队的这个经验表明，在人少地多、需要劳动力的地区，在有重点有计划地扩大旱涝保收田的地区，在需要治山、治水、治碱的地区，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让下乡的知识青年集中插队发展农林牧副渔各项生产事业。梨树沟的经验还表明，集中插队的好处是很多的。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1964年1月16日。

这是有关知识青年集体下乡插队的较早的完整经验。

紧接着，宣传集体插队好处的活动在全国迅速展开。5月，《中国青年报》刊载了吉林、辽宁知识青年下乡集中插队的经验，并就此议论这一经验的好处，说集体插队既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于发挥青年在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中的作用，也适应青年喜欢过集体生活的特点，便于进行政治、文化学习和集体安排生活。这篇评论还强调，这么多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插队落户，给团组织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

10月，《人民日报》又发表短评《向集体插队的知识青年致敬》，在再次历数集体插队的各种好处的同时，要求各地要慎重挑选、配备和培养集体插队的小组长，培养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它还将集体插队这一形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说这是“加速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加速知识青年革命化、劳动化的根本措施之一”，这固然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虚张声势的弊病，但是，集体插队这一组织形式的确立，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上的意义的确是不可小觑的，它使得在农村大规模地安置城市知识青年成为可能，使城市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得以跨出了最难跨越的一步，标志着国家的安置工作已经走向成熟。

国家并未就此止步。1966年初，就在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前夕，《人民日报》又向全国推广了长春市知识青年下乡的组织“集体户”。

“集体户”与一般所说的集体插队之区别，主要是它的相对集中性，它的人数基本上在十余人以上，建户地点在生产大队而不是生产队（当时人民公社的三级组织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这是一个很容易为人所忽略，却又至关重要的改变。当时一些人对知青下乡后还自成一体已经很看不惯，更何况又进而集中扎在大队，因此，这一经验在“文革”中曾被说成是有意阻止知

青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阴谋，而受到批判^①。我们如今当然可以置这些极“左”滥调于不顾，事实上，这种相对集中，对知青和农民双方，都有着莫大便利。

长春市的经验说，将在一个生产大队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立为一户，让他们生活、学习、劳动在一起，符合青年愿意过集体生活的特点，有利于帮助青年克服生活上的困难，有利于从事科学文化活动，也有利于上级组织对他们进行管理和教育。

经验进而阐述说，集体户的意义在于，首先，它是青年的安置基地，也是城市输送学生下乡的主要渠道。集体户就是青年的家，经过一段时间，有人结婚，有人入伍，先来的走了，新人又不断加入，一批接着一批。长春二中1962年曾有27名初中、高中毕业生组成集体户，到吉林农安县黄金公社裴家屯生产队安家落户。此后又不断向这里输送学生，到1966年为止，已达41名，加上单身插队后加入的，共有80多人，有些家长也跟着迁到农村，帮助青年料理生活，操持家务。^②

其次，集体户还是学校的劳动锻炼基地。几年来，学校组织了200多名师生到该基地参加劳动锻炼，请下乡的毕业生与在校学生座谈参加农业生产的体会，一方面能够有效地对在校生进行上山下乡的教育，一方面能使学校及时与生产队和已经下乡的毕业生保持联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① “文革”期间有文章批判这种“集体户”说：“一小撮资产阶级指责贫下中农对知识青年‘安置不当，照顾不好’，需要‘居住集中，单独劳动，活计还得轻’，‘新、老农民不要混了群’，而大建所谓‘青年点’。土城子大队6次派贫下中农进青年点办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都受阻挠没有办成……”又说，“‘文革’开始后知青再次到这里插队时，就打破了‘大队建点’的规定，把点建在生产队里，或十几个人插到生产队（意即不建青年点）。”见辽宁省新金县革委会：《下乡知识青年必须由贫下中农给以再教育》，《人民日报》1968年12月6日。

② 《有计划地把城市青少年导向农村——长春市管理教育城市青少年的经验》，《人民日报》，1966年4月4日。

经验中宣传的把有知识青年插队的地方当成生产、劳动基地的做法，对于与农村接触密切的中小城市，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有益的方式，但对于北京、上海、天津这类大城市，组织集体插队的地点远在内蒙古、山西、安徽，就未免有些可望而不可即了。这一经验之真正的可取之处并不在此，而是在于将一群青年作为一个“户”插在大队里，可以使很多过去难于解决的问题，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途径，其前提就是国家发放的安置费用得以相对集中。

以住房问题为例：我们多次提到，这是个从1957年初次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开始，就困扰着知青、农民，和有关负责干部的问题。在1963年的安置工作会议上，根据嘉兴县的经验，提出要分别采取挤、借、租、让、建等办法，解决下乡知青的住房，显然是尚未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①在当时的报刊上，时常可见赞扬青年与老贫农挤住在饲养室，或集体住在茅棚里的报道，透露了他们生活之艰苦。1964年初国家开始为插队知青发放安置经费，并明文规定这笔费用主要就要用来解决住房问题，但按照一个生产队分散下去两三个人，三五个人的插法，区区几百元的安置费，一间像样的房屋也难以搭盖起来。而将安置费集中起来建立知青的集体宿舍，从道理上说，这一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我们说“从道理上说”，一是这一经验刚一出台就逢动乱，并未在实践中得到较大范围的验证。“文革”期间知青插队，组织工作已比不上当年细致，对这一问题，也再无系统的总结和经验；二是它的实行，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即安置经费能切实发放到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又切实能用到知青安置工作上；再有，是知青的确能如中央所期望的那样在几年之后生活自给，待到达结婚年龄

① 《关于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的报告》，1963年7月30日。

时，有能力自己建造新房。后来的事实说明，漏洞往往就出在这两个问题上。

六 为农村基层组织树立的典型

嘉兴县位于长江三角洲上，是著名的稻米产区。我们在本章第三节中曾提到周总理曾亲自向全国负责安置工作的同志推荐过这个县的经验，1962年2月16日，与上述辽宁省组织知识青年集体插队的经验一道，《人民日报》又以《浙江省嘉兴县细致安排下乡知识青年的经验》为题，再次肯定了这个县的经验。但这次《人民日报》所说的下乡人员，已不再是上次所说的城市精简人员，而是自1962年以来陆续由上海、杭州、嘉兴等城镇到嘉兴县农村安家落户来的知识青年了。嘉兴已被进而培养成一个安置插队知识青年的典型。

树立这样一个典型无疑是十分必要的。知青所下地区的干部对知青采取什么态度，具体地说，对他们下乡是欢迎还是排斥，他们下乡后对他们是予以安排管理，还是不闻不问，即使加以管教了，方式是否得法，都是关系到知青在当地能否巩固的关键。哪一个环节出了纰漏，都可能使城市中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所精心组织的动员工作毁于一旦。这里所说的“地区”，指的是有接收知青任务的县和县以下各级党、团和行政组织。

到嘉兴插队的知识青年，此时已达2390名，其中有新近从学校毕业和前几届毕业的学生，也有社会知识青年。据经验称，嘉兴县的党政领导部门为他们的下乡落户，进行了一系列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首先，是建立健全领导机构，县、镇和公社都建立了安置工作办公室，设置了专职干部，中共嘉兴县委确定一个副书记专管这项工作。我们上面提到过，国家拨给下面的安置费中，就包括

这类专职干部的工资。安置办后来便成为地方上管理知青工作的实权机构。

他们做的具体工作包括：

1. 坚持先安置后下乡的原则，事前和公社、生产队联系，把知识青年下乡后的劳动问题、生活问题、学习问题都安排妥当，才让他们下乡。

2. 做到住房、自留地、口粮、农具和家禽“五落实”，使下乡青年处处感到到队如到家。

3. 关心已经下乡的青年的劳动和生活。有些社和生产队组织有经验的农民带徒弟，让这些青年边做边学，效果很好。有的青年已经成为农业生产上的新生力量。有关部门还曾根据各个公社的需要，为他们举办过抽水机手、电力灌溉机手、生产队记账员等训练班。

4. 知识青年在农村也受到很好的阶级教育。不少公社和大队的贫下中农向青年讲家史、村史和社史，收效都很好。

5. 为了及时发现和解决下乡青年中的问题，县各级领导部门还经常检查知识青年下乡落户工作，并派人访问下乡的青年，听取他们的意见。1963年底县里就抽调干部深入农村，进一步了解了下乡青年的思想、劳动和生活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具体问题。各公社还以大队为单位召开了下乡人员会议，总结前一段工作，制订新的工作计划。这其实就是中央对下面要求的一个具体图解。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承认，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件十分艰巨繁重的任务，必须做好细致的具体安置工作。它强调：

要做好动员和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重要的经验之一，是各级党委要切实重视，认真加强领导。嘉兴县委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我们希望各地党政领导机关，特别是县一级的领导机关，能够按照

具体情况和具体条件，努力做好这项繁重而细致的工作，特别是采取集中“插队”办法的地方。

这篇社论还特别赞许了嘉兴的“五落实”和讲“三史”（家史、村史、社史，是当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大搞阶级斗争时最常用的做法）等经验。

时隔半个多月以后的2月28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社论《热情关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其中再次提到了嘉兴的经验，说到嘉兴插队的知青中大多数已在农村定居下来，不少人去年做的劳动工分，已经接近或超过一般社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县级领导部门非常重视，如此反复强调，说明中央看到了领导的是否重视，是这项工作能否搞得下去的关键，同时却也透露出，如此强调，正是因为各地干部对这一工作并不重视。他们既然看不到知识青年下乡对自己这一方土地有什么明显好处，又凭什么要重视呢？何况，以当时农村干部的素质而言，对这帮受过学校教育的小知识分子们，即使想要加以重视，又如何能够胜任呢。

这套党委负责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动员和安置工作的经验，一直沿用到70年代末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却自始至终没有、也不可能得到真正落实。事实上，这一直是整个知青工作中最薄弱的环节。

1964年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城市知青集体插队行动，是由天津市搞起来的。中央的决定1月发出，3月份该市就与河北省宝坻县（当时属河北省，今属天津市）建立了联系，同时以滞留城市的社会青年为重点，展开了声势空前的宣传动员。当时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也专程到天津郊区和河北省宝坻县、蓟县、遵化县农村以及唐山市，不仅多次与下乡知识青年座谈，还访问了著

名知青典型王培珍、侯隽等人的家，一连发表了几次重要讲话。4月中下旬，天津市各街道的4300多名社会青年，分批下到宝坻、蓟县、武清、宁河、遵化等5县，做了周到细致的各项准备的各生产队，对他们进行了妥善安置。团中央以“宝坻县是怎样一次安置2300多名下乡青年的”为题，向全国推广了他们的做法，重点表扬了他们两点，一是注意贯彻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下乡青年绝大部分住到了贫下中农的家中，各大队党支部普遍对他们进行了“三史”（即村史、队史、家史）教育；二是夸赞他们群众动员工作做得好，住房锅盆都事先准备妥贴，接待热情，有人帮助管理伙食，指导知青做饭。而且安置知青的10个公社，大多是人多地少，有改造洼地任务的地方^①。宝坻县从这时起就开始以知青工作先进县的形象名扬全国，在“文革”10年中到了尽人皆知的程度。

另一个动作较快的是江苏省。南京市第一批知识青年733名于5月就已准备动身前往江宁、盱眙等县集体插队，他们中间因为有一批品学兼优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自愿放弃高考加入进来，而受到世人瞩目，也备受有关部门的宣扬和鼓励。同月，南通、苏州、常州等地的首批集体下乡知青也陆续出发，人数多在几百人上下。到当年10月，全省下乡的城镇知青已达18400余名，其中16000余人是到农村集体插队。

据中央统计，1964年的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共计32万余人，其中到农村生产队落户的，占75%，这里当然还包括以投亲靠友等方式下乡的人，但集体插队的人数，仍然十分可观。

^① 《天津唐山两市向河北输送新生力量》，《中国青年报》1964年8月31日，并见《团的情况》1964年第11期。并参见胡克实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1964年5月30日。

第八章

知青群体的形成

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成为国家的一项专门工作，随着它作为一项政治运动在全国的普遍深入展开，“知识青年”逐渐成为社会上公认的专用名词，取代了以往常用的“中小学毕业生”、“青年学生”等说法。

自从国家为下乡上山的城市青年学生发放安置费之日起，“知识青年”这个名词，就开始有了明确的限定，它特指原来持有城市户口，下乡时享受国家给予的安置费待遇的青年学生。从下乡前的身份说，它包括了应届毕业生和以往毕业后未能在城市就业的“社会青年”；从上山下乡的去向说，则包括了到国营农场的青年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新社员，以及到生产建设兵团和边疆各农场的以往的“支边青年”。

过去所常常使用的“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一词，已经被“回乡知识青年”代替，“知青”与“回乡知青”二者在宣传中并无区别，但在政策与待遇上，却有着严格的区别。回乡知青既然不享受国家的任何照顾，它的概念就宽泛多了。

与50年代的“中小学毕业生”相比，知识青年的文化水平已经大大提高，绝大部分都是中学毕业生，高中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年龄却有所下降，应届毕业生基本都在15到20岁之间，来自社会不同阶层中形形色色的家庭。

知识青年，从此作为社会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载入了史

册。但还要指出的是，在十年动乱之前，它还不是一代人的代名词，它的人数和影响，都还是相当有限的。

一 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

即使是“文革”期间下乡插过队的人，也有很多并不知晓“文革”前就有过知青和上山下乡，但是，只要向他们提起邢燕子 and 侯隽，他们马上会点头说，知道知道，看来，知青还真是早就有了。

知青典型并不“典型”，他们未必全都是知青中最优秀的人物，但知青这一群体却的确是因他们而闻名。

我们前面已多次叙述过这些先进人物，但典型已成为知青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则是60年代中央将上山下乡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之后的事。

从知识青年中物色先进典型作为榜样，已经是动员知青下乡的传统做法，我们在第六章曾经提到，三年灾害时期再次动员知青下乡时，邢燕子、王培珍的名字一下子传遍全国，对动员工作曾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1963年10月周总理发出“要长期地抓紧城市青年下乡的工作”的指示以后，团中央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要大张旗鼓地表扬模范人物，立即同他们中的50到100人建立通讯联系。拟在明年“五四”召开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便在明年夏秋掀起一个热潮。^①

^① 《团中央书记处关于贯彻执行周总理对团的工作指示向中央的简报》，1963年10月23日。

可见这种“以典型带动一般”的做法在他们已是轻车熟路。典型是人为树立起来的，这一做法在当时不仅不为人们所讳言，而且还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中国青年》杂志的社论就曾明确提出：

做青年工作大抓典型很重要。因为典型，都是活人活事活样板，既有先进思想，又有先进事迹，都是生动的具体的形象的东西，对青年最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也最容易被青年所接受。我们团组织是做教育青年工作的，当然应该经常向青年讲革命道理。但是教育青年光靠讲道理是不行的，一定要给青年树立各种活的典型。……这样来抓典型运用典型，是突出政治的一种工作方法。^①

这已经把树立典型的作用，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树立典型的具体操作这时也已系统化，一般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根据上级布置的任务来发现典型，阐扬它的重大意义；第二步是发现之后，立即深入下去，抓住不放，反复落实，反复推广，使之在广大青年中造成深刻影响。50年代最早出名的知青先进人物徐建春和60年代初的邢燕子，就是这样被反复宣传而树立起来的。直到“文革”以后，每当动员知青下乡时，各种宣传媒介都要将她们再次抬出来。这时的她们，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了。

从1963年开始，树立典型的活动达到了最高潮，甚至“文革”期间树立的典型，其广泛性和家喻户晓的程度，也无法与之相比。这一时期典型的突出特点，是“全面开花”，几乎每一时期，每一地区，每一类型的下乡知识青年，都有典型被树立，被各种宣传媒介“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是一个经全局性的周密部署而形成的知青先进群体。十年动乱期间树立知青典型的活动，则因缺乏这样有效的运作而显得零乱、没有章法，再因政治局势的动

① 《中国青年》，1965年第14期。

荡不定，难以对典型加以反复推广、反复宣传，后期更有一些典型陷入政治阴谋之中不能自拔，或者索性就是为某种政治阴谋而树立起来的如“白卷先生”张铁生，彼时再想造成60年代这样轰轰烈烈的宣传攻势，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应该承认的是，先进典型中很多人，下乡前就是学校的好学生，或是品学兼优的“三好生”，或是班级和共青团的学生干部，所以在学生和青年中具有相当的威信。听党的话，心甘情愿为党的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是他们共同具备的品质。每次动员上山下乡，各地党团组织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注意挑选这样的学生，动员他们带头，作为一批下乡青年中的骨干，他们是听话的，很多人就此自愿放弃了升学的念头。在从上海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中，就有相当一批这样的“三好学生”和团干部。他们往往还未离开城市，就已被树立为先进典型，被宣传为这一批青年的代表和榜样。由于他们原来所具有的威信，也因为他们确实有高于一般下乡青年的文化和思想素质，所以这样的典型，对青年是能起到作用的。

但是他们自己，却付出了青春甚至一生的代价。因为绝大多数典型并未能如邢燕子、侯隽那样闻名全国，他们下乡以后，往往就混同于普通知青，经历着与普通知青并无不同的失落、波折和磨难。所不同的，只是与其他知青相比，思想上的落差更大而已。

宣传先进典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召开先进知识青年代表会议。

早在50年代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曾采用定期召开回乡知青代表会或座谈会的做法，使各级领导得以听取回乡知青从下面反映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同时也为各自居住于偏僻乡村的知青提供一个活动和交流

的场所，本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形式。后来一些地方利用这个机会表彰先进知青，结果发现比起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更能扩大宣传面，也更易引起上级的重视。我们在第一章曾经谈到，早在50年代，吉林省在宣传吕根泽这个全国典型时，便同时在该省13个县培养了185个先进人物，并为此而召开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此举作为先进经验公开推广之后，各省纷纷仿效。1954、1955年前后，山东、河南、湖南等很多省份都召开了这样的大会，其中湖南召开的全省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的回乡知青代表有250人，当时的全国著名知青典型如山东省的徐建春、广西省（当时还是省）的邓祚荣和广东省的杨明汉等纷纷写信向大会祝贺，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影响。1954年12月，1955年青年团中央组织北京、天津和黑龙江等地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萝北垦荒，翌年黑龙江省就召开青年垦荒积极分子大会，以作为对这一影响到全国的垦荒运动的一次检阅。在1955年9月，徐建春等14名参加农业生产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还在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期间举行会议，动员回乡生产的青年们投入扫盲等活动中去。1957年，中央关于动员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决定刚一作出，河北省就召开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团中央为此发去了贺信，这些做法，造成了一股轰轰烈烈的声势，对青年起到巨大的鼓动和感召作用，推动了动员工作的开展。

1963年团中央在全国大规模宣传知青先进典型的同时，也再次运用了这一宣传形式。团中央青农部工作组在“农村知识青年工作的几个问题”中提到，召开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对知识青年进行工作的一种很好的形式，值得提倡，这表明党和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和鼓励，是很好的宣传。他们还曾打算在第二年也就是1964年的“五四”青年节时，召开一次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后来未得实施。但想将规模

和声势搞得越大越好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

此后，各省纷纷召开了旨在造动员声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每一开会，省一级最高领导必然到会并且讲话，各路先进知青代表云集省会，介绍经验，老典型得以亮相，新明星得以推出，在一番热闹的背后，浮夸、虚假、形式主义的因素也越来越多，除了作为动员知青下乡的一种宣传之外，也成为各级领导向上级表示对此项工作之重视并进而表功的方式。而占大多数的普通知识青年在农村所面临的各种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却往往因此而被掩盖了。

从1963年到1966年上半年，各类报刊上对此类会议的报道层出不穷，这里就不再具体举例了^①。

新的先进典型往往通过这种大会被“打出”，已经出名的则通过参加大会而增加知名度。这种大会是知青明星的活动舞台，知青明星的参与也为大会增辉，二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做法，被作为成功经验传下来，一直沿袭到“文革”期间知青大规模下乡之时，并最终成为完全形式主义的东西而受到知青的普遍厌恶。

二 青春无悔

我们在这里先介绍当年在政治舞台上极为活跃的两个人物：董加耕和侯隽，这是中国知青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笔。

1. 侯隽

她和邢燕子，是知识青年典型中保持令名最长久，因而知名度也最高的两个人。

^① 关于这一阶段各省召开的知青代表大会，可参见刘小萌、定宜庄等，《中国知青事典》有关条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侯隽，1962年于北京良乡中学高中毕业。她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工会干部。少女时代她也曾有过各种各样的理想，当时党号召全国人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她受邢燕子、王培珍等榜样的鼓舞，决心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她在农村无亲无故，便与一个同学一道，下到了那个同学的老家河北省宝坻县史各庄公社窦家桥大队。从我们前面的叙述就可以了解到，那时的城市知青，绝大多数是因各种原因未能升学的社会青年，而且基本上被集体安排在城市近郊的国营农场，下乡插队的试点，在外省刚刚开始，在北京还未提上日程，她是真的走在时代前面了。

虽然与她同时代的青年，都具有热情浪漫、满怀革命激情的特点，但就在这代人中，她也要算是最热情浪漫的一个。因为作为一个品学兼优而且家庭条件优越的高中毕业生，她本是同龄人中的幸运者，可是却将这一主要是为安置那些在城市无法安排的人的政策，当成了自己的理想，而且就身体力行之了。作家黄宗英将采写她的报告文学冠以《特别的姑娘》之名，的确是恰如其分的。她的这段历史，曾被以她署名的文章和各种宣传媒介，在十余年间反复地讲述、渲染，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了。但今天读来，却仍然饶有兴味。

她下乡后的遭遇，是几乎每个下乡知青都曾经历过的，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她那个同伴在窦家桥的“家”，其实是一间在土改时分得的空屋，没有人住，也没有一件农具，做饭还得现搭锅台。女伴很快就离她而去。艰苦，尤其是难耐的孤独，使她也动过离开的念头。她曾想到国营农场去，那也是支援农业，不算当“逃兵”。但她下乡的这个县实在是个“宝地”，全国著名的邢燕子和最早的“铁姑娘”张秀敏都出在这里，也因此而不断吸引着记者、作家的目光。就在她感到最无助的时候，著名电影演员也兼作家的黄宗英来到这里。她本是来采访邢燕子和“铁姑娘”的，

听人说到侯隽，就到她的小屋与她同住了几日。回京后，她将此事讲给了周恩来，我们在上一章说过，此时正值1963年夏，总理刚好在筹划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长期工作，而且拟将安置方向从国营农场改到农村插队落户之时，他立即看到了树立侯隽这一典型的意义。1963年7月13日，《中国青年报》以《侯隽落户农村劳动被称为“特别的姑娘”》为题刊发了报道，仅仅几天以后的7月19日，共青团天津地委又发出通知，要求在知识青年中开展学习侯隽的活动。7月23日，黄宗英与另一作者合写的《特别的姑娘》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紧接着，全国各大报也都纷纷发表了报道和评论，这些评论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如《光明日报》评论所说：

（在侯隽下乡的）短短一年里，回答了为许多初高中学生思想上共同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国营农场的人数，比起人民公社生产队来总是少数，因此，要靠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回乡，家在城市的知识青年下乡，参加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劳动，或是组织起来从事边沿地带的垦殖生产。侯隽走的是后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比较艰苦的，但正因为艰苦，也更好地锻炼了人。^①

这便是宣传侯隽的特别意义所在。

侯隽毕竟是北京的高中生，其文化素质与邢燕子、张秀敏等高小毕业的农村青年不可同日而语，她也因此受到当时到天津考察工作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特别的关怀。周扬于1964年3月间几次专程到郊区和河北省宝坻、遵化等县农村，邀请回乡和下乡知识青年40多人进行座谈，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上山下乡对消灭“三大差别”的意义，号召青年们“做农民的新一代，也做

^① 1963年8月19日。

知识分子的新一代”。这个号召，无疑是很能鼓舞人心的^①。

此行中周扬还专门访问了侯隽的家，与她进行了交谈。“文革”开始，周扬成为刘少奇在文化界设置的“黑爪牙”后，侯隽曾多次回忆起这场谈话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刘少奇和他的爪牙千方百计在我身上打主意……周扬对我说：“把你们这些人放下来，不是让你们把知识扔了的，这个广阔的天地不只是产粮食、出经济作物、出工业原料的地方，也是出各种干部、出各种人才的地方。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学者、作家都不是出在通都大邑，而是出在穷乡僻壤。社会主义新农村难道不当出更多的人才么？”

“你与工农结合，又经过了实践，有资本，比我们强，就把你的亲身经历写一写，就是一本好小说嘛”……当时我就觉得他这些话不是味，完全违背毛主席教导——我没理周扬那一套鬼话。^②

周扬拉我上他们把持的旧清华，妄图中断我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干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我坚决不去。^③

我坚决回答：从下乡那天起，我就不打算当文学家了……难道办民校、革命文化站、写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材料都不重要，只有写小说重要吗？^④

虽然与周扬原话可能有些出入，但大意恐怕不差。周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解，基本上遵循了刘少奇1957年动员城市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务农时一系列讲话的精神——他们期望通过这一运动培养出一些人才。周扬毕竟是文人，刘少奇所想的人才，更多的是县

① 《周扬同志就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作重要讲话》，《天津日报》3月15日。

② 侯隽，《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文汇报》1968年5月14日。

③ 《坚持乡村，不断革命——侯隽在甘肃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甘肃日报》1975年7月9日。

④ 侯隽，《我们决不上中国赫鲁晓夫的当》，《人民日报》1967年6月23日。

长、省长、中央委员，是干部，周扬想到的，则是文学家，是学者。他们的想法，与毛泽东当时所要培养的革命接班人相比，是有些“不对味”。事实上，这作为解决城市剩余人口的一项迫不得已的措施，固然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再进一步，说到期望知青成为什么样的人，则只好凭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其实谁都心中无数。

侯隽名声大噪是在“文革”期间。她的活动与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相始终，能做到这点的知青典型只有她和邢燕子两人。1976年她曾被中央任命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她说过很多过头话，但也向上级反映过知青的不少真实情况，并为他们奔走呼吁。无论如何，她的名字已经与那个时代，与“知青”二字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了一种象征。

2. 董加耕

董加耕的光芒曾一度盖过了邢、侯两人以及所有其他知青典型，但“文革”一开始，就暗淡下去了。

董加耕是回乡知青。他原名董嘉庚，江苏省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人，1961年夏高中毕业，他在升学志愿书上填写了“回乡务农，立志耕耘”八个字，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加耕”，回到了家乡。他学习成绩优秀，又是贫农后代，在中学就入了党，并担任团支部书记，在农村青年中甚属难得。在当时高校招生强调政治成分的情况下，他本来很有把握进入大学并进而成为农村青年所梦寐以求的城里人的，他却能主动放弃这一切，因此，从他下乡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成为人们的注意中心。在他下乡一年后的1962年，江苏省省报《新华日报》就以《目标始终如一——高中毕业生董加耕还乡前后》为题，报道了他的回乡经过，但这时他还未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

董加耕名声大振是在1963年下半年，也就是中央制订了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决策以后。在是年11月团中央于苏州召开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汇报会议上，江苏省汇报了董加耕的情况

后立即引起了上级的重视。此时回乡知识青年中的高中毕业生越来越多,已经占到回乡知青总数的6%左右,是思想波动最大的一部分人,团中央急于在回乡的高中生中树立新的标兵人物,董加耕便应运而生了。

从1964年年初开始,先是《中国青年报》,然后是党报《人民日报》和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都不惜篇幅对他加以大肆报道,其规格甚至连1960年对邢燕子的宣传也无法相比。他的务农日记在当时全国几乎所有的报刊和杂志上全文刊载,那个时代特有的铿锵语句顿时就响彻了全国:

一个青年应当根据革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第一线。解放前,第一线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现在的第一线,就是广阔的农村,我到农村去。不正是党所需要的吗?

体力劳动是一座不朽的熔炉,我是一块矿石,一定要炼成不锈钢。

身居茅屋,眼观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称他是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是勇敢的革命先锋,说他所走的道路,正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道路。^①

董加耕作为知青典型的巅峰,是在这一年的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的70岁生日,破例设了三桌便宴,经周恩来安排,毛泽东圈定,董加耕和邢燕子分坐在毛的左右,毛泽东在从1955年直到“文革”爆发之间的十余年间,对已经颇具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迄未置一词,即使是这次便宴,他也没有哪怕一句话直接谈及此事,但按照当时的习惯,这已经可以算作是对知

^① 《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1964年3月20日。

青上山下乡运动，对董加耕和邢燕子本人最大的赞许和鼓励了。

对董加耕的宣传在全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在几个月内就收到数百封信。

知识青年纷纷表示要向他学习，不可否认他们中大部分人的真诚。当时江西省赣州四中有个名叫赵恒（金昌）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是班长、共青团员、四好（三好之上再加劳动好）学生，他与三个同班同学熊强年、宋柏林、刘捷民分别改名为赵恒耕、熊长耕、宋志耕和刘永耕，组成“四耕小组”，将他们4人的照片寄给董加耕，并且提出“学加耕，比加耕，四耕赶一耕”的口号，放弃高考，到离开市区300多里的山区插队务农。这种做法，在当年曾风行一时。

董加耕自己也曾谈到，当一切已经结束的20多年之后，一次他出差住进常州的一家旅馆，一些人听到他的名字后围过来，他们说他们都当过知青，都是学习他的榜样才下乡的，这使他感慨万端。

“文革”爆发，他一下子就成了众矢之的。北京有人组织了“五湖四海”调查团，盐城县组织了“拔黑旗”战斗队，矛头都是指向他的。县里甚至还专门成立了“董加耕问题联络站”，编了一本《董加耕反对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广为散发。这些批判，都紧紧围绕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他的自愿下乡，到底有没有私人动机？他们说其实他是大学迷，只是几次未达到目的，才想出这么个哗众取宠的主意。

如今再来判断这些揭发材料的真伪，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即使他曾真的梦寐以求想上大学，即使他曾有过所谓的个人动机，也无可厚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个在当时常常被人们用来作为衡量模范人物的标准，如今看来在概念上就存在着矛盾。但在当时，这些揭发的确使他备受磨难，这颗夺目的知青明星一下子就陨落了。

董加耕和侯隽尽管出身不同，经历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在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的时候，主动选择了这条道路。这与后来“文革”期间知青被“大拨轰”到农村，毫无自己选择余地的情况是不同的。这也正是他们的可贵之处。也许只有他们，才可以谈得上是“青春无悔”。从他们后来的表现来看，他们对于选择了这条道路，也的确“无悔”。1986年，当山西的北京知青掀起最后一场返城风波的时候，山西曾派出一个由上山下乡的老知青组成的“志在四方”汇报团，到京、津等地巡回讲演。一位中央首长在接见他们时对知青在农村所起的作用作出的几句肯定评价，曾使侯隽“高兴异常，奔走相告”^①。董加耕对往事的评价则更理论化一些，他说：“当年一些知识青年志愿到群众中去干事业这是可以的，只是后来一阵风，就把事情搞坏了，凡事都怕走极端。”他进而阐述说，当年的上山下乡有4个区分，第一是“文革”前部分青年出于自愿到农村干一番事业和“文革”中的“一刀切”、“一刀红”亦即一律下乡应当区分；第二是毛泽东、周恩来培养的青年积极分子和“四人帮”为篡党夺权而培植的人应予以区分；第三是“文革”中说错话、办错事和主动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人应予以区分；第四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积极工作还是消极怠工也应有所区分。^②他们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和心情。

主动选择这条道路的青年虽少，但也并非绝无仅有。像董加耕和侯隽一样，他们大多是高中毕业生。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怀着为祖国贡献青春的美好理想，他们是当时的知识青年中最优秀的一批人。

① 《访老知青侯隽》，《新疆青年》1986年第9期。

② 台恩普：《往事历历三十年——董加耕访问记》，《青春岁月》1991年第6期。

最具代表性的，是曾经轰动一时的“南京72贤人”，指的是72名自愿放弃高考到农村插队务农的高中毕业生群体。

1964年年初，江苏省将董加耕这一先进典型推向了全国，并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大张旗鼓的学习董加耕的运动，在高、初中生中间造成了很大影响。南京市六中、十一中、南师附中等学校的一批应届高中毕业生，在这种气氛的感召下，考虑到当时高中毕业生中下乡务农的人数还不多的事实，决心开风气之先，放弃升学考试，直接报名到农村插队务农。此举得到南京市以及江苏省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宣传，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震动。

这72个青年中很多是当时重点中学的学生。有些是干部子女，六中的蒋才琴出身革命家庭，自己每年暑假都回到老家泰兴去参加农业劳动，看到很多回乡青年不安心，总想往城里跑，而农村又需要有文化的人，遂产生了下乡务农的想法。她说自己不考大学并不是单纯的决心，而是革命。还有不少是知识分子子女，如黄桂玉，父亲是大学教授，她说：“我家祖辈几代都是书香门第，如今我要去种田，就从我这一代起，用汗水来谱写劳动人民的家谱。”又如方环，父亲是南京航空学院教师，母亲是中学教导主任，她的哥哥已经于1961年下乡，这次她要放弃高考，家里本来不同意，希望她能先考大学，但她态度十分坚决。也有一些工人子弟，如蒋贵勤，本来想接父亲的班当铁路工人，经再三考虑后，认为到农村去更有利于自己的思想改造，于是决心下乡。此外，他们中还有归国华侨。

这些青年从决心下乡务农之日起，就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组织起来建立了临时学习班，抓紧一切机会开展自觉的“练兵”活动，锻炼自己的体力和意志。张光祖每天早晨挑上一担砖块上学，晚上再挑回家，20多天下来，已能从开始的70斤，达到110斤。方环每天早晨和中午挑水围着房屋绕圈子，有同学笑话她，她脸不红，气不喘。李双银带上两个同学到农村的外婆家，整天练习

栽山芋、车水。还有些人练习赤脚走路、爬山。

8月29日，江苏省召开规模空前的全省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72个尚未下乡的中学生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十分令人瞩目。9月12日，他们与其他知识青年共733名一起，动身前往苏北的江宁、盱眙等县插队，南京市为他们召开了盛大的欢送大会，会上他们的代表蒋才琴、王作霖，以及家长代表方环之母、顾小抗之父等人作了发言。

下乡后，这“七十二贤”以学校为单位被分别编入集体户，成为各户中的骨干。

三 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

从1962—1966年“文革”之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规模虽远远无法与文革以后相比，但仅就它动员了将近百万人这一数字来看，就已决不是如今天有些人所以为的“人数不多，影响不大”了。这支百万大军的主体，是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于此点，中央曾有过明确的规定，1963年年初中央文件称：

安置对象必须坚持中央规定的条件……学生是指1961年以来毕业没升学就业而又具备下放条件的；闲散人员是指历年精简下来没得到安置的职工和1960年毕业没升学就业的学生，家庭妇女（男女双方下放者例外）等其他人员不包括在内。

安置对象应限于家居大城市的精简职工和学生。大中城市的界限，暂按经国务院批准设市的17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和不够10万人口的工矿区为标准，这个范围，不能扩大。^①

^① 《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批转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学生的安置计划落实会议的报告和落实的安置计划》，1963年2月8日。

可见，作为安置对象的知青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应届毕业的学生，另一类，就是我们在第三章曾经论述，后来也间有提及的社会青年。而无论是哪一类，他们与“文革”时期大批下乡的知青相比，也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只是城市青年中的一部分人。在有相当数量的人可以升入大学，还有一部分人可以留城就业的前提下，下乡知青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属于被城市“抛弃”的、位于社会底层的青年，像上一节所述那些能够升学而自愿下乡务农的人，只是极少数。

与50年代相比，这时的年轻人，心头已经平添几分压抑，虽然他们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却依照出身不同而被划成几等。这一情况在宣传知青典型时已很明显，人们很少注意50年代知青典型的家庭出身，没人去理会徐建春、吕根泽的父母是否是贫下中农。但1964年以后就不同了，对不同家庭出身的子弟，采取的是不同的宣传方式，甚至有些知青典型就是因出身有代表性而被树立的。所以我们在论述当时知识青年的构成时，也不得不将他们的出身考虑在内，甚至部分地以出身作为划分他们类别的依据。

一 干部子女

在当时的宣传中，干部子女的概念是相当广泛的，其中包括了高级干部，也包括一般干部，甚至还有老红军、农村人民公社、大队干部的子女。他们中很多人在未能考上高一级学校时，也加入了这支下乡知青的队伍。早在1963年就有报道：“（在知青中），有元帅的孙女，有将军、老红军、部长、省长、市长、市委书记的子女，有‘革命妈妈’陶承同志的孙女。”^①以后则为数更多。

^① 《下乡上山是千万知识青年的方向》，《中国青年》1963年第23期。

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干部子弟，主要还是指的高干子女。

“文革”以前，高干，按规定是十三级以上干部，以下则为一般干部，但我们这里主要指的是中央领导干部的子女，他们当时绝大多数生活在北京。

“文革”前上山下乡的高干子女典型，最著名的有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董良飏和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之子万伯翱。

万伯翱1962年于北京育才中学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此时国家已经开始动员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北京市也已经有一批中学毕业生被安置到近郊区国营农场，这些农场离城都较近，条件相对说也比较好。但他的父亲万里却认为儿子需要离开家，离开父母，到更远的地方去，一切从头学起。于是，1962年9月，在父亲的支持下，他下到河南西华国营黄泛区农场的园艺场，参加农业生产。后来著名剧作家曹禺曾在文章中提到此事说：“1962年他被父亲送到河南农村锻炼，首都知识青年支援农村，伯翱大约是第一人。”^①说是“第一人”并不准确，但他作为北京最早到外地农场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又是市委书记的儿子，可算是开风气之先的人。

1963年9月，《中国青年报》以《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生产》为题，报道了此事，提到万伯翱通过一年的锻炼，尝到了劳动的辛苦。同年11月，万伯翱在该报发表给青年朋友的信《我懂得了劳动的意义》。1964年9月22日，他又在《河南日报》发表文章《到生活的激流中去》。1965年4月，该报又刊登了万里给儿子的信《要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和万伯翱给父亲的回信《用双手去为人民造福》。在这些文章中，都提到他通过艰苦劳动的磨炼，思想上得到了升华，从而更加了解和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等等。同时，特别提到父亲对他的严格要求，尤其是春节时不准他回京，要

^① 吴欢：《京城一少》，《北京晚报》1994年4月4日。

他留在农场与农民一起过年等事，在社会上和青年中都引起了相当的反响。

万伯翱现任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体育》杂志副总编辑，曾有多部电影、电视剧问世，并有文集《三十春秋》出版。

干部子弟的下乡目的也是形形色色，一些是出于无奈，因为“干部带头”是动员知青下乡工作的重要前提；也有不少干部，怀着“毛主席指出的道路没有错”的信念，真心送子女下乡锻炼，如1965年到“北大荒”，曾被树立为知青典型的某某回忆说，他的当司长的父亲确实认为，毛主席都把儿子送到朝鲜前线并在那里牺牲，自己响应中央号召送子下乡义不容辞；但在1964年以后，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这时已有些干部子女，怀着一种使命感自觉下乡，就如“文革”期间第一批主动上山下乡的红卫兵一样。“文革”期间这样自觉下乡的，不仅有高干子弟，还有一些曾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一般中学生，但在“文革”前，这类人还只是为数甚少的先驱。

这里说的使命感，与上述邢燕子、侯隽等人那种响应号召、“为党分忧”的单纯的革命热情是不尽相同的。当时的年轻人个个高喊要做革命接班人，对一般青年来说，这不过是个泛泛的口号，而对高干子弟来说，却有着十分明确的内容。1964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同时对王海容、毛远新几次发表抨击“旧教育制度”的谈话，这些谈话早在“文革”前，就已在高干子弟中广为流传，他们开始厌恶“旧学校的那一套制度”，其中一些对学校的课程不感兴趣，成绩平平，而埋头于马列主义的理论，热衷于讨论各种现实问题，这明显是以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为表率的。一名干部子弟评论这批人时说：

有一批人是真正具有干部子弟色彩的。他们也学各种各样的知识，

但就是在知识结构根本改变之后，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最终是要到政治舞台上管事的……后来他们果真也成了各方面比较活跃的人物。^①

这是高干子弟中素质最高的一批人。他们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在自觉地为未来登上政治舞台进行准备，他们相信毛泽东的话：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定要“经风雨，见世面”，要能够吃苦，要与人民打成一片，虽然他们最终的目标远不是到此为止。

一些家长也是抱着这一目的送子女下乡的。典型的如陈伯达。他的儿子陈小农在北京人大附中读书时就入了党，1965年高中毕业时，学校已决定将他保送到高级党校深造，陈伯达却坚持提出要他到农村去锻炼，陈小农遂于当年7月随北京首批去内蒙集体插队的应届中学毕业生到临河县狼山公社落户。据当时负责此事的区安置办公室同志回忆，临行时陈伯达曾派国务院办公厅出面，与负责此事的干部约法三章，一是不准让他接待外宾，二是不准对他夹道欢迎，三是与其他知青一视同仁。与他同去的同学们说，他不爱讲话，但劳动肯干，极能吃苦。有文章说他一到公社，就被任命为副书记，是不确切的，他不过是县知青办的联络员。“文革”开始不久他便回城，“文革”结束后有人撰文说，陈回京后到国防科委工作，其父又安排他去华北某工厂锻炼，准备以后委以重任，可见一直是沿着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思路进行的。只是陈伯达不久即倒台了。

二 一般的“红五类”子女

“红五类”这个词是“文革”期间才出现的，我们将它提前用在这里，是因为它能最准确地概括我们下面要描述的一类青年。

从概念上说，“红五类”子女指的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

^① 陈小雅，《北京知青历程回眸》，载《中国知青报》，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

部、革命军人的子女，我们将一般干部的子女也包括在这类人之内。这些人，本应该在人民中占大多数，可是实际上，由于当时搞的阶级划分总以“宁左勿右”为原则，总要搞得“纯而又纯”，所以真正达到所谓“根正苗红”标准的，至少在城市中，只是少数。按照当时的宣传，他们将来是要接班的，而他们的家长，也应该在知青家长中起带头作用。所以，带头送子女下乡的革命家长典型，就常常出现在这些人中间。这些家长中，有的是自觉这样做的；也有的是迫于压力；更有一些，则是按照宣传需要被粉饰一过，已经无法得知其本来真象了。

在他们中间，当年最响亮的一个名字是赵耘。他的父亲，是天津市的一个处长。

赵耘是1957年最早到农村落户的那批城市中学生之一。在天津十三中读书时就已经入党。初中毕业后与天津市首批自愿下乡的100余名初中毕业生一道，下到河北省宁河县军粮城“共产主义之路”高级社（即后来的天津市东郊区军粮城公社）落户。当时对他的宣传特别强调说，他的父亲非常支持他，将他的名字改为“耘”，取“不重金银重耕耘”之意。当年与他一同下乡的中学生中，有好几名都是处长或其他干部的子弟。

他时时以一个干部子弟、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几年后，当上级准备将这批下乡青年安排去当小学教师时，他也曾犹豫过。是留下来还是和别人一起去？去有去的好处，他最不愿意做饭，这一去就可以吃食堂了，再说做小学教师不也是党需要的吗，也还是留在农村，怎么能算逃兵呢？可是他又想，临来时和父亲谈过话，表示既然过来了，就一辈子干农业了，我是自觉自愿来农村的，现在我又想了些什么啊！他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安心在农村待了下来。并与一同下乡落户的知识青年李秀敏结了婚。

1962年春，赵耘转到苗街三队任生产队长，有的社员听说他

父亲是天津的一个处长，恨不能借他这个关系多给队里办点事，如搞点化肥、机器之类，都被赵耘一一回绝。据他说：“我初当队长时以为最大的困难是不懂生产，没想到迎头碰上的是阶级斗争。我反复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有人不满，说我是政治队长。有人乘我到区里开会的机会，在乱稻草里裹上稻子，打算搞瞒产私分，被我发现了。我马上向大队党总支作了汇报。”有些社员因他反映情况而骂他是“奸细”。1962年前后的农村，情况相当复杂，“瞒产私分”，其实是农民对上面一些极左做法的抵制。其他一些所谓的“阶级斗争”现象，也往往是被人为夸大甚至制造出来的。刚走出校门的知识青年不可能了解如此复杂的实际情况，他们往往凭着在学校学来的一套大道理，在农村横冲直撞，与“落后势力”开展坚决斗争，而当时被极力鼓吹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与之相关的一整套宣传，无疑对青年的这种做法是一种激励，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当成骨干、充当先锋，结果与农民关系搞得十分紧张的事例是很多的。这也是“文革”爆发后很多知青在农村待不下去只得返城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些知青中也不能排除有想借此机会达到个人目的，而置农民疾苦于不顾的人。

赵耘看到和他一起下乡的伙伴，有的初来时不习惯，后来开始适应了乡村生活，拿上了工分。他们只看到鼻子底下的那一点小天地，盖了新房、置了家具，买了无线电和自行车，开始安于热炕头的小日子。赵耘感到很痛心，尽管有人有意识地和他疏远，他却主动去接近他们，与他们谈心，鼓励他们重新树立革命理想。

1964年，赵耘已在农村落户7年。他被评为河北省农业战线上的28面红旗之一，从此赵耘名扬全国。《中国青年报》和《天津日报》等报纸都曾以大量篇幅报导他的事迹。《天津日报》以《赵耘到了农村以后》为题发表对他的长篇报导时所加的编者按说：

他终于以革命思想战胜了残存在自己身上的落后思想。不仅不为某些迷恋于小安乐窝生活的人所感动，而且，一些同来的伙伴在思想上的变化使他感到痛心，他主动帮助他们重温旧志，鼓舞他们继续前进。他不断地从农民身上吸取有益的营养，而对于那些落后的思想和习俗却并不妥协。他这种勇于革命、坚持革命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知识青年学习的。^①

《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他的文章《要革命就要和工农相结合》时所加的编者按说得更为明确：

这又是一个和工农结合的知识青年革命化的典型……赵耘和周明山，同是从学校走上农业战线，同是后来当了群众爱戴的党支部书记，所不同的是，周明山在农村长大，赵耘是大城市里长大的。但是，赵耘经过7年的刻苦锻炼和改造，也由城里来的“洋学生”变成了一个“田秀才”^②

在农村参与“四清”运动，参与整农村干部和社员的，也往往是他们，结果便是“文革”以后在农村的无法立足。他们为自己的热情和盲目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三 知识分子与社会名流子女

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不包括已经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而只是指当时所谓“没有问题”的那些人。社会名流，包括民主人

① 1964年1月17日。

② 《中国青年》1964年第8—9合期。周明山是与赵耘几乎同时，在同一背景下被推出的知青典型，是山西省绛县南柳大队的回乡知青，更准确地说是一个青年农民，因为他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参见《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青年》1964年第8—9合期对周明山的报导。

士、著名演员等等。

只是到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命题时，人们仿佛才明白，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其实都是劳动。他们一致的对立面，应该是剥削才对。可是在当时，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却被错误地扩大化、绝对化起来，甚至成为对立的两个概念，知识分子，脑力劳动，倒与剥削者，与不劳而获成了一体。按当时的宣传调子来说，最厌恶劳动，最轻视劳动人民的，不是剥削阶级，反而是同样也在从事劳动的知识分子。

社会上存在这种看法，其实渊源有自，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中，读书与做官，一直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的读书人，的确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劳动者。但问题在于历史已进入20世纪，接受民主、科学教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与封建士大夫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读书与做官之间的必然联系早已被切断，不再存在滋生“官僚士大夫”这一阶层的社会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还硬要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混为一谈，这或者是观念上的落后，或者是别有目的，就不在我们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这些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们的处境，是颇为尴尬的。一方面他们至少在表面上还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生活条件不仅高于一般百姓，甚至也高于一般干部的水平。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是被改造对象，毛泽东动辄就让他们“洗澡”、“脱裤子割尾巴”，使他们动辄得咎，战战兢兢。而他们的子女，处境比他们本人更糟些，他们往往被当作资产阶级子女对待，比他们的父辈承受着更大的政治力，“娇生惯养”，“清高自大”、“只专不红”几乎成了他们的代名词。所以，他们普遍存在着要背叛家庭的意识，其中一些人“与工农结合”，做普通劳动者的愿望，比一般青年更为自觉和迫切，这是“文革”前知识分子子女的一个特点。

这些人的子女，在学习文化知识方面的确占据优势，所以考不上学的人数，相比其他子女要少些，在“文革”前便已上山下乡的是极少数，但社会上既然认为他们能够参加体力劳动最为难得，所以在60年代初，对这些知识分子子弟下乡的宣传，曾一度是舆论的热点。

北京最早树立的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知青典型，是北大著名教授侯仁之的儿子侯方兴。侯方兴于1962年初中毕业，与百余名同学一起分到位于京郊西山脚下的巨山农场参加农业生产，当时年仅16岁。侯教授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他的儿子能到国营农场参加劳动，在宣传上的意义自不待言，一年后侯教授夫妇在报刊上发表了名为《喜看儿子参加农业生产一年》的短文，与后来那些充满革命词藻的文章相比，这篇文章是相当平实的，只是以父母的口吻谈到，孩子当初报名，主要还是出于个人兴趣，短短几个月，却从贪玩的孩子变成了自觉的劳动者。^①

如果说对侯方兴的宣传，更多强调的是教授送子下乡这一主题的话，那么与此同时甚至更早的陈嘉鲲，更多地则是宣传他本人。陈嘉鲲也是教授之子，他的父亲是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锡祺，据说他本来希望儿子能继承父业，学习历史。陈嘉鲲1961年于广州市六中高中毕业后却未考上大学。当年9月，他随广州市“大跃进”之后最早一批城市知识青年，到中山县的平沙农场落户，他最初在青年队劳动，后来到畜牧队饲养奶牛，两年间没有怨言，不怕脏累，干得很有成绩。一个著名教授之子当了最为人所不屑的平凡的饲养员，这是个太有文章可做的题目，各报曾以《来自书香门第的新农民——教授的儿子陈嘉鲲落户农村》、《教授之家新“秀才”——记落户平沙农场的高中毕业生陈嘉鲲》

^① 《中国青年报》1963年10月12日；另见《送儿子支援农业最前线》，《北京日报》1963年5月10日。

等为题对他进行报道，陈嘉毓一下子就名扬全国。^①

不过，除了侯隽以外，他们都没能成为全国级的知青明星。1964年以后，更是连陈嘉毓这样等级的典型也未曾树立过，这显然是因政治形势的改变而在宣传导向上所作的调整。即使是对周恩来亲手树立的侯隽，也曾有人以她父亲有些“问题”为由，对大张旗鼓地宣扬她，提出过不同意见，更何况别人了。

四 普通市民的子夜

我们按照当时青年的出身来讨论知青的结构问题并不是绝对的，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情况不可能按照出身划分，如下面将要谈到的普通市民子女。

“文革”前的下乡知青中，占据大多数的，是因种种原因未能升学、又没有门路在城市就业的普通市民子女，其中包括国营企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城市贫民、小工商业主的子女，当然也不乏“红五类”。他们也有献身革命、献身祖国的情，但总的来说，却既少干部子弟的使命感，也少知识分子子女的浪漫，他们下乡的动机大多是很实际的。

最普遍的，是家庭生活困难，急于为家庭减轻负担。这类青年有的未考上学，有的则因家庭情况本来就没打算升学，甚至提前退学了。在“文革”前，他们是各地动员下乡的重点，成都市1962年开始进行下乡插队试点时，首先挑选的，有两种人，一种是觉悟高的，还有就是家庭有困难的。据重庆市1964年所做的统计，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自愿下乡的青年，占自愿下乡青年的60%，他们把下乡做为一条就业出路。一般来说，他们到农村后，不像知识分子子女那样产生强烈的挫折感，也能够吃苦，但当所挣工分不仅不足以支持家里，而且难以养活自己时，他们的不满就非

^① 《中国青年报》1963年7月30日；《羊城晚报》1963年7月22日。

常强烈，往往倒流回城去寻找其他生计。

另一种，是家庭关系不好，希望离开家庭独立生活。如1965年从北京赴内蒙古临河县狼山公社某队插队的16名知青中，就有3人家中是继母，其中一个女生，从小寄养在外地，上中学才回到北京，学习跟不上，又说一口方言，继母对她百般歧视，无奈初中毕业后就去插队了。其实，就是在上山下乡的高干子弟中，也有很多与家庭存在这类问题有关系。

此外也有一些虽然也在学校读过书，实际什么也未学进去，升学既不可能，在城市也难就业，除了下乡别无出路，他们之称为知青，只是徒有其名而已。

五 因种种原因失足或有各种毛病的社会青年以及工读学校学生等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学校出来几年后仍未找到出路的社会青年。从1963年以后到“文化革命”开始之前，社会青年一直是城市安置工作的主要对象，也是被动员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主力。虽然总的来说，他们基本上也是从学校出来的青年学生，是知识青年的一部分，但是与在校学生相比，也有明显区别。他们离开学校后又几经“淘汰”，一般来说各方面素质较差，回到街道以后，又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有不少人沾染上不良习气，已不像刚从学校出来的应届毕业生那样单纯。还有一些是因出路茫茫，有不满情绪，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就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这些“道德败坏”者在社会青年中占据相当的比例，如据广西南宁市统计，占社会青年总数的18%左右，其他城市也大抵如是。再者，由于社会青年的范围并无明确的界定，社会上经常将一些复杂的成分，如劳改释放犯等与社会青年混为一谈，更是大大败坏了他们的声誉。

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谈到，1962年重新开始动员城市知青下乡

时，就有很多这样的青年被动员甚至强行送下乡。尽管1963年团中央在苏州召开动员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汇报会时就曾特别提到，这项工作开始时还是搞得纯一点好，以使这条路越走越宽。1964年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在一次讲话中也强调，最近两年动员时要特别注意一下质量，品德太坏的可暂不下去，这些人农民极不欢迎，也把城市知识青年的名誉搞坏了。但是，我们上面也分析过，不让这些人下乡，实际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本是城市所最不能容忍的一类人，不把他们送到农村去，又送到哪里去呢？虽然上面一再强调不要有“甩包袱”的思想，然而事实上想尽快将他们打发下乡的，决不仅限于下面负责具体工作的干部。

1964年北京组织第一批知青去宁夏参加农垦，当时有干部为了把这类青年尽快“呼噜”下去，所以要下面进行政审时尽量简单。为了顺利地将这些人送下乡，许多地方不惜欺骗接收单位。1965年北京送一批知青到内蒙古临河县插队落户时，为了将一批工读学校学生掺杂进去，便不准临河县来接收知青的同志翻阅档案，告诉人家这些学生是半工半读的，当地同志看到这些青年身体健壮，去了能干活，非常满意，并不知其中有些是京城著名的流氓集团成员。结果，当年11月当地就向北京退还50余人，回来后这些人都会被送交了公安局，在当地造成很坏的影响。

天津市也存在同样问题。1964年该市组织大批社会知青到河北省宝坻等县集体插队，曾被作为一项成功经验在全国推广，但即使如此，这支两千余人的队伍中，混杂进流氓、惯窃、反革命分子和劳改释放犯共70余人，占这批知青总数2300名的3%。这些人在农村表现仍不好，弄得很多社员不敢敞着门下地，下乡女青年晚上不敢出门，有两个下乡两天就被天津公安部门抓回去了，还有两个下乡不几天就用铁锹打架，群众和青年都很不满意。

总之，许多大城市采取这种做法，将本应自己解决的问题和矛盾推给了接收知青的地方，加剧了城乡矛盾，尤其是其中很多

并无多高文化，称为“知青”实在勉强。他们下乡后，虽也有勤劳肯干的，但少数人的偷鸡摸狗、寻衅闹事，损坏了知青的名声，这种良莠不分的结果，使满怀革命热情的纯洁的青年学生感到寒心，更使农民误认为凡下乡者都是有问题的，是坏分子，在一些地区恶化了其他下乡知青的处境，也加大了以后动员知青下乡的难度。

六 出身不好的青年。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专门论述

上述的第四、五、六种人，构成了“文革”前城市下乡知青的主体，也是与“文革”期间下乡知青在构成上的主要区别。

四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在第三章我们曾经提到，歧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青年的现象，早在50年代就已存在，无论升学还是就业，工农和干部子女都有优先的权利，但当时人们还将此视为政权初建时期的一个暂时现象，国家也曾试图纠正这一问题。但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却使形势急转直下了。

大学招生开始注重政治成分，理由如下：

在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高等学校学生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右派分子，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反映了以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存在着贯彻阶级路线不够、注意新生政治条件不够的严重缺点，要求今后大力改进。同时从对培养高级建设人才的要求来看，培养一个大学生，国家平均要花五六千元，也应该慎重选择培养对象。^①

^① 宋诚：《高三同学怎样对待升学和劳动问题？》，《中国青年》1958年第8期。

不过，这时所谓的成分，还主要是指本人的成分而言，加上自1958年以后大学招生规模连续3年迅速扩大，更是把这一问题掩盖了。

大学之门向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逐渐关闭，是从三年灾害以后开始的。1961年，当大中学校进行大规模精简的时候，教育部曾正式发出通知：“各级师范学校招生，必须保证质量，特别是政治质量。认真改变过去降格以求，不顾质量，勉强凑数的现象。今后，凡学生家庭属五类分子的一般不予招收^①。”虽然只限于师范院校，却是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当年8月，中共中央转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资产阶级子女升学问题的报告》，指出各地、各高等学校在招生工作中仍存在对资产阶级中间派和右派没有区别对待，对学生本人的进步表现注意不够，一些学校所规定的机密专业数量太大、范围太广，过分限制了资产阶级子女入学的问题^②。可见这一时期高校招生中，已存在着对出身的强调，存在着对出身不好的子女的歧视了。不过，从政策来说，这时大学所明确拒收的，还主要是“五类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的子女，矛头尚未扩大到、至少是中央还不愿让矛头扩大到一般所谓的“资产阶级子女”的范围。

1962年以后，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命题，提出为了使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要在阶级成分好、思想觉悟高的青年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原则，与之相对而言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便被当成了资产阶级复辟的主要社会基础之一，当成必须严加防范的主要危险。这种看法，在1964年以后，还被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

1964年5月，团中央某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修正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289页。

② 同上，第297页。

主义在青年中间的社会基础有两个，一个是怀着阶级报复思想的“五类分子”子女，一个是轻视劳动、轻视工农，拜倒在资产阶级专家、教授脚下的知识青年。知识青年不经过艰苦劳动，有了点书本知识，就认为有了“私人资本”，自以为高人一等，是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另一位领导干部也宣称，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同我们争夺青年，这一斗争尖锐激烈地在各个方面进行着，最直接的就是资产阶级同我们争夺他们的子女。我国现有资产阶级分子100多万，以平均一个资本家生4个子女计，全国就有400多万个资产阶级子女，如果每个资本家都有一个子女接班，就会出现100万资产阶级的继承人，尤其严重的是他们还会扩大阵地。这位领导还说，我们过去几年对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反复性认识不足，把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只简单地看成是对现在老一代的改造，没充分看到资产阶级思想还要传宗接代，还要争夺下一代以至下几代。他还对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作了一个估计，说他们是“两头小，中间大”，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仅占20%。这些讲话，当时是没有公开的^①。

自60年代开始，青年升学和就业时，就必须通过政审。这些解放时尚未成年的学生，自然谈不上什么历史问题。所谓政审，审的其实就是出身。每个青年的档案上，都根据出身不同注有“可去机密单位”、“一般”、“不宜录取”等字样，招收单位就根据这条来招人，如果是大学招生，一旦被写上“不宜录取”，那么无论成绩多么优秀，也只有落榜一途。不幸的是，“文革”前的高考并不公布考分，上述规定也只在内部掌握，落榜青年并不知道自己没考上大学的真正原因，有的还在继续用功，期望下一年能够榜上有名，直至几次失败之后，才不得已而走上下乡之路。

即使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按照出身不同，也有不同的动

^① 胡克实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1964年5月30日。

员口号，如天津市团委书记的动员讲话：

希望劳动人民出身的家长带头教育子女走革命道路，使自己的后代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事业，把革命进行到底，希望剥削阶级出身的家长认清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革命的潮流，势不可挡，应该下决心从自己的后代改变门风，使子女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①。

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背叛剥削阶级，在劳动中锻炼改造自己，是值得赞扬的革命行动。一切拥护社会主义，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都应该为在自己家庭里出现了第一代新型劳动者而感到高兴。

加上一些具体执行政策的干部因惟恐沾上袒护“出身不好”青年的嫌疑，不惜将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范围一再扩大，最初是地富反坏右子女，后来加上资本家子女、历史不清白分子的子女，再后来高级知识分子子女也被划入资产阶级范围之内，还有民主党派、富裕中农甚至一般职员的后代。最初只是指直系子女，后来扩大到孙子孙女、侄儿侄女以及其他亲属。在有些地区甚至左到凡亲属中有一人成分不好，那么即使这个青年的父母是“红五类”，他也会被视为不可靠。尤其不公正的是，直至“文革”结束之后，在很多地区，出身和成分都是混淆不分的，许多干部认定出身就是成分，成分就是出身，或者将出身看作成分，将成分看作出身，不明白每次填表时何以会设有“出身”与“成分”两栏。奇怪的是，对于这个在当时如此至关重要的问题，却从来没人予以认真的说明和纠正。很多高级领导人在对青年讲话时也总是强调：“我们是：一有成分论；二不唯成分论；三重在表现”。显然也把出身和成分混为一谈。这种有意无意的混淆，终使很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在实质上变成了和他们老子一样的阶级敌

^① 《知识青年们，走革命化道路！》，《天津日报》1964年5月10日。

人。他们成为准专政对象，成为先天的罪人，以至到“文革”时，“狗崽子”这种侮辱性的称呼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报刊和书籍之上。

歧视剥削阶级子女的现象在各地的迅速冒头，使中央认为有必要在政策上作出解释和调整，1965年7月，周恩来、陈毅到新疆看望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参加农业生产的上海知识青年时，曾有过如下一段重要谈话：

……

周总理接着——问大家的家庭出身，当问到共青团员卓爱玲时，她羞涩地说：“我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里”。

“你家里还拿不拿定息？”

卓爱玲一时答不上来，错听成自己要不要拿定息，着急地说：“我不要拿，我不要拿！”她的这话，引得周围的首长和同志们都乐开了。

周总理乐呵呵地对她说：“你爸爸拿定息是他的事嘛”。

周总理告诉大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向组织交代清楚他所存在的社会关系，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地在实践中改造自己，就会有光明的前途。”总理意味深长地对革命青年的勉励，使得卓爱玲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过去，她也曾为自己的家庭出身苦恼过，不知怎样同家庭划清界限，不知怎样争取自己的前途。进疆以来，走上了革命化的大道，思想包袱逐步丢掉了；今天总理亲切的教导，方向更明确了，获得了新的巨大的思想动力。^①

随后，《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的

^①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新疆勉励知识青年》，《中国青年》1965年第16期。

社论，本着周总理讲话精神，对如何看待青年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本人表现作了如下的解释：

首先，不能忽视一个人的出身，

剥削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它们总要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的继承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子女从小同他们“住一屋，睡一炕，吃一锅”，是他们首先要夺取的对象。……对于剥削阶级子女来说，家庭的影响对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世界观的形成，往往起着不小的作用，有的甚至会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确实和工农子弟不一样。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要看到这个不一样。

其次，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是可以改造的：

剥削阶级子女，虽然生在剥削阶级家庭里，但是他们没有亲自参加剥削，同剥削阶级分子是有区别的。他们年纪轻，要求进步，可塑性很大。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做剥削阶级的殉葬人，而要求向革命的方面转变。

第三，要“重在表现”：

首先要看他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尤其要看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执行重在表现的政策，就是按照兴无灭资的方针，教育剥削阶级子女进行思想改造，确立无产阶级立场，背叛剥削阶级，把他们争取到无产阶级这一方面来。我们要坚信，党完全有能力把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改造好。

无论怎样讲落实政策，大前提是坚定不移的：尽管同样是在红旗下长大，但是对剥削阶级子女与出身好的子女，不可能一视同仁。他们要想进入到革命队伍中，就必须进行艰苦的改造，没有人告诉他们，这种改造到什么时候是尽头，但很明显，上山下乡，当普通劳动者，是进行改造的最好途径。

为了宣传这一政策，团中央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树立了一批勇于改造自己，走革命道路的剥削阶级子女的典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鱼瓣玲。

鱼姍玲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父母都在香港。1962年她从上海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父母几次三番要她回香港读几年外语，但她认为自己是个共青团员，不愿意到香港去。她曾回忆说，在去新疆前的那一年除夕，姐姐为她准备了丰富的饭菜，但她一点也吃不下：“我感到自己的精神十分空虚，为自己的生活过得毫无意义而痛哭起来……”1963年6月，她决定报名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家里知道后曾竭力劝阻，她母亲特地赶到上海，对她说：“考不取大学也不要紧，只要你不到外地去吃苦，家里就是养你一辈子也可以……”她想，妈妈是爱我的，但母爱也是有阶级性的。她不愿走“离开党、离开革命，过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的死胡同，终于冲破家庭重重阻力，来到塔里木的农一师胜利十七场参加劳动。她克服了生活过不惯、劳动吃不消等困难，到新疆几个月之后，她曾作出总结说：

我深深地感到，听党的话，不贪图舒适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走革命的道路是完全走对了。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其不平常的变化……劳动使我的生活过得十分充实、十分有意义，不像过去那样空虚和无聊，我从心底里感谢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①

几乎所有升学落榜的青年，都有过她曾有的苦闷，“文革”前上海这批资产阶级，从整体上说，旧有的生活方式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心底仍残存着昔日那种优越感，他们一向是将到外地劳动视为畏途的，更何况是遥远的新疆。不仅是他们，就是一般的上海市民，也都是一谈“新疆”就色变的。作为第一批踏上这条艰苦道路的青年，鱼姍玲的确不易，这是她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到疆仅短短几个月，还未及品尝到人生的另一面，她心里充满自豪和喜悦，

^① 鱼姍玲：《从娇姑娘到边疆建设者》，《中国青年》1964年第11期。

是很自然的事。第二年，周总理在新疆发表讲话以后，鱼耀玲这一典型，其意义已不比从前，而迅速升级了。她不久入了党，在当时，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是改造得最有成效的标志。8月23日，《中国青年报》以《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坚决跟党干革命——鱼耀玲改造思想进步快光荣加入共产党》为题，对她进行了报道，同时发表社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她被团中央树立为全国的知识青年典型。

鱼耀玲后来的道路并不平坦。“文革”爆发，她又回复成了“资产阶级的狗崽子”。她所在的农场，一度只剩她一个女知青，但她咬牙坚持下来，“文革”结束后中央于1979年召开最后一次知青座谈会时，她还是33名代表之一^①。

这些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青年入党、当模范的事例，确实打动过相当多单纯的、向往革命的青年的心，但这毕竟只是他们中极少数的几个人。

且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一命题本身的荒谬性，仅就这个前提下引伸出的这一言论来看，就是漏洞百出的。首先，尽管这个理论的始作俑者极力否认，但它确实是建立在十分反动和落后的血统论之上的。当时和后来的事实早已证明，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同样表现在出身于“红五

① 鱼耀玲所在的连队，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最偏远的农垦十四团场九连，到1979年为止，她在那里已经生活了16年。她“文革”时被打成“黑典型”，遭到批判，排长的职务也被罢免了。当时垦区内武斗严重，生产停顿，生活困难，知青们纷纷返回上海，伙房也关闭了，她顿顿吃包谷馍就凉水，却不肯回上海。棉花该收了，她动员职工去收。1979年有记者去时，她已重新担任九连的副指导员，虽有孩子拖累，身体非常瘦弱，却主动要求兼任学校的英语教师，但她所在的单位却仍不同意将她登报，说她“文革”时犯过错误，影响不好。那年2月，她所在团场的知青曾集会要求返城，有人劝她当上访团团长，被她“严辞拒绝”了。参见：《她没有玷污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新疆青年》1979年第四期；《鱼耀玲没有玷污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人民日报》1979年5月23日。

类”的青年身上。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年选择人生道路时，决定的力量都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决不可能是早已陈旧不堪的“父死子继”。其次，尽一切可能将各个不同阶级、不同政治集团中的优秀人才吸引过来为己所用，这是一个政权具有自信心、具有生气的标志，何况是对甘愿追随自己的朝气蓬勃的广大青年，更没有要排斥、冷落的道理。再者，人为地将社会分成等级，在历史已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时期，其反动、落后和不合潮流，已不必详说了。而当时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政策，除了理论上的错误以外，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打江山坐天下”的思想，即觉得老子抛头颅撒热血打下的江山，就该让自己的子孙享受的思想，在有些人的潜意识中确实占据了重要地位。

结果是，在这种政策之下，别的青年尚可以“一颗红心，多种准备”，这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则几乎是除了下乡别无选择的。绝大多数青年在下乡前都有过鱼姍玲所曾有过的那种空虚、悲观的精神状况，如一位家长所说：

儿子生长在资产阶级家庭，沾染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高中没毕业就休学，早晨睡到快吃中午饭才起床，放下饭碗就出去，在外边胡吃乱花，逛到深夜才回家，我成天为他的出路发愁^①。

直到将他送往边疆，这位母亲才算松了口气。

在“文革”前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这类所谓“剥削阶级子女”所占比例是相当大的。1962 年秋天成都组织的第一批下乡插队知青中，有半数以上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1966 年 2 月从成都到西昌农村插队的知青中，据一个女知青回忆：“仅仅因出身不好而被拒之于学校门外的，在我场知青中约有百分之六、七

^① 朱洛筠：《我儿子走上了光明大道》，《天津日报》1965 年 7 月 1 日。

十^①。”1963年上海动员知青去新疆，在近2万名赴疆青年中有近2000名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据上海市团委的报告，其中有些资产阶级分子对这一运动的态度是很好的。虽然当时上海市委提出对资产阶级子女以教育为主，不勉强动员，但在大学已对他们关闭了大门，不下乡就只能去港澳或留在家中当“寄生虫”的情况下，许多爱国的、满怀理想的青年，还是毅然走上了支边的艰苦道路，其中很多至今留在那里。

他们与一般社会青年不同，有不少在校时品学兼优，不乏像遇罗克那样有头脑、有才华的青年。曾有负责知青工作的安置办公室干部回忆说，“文革”前每送一批青年下乡时，其中最出众的几个，往往就是这类人。他们很多人是抱着替父母“赎罪”的想法下乡的，但在乡下所受的歧视，往往比在学校时更为严重。

“文革”时期因写《出身论》而在青年中引起强烈震动、最终也因此而遭杀害的遇罗克的遭遇，在当时出身不好的青年中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

遇罗克的父亲原是水利电力部华北电力总局的工程师，母亲是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1957年双双被划成右派，当时遇罗克15岁，他的操行一下子就从“优”变成了“中”。1960年夏天，遇罗克高中毕业，虽然他的文理两科成绩在班级和年级里都是拔尖的，报高考志愿时他还是只敢报考地质专业，以为报考这个冷门也许比较容易用优异的成绩掩盖父母的政治问题。结果，发通知那天，班上只有两个学生什么也没接到，一个是有盗窃行为的学生，还有一个就是遇罗克。后来有人查看了教育部存档的成绩单，证实他考得确实很好，但因操行是中，而未予录取。

遇罗克此时家境已经十分困难，父亲去劳改，剩下一家6口，全凭母亲几十元钱的工资度日，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他决定边

① 夏晴：《抹不去的岁月》，《知青档案》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

准备功课，边参加工作。他觉得去农村能更好地了解社会，更好地锻炼自己，就响应号召，自愿上山下乡。1961年春节前夕，他下到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一个菜园小队，成为北京最早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之一。他被社员选为记工员，与社员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劳动之余，他同几个境遇相似的伙伴刻苦攻读，此时他对自己的前程，还抱有些许幻想，“少年幸遇读书风”，就是他那时写下的诗句。他所居住的那间拥挤的宿舍，虽然终年人来人往，附近电井抽水声很少间断，粪池气味熏人，夏秋蚊蝇肆虐，读书之风却经久不衰。夏天，为了在灯下静坐读书，他穿起老蓝布制服，将裤角、袖口掖紧，外加一盒清凉油。1962年，大学扩大招生的消息传来，他和伙伴们非常振奋，以为作为社会青年去报考，就不会再有人作梗。他积极应试，考后觉得很有把握，不料又是名落孙山。这时，传来蒋介石企图反攻大陆的消息，征兵开始了，他又立即报名，“大学不要，我们上前线去，战斗会证明我们有一颗赤子之心！”然而，他们连检查身体的资格也得不到。新打击落到旧伤口上，使他备觉疼痛和惶惑。

1964年初，他因病离开农村。两个月后，他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翻译资料的合同工，后来又到一个小学代课，始终未能得到一个固定职业。无论他付出什么样的努力，表现出多么出色的能力，但没人敢要一个右派的儿子。正是因多年来为出身问题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和不公遭遇，使他在文革时大胆写出了令人振聋发聩的《出身论》。至今读来，仍让人对他思想的深刻、批判锋芒的尖锐感佩不止。而文章中声声血泪的控诉，尤令人感到不平和沉重。^①

文章提到，每年大学招生完毕，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

^① 王晨、张天来：《划破夜幕的陨星》，载《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第3卷，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

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受优待。不少大学设立“贫协”一类组织，与团组织并列。他尤其提到街道居委会的问题，说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历年积淀下来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有被分配的把握。“出身压死人”，一点不假！^①

与鱼姍玲相比，遇罗克的经历可能更为典型。

到1966年为止，全国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已达一百余万人，这是一个以社会青年占多数，以普通市民子女为主体的青年群体，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有问题”家庭的子女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如上所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在升学、城市就业中几被“淘汰”。虽然也有出类拔萃者，但从整体文化素质和精神状态来看，与“文革”期间的“老三届”知青，自不可同日而语，在社会上所受注意的程度，与后者更是无法相比。

但是，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毕竟是形成了，这与国家的本来意愿是相反的。国家希望的是他们能够尽快融入、消失于那个广阔的天地中间，谁也没有想到，要做到这点，竟如此地难。

这个群体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不确定性：是农，又非农，今天是农，明天就可能不是农，就可能是别的什么。1964年以前上山下乡还未被作为长期性的任务时，很多地方的知青在下乡一两

^①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中学文革报》创刊号，1967年1月18日。

年后便回城或在当地分配了工作，1964年以后，也仍然无法断然地堵住这个口子。在“文革”前，知青回城的途径，很大一部分属于自发“倒流”，一些人在农村无法养活自己，回到城市当临时工，或者做小买卖，甚至投机倒把。也有些人因疾病等原因，通过正当手续回城，但仍找不到正式工作，重新成为社会青年。

在当地分配当工人、当教师的，为数也不少，也有少数青年入党，被提拔做了当地干部。1965年以后，表现特别突出的部分青年典型，也有被保送上大学的。结果是，不断地动员新的知青上山下乡，又不断有老的知青从乡下回城，川流不息的流动，使大量的人力物力付诸流水。这是个从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就困扰着决策者的问题。

第九章

走在与农民结合的道路上

周总理曾经设想，要将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进行15年。他大概料想不到在他讲话后仅仅几年，会爆发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安置工作脱离了原来设想的轨道。但也许是巧合吧，从他讲这番话的1963年算起，15年后就是1978年——我们知道，这正是惊天动地的知青大返城走向高潮，中央即将下决心把这一工作结束的时候。如此说来，这场运动果然进行了15年。

“文革”使这项工作变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它的结束，并不是如周恩来当年预期的那样，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控制了人口的发展。但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一切变化，如果这一计划能够按照原来的方案实施，它就真的能进行下去而且得到成功吗？

事情的发展从来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尽管这一愿望有时是非常良好的。到“文革”爆发前夕的1966年春，不仅安置城市知青工作的各种问题已日渐显露，农村回乡知青中出现的问题也令人颇感不安。上山下乡的动员，已经初现难以进行下去之虞。

一 谁改造谁？

知青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大

背景，也就是说，指导这一工作的理论是否正确、可行；第二，是具体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偏差。

一般来说，知识青年可以分为两类，即家在城镇的下乡知青和家在农村的返乡知青。在下乡知青中，又因去向不同，可分为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的和到国营或集体所有制农场以及兵团的两类。他们由于地位不同，境遇不同，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当然，就其问题的根本性质来说，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前面已经多次分析过，解放后一次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实质性的原因都是经济问题，具体说就是人口与就业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有些应归结于决策上的失误，这里所说的失误指两种，一种是指导性的：如计划经济使城市就业门路越来越窄、对农村人口的长期禁锢等；另一种是政策性的，如解放初期的片面学习苏联，盲目发展重工业，更如1958年的“大跃进”。但还有一些，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世界性问题，如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等问题。这里且不说“大跃进”以后，在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情况下，已找不到比精简城市人口更迅速有效的缓解危机的办法，就是在计划经济的大格局无从更动的前提下，想通过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他们寻找一条广阔的就业出路，这一方案至少从动机来说，也还是积极的；而通过组织在城市找不到任何出路的部分青年上山下乡，来探索这一方案实施的可行性，更是无可指摘之举。至于我们前面所谈到的每一次动员知青下乡，都要从意识形态上开路，不过是解放以来一切行动都要如此的习惯性做法。

问题在于1964年以后，安置工作被涂上了越来越浓的政治色彩。

我们在第七章谈到过，从这时起，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被作为一场改造一代人的政治运动，作为知识青年革命化的必经之路。基本理论是：知识青年要革命化，就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在

现阶段主要是与农民相结合，更进一步说，是与贫农下中农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消灭“三大差别”，而这是从社会主义进入到共产主义的必然途径。

这个理论看起来冠冕堂皇，但知识青年只要到农村生活了一段时间，就立刻会产生与这一理论相悖的各种疑问，这常常使他们的思想产生巨大危机，结果必然是信仰根基的动摇。

一 向贫下中农学习什么？

上述一整套理论中，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知识青年若要革命化，就必须与农民相结合。1967年12月，毛泽东更将这一理论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叫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对于回乡和到农村生产队插队的知识青年来说，到农村后，最感困惑、最难以接受的，往往就是这一点。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让我们向农民学习什么？”一位高中毕业生在写给他的中学老师的信中说：

农民个个互相包庇，互相嫉妒，互相打击，互相气人，自私自利，自高自大，说话粗鲁，极端低级，吵嘴打架，消极怠工，干活拣轻怕重，还不讲卫生。这种生活环境我无论如何也过不惯。从这，我更体会到毛主席所说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句话多么深刻了。要提高农民的觉悟真是不简单的事哪！

这封信写于1958年年初。显然，1964年以后，报刊上是不会再公开发表这样直率的文字了。但即使后来树立的知青典型，也仍然存在这一问题。黑龙江省的知青典型胡建良在回忆自己初下乡的经历时，是这样说的：

初到那里，我看到的尽是些落后现象。比如，有的人干活收工时，

随便拿队里的土豆、胡萝卜；有的人干集体活不积极，起早贪黑地在一小块荒地打转转等等。看到这些，我觉得这里的农民真是“自私、落后、保守”，和我在小说里、电影上看到的农民差远了，没有一个像《创业史》里的梁生宝，也没有一个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高占武和曹茂林那样值得学习。

不必再多举例子，因为每个下乡知青，都有过同样的体验。

既然证明农民比知识分子更革命、更进步，是让知识青年向农民学习、与农民结合的必要前提，这个问题就非解决不可。对于上述的前一封信，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所回复的公开信是这样说的：

农民的确是有缺点的，但是，你把农民的缺点过于夸大了，你在上面所列举的有些缺点，在一些知识分子身上，不是存在的更严重吗？何况，农民虽然有缺点，但是，他们是劳动者、是生产者，是自食其力的人，是为人类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人。劳动者和生产者正是农民最大的特点，他们的优点是：诚恳、朴实、敦厚、勤劳。你应该首先学习农民身上这些最主要的品质。^①

这是1958年的说法。再看1966年初的：

一些知识青年在下乡之前，从道理上也知道农民群众很伟大，有许多优秀品质，可是到了农村以后，却又觉得农民自私、落后，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这是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从本质上看农民。农民，主要是占农民大多数的贫下中农，他们在旧社会受苦最深，因此，在农村中，他们最革命，他们最听党的教导，他们热爱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坚决。为什么有些农村知识青年看不到这些最本质的东

^① 谭启龙：《在农业劳动中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人——复焦洪瑞同志》，《中国青年》1958年第1期。

西呢？胡建良同志的亲身体会告诉我们，最主要的是个思想感情问题。在你还没有从思想感情上和农民真正打成一片以前，总是容易看到一些表面的、个别的现象……但是，在你真正从思想感情上和广大的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以后，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了，才会真正了解他们，对他们可贵的优秀品质，就能看得清了……①

上述两段话中回答的三个问题，正是解放以后始终存在于理论上的几个误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在旧社会“苦大仇深”，所以他们最有阶级觉悟，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坚决。事实上，这是把农民在土改中分得土地、获得一些实际利益后所产生的“感恩”思想片面地拔高了。“文革”结束后，有学者对历史进行反思后，如此分析了这种感情：

“感恩”作为一种情感类别，品格并不高级，带有很重的自私属性。感恩是以恩赐为前提的，也会因恩赐的失去或中断而减弱或消失。感恩的转化物也不会是高品格的心理或行为，只能是：一、依赖；二、恩忠。

在“感恩”被美化、被神圣化之后，中国不仅出现了举目皆是的“依赖现象”，而且还出现了“依赖”的极端劣质行为——将“依赖”本身作为一种特权，一种威风，以显尊于那些无权依赖的人。……

多少年来，中国文学以及一切宣传品都进入了一种梦幻——以为小农的“感恩”意识是通向“信仰马列主义”的桥梁和媒介，或者简直就认为这种“感恩”意识本身就是马列主义觉悟！②

说的虽然是文学现象，在这里也同样适用。朴素的阶级感情并不能代替马列主义觉悟，何况这种所谓阶级感情，常常也只是宣传中所一相情愿的说法。只是在当时，谁要敢对这种论调产生怀疑，

① 胡建良：《我向老贫农学习了什么？》，编后：《知识青年与工农结合的关键》，《中国青年》1966年第6期。

② 毛志成：《告别小农文明》。

马上就会被扣上“思想感情有问题”甚至“立场有问题”的帽子。

其二，农民是劳动者。这话固然不错，劳动者、劳动，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但这里的问题是，它是把知识分子作为农民的对立面而言的，农民是劳动者，所以知识分子就应该向农民学习，那么知识分子是什么呢？难道不是劳动者吗？难道只有农民所从事的那种直接劳动、简单劳动才是劳动，才值得赞美，而同样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所需要的间接劳动、复杂劳动、文化性劳动就不是劳动，就应该遭受排斥和无情的践踏吗？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看法，本身就是农民意识的一种典型表现。

第三，将存在于一些知识分子身上的农民意识，与农民所具有的普遍特征混为一谈。潜台词是：农民自私，知识分子就不自私吗？可是农民身上所有的优点，知识分子又哪里具备呢？

将知识分子作为农民、作为劳动人民的对立面，这是改革开放之前几十年我国宣传工作上一个显著特征。这既是农民意识的一个典型表现，也反过来加深了农民对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的敌意，人为地扩大了双方间的隔阂，这与“消灭三大差别”的口号，已经是背道而驰的了。这便产生了理论上的一大漏洞。

上山下乡知青，便处于这种隔阂之中，他们具有的文化优势不仅得不到发挥，反而成为必须甩掉的包袱，必须改造的罪过。由此而来的第二个问题便是：

二 怎样与农民结合？

“结合”其实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怎么样才算是结合了？用当时常用的政治术语表述，就是和农民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了，可是农民的政治立场与工人阶级的立场并不能完全划等号，而且，即使是工人阶级的立场，在当时风云变幻的政治背景下，也没有明确的标准。那么，和农民一样，就算是结合了吗？那就是每天出工、收工，脸朝黄土背朝天，没有哪个知青甘心一辈子过这

样的日子，女知青更是担心会像农村妇女一样，围着锅台转上一生。

一个1965年下乡，在农村度过十余年的知青深有感触地对笔者说：“我认为知识青年的悲剧就在于，他们要想在农村有所作为，就要与农民融为一体，可是知识青年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自己与农民融为一体。”这的确是很多想在农村有所作为的知识青年都曾经历过的苦恼。这里有知青自身的原因，但农民对知青的戒备、排斥心理，恐怕是更重要的因素。

农民和农村干部，对于读过书的人，哪怕他原来就是自己本乡本土的子弟，也怀着相当深的疑忌心理，这种隔阂有利害关系上的，也有文化上的，其深刻的程度远非单纯热情的知识青年所能想象。如果说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对秀才们多少还存在某种敬畏，还不敢过分加以侵害的话，对于知青，就连这一层顾虑也不存在了。

从切身利益上考虑，农民和社队干部当然不欢迎知青回乡，有限的土地、有限的收入，又要多添上几张嘴，他们认为这给他们增加了负担，“是国家揩生产队的油”。不少队干部担心知青有文化，比自己强，会抢了自己的乌纱帽。即使没有存此念头，也担心知青不好管，“回乡干部架子大，回乡学生不听话，回乡军人管不下”。上面的例子也送到了，知青对农民尤其对干部的很多做法看不惯，爱提意见，当时又正值“四清”搞得农村干部人人自危，很怕自己瞒产私分或假公济私的举动被揭发。

知识青年看不惯农民，农民同样也看不惯知识青年，不仅看不惯青年的乱提意见，也看不惯青年的“说话咬文嚼字”、“拿腔作调”、“臭要面子”、“穷讲卫生”等等。他们出于本能，感觉到知识青年与自己不是一类人，他们对文化和有文化的人从来怀着一种偏见，当时的政治气候对这种偏见也起了某种助长作用。一面动员知青回乡，急切地希望他们在农村安心扎根，一面又在宣

传中有意无意地为二者间的矛盾加温，这种南辕北辙的事，在那个年代是太多了。

再者，即使有少数知青自觉地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变成了道地的农民，但农村中强大的家族、宗族势力，也未必就能见容于他们。这种宗族势力在解放后虽然屡遭打击，却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非同族的异姓农民尚且要受排挤，更何况知青。

许多知青的热情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冷却了，但他们也因此而真正了解了农村和农民，并在这一过程中成熟起来。

三 在学校学得的文化知识有什么用？

这也可以说是知识青年在农村能否发挥作用，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与前一个问题一样，它也贯穿于知青运动的始终。国家对这一问题并非不重视，1964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中就曾特别强调说，怎样使下乡知识青年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是有关培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后备骨干的一个大问题，也是知识青年十分关心的问题，只有当他们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既用上体力，又用上文化科学知识，各得其所，各展所长，确实看到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又真正大有可为时，才能牢固地把根扎在农村。

这的确是知青能否在农村巩固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毛泽东的那句名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才会被人们一喊再喊。但是，喊口号是一回事。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却是另一回事，除了一般所谓的要领导重视以外，还必须具备几个前提：首先，必须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尊重科学技术，尊重文化，使知识青年能够用先进的文明去影响和改造农民；其次，在农村的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使农村感到有学习文化、引进人才的需要；第三，即便如此，也仍然要有一套比较系统完善的培养人才、保证他们发挥

作用的制度。可惜的是，这三点在当时的中国农村都是不具备的。

上面我们讲到，解放后一系列运动的矛头，总是瞄准知识分子，总是将他们作为工农劳动人民的对立面，作为改造对象，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整个社会对文化、对文明的排斥与敌视。处于这种大气候下的知识青年，一下乡就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无法调整自己与农民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接受农民的改造，是把自己本来具有的优势，把自己在学校学得的文化作为被改造甚至被抛掉的对象，他们又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特长，又拿什么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呢？

第二，从解放直到“文革”结束，我国农村一直在个体小农经济的落后状况下徘徊，一锹一锄的生产方式确实使先进的科学技术找不到用武之地。我们在第二章分析青年志愿垦荒运动的教训时提到，当时已经有人认为，在目前还只能用锄头挖土的情况下，组织过多的知识青年参加垦荒是不适宜的。我们还提到，这条意见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结果是，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于下乡知青中。1964年董加耕的事迹见报，曾经在青年中引发一场讨论，焦点便是，像这样成绩优秀的高中生下乡，是不是太可惜了。有下乡知青说：

即使在这广阔的农村天地之间，也觉得有些狭窄了，真是荒废了年华，虚度了光阴，我对农业的贡献不大。请想，我一样和社员锄地、推车，就无所谓谁的贡献大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受了我们生产队条件的限制。我们用的农具，就是锄、镰、锨、镢四大件，谈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那就谈不上了。因此，在我们这样的地区干下去，是没有出息，没有前途的。

锄地还用得着直角、钝角吗？拉粪还用得着碱酸盐吗？就是把农业的一套技术学会，原来学的书本知识又生疏了，也是得不偿失。^①

^① 海涛：《我也感到“有力无处使”》，《新华日报》1964年12月24日。

这都是十分现实的问题。中央文件虽然要求各地党团组织不要把知青当成一般的劳动力使用，而要注意发挥他们的科学文化知识特长，但在农村生产力如此低下的背景之下，又从何发挥呢？

第三，虽然称为知识青年，实际上文化程度最高也只不过高中毕业，有的只是高小毕业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无论是农作物的栽培和品种改良，还是农业机械的制造和改进，都难以胜任。即使如防病治病、担任中小学教师，也不是凡读过中学，有了一些基础知识，就能够像当时宣传媒介所宣扬的那样干出名堂来的。要想真的在农村有所作为，他们的知识太不够了，他们需要再受培训，再学习提高，但当时的农村，大多数却没有为他们创造这一条件。这种不上不下的状态，正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十分尴尬之处，倒是那些大学或受过专业训练的中专毕业生，能够发挥的作用更大些。

由此说来，让知识青年下乡去当农民，从发挥作用一面来说，究竟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知青典型的经历为例来进行探讨，他的名字叫柳昌银。

柳昌银是1957年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万宝人民公社新兴大队参加农业生产的。他从小丧父，由母亲一手抚养长大，家里条件艰苦，所以很小就下地帮母亲干活，逐渐对水稻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上高二时，一场霜把社员辛辛苦苦种的稻子全毁掉了，他受到极大的震动。本来他是个好学生，学校已经有了将他保送上大学的意向，但他等不及，他恨不能立刻回到家乡，去培育能够在无霜期就成熟的稻子。他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劳动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就这样，主要不是因为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而是怀着改造水稻品种的理想，他回乡参加了农业生产。据当时的报道说，他第二年就培育成功

了耐寒、早熟、高产的“万宝十一号”水稻良种。为了使培育出的良种更有适应性，他主动离开条件较好的家乡，到位于山区的昌图去进行试验，也取得了成功。万宝地区将他的良种推广开来，使水稻的平均亩产上升到400多斤。

柳昌银因此而成了知识青年在农村大有作为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典型。他于1962年入党，1964年出席了共青团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他曾一度以“长白山下‘种子迷’”的形象名扬全国。

“种子迷”这一称呼对他来说实在是恰如其分的，据曾经先后为他写过9篇报道的女作家在30年之后回忆说，“文革”期间他曾屡遭磨难，他精心培育的良种都被烧毁，他几乎发疯，但这一切过去之后，他一如既往地仍然倾心于他的良种试验，但他没有著作，没有职称，没有人肯承认他。他属于“鬼迷心窍”的那类人，是神人。她说，写柳昌银，贯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她也与柳昌银成了共过患难的朋友。但她也承认，柳昌银的这一段人生道路，是一个悲剧。^①

悲剧就在于，以他的执著，他的才干，他的研究成果，却只适用于家乡的局部地区，甚至在局部地区也未能得到公认。他终于没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农业专家，也就没能为家乡的水稻生产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不是他一人的悲剧，而是那一代人的，他们太相信“卑贱者最聪明”、“实践是最好的老师”等教导了，不知道许多专业知识，其实是多少代人不断探索、实践得来的智慧结晶，以为不必经过正规的、理论的、科学的专业学习，就可以凭“土知识”、“土办法”创造出前人所未有的成果，这只能是自欺欺人。自学不是不能成才，但是盲目自学而无专业的正确指导，则成不了才。正是在这一点上，十多年的片面宣传，使一大批青年走上歧途，这也是多年来形成的，至今未曾认真清算过的一个

^① 此段叙述根据1992年9月笔者与女作家何鸣雁的谈话记录。

误区。

这里当然毫无指责柳昌银之意。这一代知青中，有那么多人像柳昌银一样，热爱自己的家乡，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汗水抛洒到了家乡的土地上。我们要说的是，如果当时的国家能够更注重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农村能够像如今这样开放和流动，如果社会对文化、对知识分子能够有比较公正的态度，这些知识青年所挥洒的生命和汗水，就不会白白流淌，而会得到比他们实际所得更大更多的收获。

二 靠什么来保护自己？

我们上面分析了在指导上山下乡工作的理论上存在的诸多误区。不过，在“文革”之前，当一切尚处于开始阶段的时候，实质性的矛盾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最突出的问题，还是在具体操作上的。

从动员安置知青工作一开始，各个环节上的问题便随之产生。

首先就是城市干部在动员知识青年下乡时采取强迫、欺骗手段的问题。早在1964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中就曾针对这一问题明确表示：“有的地方，不愿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不等知识青年思想酝酿成熟，就匆匆忙忙地把他们送下乡去，引起了不良后果，这是值得今后注意的。”“过去有的地方，用物质引诱和欺骗的方法，到处许愿，又不能兑现。结果引起青年的反感，给以后的动员和巩固工作带来麻烦，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中央还一再强调对于知青下乡，“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强迫命令”。

可矛盾在于，国家对于每年安置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是有明确计划的，而真正自愿下乡的知青，又只是少数，完全靠其觉悟，靠其自愿，根本无法达到国家要求的人数；而我们上面谈过，

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又是地方干部所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而且还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加上每年任务压下来时，不仅时间紧迫，无暇细细动员，而且在人数上也有硬性要求，还经常要求地方“只能超过，不能减少”，这使所谓的“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强迫命令”只能是一句空谈，地方各级组织为完成任务，只能不择手段。

强迫是不太能够行得通的，最简便有效的办法，就是“引诱”，包括物质上和前途上的两种：

过去不是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动员，而是用皮鞋、皮箱、被褥，用升官发财，用发展入党、入团来诱惑知识青年下乡。^①

“文革”期间的大批判文章多夸张不实，但以物质利益，或以入党入团来动员知青下乡的做法，的确比比皆是。知青下乡后发现受了欺骗，会感到极其愤怒，所以“文革”一爆发，就有众多知青从农村返回城市，向把他们“骗下乡的”干部发泄怨气，大造其反。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想一想，这些干部们除此之外，又能以什么方法，把大批的知识青年动员下乡呢？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下乡以后。当然，如果在农村的处境大致顺遂的话，上面的前一个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文革”前，矛盾最突出、最集中的地方是各类农场。

1962年以后，最早也是最大量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地方，是国营的农、林、牧、渔场，以及大量集体所有制的地方农场，这些农场的知识青年并不像插队知青那样生活在农民的包围之中，怎样与农民相处、怎样在农村发挥作用的问题，也不像插队知青那样突出，但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上述关于知青工作中管理体

^① 《人民日报》1967年2月20日黑龙江革命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造反派署名文章。

制上的、领导素质上的诸多弊病，往往因农场知青的相对集中而突出地暴露出来，就像“文革”期间矛盾的爆发之处总是在生产建设兵团一样。

我们这里先按时间顺序，举出几个实例：

一 云南橄榄坝农场

这是1963年由当地团组织向团中央作的汇报。

1961和1962两年，该农场先后吸收了两批85名青年，占全场职工总数的2.6%。这些青年都是没考取高中的初中毕业生，是由云南省农垦厅统一安排，从昆明市动员来的。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仅有15岁，最大的也只有19岁。初来时，都把到农场当作就业之路、安家之所，还是比较安心的，对农场也比较满意。

到农场后，他们大部分被安排在生产队参加体力劳动。日子一久，因无人过问，住房破漏，已有五分之四的人迫切要求回家，半数以上的人正式提出申请，三人私自逃跑；有的向外写信，说农场坏话，要家长出面干涉，叫老同学不要再来。有个大学教授得悉农场的混乱情况和不让他女儿回家之事，已找到省委统战部去告状要人。这些青年虽然暂时被农场用不给转户口的办法硬留了下来，但根本无心劳动，随时借机发泄不满情绪，不服从队长分配，找岔子和队长吵嘴顶牛，经常装病旷工。农场是按劳动日计算工资，有人从家里要钱维持生活，手头有钱就干脆什么都不干，去集市上闲逛，或搞个竹筏子到澜沧江上游泳。3月初，有两人为一件小事动刀殴打，一个手臂被刺穿，送公安局处理。有人听说内地有人经这儿越境，也想试试，有4人以游泳为名企图到缅甸闯一闯，被边防哨截住，才未实现，还有个别男青年在女青年集体宿舍过宿。还发生过一人吞服安眠药自杀事件。

该团组织的汇报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责任，主要应该由农场来负。农场把这些青年看成是包袱，埋怨上级为什么把他们搞

到农场来。团组织不健全，下面支部根本就没人管。农场负责人不考虑他们年纪小，就和成年人一样要求，哪怕累倒了起不了床，领导也不及时解决。知青们住的是竹架的草棚，一刮大风就倒，一下雨就漏水。大部分职工到农场是带家属安家的，可以自己改善伙食，知识青年下工却没人管，还得自己买菜做饭。他们不会安排生活，一领到工资就很快花掉，然后就常喝“玻璃汤”（即清水汤）。居住分散，没有一定的生活管理制度，甚至病倒好几天领导连知都不知道。他们很少能看到报纸杂志，除了一半月看一次电影，没有其他文化生活。知青旷工，农场干部采取扣工资、扣米的方法来惩罚，常常引起不满和顶牛。有的工人讽刺他们是来劳改的，干部不仅不去制止，反而附和。有个姓梁的知青与卫生所女青年谈恋爱，经常旷工，卫生所负责人就发动群众斗争女青年，不让她和梁在一起，梁感到恋爱无望，觉得在农场没前途，回家没出路（其母改嫁，对他不管），结果自杀身死。很多青年说：“我们是被骗来的，在这里尽干些杂活，学不到什么东西，没有前途，呆下去也是白白浪费青春。”^①

二 河北省唐山市柏各庄农场粗暴对待下乡知识青年

这个农场在1963年5月以前，曾接收了1402名唐山市的知识青年到场参加生产劳动。农场在对待下乡青年的工作上存在不少问题：

1. 大会批判，拳打脚踢。

农场有些干部对下乡青年歧视、讽刺，说他们是“白面书生”、“小姐”、“为吃大米来的”。解决思想问题，方法简单粗暴，动辄采取大会批判、辩论的方法，有的甚至拳打脚踢。例如，三

^① 《橄榄坝农场的知识青年普遍要求回家另谋出路》，《团的情况》1963年第1期。

分场四队郭玉池（团支部委员）与一个工人闹不团结，队干部硬说郭受坏人指使打击积极分子，召开了三次团支委会、三次团员大会批判他的思想，结果郭玉池没要团的关系就离场回家了。他离开农场时对一同来农场的青年袁慧琴说：“劳动再苦也能受得了，可是这种辩论受不了，实在呆不下去了。”三分场四队张国才，因与班长口角，队干部就开大会辩论他，并且把他捆绑起来，用脚踢他。有些青年说：“我们见到书记、队长就害怕，有意见也不敢提。”

2. 扣压口粮、私拆家信。

1963年7月，工人李五奎家中打来电报说他父亲病重，让他请假回家。这封电报在队干部手中压了5天，以后批准给他4天假。他到家第四天，父亲因患结核性脑炎住了医院，医生要家属看守，因家中无人，便由他看守两个半月。回农场时从居民委员会、派出所和医院开了三张证明信，交给生产队支部书记，说明超过假期未归的理由。可是队干部不看证明信，硬是决定不发给超假期间的口粮。还有的队干部私拆工人的家信。

3. 漠视健康。

女青年在经期，有的队干部仍叫坚持下水劳动，可以安排一些轻活的也不给安排。她们反映，在女工中约有80%以上的人有妇女病，有的得了关节炎。农场对病号照顾也不够。四分场二队王秀芝，有妇女病、关节炎，右腿麻木，总场医院诊断后叫她每天坚持针灸，但生产队不准假。三分场四队女工张淑兰在1962年得了肾炎，在总场医院住了半个月，出院时给一个月假，但只休息了半个月，生产队干部就叫上班了，还说她是装病。

4. 女知识青年被逼婚。

1963年6月，天津市有12名女青年到该农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翌年春节时，其中有三名回津，坚决表示不愿再回农场。市团委和市妇联的干部访问了她们。她们说，主要是嫌那里男职工

逼婚、骗婚；劳动定额高，工资收入低；干部不民主，作风很生硬；劳动保护差。下面是她们被逼婚、骗婚的经过：女知青李淑莲。19岁，1963年6月到七分场三队落户后，表现很好，担任小组长。12月，该队四班长李成忠（党员）对她说：“小李，你看人家都结婚了，你不眼红吗？我给你介绍我的干弟弟李全祥，今年25岁，在十分场工作，家中只有一老母，你进门就当家。”李淑莲不同意，两天后又又有几个人给她“介绍”对象。李淑莲被纠缠得没法，勉强同意和李全祥结婚。婚后，男方要她把户口迁到十分场，并说：“十分场有活你就去做临时工，没活就去家侍候我母亲，工资不能给娘家寄。”李淑莲不同意，说：“我是来支援农业的，不是当家庭妇女的。”不久她要求离婚，并要求调到别的分场。女知青王丽珠，年方16岁，在七分场二队队长丁树春的包揽下，和班长崔凤友结了婚。婚后两人不和，男方对王丽珠说：“女人就是男人的玩艺儿，就得听男人的摆布。”并把她捆起来，锁在屋里。她也坚决要求离婚。女知青郭伟燕，16岁，也是由于该场男青工用各种方法围攻她，逼她结婚，吓得她不愿再回场。郭伟燕的母亲说：“我女儿是去支援农业，不是去那儿找对象的，他们这样污辱妇女，我们的孩子不能去啦。”她们反映，这个队给女青年介绍对象成风，有时一介绍就是四五个，不同意就进行“谈话”，形成变相逼婚。

结果到1963年10月底，来农场的这批知青中，经批准或自动返回城市的已达961人，占总数的68.5%。留下的青年中，也有许多人不安心在农场劳动。

四 北京延庆农场发生严重污辱下乡女青年事件

北京市延庆农场女工李×，是1963年高中毕业生，共青团员。她响应党的号召，不顾家庭阻拦，毅然到农场参加劳动，表现很好。1963年10月15日，因偶感风寒，头晕发烧。农场会计吴成

禄（地主子弟）、炊事员刘宝庭借口说她得了“邪病”，纠合本场工人王从正、孙全然，在15日凌晨2时闯进女宿舍，把李×从床上拽起，强行给她“辟邪”。吴成禄、孙全然把她的两臂拧在背后，王从正搂着她的腰，刘宝庭挥舞尖刀，大吼大叫，逼她承认是“鬼神附体”，还用4.3厘米的钢针在她的头、颈、手指尖等处乱扎，有的指尖被扎了四五针，有的针扎上去十几分钟才拔出。在这样横暴的折磨面前，李×严厉斥责吴成禄：“我是共青团员，根本不相信鬼神，决不向你们妥协。你是共青团干部（小组长），为什么搞迷信活动？”吴成禄竟又指使刘宝庭脱李×的衣服、乳罩、裤子，并乱摸乱抓她的乳房，腋窝和大腿。李×当时曾哀告他们不要这样污辱她，说：“我是个姑娘，你们这样污辱我，以后叫我怎么见人？”但他们依然不听，一直胡闹到凌晨4点多钟。他们走后，李×立即昏倒，以后十几天下不了床，经医生诊断，已患“反应性神经症”。和李×同住一宿舍的其他5名女知识青年，目睹此事，曾出面制止，但刘宝庭竟威胁说：“以后也这样整治你们。”此事在全场职工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北京市委很重视这个情况，指示有关部门认真处理。吴成禄、刘宝庭两犯已被逮捕起来。

通过以上所举的例子已经可以看到，最突出的问题，是知识青年应有的权益甚至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女青年尤甚。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领导，这里有领导者个人的问题，如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但是问题如此集中，显然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首先，这源于农场干部对知识青年的整体看法，这种看法也就是当时社会上对知青的看法。在政治条件以及其他条件都相对较好的青年或进入大学或应征入伍或留在城市就业之后，下乡和到农场的青年总会给人一种“被淘汰”的印象，这是无论怎样宣传都无法掩盖的事实。于是，在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环境下，一些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干部，会将这些青年看作是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来加以歧视；下乡青年本身所混杂进的工读学校学生

甚至在社会上沾染了劣迹的流氓小偷等人，更使农场干部和职工加深对他们的偏见，他们都认为这些青年是城里不要的“渣滓”，北京一些农场就公然称这些青年为“渣儿”。他们对于城市将这些包袱甩给他们非常反感，这股怨气当然就宣泄到知青身上。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是下乡知青都被户口和粮食关系严格控制着，对于农场再不满意，真要离开，也有诸多顾虑，用上述例子中干部的话说，就是反正想跑也跑不了。这使当地干部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对于知识青年享有的是至高无上的、基本上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他们可以对知青为所欲为。一旦认识到这点，后果就很可怕，动辄扣青年的工资、口粮，随意打骂知青，开批判会，甚至污辱女青年一类事件，便如上述那样层出不穷。本来，在这里，国家的政策、法律是应起到制约作用的，但在当时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知识青年却没有任何手段可以用来保护自己。农场是知青集中的地方，农场干部对知青所享有的权力，往往超过人民公社、生产队干部，问题的出现往往便更明显、更集中；这一问题，到“文革”后知识青年大批到农场（当时多已改成兵团）去时，就变得更加严重了。

唯一能对这些干部的做法起到制约作用的，是中央文件，事实上当时的知青和家长，也都将希望寄托在“中央说话”上。“文革”前，中央已经就农场干部迫害知青问题专门发出过两个文件，也可见问题发展的严重性了。

1964年5月9日，也就是中央开始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的时候，鉴于农场所暴露的问题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不利影响，直接阻碍了对于知青下乡的继续动员，中共中央特地批转了共青团中央关于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受到歧视、打击、污辱的4份材料（即如上述），批示说：

请大家看看这四份材料。这些材料讲的都是关于知识青年到国营农场参加农业生产后遭到歧视、打击、污辱等粗暴对待的问题。这些事情的性质是严重的，影响很坏。据了解，有的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很值得重视。知识青年下乡和回乡是加强农业建设，实行农村文化革命的重大措施，是知识青年革命化的重要道路。这条道路刚刚开辟，阻力很大，全党应加强领导。对于知识青年下乡的行动应当积极支持。^①

批示还提出了 4 项解决措施：

1. 对于来自习惯势力的阻挠，应予说服教育。
2. 对于那些官僚主义分子的压制、报复、打击行为应当严肃处理。
3. 对于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应当依法严加制裁。
4. 必须迅速加强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的政治思想工作。

批示并要求有关的领导机关，对于团中央所发的 4 件案例，认真地加以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的办法和结果报告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还决定将以上典型案例和中央批示下发 2 万余份，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其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是很大的。

本着这一文件的精神，当年 10 月，农垦部还特地发布了《关于国营农场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纪律规定》。规定中承认，据各地反映，有不少农场发生了歧视、刁难、捆绑、打骂、扣工资、扣饭、诱婚、逼婚、甚至奸污下场青年的不法行为，严重地破坏着动员城市青年下乡上山运动，摧残着青年们的身心健康，给党的农垦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和不良政治影响。该部表示要对这一系

^① 《中共中央批转共青团中央关于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受到歧视、打击、污辱的四份材料的批示》，（1964 年 5 月 9 日）。

列事件进行严肃处理，并且特规定了以下几条纪律：

1. 要对下场青年一视同仁。对女青年在住房、劳动保护方面加强管理。任何人都不得对下场青年歧视、排斥或刁难，违者应给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应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

2. 对下场青年的缺点应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不应简单从事。对他们犯有严重错误，需要给以适当纪律处分的，必须经农场党委讨论决定。任何人都不得对下场青年擅自停餐、饿饭、扣发工资或拘禁，更不许捆绑、打骂或施加其他变相体罚，违者除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或斗争外，还要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行政纪律或法律处分。

3. 必须贯彻婚姻政策，开展晚婚教育。青年下场后，任何人都不准给他们强行介绍对象，更不准诱婚、骗婚或逼婚，如有违犯，轻者批评教育，重者应给予纪律处分，特别严重的应依法论处。

4. 必须加强法制观念，尊重下场青年的民主权利。不准扣压、私拆下场青年的来往信件、电报，非法搜查人身衣物，不准阻挠越级反映情况或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违者严肃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应给予法律处分。对由于虐待、迫害造成人身残疾、死亡或强奸女青年的违法乱纪分子，不论资历高低，职位大小，都必须严肃处理，不得姑息迁就，情节严重的应依法严惩。如系地、富、反、坏分子，更须加重治罪。^①

这是迄今可以见到的“文革”前对于这类问题最具体、最严厉的一份纪律规定，它对于那些为所欲为的农场干部，无疑是有镇慑威力的，但它毕竟不是法规，而且下面一旦具体执行，就有松有紧了。

从1965年农垦部党组向中央所作的关于湖南省湘阴杨林寨、江永县回龙圩、铜山岭、桃川等4个农场歧视、虐待和侮辱下乡青年的严重问题的检查报告来看，这一规定并未能有效制止该部

^① 《农垦部关于国营农场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纪律规定》，（1964年10月21日）。

所属农场中此类犯罪事件的发生。当时中央对此问题所作的批示说：

农垦部这个检查报告所反映的情况，主要是严重违法乱纪、干部压迫、剥削青年，对下乡青年生活漠不关心。这是严重的官僚主义者，如果不把这些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整好。那么，这些农场的领导，就永远会同贫下中农、同下乡劳动的青年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中，就不会办好社会主义农场。

批示还要求各地把所属农场的工作都检查一次，对这类违法乱纪的行为，应在查实后严肃处理^①。

从这份批示看，即使是中央，对下面干部的这些作为，也没有明确认为是在犯罪，而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既然严重违法乱纪、压迫剥削青年的行为，都只不过是“官僚主义”，至多也不过是“严重的官僚主义”的话，那么干部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农垦部对于这类问题，还是重视的。它所属的国营农场，毕竟属于“王法”可以管得到的地方，而在一些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地方农场，问题则更为严重。即使在中央有关文件发布之后，仍然是“尚未引起领导重视”。按照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于1965年4月向中央作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说：“更严重的是有些地方既不上报，也不检查处理。还有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和法院，对严重污辱和迫害下乡青年的案件，不告不理，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会议认为，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可见，在其他有些地方，问题可能比农垦部所属各国营农场更严重。

^① 《中共中央批转农垦部党组关于湖南有些农场干部迫害下乡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的批示》，（1965年5月20日）。

这类问题在农村生产队也同样存在，只是表现方式略有不同而已。除了像农场一样对知青政治上歧视之外，主要表现在与社员同工不同酬、劳动强度大和女青年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等几个方面。亦即如当时中央文件所指出的，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劳动“底分”过低，加之生产队派工不合理，同工不同酬，生活不能自给；有些年少体弱的青年，因劳动强度大，休息时间少而影响健康，特别是有些水田地区，百分之八、九十的女青年患妇女病，甚至发生死亡事故。这是在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农民的物质生活在当时已经十分贫困，但有些地区的知青，甚至达不到一般农民的水平，这一方面是因为农民不愿知青分沾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城里人”的一种敌视心理，有的地方对知青在劳动上要求过急过高，甚至专派重活给他们干，理由便是“让他们尝尝当农民的味道”。据各地反映的情况看，如陕西扶风县黄浦公社89%的回乡青年口粮都比一般社员低，而且质量差。又如不少地方给知青的自留地分得很少甚至不分，有的地方按社员一分五、知青一分的标准分配自留地，甚至如安徽肥东县电站大队从63年冬到64年春回乡的4名知青，到5月还没分到自留地。还有很多地方的知青，住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只能住到生产队的办公室，或仓库甚至马棚里。

插队女知青与农场女知青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中央文件谈到：

现在，有不少下乡青年，尤其是女青年，早婚的很多，对他们的进步、劳动影响很大。应该加强晚婚节育的教育。有的地方发生过逼婚、骗婚、污辱妇女的现象，应当及时处理，并防止今后再发生这类问题。^①

① 《中共中央批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1964年4月24日）。

如果说国营农场尚有国家的纪律管束的话，对于农民，则连这点约束都难以奏效，事实上直到“文革”以后，对于下乡插队知青的处境，始终无人能拿出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

总之，从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为了能够将这场运动顺利地、长期地进行下去，国家就十分重视解决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但是始终收效甚微。究其原因，除了受当时种种政治、经济的大原则的制约之外，关键在于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也就是说，知青无法将保护自己的“武器”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只能企盼于“上面”的眷顾，即靠得到中央的注意和中央发布文件。而中央即使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决心再大，做法再严厉，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阵风。大风刮过，依然故我，这已是多年来干部群众都习以为常的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突出现象。结果便是知青的状况，始终未能得到根本的改变，“文革”期间这类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直至中央不得不采取将几名罪大恶极者处以极刑以平民愤的方式，却仍然无法杜绝，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四清”运动的开展，使知青在农村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了。

1963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在全国掀起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年后的1964年9月，中央又发布有关这次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即“后十条”，规定这次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是在农村引起巨大震荡的“四清”运动，下乡知识青年也受到这场运动的深刻影响。许多工作组将农村中组织阶级队伍等一系列做法运用到知青身上，结果，第一是使一部分青年被作为运动的依靠对象，参与了对当地干部的斗争和冲击，恶化了与干部与社员的关系，甚至到了难以在当地立足的地步；第二是使相当多出身不好或有一些不良习惯的知青，被当作阶级敌人和被整顿清理的对象，遭到打击；第三，它也使知青之间的关

系变得紧张甚至恶化了。

我们这里引几个当年四川知青的回忆为例：

1964年4月从成都下到四川省会理县鹿厂公社的知青回忆说，当年收完大春后，县里来了知青整顿工作组，把鹿厂公社209个知青统统集中在公社进行整顿。七整八整，有个14岁的小知青被整得魂飞魄散，哭着交待了曾偷砍生产队的包谷秆吃，还偷盖公章私自开条子到公社割肉吃的“罪行”，然后在身上一无钱、二无粮的情况下，横越大渡河，竖攀万丛山，历时一个月，硬是一步一拖回了成都^①。

工作组还将知青按照出身不同划成三六九等，1964年从四川合州下乡的知青回忆说：

知青农场办起没到一年，便驻进了四清工作组。于是，农场一百儿十号知青顿时分了等级，红五类子女、黑五类子女立马有了区分，对红、黑两类出身的知青召开了内容及形式都不同的会。

工作组长是位湖北佬，复员军官，说起话来声震屋瓦。他的口头禅是“枪打出头鸟”，每说此话时，二目放光如手电筒般四射，使人心惊胆寒。依了这位工作组长的分等划类，我们农场里便有了一个应予诛灭的黑帮，这个黑帮由27名黑五类子女构成，为首者便是其父解放前曾任西南长官公署秘书长的何姓知青，被定为农场最大之黑堡垒，由工作组长组织知青围而攻之。^②

更有甚者，1963年10月，曾有300多名成都知识青年到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叙永县后山茶场落户，一年以后，省、地、县三级的“四清”工作组进驻茶场，不知出于什么背景和动机，便将这批大的十七八岁，小的十四五岁的知青“娃娃”当成了妄图

^① 黄新生，《杨瓜娃儿》、《知青档案》。

^② 戴克学，《老知青文革读书梦》，载《龙门阵》1993年第4期。

变天的阶级敌人：

县委工作组工作组长，一位姓王的局长有一次对二队的同学们训话，竟说：“不怕你们这些成都娃娃，你们休想变天！我们有监狱、警察、军队，还有飞机、坦克、大炮。”接着，背靠背的揭发、检举、批判会陆续开始了。

很长很长时间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动用那么多人，无缘无故地来对付这几百名种茶的少年，扼杀他们青春的梦想，把他们之中的数十人，直接投入罪犯和贱民的地位，饱受人格的屈辱，丧失青春、幸福、健康，乃至生命。而谁都知道，确定不移地知道，这些人是无辜的！余下的两百多人，无疑也饱受惊吓，紧接着又带着受伤的心灵，接受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洗礼^①。

三 回乡知青的处境

与城市知识青年一样受过学校教育，然后一样上山下乡的农村青年，也就是“回乡知青”，人数始终多于城市知青。虽然他们并未被国家划入安置工作的范围之内，对于动员他们回乡，在经过50年代以来的长期工作以后，也几乎不再成为问题。但他们回乡后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困惑，从性质上说，与城市青年是一样的。这里之所以将他们专门列为一节，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也存在一些特殊问题。

虽然国家自1954年起就大力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生产，但回乡知青数目的迅速增长，是在1960年以后。如果说50年代青年回乡的走向可以用上下波动的曲线表示的话，60年代以后则一直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了。这当然是与国家实行的农业政策紧密相关的。

^① 周永严，《下乡周年祭》，《知青档案》。

1958年《户口管理条例》的实施，城乡间裂痕的扩大与加深，都大大减少了农村到城市谋求职业的可能性。甚至原先许多农村女青年通过嫁给城里人而改变自己身份的出路，此时也被基本堵死。因为即使与城里人结婚，也极难改变原来的农村户口，而且如果母亲是农村户口，孩子即使是在城里出生，户口也要随母亲一方，并且会随之遇到诸如没有粮食副食供应、无法在城市入学等一系列困难。

于是，农村青年想要成为城里人亦即获得城市户口的途径，便只剩下三个，一是参军，二是当干部，此外就是读书、升学。只要读到中专、大学毕业，自然就可以由国家将工作包下来，当然也就获得了城市户口。而参军，大多数人复员后仍需回乡，提干只是极少数政治条件好的人才能得到的机会，而且也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可见，考中专、读大学，是农村青年实现自己当城里人、挣工资、并进而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最佳选择，也是当时农村青年的家长最大的愿望。为此，许多父母不惜节衣缩食，卖猪卖粮，送子女到学校去，而当这些子女苦读数年，甚至十数年之后，又回到家乡种地时，其父母的失望、愤懑和对这个事实的不能接受，都是不难想象的。

可是，对农村子弟来说，走读书这条路，到60年代以后也越来越艰难了。我们在第六章谈到过，国家于1960年作出规定，为了保证农村有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和不断补充农村劳动力，此后必须在每年毕业的小学生和中学生中给农村留下一定的比例，不要全部升学。按这个比例规定，能够升学的农村中小學生只有1%，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农村青年学生被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权利。从农村考入大专和中专的学生，在学校停办后也被一律要求回乡，而这时数量特别多的还有几乎全部停办的农业中学的学生。这都造成愈来愈多的农村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而不得不回乡生产的局面。

据团中央 1962 年统计，全国农村已有高小以上知识青年近 3000 万人，大体上在 1 亿农村青年中，4 个人中有一个小学或初中毕业生。1964 年，全国知识青年总数达 4000 余万，其中城镇下乡知青仅几十万，在知青总人数中仅仅是一个零头，其余的，都是回乡知青。再举几个具体数字：据北京市的统计，到 1962 年底，参加郊区农业生产的具有高小以上文化水平的回乡知青达 11 万余，约占郊区农村青年总人数的 1/3；上海市川沙县统计，自 1957 年到 1964 年期间，陆续落户、回乡的知青达 52000 余人，占全县农村青年总人数的 2/3 以上，占全县农业劳动力总数的 1/4 以上，有的公社 70% 以上的农活是由青年干的。在河北省宝坻县，至 1963 年底，全县回乡知识青年总数达 15000 人，占农村青年总数的 36%。在教育事业特别发达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解放后陆续从中小学和大学毕业的回乡知识青年，到 60 年代初已达 7 万，占全州农业第一线青年劳动力总数的 85%。再有，广西召开回乡知青积代会时提到，到 1963 年为止，几年来全区回乡已达上百万。1964 年广东省报道，近 3 年有 56 万多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回乡，如果从 1958 年算起，回乡知青总数已达 76 万人。而据同年湖南省的统计，全省回乡知青人数更多达 300 余万。

与 50 年代相比，回乡知青群体的构成，也已经有了可观的变化，不仅有高小、初中毕业生、肄业生，而且包括了高中生，甚至因病或其他原因退学辍学的大学生；不仅包括正规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也包括从 1958 年大跃进期间各地大批涌出的民办学校、半工半读学校和农业中学毕业的学生，还有因学校停办而返乡、随父母精简而回乡的学生等等。由于回乡知青与农民一样，不存在户口、城市供应和日后分配等一系列问题，所以算不算回乡知青，也就毋须像对城市下乡知青一样，有那么细致的规定和明确的界限。

作为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并多少接受了现代文明熏陶的知识青年，回乡知青在农村人口比例中的增长，对于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是具有巨大意义的，国家对此也寄予厚望，即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说：

这不但对于加强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有重要意义，不但对于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决不是一项临时的措施，而是今后很长历史时期内都要认真做好的工作；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情，而是一项具有革命的战略意义的大事情。

并不只是要他们起增加劳动力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要他们起增加革命力量的作用^①。

广大的知识青年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们不仅直接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劳动力，而且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增添了大量的后备技术力量。为加强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增添了力量。他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伟大斗争中做出贡献，不仅要继承老一辈农民长期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生产经验，而且要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学会和掌握新的技术，成为有觉悟、有文化的社会主义的农民。

虽然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局限，但与“文革”后主要将知青作为被改造对象的“再教育”理论相比，对知青在农村所起作用，期望仍是较高的。

这是些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青年农民。他们与城市下乡知识青年的最大区别，不仅在于一是回到自己家乡，一是离开家乡

^① 《热情关怀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人民日报》1965年5月5日。

到农村去，而更在于前者是农民子弟，后者则是城市干部、工人及市民子女，二者间存在着身份上的区别。具体地说，就是户口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待遇问题。这一区别源于解放后一直存在且一度扩大的城乡差别。“消灭城乡差别”是五六十年代喊得最响的口号之一。且不谈这个理论是否成立，事实上城乡差别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因种种措施的实施，而成为几乎无法填平的鸿沟。于是，回到农村的知识青年中的大多数便只能重复他们那些未曾进过校门的父兄的命运，他们与60年代全国的农民一样，被牢牢地禁锢在家乡那一小块土地上，再难有离开的可能。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本应该使他们成为农村中一支最先进最有生气的力量，日益增多的中小學生回乡本应该极大地促进贫困愚昧的农村面貌的改进，但在60年代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排斥知识、排斥文明的背景下，他们的作用被抵消，他们的青春和理想也被贫穷落后的农村所吞噬了。

与城市下乡知青相比，回乡知识青年对于农村的环境更易适应，又因有家庭和亲戚的帮助，往往能够获得更多发挥作用的机会，尤其是如果家庭在当地较有势力，则招工、提干、入党，都可以较他人优先，这是一些回乡知青的有利条件。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有利条件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比城市的外来知青更不利的因素。诸如，正因为环境更为熟悉，回乡后所受到的家庭、亲戚、朋友的冷眼、奚落和歧视就更难以承受，所以每当动员中小學生上山下乡时，总有农村的知青提出离开家乡越远越好，最好是到边疆垦荒一类要求。农村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也常使青年陷入其间而难以摆脱，如果家庭在该村没有势力尤其若是地富子女，处境就更糟糕了。

当然，回乡知青面临的很多问题，是与城市下乡知青共同的。但回乡知青更少得到上级单位的重视和关心，在有些文化不太发达地区，他们单枪匹马，比有同学一起下乡的城市知青更显孤独，

这使他们在遇到困难和产生思想苦闷时，更难于化解。尤其是比起城市知青来，他们更少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和希望。只是他们往往在经历了几年的情绪起伏之后，也就逐渐变成与自己父兄一样的普通农民，再不奢言抱负和理想，加之他们居住分散，一般不会像城市下乡知青那样，一遇机会，就发泄出来甚至激起事端，因而也就不太引起人们注意罢了。

山东省莱阳一中的一个回乡知青在给老师的信中所表达的情绪，是颇有代表性的：

自接到没考取大学的通知书后，每天无精打采，又急、又愁、又恨、又苦闷、又吃不下饭。前几天我到县人委去过，我县没有工作分配。我在家里真是坐立不安，真把我急坏了，焦躁坏了。现在人家考上学校的人多幸福啊，愉快啊，进步又多大啊！而我却在家蹲着，干上了农业劳动。由于长期求学，庄稼活十分生，身体非常弱，干起活来十分吃力。通过这几个月，我感到农业社的劳动真不轻，劳动强度真大，天天起早拉晚地到田野劳动，简直把我累得有些瘫痪了，全身痛，腿也麻木了，腰杆无论如何也挺不起来，实在抗不了。而这又不是干一天两天，好家伙，而是要干上它几年几十年。别人不知怎样，我可尝够了。熬到高中毕业，多不容易啊！当了12年学生，又硬逼着推粪登山，参加农业生产。想到这里，气得我脑子有些胀痛，好像要炸开似的。

在家不仅抗不了那样大的劳动强度，而且也受不了群众舆论的讽刺、打击。我母亲和我哥哥也常气我，无论如何他们也不愿我下庄稼地干活。因为我上了这6年中学也不容易啊！全是我哥哥省吃俭用供给我的，现在我哥哥那里困难也不少，家里没烧的，也没钱买，拾吧？又没有时间。

我天天想，倘一直这样干下去，能学点什么哪？能有什么进步呢？将来能成个什么样的人哪？

你来信还批评我，说我悲观失望，发牢骚，不满，我坚决不接受。青年人都有远大的理想，哪一个不想在黄金的青春时代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呢？我是充满理想并一时不停地向正确道路前进的人，不愿

白白度过一生而愿给祖国增光的人。但是国家不给我适当的工作，这怎能不使我因为不能为祖国工作而感到十分失望、悲伤呢？倘若国家给我工作，给我一件有出息的工作，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我将欢天喜地为祖国工作，为祖国献出所学的知识，并以创造性的劳动来推动革命前进。

现在让我参加农业生产，在家里没有一点学习时间，原来学的东西也会忘尽了的，这就浪费了6年中学教育。这多么可惜，多么伤心，又多么残酷啊！

老师，倘叫我这样下去，脑子会生锈的。

敬爱的老师，我真过不惯这种生活，我请求您，哀求您，望您费心地叫学校给我找一个工作吧！

这封信虽然是1958年写的，但其中所反映出的知识青年回到农村后的苦恼，同样反映在60年代的回乡知青身上^①。据1962年团中央青农部的统计，安心留在农村务农的回乡知青，仅占回乡知青总数的30%左右，不安心的主要原因，除了生活艰苦、劳动过于劳累之外，深感在农村“没前途”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三年灾害之后的中国农村，在经历了十分短暂的恢复阶段之后，紧接着是一连串政治运动的困扰，农民普遍的生产积极性尚且无从发挥，知青个人的才干、他们所学的文化科学知识又何来用武之地？尽管各种宣传机构一再宣传农村需要有文化的新农民，并树立一系列在农村大有作为的知青典型，但这些典型所具备的条件，并非大多数知青都能具备，何况有些典型本来就是人为树立的结果。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回乡知青，对农村的现实往往比城市下乡知青更了解，许多人在考不上学，知道自己只有回乡生产一途时，就已十分消沉，回乡之后的现实更使他们失望。这种现实虽然是

^① 《在农业劳动中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人——复焦洪瑞同志》，《中国青年》1958年第1期。

回乡和下乡知青所共同面临的，但在城市知青尚且被动员下乡的情况下，回乡知青明知自己进城的可能愈加渺茫，尤其是女青年，唯恐会“围着锅台转一辈子”，因而更为悲观。

除了对自己前途的忧虑之外，从学校出来的学生与农民难免发生种种矛盾冲突。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其中一些，属于知青缺乏社会经验，缺乏对农民的理解，对周围环境期望过高，因而做出过激行动，甚至不自觉地为极左路线充当了马前卒，导致了自己与农民的对立。如据当时报导，经常有青年因对队上干部和社员私分粮食、做投机买卖不满而提出批评，遭到干部的报复。还有报导说安徽宿县有个知青，父亲是铁匠，由公社工厂下放回到农村自由营业，他回乡后就和父亲一起干，对父亲看人议价、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思想很不满，常和父亲发生口角，很害怕自己将来会走资本主义道路等，今天来看就未必全是农民一方的不是，至少需做一些具体分析。还有一些，是因农民本身存在的种种落后性，以及农村干部的作风不正引起的。而更多的情况，则是各种因素错综纠结在一起。1964年团中央青农部曾在辽宁省盖平县九垄地公社古家子大队对回乡知青的情况进行过一次调查，是很有普遍性的：

这个大队到1962年为止，共有96名知识青年回乡，其中高小以上84名，初中、高中17名。知青们爱提意见，对不合理的开荒、劳力分配不当和党团工作都提过意见。1962年1月，知青又和队里闹了一场“大字报风波”。

起因是这样的：当年队里有13户人家纺草绳，其中9名是干部。他们用的草是队里以每斤1.5角卖的，纺成绳后，每斤的议价是3角，一天可挣20来元，而在队里劳动，一天只能挣1元。不少社员背后有意见。念过8年书的于耀江气不过，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说草是集体的，不能只肥了几户，建议队里提高草价，说纺草绳过高的利润就是剥削，把这张大字报贴到了大队办公室墙

上。队干部很恼怒，说：“你乱提什么？若不叫共产党领导早就揍你了。滚出去！你一年才挣800分，你没有提意见的资格。”说着就往外推。高中毕业生刘福全看到不公，也写了一张。第四天高中毕业生伊正和也贴出一张大字报表示支持。于耀江不服，又贴出了两张。一时间满墙都是大字报。党支部连续三天找他们，说大胆提意见是好的，但意见提的不切实际。青年不服气，党支部烦了，说他们是“钻空子”、“攻击”、“臭理论”。党支部说是团支部发动的，叫团支部做了检讨。事情总算没有闹大，于耀江也算接受了教训，他说，吃一堑长一智，咱这个四楞木头算从圆眼钻出来了。

这个队的团支部举办业余技校，要求青年都参加，初中以上青年有意见，说都学过，有这功夫不如学点别的。有5名知青想考大学或高中，一般都在业余时间看书。于耀江张罗三四年了，加上身体不好，60年没挣到800分，61年挣了800分，62年就挣到2700分了。他已打算能考上就升学，考不上就安心劳动。有的青年要求半日劳动，半日学习，党支部同意了，说，学就学吧，不叫学也不安心干。学了一个多月，有的知青看挣分太少，又上全班了。党支部认为，只要家庭同意，就该支持，考不上，过一两年自然就会安下心来^①。

这个大队党支部对于青年虽然谈不上进行教育，但还是非常宽容的。还有更多社队干部连这样的水平也达不到，那些地区的回乡知青，处境还要更糟。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提到了知青的家庭出身问题及其这一问题对他们以及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并用相当的篇幅讲述了遇罗克

^① 《关于古家子大队知识青年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团的情况》1964年第11期。

和他的《出身论》，这里还有必要对家在农村的地富子女的处境问题特别提上一句。当时的“黑五类”所指为“地富反坏右”而“地富”居其首，50年代时他们能否加入农业互助组和合作社，就曾成为过一个问题，60年代尤其是“四清”之后，他们的处境之恶劣已不难想象，如果说在“文革”前的大中城市，对待这些子女，尚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政策多少进行一些约束的话。那么在农村中，就连这样一个形式上的约束也没有了。

60年代以后，大学校门实质上已经对农村地主富农子女关闭。虽然“文化大革命”前没有任何文件明文禁止地主富农子女上大学，却是当时的既成事实，这些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一度有所披露，其中曾引起过震动的，是钱宗仁（1942—1985年）的经历。

钱宗仁是湖南湘县长丰公社济洲大队人。本人勤奋好学，却因出身富农而几次丧失升大学的机会。后来只身到新疆谋生，成为实验林场一名职工。“文革”期间被批斗并遣送回原籍，1974年落实政策回到新疆阿克苏。他天分甚高，刻苦自学过高等数学等诸多课程，并达到了一定水平。他长达20年的坎坷经历，以及他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动了一位到当地采访的女作家，她于1984年写出报告文学《胡杨泪》^①，提出“左”的思想埋没人才和摧残人才等在当时还算是非常尖锐的问题，钱宗仁的事迹由此而得以为世人所知，并引起相当大的反响。但此后仅仅一年（1985），他就患肝癌去世，时年41岁。

钱宗仁一生行迹，我们这里不拟多费篇幅，只想根据钱宗仁的自述和几篇曾公开发表过的证明文件，叙述他当年不得入学的经过，这些出自当事人之手的文件，应该是基本可信的^②。

① 见《文汇报月刊》1984年第4期。

② 上述材料均见于朱正编：《不要忘记钱宗仁》，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

钱宗仁于1962年第一次报考大学，据他在《冤屈集一身，丹心有谁识——一个自学青年的经历自述》中回忆：“我的高考成绩特别优秀，据说列全省前10名中。清华大学录取小组正准备录取我，王寿松（注：钱所在的湘乡二中党支部副书记）赶到招生办公室，将我的政审结论改为‘不宜录取’加盖公章，要回材料，最终被淘汰。”

1963年他再次参加高考，据证明材料：

湘乡县教育局落实政策办公室焦仲付（1983年3月22日）：“（钱宗仁）1963年考取哈尔滨工业大学，该员8月份接到通知后，9月即应入学，由于该大队已开展面上四清，蹲点的公社副书记×××即向该大队的干部打招呼，不让签发迁移户口粮食关系，因该员家庭出身富农，钱再三请求，未予解决，只好空手赴哈工大……”

洲大队（1982年3月31日）：“钱宗仁住我大队第二生产队，富农成分，本人系地富子女，于1962年在湘乡二中高中部毕业，1963年考取哈尔滨工业大学，那时我地正在开展农村面上四清运动，由于当时极左路线影响，贯彻阶级路线坚决，四清工作队认为，地富子女不能上大学，加之其父钱福乔那时表现不好，所以就未发迁移证，拒绝了他上大学的机会。”

钱宗仁空手到哈工大，3个月后终被送回。

1964年第三次考大学，据钱宗仁以第三人称写的自传材料（据遗稿排印）：“公社曾书记本已答应了，一位姓伍的公社干部还在钱宗仁的笔记本上签了字，写了些勉励的话，但一经讨论，觉得不对，说他若上成学，不就说明公社以前都做错了吗？现在的办法就是不理睬他。害得钱宗仁满怀希望地准备了几个月，没有拿到准考证。”

钱宗仁由于学习成绩特别出色，曾深得教师和一些干部的同情，所以才会有考取大学再被退回等一系列波折，至于一般地富

子女，早在学校政审那一关，基本上就已经以“不宜录取”为由而被淘汰出局了。

在学校的青年对于未来多少会抱有憧憬和希望，回到农村便一切终成泡影。“四清”之后回乡的地富子女，是被当地干部和农民与地富同等看待的。有些地主和富农家庭出身的团员抱怨说，回乡后，当地不让他们担任生产队干部，甚至有的队干部只让他们参加地富分子会议。有的党支部不准团员与地富和反革命子女结婚，回乡的地富子女找不到对象，成为一个普遍问题。山东有个1956年即已入团的地富子弟向团报写信反映说，回乡后团组织开会从来不通知他，他因此而十分苦恼。湖南衡阳的一个高中毕业生也说：“我是地主出身，回乡后队里把我和父亲同等对待，不让四类分子参加的会也不让我参加，这岂不是剥夺了我的政治权利吗？回乡后这不让我参加那不准我进去，等于用一条无形的锁链把我锁住了，这样的生活实在无味凄然，”“我想不通，因为再好再忠心的人，转弯抹角都可能找到一个什么亲族是反人民的。”^①山西和顺县青年牛成贵一度盲目外流，回乡后别人分全年口粮260斤，小片荒地补助粮40斤，只给他190斤。一次他下地干活，社员将一穗玉米放在他筐里，队长硬说是他偷的，在社员大会上斗争他，牛成贵感到走投无路，上吊自杀。

由于对出路感到茫然，也有知青铤而走险。如1961年10月，湖北鄂城太和柯家地区曾破获一个“中国民主党太和地区反共司令部”，成员20名中，就有青年19人，其中有9名是回乡知青。

1963年中共广西省委向中央的汇报中也提到，回乡知青中“已有少数人搞投机倒把，和反革命分子瞎胡混，参加或组织反动组织。在知青中已产生了一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新的反革命分

^① 《回乡知识青年的要求》，《团的情况》1964年第11期。

子”。^① 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提出要重视和加强对回乡知青的工作，但在强调阶级斗争、扼杀农民一切发家致富积极性和个人创造性的大前提不变的情况下，回乡知识青年找不到出路的现实是无法扭转的。

1964年以后，为动员更多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几乎将下乡知青的一切都由国家包办起来，诸如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补助、生活补贴等，回乡知青则都与此无缘。这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都对知青造成不小的影响，下乡知青虽已离开城市，却仍认为国家应该为他们负责，而回乡的农民子弟，却从此成为彻底的农民，同是下乡，感觉上却低人一等，这也导致回乡知青与下到当地的城市知青的矛盾。尤其是80年代末国家做出凡1962年以后下乡的知青一律计算工龄的规定之后，那些最终因升学、当兵等途径，凭借自己不懈努力而成为城里人的回乡知青们，却因自己当年是农民而不能与下乡知青一样计算下乡的工龄，他们往往比同龄、同届的同事们在工龄上少出几年，并因此在福利补助、提职晋级和分配住房等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吃亏，他们会不满地发问：我们哪一点不如你们？难道就因为我们的父母是农民？的确，人们在谈到五六十年代因出身造成的不平等时，往往忽视了工农之间，也就是有城市户口的人和农民之间的不平等，而这个不平等，才是最大的不平等。

^①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省委关于召开全区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请示报告》，《团的情况》1963年第14期。

第十章

这条路能够走到底吗？

我们已经一再提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措施，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的传统观念，都是严重的冲击，从实行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抵制和反对。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已经到了很难进行下去的地步。据统计，当年中央曾计划安置下乡回乡知青共67万人，到3月底才动员下去8万余人，留下近60万人的任务要在余下的3个季度完成，是十分艰巨的。社会各方面的不满情绪都在滋长着。

中央一直在寻求解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补救的措施，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僵化，而城市就业人口日益趋向高峰的前提下，取消这种做法或以别的方法来代替它，都是不可能的。

一 “两种教育制度”

这是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出的设想。所谓“两种教育制度”，一是指正规的全日制学校教育，一是指半工（农）半读学校和农业大学，这里特别强调的，主要是后者，这实际上就是同劳动制度紧密结合的一种职业技术教育。其中，学校和工厂合而为一的半工半读就是工业技术学校，学校和农场（或农业劳动）合

而为一的半农半读就是农业技术学校。所谓半工（农）半读，是与全日制学校相对而言的。从理论上说，它们主要不是由国家投资，而是靠地方上的群众或学校师生自己动手，通过勤工俭学兴办起来，一般也是不由国家负责分配的。

刘少奇在提倡这种教育制度时曾一再强调，这种既读书又劳动的学校，是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这种学校培养的既能动手又能动脑的人才，是共产主义的一代新人。但无论将其意义提到何种高度，它在当时的兴起，总是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也就是城市中小学毕业生的出路问题。当时从事具体工作的领导人都明白，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是会引发严重社会危机的。

一 问题的再度提起

我们在第五章第四节中曾经详细论述过，刘少奇自1957年处理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时，就已经明确提出过，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并曾在1958年将其部分地付诸于实践，但“大跃进”的浮夸风，却使这一本来很认真的思考演化成了一场闹剧。几年以后，刘少奇在1964年5月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再一次提出了这一设想，这正是在周恩来明确提出要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作一项长期工作，并在全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动员之后。这一设想，既是一个与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行的方案，同时也是前者的重要补充。“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文革”期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国家曾经试图将这一措施，作为一项固定的、长久实行的制度，而不仅仅是“文革”期间那样的政治运动，而“两种教育制度”，则是这项制度中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

半工半读学校可以成为知识青年从城市学生到农民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

首先，它可以缓冲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阻力。因为

上学，哪怕是到农村去上学，总比直接下乡当普通农民，让知青和家长更易于接受，也容易巩固。而且，我们上面提到过，知识青年在普通中学受到的，只是一般的基础教育，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加以农业技术、医药卫生等各种专门训练，对他们在农村发挥作用，肯定要有利得多。

其二，“文化革命”以前，大量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入中学，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并未达到劳动年龄，尽管国家已经将下乡年龄从18周岁放宽到16周岁，而实际上不少十四五岁的少年也被动员下乡，但他们下乡后因年龄过小引起的种种问题已经导致了家长和当地农民的强烈不满。何况还有很多小学生只有十二三岁。自50年代开始，这就是颇难解决的社会问题。国家只能要求家长安排他们从事家务劳动或者在家自学，事实上等于是放任自流，长春市教育局曾经谈到：

1953年，我市突然出现几千名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的现象。这些毕业生只有十二、三岁，还不到就业的年龄，他们还不能离开父母，只好在家呆着，有些天天逛大街，遛马路，打架斗殴，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秩序，有的甚至沾染了一些坏习惯。面对这种情况，当时我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有人认为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是正常现象，应该由社会负责组织，教育部门不能再管了；有的认为要教育部门来管，国家就得多盖校舍，多办全日制中学，由于这些思想障碍，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①。

可见这一问题的出现由来已久。兴办半工半读的职业学校，等于是为这些人兴办未来参加劳动的培训中心，至少可以将他们管理起来，待他们达到劳动年龄时再送到农村去。

同时，随着下乡上山知识青年人数日增，下乡时间日长，人员构

^① 《有计划地把城市青少年导向农村——长春市管理教育城市青少年的经验》，《人民日报》1966年4月4日。

成也从早期的主要是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变为有更多的高中毕业生。负责具体工作的领导人明白，不管“当一辈子有文化的新农民”的口号喊得多响，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措施，要保证他们在农村长久地生活下去，也是行不通的。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在1966年政治空气已经十分紧张的时候曾经说过，现在下乡的知识青年每年是二三十万，下乡知识青年多了，怎么管他们，是个很大的问题。这种力量用得不好，教育得不好，就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否则，就是有害的。问题是我们领导不领导他们，管不管他们。于是，这一问题便上纲到了两个阶级争夺接班人的大原则上。陆定一呼吁要将这种学校的举办，同安置工作配合起来，用穷办法把下乡青年管起来。可见，办农业大学，让下乡青年重新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同时也为国家培养农业方面的人才，尤其是使他们不致因心怀不满而成为社会的一股破坏力量，不失为一个最为妥善的方式^①。

二 “文革”前的几次半工（农）半读会议

1964年5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会议讨论并肯定了他的意见。6月8日，毛泽东也对这个建议正式首肯，他说：

会议的简报我在努力看，有许多好的东西，看了社会主义教育，四清、五反，还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你（指刘少奇）提的嘛，下边已有这样的情况嘛！^②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先后到河北、山东、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地视察，一路上大讲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

^① 《1966年1月15日在全国半工半读高等教育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② 参见黄峥，《刘少奇提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过程和意义》，《刘少奇选集下卷学习研究文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

制度问题。除此之外，从这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他在有关会议、会见外宾、召集有关部门汇报工作等场合，30多次讲到这个问题，此时他对这一制度的意义、作用和具体设想，已经比1958年初次提出时，更系统也更完善了。

刘少奇的理论，概括地说，就是除了传统的、互相分离的全日制教育制度和全日制劳动制度之外，还实行一种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紧密结合的新型制度，即半工半读、半农半读。这既是一种新的教育制度，也是一种新的劳动制度，其出发点，首先还是要让更多的青少年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实行我们现在这种学校制度，是不能普及教育的。我问了一下，山东学龄儿童入学的只有49%，有的农村里面有70%、80%的学龄儿童不能入学。安徽学龄儿童入学的比山东还要少一点。江苏多一点，有60%的儿童入学，但农村里面也有一半的学龄儿童不能入学。所以，用目前这种教育制度不能普及教育，国家负担不起，家庭也负担不起。如果一个家庭有四五个小孩子上学，有的进小学，有的进初中、高中，有的要进大学，那不但一般的工人农民家庭负担不起，恐怕今天在座的同志的家庭也难于负担，也要发生困难。那么，用一种什么办法，既能普及教育，国家和家庭又能负担得起呢？那只有除开现在的全日制学校以外，再办那种半农半读或者半工半读的学校，就是小孩子大体上自己可以搞到饭吃，国家稍许补贴一点，家庭补贴一点。因此，可不可以设想，现在的这种学校不再增加了，现在这种学校的教育经费也不加了，国家以后每年还可以再增加一点教育经费，把增加的教育经费拿来办这种半工半读或半农半读的学校。从当前来讲，从普及教育来讲，我看必须采取这个办法。

刘少奇还强调，从长远来讲，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可以逐步地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他主张每一个省，每一个大中城市，都来着手试办这种半农半读或半工半读学校：

在农村，初级小学可以多办一些全日制学校，高小、初中的学校就办半农半读。仅仅办农业初中还不够，还必须办一种中等农业技术学校。这种学校的学生可以回家生产，也可以在国营农场生产，或者开荒。我的意见，应该充分利用国营农场的生产资料来办这种学校。训练出来的人具有中等农业技术学校的水平，可以回家去当农民，也可以到技术推广站、畜牧兽医站、拖拉机站等等地方去工作。

我国现在的教育制度是不好的，必须改革。现在的全日制学校还不能不要，还是需要的，我认为以后不能再增加了。但是，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可以办，以后可以多办。现在还是少数试办，不要大办，不要一下子铺开，一下子又垮台。要通过试办，取得经验，以后多办，将来要使它成为我们的主要的教育制度和学校制度。现在的这种学校寿命是不会很长的，但是，这种半工半读学校我看一万年还要。

他说：“必须使我们的工人、农民有文化，而且是有相当高的文化，我们这个国家的整个面貌才可以改变，才可以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将来才有希望进入共产主义。”^①

刘少奇这一设想，得到中央的全力支持。1964年11月7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问题的批示》；12月21日，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讲到了这个问题：“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是一种教育同劳动相结合的新型学校。这种新型学校能够培养出既能体力劳动、又有文化技术的全面发展的新型的人来，为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创造条件。这种新型学校，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长远发展方向。”

1964年，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教育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中央办公厅为此发出《关于教育办公室工作的通知》。中央政治局在此前后曾几次开会讨论半工半读的问题，表示出前所未有的重视。于

^① 《半工半读，亦工亦农》，《刘少奇选集》下册，第465—469页。

是，半工（农）半读的试点工作迅速在全国展开。

1965年3月，全国第一次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转发了这次会议的报告并发出了《关于半农半读教育工作的指示》，陆定一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首先对解放以来教育的发展情况作了一个简单的回顾。他说，从前在很长时间里，半农半读被人认为不正规，被人看不起，现在放到重要地位是完全正确的。经过1962年以来的调整、巩固、恢复、发展，现在又是发展的时候了。农村经过“四清”以后，教育恐怕会有一个高潮，农民要求学习了，目光远大了，知道种田不光是为自己，而且是为国家，为了世界革命，农村里的半耕半读估计会有一个新的兴旺的局面。

谈到农业中学和技校时，陆定一说：“国营的农、林、牧、渔场，现在正在开始找出路，就是场校合一。有的名叫场，实际就是校，有的名叫校，实际又是场。这种场校合一又有两种：一种是从公社招一批人，又当学生又劳动，毕业了回去。广东新会的就是这一种。另一种是学完后定居下来，不走了，就像江西共大，陕西也办了个劳动大学，主要招城市青年下乡去，下乡后就在乡下定居下来，这个类型的也好。”^①

同年8月，全国高、中等农业教育会议召开，毛泽东和刘少奇到会并接见了全体代表，刘少奇在会上对农业教育革命的方向作了明确指示。在为半农半读大声疾呼的同时，他又提出了新的设想，就是“社来社去”，也就是从农村或城市招生，毕业后分到农村去。他要求今后新办的半工半读、社来社去的学校，要办到农村去，实行劳动建校。还要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举办函授、夜大和训练班，为农村知识青年、复员转业军人和农村干

① 《1965年4月20日在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上的讲话》，载《陆定一文集》。

部提供不脱产的学习条件。他说，这是农业教育的一场大革命，也是一条必须走的正确道路。这样做，不仅可以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逐步满足广大农村知识青年的学习要求，而且可以为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创造条件。

会议还要求，今后除了若干高等农业院校要保留一些全日制的专业和班级以外，一般的高等农业院校都要逐步实行半农半读，中等农业学校要分期分批全部实行。

这次会议召开后不久，新华社即发出报导，说我国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教育制度已经确立。到消息发出时止，全国耕读小学学生已达1700万，半工（农）半读中学比1964年增长87%左右，各地的国营农林牧渔场都兴办了大量中等技术学校和高校。现在正进一步推行“社来社去”，这是半工半读学校的一个新发展。

当年12月，中央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到会并作出指示，要求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1966年结合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重点试办城来社去（即来自城市毕业后分配到农村人民公社）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目的是为了推动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顺利开展，“促进农村文化革命，实现科学种田，造就人才”。会议说，办半工半读学校，要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这是一个方针性的问题。城市学校的毕业生，一部分在城市升学或就业，大部分要上山下乡。城市学校要为农村大量培养有觉悟、有文化、有生产技能的人才。可以把学校办在农村，招收城市的学生，毕业就在农村分配工作；也可以办在城市或郊区，面向农村，学生毕业后，上山下乡。这项工作今后要重视起来，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把事情办好。会议还提出了“五年试验，十年推广”的计划。在其后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又一次提到，试办半工半读教育，一定要注意局部和整体的关系，这就要特别注意需要和可能，特别注意人口、粮食、上山下乡等事情的统筹安排，务使学校布局合理。农村是广阔的天地，需要各种技术工人，青年人上山下乡大有可为，城市可

以举办一些市来社去的学校，积极为农村造就和输送人材，以满足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各项建设的需要。中央转发了这次会议的报告。

三 评价

按照刘少奇的设想，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之后，即要把这种制度作为国家正规教育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推行到全国，并且逐渐形成一套体系。可是正式推广起来，却遇到了事先未曾预料的问题，很多地区闻风而动，大钻“城来社去”的空子，竟把办学当成逃避或至少暂时逃避上山下乡的手段，大量招收城市青年到半工半读学校学习，结果一些来自城市的青年在学习之后，照样不肯到农村去，国家白白花了钱，却收不到预期的效果。

1966年3月23日至4月7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召开了“文革”前的最后一次安置工作座谈会，会上特别对如何结合安置工作推广业余教育，试办半农半读学校的问题交流了经验。据载，到会同志反映，自从国务院下达了1966年安置计划以后，不少地区出现了结合安置工作大办城来社去的半工半读学校的苗头，值得注意。办学和安置是两回事，不能把办学当作动员方法和安置方式。今后应先动员下乡上山，经过一两年劳动锻炼后，再由社队选优保送入学，否则包袱越背越重。本着这一精神，各省已经办起来的城来社去的学校，应进行整顿，对不合条件的学生，应动员他们去插队；对留校学生应当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and 劳动锻炼，使他们学会一技之长，并向他们讲清楚，将来毕业后到公社去当农民。办学经费仍按国务院1965年12月18日批示的标准从安置费中开支。这次会议还将吉林省延吉县东盛公社黎明大学、广西自治区五塘实验区耕读大学和河北省宝坻县农业劳动大学树立为样板，要求各地安置部门协同有关单位，试办一所黎明、五塘或宝坻式的劳动大学。初办时期，招生不超过一百人，由社队选送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下乡、在乡优秀青年入学，

社来社去。办学经费，建议由地方经费开支。

国务院在批转这次安置工作座谈会纪要时也提到：“关于结合安置工作举办半农半读学校的问题，目前还没有经验，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试点，不可多办。同时，应该坚持社来社去。已经办起来的城来社去的半工半读学校，办完一期之后，也应当改为社来社去。各地农业、教育部门应当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①

这次会议召开不久，“文革”爆发，一切教育、文化事业均告中止，但即使不是如此，这也是刘少奇遭遇的一次重大挫折，尤其是毛泽东已经明显表示了对这一试验的冷淡。

毛泽东更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劳动来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他还希望让农民群众掌握一些文化。他对刘少奇这一设想的冷淡，一方面出于对它与美国教育中的“双轨制”有某种雷同而起的反感；另一方面，他必然敏感地看到了，实行这种制度，不仅未能缩小三大差别，反而使接受教育的两种人之间的社会不平等明显地变得尖锐起来。当然，这并不是刘少奇的初衷。

60年代前半期，在半工（农）半读教育广泛开展的同时，城市重点中学也进入了完善和成熟的阶段，不仅集中了最优秀的教师、最完善的设备，而且几乎成了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子女的集中之地，学生的升学率高达70—90%，这在当时意味着这些学校的学生可以获得远较一般青年更有保障的、更优越的社会地位，一些重点中学公开宣称他们的培养目标就是未来的部长、外交官和学者，学生们也自以为是未来社会最优秀的人才。“文化革命”初期充当了急先锋的红卫兵，源起于北京当时的重点中学——清华附中，以大城市重点中学的高干子弟为主体，这与他们在学校所接受的教育，是有其必然联系的。而在城市中数量远较重点中学为多的一般中学，所吸收的多是一般劳动人民和市民子女，高考升学率

^① 《国务院批转安置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4月29日。

只有20%左右，即使有幸升学，考入的也多是一般大学如师范、农林等。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够进入社会“精英”的圈子之内。

“另一条腿”，是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他们接受的是职业培训，从入学时起就已经注定与升学无缘，只能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即使如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这样被中央树为样板的学校，其毕业生在社会上仍然不被认可而有分不出去的苦恼，仍然感到上这种大学低人一等，这使得接受“两种不同教育制度”中后一种教育的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二者间的不平等，感到自己是受淘汰者。当他们感到这种竞争并非公平而往往受到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等多种因素制约，更尤其是当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到农村去从事体力劳动的时候，这种不满就变得相当尖锐，成为当时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阻力之一。国外一些观察家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总以为，“文革”时期的红卫兵之所以那样狂暴，那样令人不可思议，就是这些被打入社会底层的青少年在发泄他们升学不得、就业无望的不满，这当然不完全是事实，但也说明这一社会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文革”期间确有很多已经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城造反，这是他们不满情绪的一次大宣泄，但是，矛头所向，针对的是具体主持这项工作的刘少奇^①。

① “文革”期间《人民日报》曾发表以“教育部延安公社”署名的文章：《戳穿两种教育制度的本质》，集中发泄了这种不满，文中说：“（刘少奇）主张家庭供得起的、‘优秀’的学生，上第一类学校（即全日制重点学校），家庭供不起的，‘次一些’的学生，上第二类学校（即半工半读学校）……这正是种极力保附和扩大三大反动的措施。在全日制的学校体系中，选择和重点举办一整套‘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作为重点中的重点，称之为小宝塔，凡是列入小宝塔系统的重点学校，都有自己独立的培养目标，如清华大学培养的是‘红色工程师’，是几十年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骨干；在景山学校，陆定一及其一伙公开提出要培养‘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妇联主任、中央委员、总理、领袖等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这样，进入半工半读学校的就决定了只能一辈子当有技术的工人农民，进入小宝塔系统的，决定了要当领导、当专家，成为特权阶层……”（1967年7月17日）

总之，在消灭三大差别的口号喊得最响的这个时代，却正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急剧扩大的时期，这是很具讽刺意味的。

二 有了准备再下乡

1964年中央提出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项长期性的计划之时，这项工作实际上已经几经反复，具体负责知青安置工作的领导们已经深切地体会到，指望农村社队干部对这些城市青年进行什么有效的教育管理是不可能的。真正积极负责的办法，惟有让城市将这一任务承当起来。这就是对准备下乡的青年进行必要的培训。

陆定一在1965年11月20日由教育部召开的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上所作的发言便特别强调了知识青年下乡前进行这种培训的意义。

他的话被以社论的方式发表出来：

孩子们到了十六、七岁，大多数人需要上山下乡……问题是用什么办法，才能有效地组织他们上山下乡。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直接上山下乡，一种是学点东西再上山下乡。根据以往的经验，直接上山下乡，不容易坚持下来，困难较多。最好的办法，是在下去以前，使他们有所准备；下去以后，城市作为他们的后方，继续关心他们，不断支援他们，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不是送走不管了，而是对他们负责到底^①。

一 “城来社去”和“社来社去”

承担这一重任的，一种就是上述的半工（农）半读学校。我

^① 《组织起来，管好教好，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人民教育》1966年2月号。

们说过，这本来就是倡办此类学校的目的之一。

这类学校中，有些是从原来的中专或中等技术学校改的，也有些是由厂矿企业和事业单位兴办的，采取的办学形式，有厂校合一、工厂办学校、厂校挂钩等多种。它们大多都以城市中不够下乡年龄的中小學生为招收对象。如1965年，长沙市农林职业学校实行半工半读，它的260多名学生中，90%是长沙市和郊区的高小毕业生，学校计划通过4年学习和劳动之后，将他们分配到长沙县和长沙市郊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以及国营的农场、林场，参加劳动或做初级技术工作，这叫做“城来社去”。

“城来社去”的学校中，也有些是由国营农场兴办的，如安徽省蚌埠市机关企业系统的农场，与该市科委的繁殖示范农场一起，合办了黄山农垦学校，这个学校招收的都是城市未能升学的高、初中毕业生，计划经过一至四年的劳动锻炼和农业技术培训之后，将他们输送到郊区各人民公社参加农业生产，同时也为全日制的中学开辟劳动基地^①（注：这个农垦学校，后来证实是用知识青年的安置经费办的，1968年3月，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停办的通知）。其实这类半工半读学校，我们早已在1958年上半年的上海和内蒙古包头见到过了（见第五章）。

农业中学也大有重新兴起之势。在陆定一搞的试点——江苏省，1964年又增办农中240多所。省里明确规定这类学校的性质，是由公社社员集体举办的教育事业，隶属于公社党委的直接领导，采取半农半读的方式，课程设置集中，更加密切结合农业生产，小型分散，就地办学，目的是使大多数劳动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子女有机会受到中等教育，这叫做“社来社去”。1965年以后，个别农业高等学校也实行或试行了这一做法，所招收的学生中，有些

^① 《利用农场有利条件实行半工半读，黄山农垦学校积极培养新农民》，《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

便是早些年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他们从这些学校毕业后，将仍然回到原先插队的地方去。

“社来社去”这一名词，在“文革”期间被“四人帮”接了过去，当作他们创造的“新生事物”大吹大擂，不仅将其绝对化，而且将其变成他们手中一块“打人的石头”，成为他们的夺权工具，终于闹到臭不可闻的地步。这恐怕是它的最先倡导者刘少奇、陆定一等所始料未及的。

二 劳动后备讲习所

还有一种，算不上学校，只是短期的培训班，它吸收的重点，是已经离开校门并在社会上闲荡多时的社会知识青年。我们在第四章提到过，1957年武汉等地动员城市中小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之前，就曾组织过这种培训。在进行各种必要的学习和动员之余，还组织青年到农村参观并参加短期劳动，对青年下乡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只是当时这种培训班都是匆匆办起的，培训时间多者十几日，少者仅仅几天。

1963年大规模动员知青下乡的活动开始后，一些城市鉴于动员的困难和已经下乡的知青又回流的问题，再次试办起这种培训班，它们的名称各各不同，有的叫训练班，有的叫讲习所，但宗旨都是一样的。

这种训练班每期为时二三个月，以组织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党在农村工作的有关政策，也就是进行思想教育为主。此外也学习少许的生产、卫生知识。

1965年7月11日，成都市20万群众在人民南路广场欢送我们去农村插队落户。我们这批知青多是六四级的高初中毕业生，此前已在团市委举办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训练班”训了好几个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可以说每天都要念上十几遍，满脑子游荡着《夺印》中的“痴

大爷”之类阶级敌人的鬼影^①。

此外就是劳动锻炼。训练班采取半工半读办法，组织学员参加建筑工地和砖瓦厂的劳动，并以劳动所得解决学习和一部分生活费用。有知青回忆说，过“劳动关”是训练班的一个重要内容，青年们为了今后下乡能吃得上苦，个个咬紧牙关：“这劳动化的第一步，确实为我们后来在农村的艰苦劳动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该训练班的学员，还被作为宣传下乡上山的骨干，他们经常被请到中学和街道给知识青年谈体会，也主动到朋友中串联^②。

原成都二中高中毕业生邓际和回忆自己参加青训班以及动员伙伴一同下乡的经历说：

60年代中期，虽说“史无前例”的劫火还未熊熊燃烧，但政治空气已经有那么些烟熏味了。那年月讲阶级斗争，讲成分论，讲脱胎换骨，我正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高考结束后，不能升入高等学校，不能分配工作而闲在家里……心里真不是味道。

徘徊街头，无所事事，目光被一支队伍所吸引，队中人年岁不高，但步伐矫健，歌声嘹亮。队前一杆大旗上书“成都市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训练班”。在他们的感召下，加上自己工作无门，升学无望，于是我也去报名加入了青训班。

……

几个月的训练班生活即将结束之际，传来了市上领导的指示：“你们走上了革命化的道路，不要忘了你们的亲友、同学，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徘徊，你们应该拉一拉他们……你们能否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每个同志动员10个同学、朋友、亲人到训练班，走上这革命化的第一步……”于是，我们东西城区400多二期青训班学员，走向社会，到各个街道辖区派出所，一家家去“说服”那些和我们同龄的青年走革命化

^① 《一夜惊惶》，载《知青档案》。

^② 《中国青年报》1965年4月13日。

的道路。

1965年7月，青训班结束后，我们就带着一股纯真的同时也有些弄不清楚的激情，到农村广阔天地去做一颗“红色种子”去了。^①

广州市举办的，称为“劳动后备讲习班”，是由60多个街道行政组织于1965年举办的，规模大于成都市，参加的社会知识青年达7000余名。内容也主要是组织进行政治学习和参加劳动，有时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有时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或者短期劳动，短期学习。劳动项目多种多样，有的到建筑工地做些零活，到街道参加服务性劳动，到工厂参加辅助性劳动，到农村参加短期生产等^②。

山东省举办这类讲习所的时间更早。1963年，济南市推出了天桥区宝华街道办事处组织社会青年参加劳动锻炼的经验，他们成立了社会青年劳动学校，将16岁到25岁的未婚待业青年组织起来进行劳动锻炼，并辅之以文化和技术学习，还开辟了固定的劳动锻炼基地，几年来，他们组织几千青年到黄河大堤等地参加劳动，每个青年月平均可得20元左右的经济收入。1965年11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在济南召开专门会议，推广了天桥区的经验，到是年年底，山东省济南、青岛、烟台、淄博等9个主要城市都成立起“社会青年劳动学校”或“劳动后备讲习所”，其中仅青岛市就成立了48个，共有学员7500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组织中有的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大有转为区办集体企业的趋势，如果不是因计划经济统得过死，它本来可以成为青年在城市就业的一条出路，事实上80年代之后，很多城市正是走这条道路并为大规模回城的知青解决了就业问题的^③。

① 《青训班一页》，《知青档案》。

② 《广州市举办劳动后备讲习班》，《羊城晚报》1965年5月11日。

③ 《山东省志·劳动志》第二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据1965年7月的报道，这种劳动后备讲习所，有的地方称为青年政治学习班，已经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①。事实上，这种形式，即使在“文革”结束之后，也曾一度被作为好经验而重新在部分地区推广，《辽宁日报》曾发表旅大市西岗区开办劳动后备讲习所的调查，说该区的10条街道都办了这样的讲习所，建立了自己的劳动基地，全区6500多名待业青年中已有5100多名进入了讲习所。不过，举办这些讲习所的目的，已不再是为了动员知青下乡，而是为他们回城后的重新就业做准备了^②。

三 发动全社会的力量

1966年初由中央向全国推广的三个典型，又为城市提出了新的任务，要在举办下乡之前培训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即使在知青下乡之后，城市也与农村结合起来，不断关心和过问他们的思想与生活，对他们负责到底。中央期望能因此形成城市街道、农村生产队和学校配套的“一条龙”，让全社会共同担负起管理知识青年的任务。

这三个典型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青少年之家办学经验、长春市有计划地把城市青少年导向农村的经验和太原市举办电视攻读中学的经验。

牡丹江青少年之家与上述成都、广州的训练班、讲习所一样，是针对那些甚至连半工半读学校都未能容纳进去的社会闲散青少年采取的管理办法。据称，这个青少年之家创办于1954年，初衷是组织城市中未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进行文化补习。1956年曾动员了300多名知识青年到“北大荒”。1958年以后，他们开始认识到这种训练班应该扭转方向，主要是为青少年就业做准备。1964

① 《全国成千上万知识青年踊跃下乡上山》，《中国青年报》1965年7月20日。

② 见《城市待业知识青年管理教育的一种好办法》，《辽宁日报》1978年12月18日。

年，他们将十余名知青动员到该省宁安县团山子大队集体插队，1965年，又在宁安县群山环抱的渤海盆地办起了牡丹江市莲花青年农场。农场办起后，该市有关部门经常派干部、教师前去探望，为他们进行思想工作，也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长春市的经验更为完整，就是在城市和农村为未能升学的青少年试办“市来社去”的学校，在城市试办“城乡兼顾”的学校，在街道试办“劳动后备讲习所”，在农村生产大队建立“集体户”，使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从城市到农村，形成配套的“一条龙”^①。

即使对于回乡知识青年，国家也希望能够动用城市的力量，对他们施加影响。回到家乡的农村知青，大抵对自己曾经读过书的学校和老师，怀有较深的依恋感情，有不少青年遇到挫折和苦闷时，愿意写信向母校的老师倾诉。有关部门重视并抓住了这个环节，要求各学校将关心回乡生产学生当成学校份内的日常工作。定期派领导和教师去农村看望他们，或请他们回校为即将毕业的学生做报告，举行座谈。

其实，这些做法不无可取之处。将未能升学的青少年组织起来，进行必要的职业培训，为参加工农业生产做准备，这在今天也是非常必要的。但这一做法要想贯彻下去，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一要领导重视，这里所谓的重视当然不仅是思想上而尤其是物质上的；二要社会各方面的密切配合，具体地说，就是要在整个社会被置于一套严密、高效的组织系统的前提之下，各部门，诸如城市街道和农村之间、城市的党和共青团之间、安置办公室与学校之间、乃至知青家长所属单位与这些机构之间，都能协调一致，用当时的话说是“拧成一股绳”。谁都知道，这在很大程度上，

^① 《组织起来，管好教好，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人民教育》1966年2月号。

只能是一种理想。事实上，城市街道一直将这些青年看成为沉重的包袱，一心想将他们往农村推，对于学校和工厂来说，管理知青实在是额外负担，他们未必有能力和余力来担负，而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总是要配合当时的“中心”来进行的，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的热点和中心，不可能总是知青问题，于是，他们管理知青，就难免具有冷热不均的特点。凡此种种，就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无形的阻力。

何况，这三个典型的被推广，正处于“文革”爆发前夕，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气氛的人们，已经无心注意这类问题，它们很快就被忘记了。70年代，当“文革”中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初混乱阶段已经过去，再想将这场运动进行下去已经十分困难的时候，中央曾再次拾起了这种城乡配套的经验，并将其作为一项新生事物，一项新的创造，在全国广为宣传推广，这就是一度名闻全国的“株洲经验”亦即厂校挂钩的经验。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做法，并未能挽救上山下乡运动。

三 当农民以后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随着下乡上山知识青年的人数日增，如何对他们加强管理，如何让他们在农村巩固下来，便成为必须认真对待的大问题，因为稍有不慎，前面的一切努力就有付之东流的危险。

大多数知青不甘于一辈子就做普通农民，他们还对自己的前途抱有期望，这期望化为实际考虑，可以大致归纳为三条路，即一：当干部；二上学读书，成为一方面的专门人才；三重新回到城市去。如果前两条路可以走通，他们中会有一部分人情愿不回城，至少是暂时不回城，回乡知青也会因此而趋于稳定。国家看到了这点，并试图从这里出发，进行知青在农村的巩固工作，这实际上也是大力倡办半工半读学校的目的之一。

一 读大学

知识青年在中小学所受的教育，并不足以让他们在农村充分发挥作用。通过系统正规的教育，使他们成为农村所需的各种专门人才，也因此而使他们感到在农村有用武之地，从理论上说，的确是让知青在农村巩固下来的最有效、最合理的办法。何况，读大学，是当时年轻人最美好的梦。下乡务农以后，这个梦是否就彻底破灭了？如果有人向他们保证，只要在乡下表现好，就还有重新进入大学的可能，那么，对很多青年来说，就不会再将下乡视为畏途。

早在1958年初，当上海计划将城市剩余人口动员下乡之时，就已经提出了从下乡知识青年中招收大学生的设想，甚至有人提出了以后的大学生不再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而让他们都到乡下锻炼几年的建议。1958年以后大批工农子弟被保送上大学读书，其中有不少就是回乡知青。60年代以后，知青典型中也有少数被保送上大学，侯隽批判周扬曾以上清华大学来引诱她，以达到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丑恶目的，就是一例。她虽然“抵制”了这一诱惑，没有去，但却有别人去了。福建省曾树立过一个出身于泉州华侨世家的女青年林涓，她于1963年高中毕业后下乡，1966年，就被作为优秀青年标兵，保送进人民大学新闻系，后来于1973年移居香港^①。1964年上海高校录取了一批退伍士兵和知识青年，其中复旦大学哲学系招收了8名退伍兵和11名劳动青年，而在华东政法学院的一年级新生中，则有在崇明围垦农场劳动、工作过两年和在崇明农村劳动过两年的知识青年^②。他们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批“工农兵学员”。

以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方式作为改造大学的手段，这不是“文革”

① 《不变的是她的中国心——访荷籍华裔女作家林涓》，《文学报》1994年10月6日。

② 《一批退伍士兵、劳动青年进入上海高校学习》，《文汇报》1964年11月24日。

的新发明。1965年，陆定一就曾有过把这一做法加以扩大乃至制度化的想法。他说，大学文科、师范（包括哲学、历史、法律、地理、经济等等）可以不招高中毕业生，而是招解放军退伍军人、下乡劳动过几年的知识青年、进修的教师和机关中的青年工作人员。高中毕业生经过劳动后，挑选好的，采取保送的方法，测验一下文化水平就可以。为什么招这些人呢？因为大学文科里的个人主义熔炉厉害得很，高中毕业生什么也不懂，也没有劳动过、锻炼过，结果教师趾高气扬，学生向他看齐，于是就成了一个熔炉……

但是，有幸进入高等学府的知青，毕竟是极少数，因为如果高等学校有这样的容纳能力的话，国家也就不必搞上山下乡了。进正规大学不成，但可以另辟蹊径，这就是刘少奇所倡导的半工（农）半读大学，像1958年一样，国家希望靠这种办法，为下乡上山的城市和农村青年圆大学梦。

1958年在各地一哄而起举办的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学校中，就已经建立过为数不少的以知识青年为主要招收对象的农业大学，著名的如江西共大、吉林延边东升公社的黎明大学，以及后来大量吸收了上海等城市支边青年的新疆塔里木农垦大学等^①。1964年以后重新兴起的学校，都是在汲取它们办学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除了硕果仅存的这几所之外，其他半工（农）半读大学，大多数是由原来的全日制正规大学改成的。到1965年初，全国农业、农垦、农机、林业、水产、水电、气象、教育等系统

^① 据当时报道说，塔里木农垦大学从1958年建立以来，一直坚持半工半读教育制度，做到了粮肉油菜基本自给，为国家培养了600多名能文能武的新型建设者（见《塔里木农垦大学办得像抗大一样》，《人民日报》1964年12月28日，《今日“抗大”——记塔里木农垦区新型的农垦大学》，《人民日报》1966年9月14日第一版；《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今日“抗大”——塔里木农垦大学》，《人民日报》1966年9月15日第四版等）。该校在“文革”开始时曾红极一时，吸引了内地众多红卫兵和青年学生前往串连，后于1969年5月9日被宣布撤销（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丛书：《农一师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的高等农业院校，已有一半以上实行和试行了半工半读，中等农业学校实行半工半读的占2/3以上。到当年年底，全国的434所全日制高等院校中，已有177所开办了半工半读试点专业，在校学生达44000多人。

还有不少新创办的农业大学，如：河北林业劳动大学。是河北省试办的第一所半工半读高等学校，这是河北省在推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试点工作中，开学时间最早的一所（1964年10月）。该校学制定为4年，设有林业专业，已招收的学生105人，绝大多数是工农子弟，其中大部分是高中毕业后参加林场劳动一年以上的知识青年。校址就设在国营的杨柳青林场。他们提出要力争在二三年内实现经费自给。学生每年除放寒假半月之外，教学5个月，劳动实践6个月，在劳动期间与工人实行同样的劳动制度。

同年年底，河北省的第二所半工半读高等学校——河北农垦耕读大学开学。这所学校设在国营柏各庄农场，学制也是4年，设置有农学、农机、畜牧兽医3个专业。据称，它的任务是为农垦战线培养相当于全日制同类专业高等学校知识水平、又红又专的新型技术干部。学生来源是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国营农牧场职工或子弟。第一批所招的100名新生，绝大部分是该省各农牧场参加劳动一年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小部分是当年高中毕业的农场职工子女。

1965年3月，北京新办的第一所半耕半读高等学校——北京农业劳动大学开学。这所学校位于京郊沙河中越友好人民公社附近，实行学生半耕半读、教师半耕半教的制度，学生绝大多数是高中或中专毕业后在郊区公社或农、林场参加过1—3年以上劳动的知识青年。首批300多名知青成为这所新型大学的第一批学生。

到1966年以前，已经办起这样的半工半读劳动大学的，除上述北京、天津、河北之外，还有江西、湖南、广西、陕西、吉林、云南等省，中央要求，凡没有办学校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除

青海、西藏以外，1966年都要试办，规模为每所300—500人。结果不少地区又出现了一哄而起的情况，而且这些大学，又重复了1958年那些大学的命运，没有哪一所能坚持下来，当然，这次的垮台，是因为“文革”的爆发。

以培训农村知青为主的业余教育，也随着回乡、下乡知青人数的迅速增多，要求进一步学习愿望的日益迫切，而在各地普遍开展起来。但在当时农村那种“极左”的环境下，知青原来在学校学过的那点东西尚且派不上用场，有多少人对这种函授抱积极态度，是很令人怀疑的。

二 红色接班人

虽然各行各业都有接班的问题，但“文化大革命”前后这段时间里，只要提到接班这两个字，谁都不会怀疑这是指的政治上的接班，也就是被提拔当干部。这在当时是比上大学更让青年们羡慕的出路。

1957年刘少奇在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时候，曾经劝告他们下乡后要老实地种上几年地，待到对农村的一切已经有所了解，而且得到农民的信任 and 拥护之后，再当干部。他还为知青们指出了—个光辉的前程：讲种地，和原来的农民—样；讲文化，比原来的农民更高；讲政治，和其他农民群众关系很好。就有可能由人民群众选出来当人民代表，当合作社的干部，当国家机关的干部。这样的干部才真正是群众中涌现出来的，而不是从上面硬安上去的。

解放后历次宣传的先进知青典型，出名之后几乎都被提拔当了干部，这无疑给了其他青年—种暗示。

问题在于60年代以后，走这样的道路却成了一部分人的专利。先进典型可以出身于不同的家庭，而革命接班人却几乎只能从出身好的青年中选拔，我们可以以当时宣传最甚的两个接班人

典型作为例子，这两个典型是周明山和吕玉兰。他们俩都只有高小文化程度，说他们是青年农民也许更准确些。

在第八章我们已经提到过周明山，他是山西省绛县南柳大队人，1951年高小毕业，17岁当村里文书，然后到七泉社任生产队长、副主任，19岁入党。1957年底，经老书记王长修的力荐，担任了农业社的党支部书记，他带领社员整修坡地、发展牲畜，经过6年的艰苦奋斗，使这个出了名的穷地方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0多亩狼不吃的山坡地全部整修成水平梯田，粮食总产量提高了1.6倍，棉花产量提高了1倍，不仅还清了国家几万元贷款，社员们还有了上万多元存款，再也没人愁吃愁穿了。

对周明山的长篇报道《敢教日月换新天》始见于《山西日报》，其后为《中国青年》转载并加以编者按说，这篇文章“写出了新一代的一个革命接班人怎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老党员、老贫下中农的扶持下，一步一步锻炼成长的过程……周明山的成长，说明我们的事业有着最忠实可靠的接班人。看了开头那幅革命两代人在交班、接班之间共同宣誓的动人情景，谁能不感动？”

这篇按语最后强调说：“周明山成长的道路是我国新一代农村青年成长的根本道路。”

1966年年初，周明山升任绛县的县委书记^①。

^① “文化革命”爆发的当年年底，周明山还曾见报，不久后就受到冲击，罪名是投靠刘少奇及其在山西的黑爪牙，阴谋将南柳作为全国学习的典型以与毛泽东树立的大寨相对抗。南柳的先进事迹与大寨的确有共同之处。据揭发周明山的材料说，早在1961年，刘少奇在山西的代理人陶鲁笈就曾提出，要让周在3年内当上地委书记，可见周明山早就得到了省里领导的注意和加意培养。1964年4月，安子文又曾在一个会上说，工业上的大庆，农业上的南柳，在主要方面是一样的。我们在全中国树立南柳这面旗子，就是要让人人都来学习它。南柳与大寨的矛盾是否属实，我们没有根据，但当大寨的名声节节上升之后，南柳则销声匿迹了，周明山也随之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

吕玉兰走的是同样的路。她是河北省临西县东留善固村人。1955年15岁时从完小毕业，以徐建春为榜样，回乡参加了农业生产。据“文革”前对她的报道，她回乡不久，正赶上互助组转农业社，按规定，社里要选一名妇女担任副社长，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有人提议让她“去顶名开会”，刚好这时正社长犯了错误被撤职，15岁的吕玉兰就当上社长，担起了领导一个小社的担子。

1956年春，东留善固由初级社转成高级社，她担任了副社长。东留善固是个有名的穷沙窝，全村3000多亩地，就有2000多亩是沙地，还有1000多亩是荒野沙滩，春天刮起风来，天昏地暗，对面看不见人，一直靠国家的救济过日子，她请教老农治沙的办法，都说要治沙必须先造林。当时一没树苗，二没钱买，她领着一群青年妇女自己采种育苗，冬天迎着刺骨寒风到沙滩上造林，到1959年，她们已经造林600亩，种树11万株，县里专门在这里召开了林业现场观摩会。

东留善固还是个出名复杂的村子，它位于省和省搭界的地方，又是在3个专区、3个县的边缘上。过去这里反动会道门的势力特别猖獗，合作化以来，又有人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生产上的每一步发展，都在经历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吕玉兰之成为全国闻名的先进典型，正是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广泛展开以后，作为一个“敢于顶住风压住浪，攥紧无产阶级印把子”的形象被树立起来的。她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勇于斗争，不怕阶级敌人软硬两方面的进攻。

吕玉兰19岁时担任了党支书，据1966年“文革”爆发前夕对她的介绍说，10年过去，东留善固建立了以吕玉兰为首的坚强的党支部，他们在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同时，也向恶劣的大自然展开了顽强的战斗，吕玉兰也从一个高小毕业生成长为一个无

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优秀接班人^①。

可是，像这样在十几岁就当上了互助组长、合作社主任，然后担任党支部书记，得以充分施展才干和抱负的青年，究竟能有多少呢？有多少人具备走这条道路的条件呢？再者，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究竟是主观努力，还是客观的条件呢？

开始有一些地区考虑到要为青年创造这种客观条件了。从1964年起，广东省就提出了要从知青中培养干部的问题，这里所说的知青，还主要是回乡知青，也许是因为此时下乡到农村生产队的城市知青数量还太少之故。

^① “文化革命”开始后，吕玉兰一度受到冲击，被揪斗一年多。据她的丈夫回忆，“当时十几所大学红卫兵到村里造反，有人把贴上小旗的竹片拼命插进她肉里，她被秘密关进牛棚，让她吃撒上农药的稻草，企图造成自杀假象……幸亏有人向周总理反映了情况，中央及时派解放军来保护了她。”

吕玉兰随后便青云直上。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中央委员，然后担任河北省委副书记。

1973年，她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阿尔巴尼亚，1975年2月到北京参加全国工会、共青团、妇联成立的筹备会，担任全国妇联筹备小组第一副组长。1977年4月，她担任了河北省委书记，是全国的第一个女省委书记。她曾一度想上大学，当工农兵学员，被领导们婉言说服。

在此期间，她不断得到周恩来的重视与关照。“九大”时，周恩来要新当选的工农中央委员们向吕玉兰那样“抓两头”，就是一头抓群众，一头抓工作。从阿尔巴尼亚率团回国后，周恩来专门找她谈话，让她把东留善固大队学习大寨的经验在全县推广，并且说：陈永贵同志到县上工作，昔阳县3年就大寨化，你到县上工作，要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几日后，周恩来又委托邓颖超派车把她接到家里，与她详细研究临西县东留善固化需要的时间和增产措施。

1980年吕玉兰被免职，有人说她有八大问题，材料与她见了面，几年后才查清此系诬告，但她却受了很大刺激。下去后，她到河北正定县当县委副书记，没有安排具体工作，在这期间费尽心力，最后经省委书记的同意，进入河北农业大学学习，并终于获得大专毕业文凭。1985年10月，吕玉兰被任命为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1989年秋，她到邢台一社教点检查工作时遇到车祸，此后出现语言迟钝现象，到1990年底发展成脑血栓。1993年3月31日去世，时年51岁。

当年8月，省报《南方日报》在报道一组农村党支部重视培养回乡知青担任各级干部的消息时，发表编者按：

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是又红又专的基层干部的重要来源之一。现在的回乡知识青年，除了极少数例外，总是大不相同于旧社会的知识分子。要选拔成分好、出身好、觉悟高、劳动好，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重点加以培养^①。

几天之后，该报再次发表有关的报道，并且强调说，要把这一可能转化为现实，是需要进行一系列工作的，诸如慎重地挑选培养对象，要首先重视出身成分、思想品质，而不是只看他们是否“能说会道”。要悉心教育培养，以阶级斗争为纲，着重使他们在阶级斗争中锻炼，而不是只教他们学生产，学业务（当然，学生产、学业务也是重要的）等等。在这里，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是常委重视，全党动手^②。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竟如此明确而且公然地提出，接班人的选拔标准是“首先重视出身成分”。于是，个人的努力、个人的素质，在这里便几乎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曾经由刘少奇等人指出过的一片光辉的前景，一片可以让青年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也是一项能够让知青在农村巩固下来的重要措施，就这样被人为地堵死了。

四 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

虽然从1963年起中央就一再强调指出，今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主要是到农村生产队去插队落户，虽然按照当时的推

① 《从回乡知识青年中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南方日报》1964年8月15日。

② 《全党动手培育回乡知识青年》编者按，《南方日报》1964年8月30日。

算，全国农村有 500 多万个生产队，按照每个队先后插入两个人计算，15 年内就可安置 1000 多万人，但直至 80 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终结束为止，这也只是一个构想，一个“方向”而已，农村的天地远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广阔。

前面说过，就是在明确将插队定为知识青年下乡的方向的同时，周恩来就已经清醒地看出，每年要有那么多人在农村就业，并不是很容易的，因为我国可耕地的面积很少，在很多地方，农村最缺的是土地，而不是劳动力，来自农村方面的对知青下乡的阻力是巨大的，这种阻力还会随着下乡人数的逐渐增多而更大。动员知青下乡插队困难重重，而且事实证明，农村干部和社员，既不情愿也不具备管教知青的能力，从农村倒流回城的，要远比到国营农场的为多。再者，越是像上海、天津这类知青最集中的大城市，其附近郊区和农村对知青的容纳量越是有限，凡此种种，便使国家在将插队作为知青下乡方向的同时，也在设法另辟蹊径，这就是到外省市、主要是边疆地区去支边，当时称之为“跨省安置”。

从 1963 年下半年开始，在上海、天津等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和一些省份，跨省安置就与到农村生产队插队一样，成为知青下乡的主要方向，其人数甚至要超过插队人数；在中小城市和城镇，则以到附近农村插队的居多。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文革”期间。

跨省安置的主要形式，是组建生产建设兵团。这些兵团，除新疆兵团等少数几个外，其余大多数，就是为容纳知青而组建，也随知青的大返城而解散，几乎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相始终。这是继下乡插队、参加国营农牧场建设以及建立知青农场等方式之后，国家所寻找到的又一种安置知识青年的方式。这就是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几种主要方式，都是在“文革”之前，就被莫立了。

远离家乡的青年踏上了 50 年代青年志愿垦荒队员踏过的路

途，但是，这回他们的身份不同了，他们不再是农民，他们是兵团战士，这平添了他们的自豪感。也使他们成为知青群体中一个重要的，也是特殊的组成部分。

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兵团组建时间最早，它并不是为安置知青而建的。1949年，由王震率领的部队解放新疆后，一部分便就地集体转业成为农业建设部队和工程建设部队。1954年12月5日，又正式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956年6月农垦部成立以后，新疆兵团便作为中央的直属企业，由农垦部和新疆自治区党委双重领导。几十万转业官兵们与先后到来的移民一道，在玛纳斯河流域、伊犁河谷、阿勒泰山麓、巩乃斯草原、阿克苏专区、哈密专区开发了十多个大垦区，建设了几十个农场，在千里边防线上形成了一条边境农场带。1958年以后，他们又向莫索湾、塔里木进军，在沙漠边缘上建设了几十个农场。每十多个农牧场合在一起，就成为一个垦区，每个垦区都在建设一座新型的城市，兵团领导机关所在地的石河子，就是其中之一。

由兵团作为安置城市青年场所的动议，在1963年中央决定将上山下乡作为一项长期政策之前，就已经开始了。1961年有少量上海社会青年进疆，其中安置在兵团农一师的有近400名。1963年，周总理又指示上海市委派工作团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一、二师塔里木垦区，进行了安置长期计划的考查，这些地区后来就成为上海市安置青年学生的基地。

这年9月，王震就这个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发言。他说，上海市目前闲散的初、高中毕业的青年学生，需要安排的有十几万人。过去的边疆移民，没有贯彻执行中央领导同志“将童男童女分别组织部队，生产打下了基础，劳动熟练了，有对象结婚，就在边疆安家”的指示，建议今后采取征兵，组织生产部队

的形式，首先是保证青年学生在吃穿用上面相等于步兵士兵的待遇（每月津贴可比士兵略低），每人每年伙食、服装、津贴等费用约需250元到300元，3年后再评定农工工资等级，这样就能够巩固住。其次参军可以激发青年革命精神和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军队形式的组织生活纪律性强，便于对青年进行管理和进行政治、生产技术教育，能够较快地成为有文化有生产技能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产业军。

以参加生产建设部队的组织形式，大批到边疆军垦的模式由此形成了。中央找到了一个大规模集中安置大城市知识青年的最有效途径。

对于一下子动员如此众多的知识青年去条件艰苦、路途遥远的边疆，上海市委的态度是相当审慎的，他们认为此举揭开了十分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好会出现许多消极因素，甚至还会死人，所以动员之前，先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排队，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通过个别工作，培养骨干，以带动一般，对于资产阶级子女，也以教育为主，并不勉强动员。

上海青年对于此举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他们认为去兵团有两个好处，一是政治上进步快，能够穿上军装到边疆去保卫祖国，是当时青年认为最光荣的事情；其二，是生活有保障，除按供给制待遇外，还按艺徒标准发给零用钱，比起下乡插队，条件要好得多^①。两个月中间，报名去新疆的人数达45000名，占全市社会青年总数87000人的1/3以上。

1963年5月，上海市被批准到新疆的社会知识青年达15000人，从7月中旬开始分批奔赴新疆兵团。是年年底，又有5000名应届毕业生动身，使当年赴疆知青人数达20000人，大大超过了国家原定的13000人之数，其中“资产阶级分子”的子女，占2000

^① 《团的情况》1963年第19期。

名。他们大部分被安置在塔里木垦区，分别被插入老部队，也有一些青年，进入了石河子农学院学习。

1964年，动员赴疆的工作达到高潮。5月，首批社会青年出发，召开了盛大的欢送会^①。9月，又有应届高中、初中毕业生奔赴新疆，被分在伊犁垦区、奎屯垦区、阿勒泰垦区和驻石河子的建筑工程部队。绝大部分参加农业生产，小部分参加水利建设。到这年年底，赴新疆的上海知青两年来共达50000人。分布在南北疆的农1、2、7、8、10师和工程建筑1师、2师以及兵团直属工厂、企业、机关、学校^②，其中仅农一师，到1965年底，就接收了上海知青40962人。

到1966年上半年为止，上海市共动员9万余名社会青年、应届毕业生迁往新疆，大部分进入了生产建设兵团^③。与此前到新疆的移民不同的是，这回进疆的数万青年，尽管来自生活相对说较优裕的地区，自身受教育程度也相对较高，也就是说，与边疆生活的反差，比以往任何一次移民都大，却唯有这一批人，是真正巩固住了，这要归功于这些青年的素质和觉悟，更要归功于生产建设兵团这一组织形式。

即使是过了十余年，当当年与他们一同下乡到其他地方的同学，以及在他们之后的“文革”期间下乡的知青都返回城市之后，这批兵团战士中的大多数，也仍然没能回归上海，据当地1985年的统计，留在兵团的上海知青为30000人，他们可以说是上山下乡风潮卷过之后，仍滞留当地的、人数最多的一个知青群体。

在从1963年7月到1966年10月的短短3年间，该兵团从上海、北京、天津、武汉4市和江苏、浙江两省，一共接收了知识

① 《鹏程万里》（短评）《文汇报》1964年5月21日。

② 《文汇报》1964年12月16日。

③ 《中国人口·上海》。

青年 126700 人，这意味着，仅新疆这一个生产建设兵团，就容纳了“文革”之前全国全部城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总人数的约 1/10，这实在是一个壮举。

二 西北农垦的发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成功经验，确实大大拓宽了中央的思路，并从此开始了组建新兵团以作为安置知青基地的工作。

此时国家已经具备了在边疆地区大规模组建生产建设兵团的各方面条件：多年的经营，已经在全国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农垦、农垦系统。到 1965 年，这个农、农垦系统包括 2062 个农场，146 个工厂，28 个建筑企业，26 个运输企业，48 个商业企业，拥有职工 260 万人，属于本系统的人口达 660 万人。

“文革”前夕，这一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了，首当其冲的是西北。1966 年 2 月，农垦部陈漫远副部长到西北检查工作，同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4 个农建师负责人研究了西北农垦的发展问题，成立了“西北农垦兵团”、“西北林业兵团”。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利用新疆兵团雄厚的物质力量和大批有经验的干部，支援这两个兵团的建设和发展。

1. 甘肃 11 师

甘肃农业建设第 11 师建立于 1963 年 10 月 30 日，师机关设于酒泉，先后接收了河西地区的 24 个国营农、牧场。

从 1964 年开始，天津着手动员知青到甘肃该农建师去支援边疆建设，当年前后奔赴甘肃的天津知青一共是 2000 名左右。他们所去之处是甘肃垦区的各农业生产队和水利工程队，一般是 250 名知青编为一个生产队。这些生产队大都位于戈壁滩中，生活和劳动条件十分艰苦，住的是地窝子或帐篷，从事的是平地打埂挖土方等粗重的体力劳动，一度引起家长和社会的关注。

1965年5月，天津市再次召开广播动员大会，动员知青去甘肃垦区。一周以后，首批800多名社会知青出发。6月底又有800名社会青年动身。9月以后，该市又动员了1500名应届中学毕业生出发。天津市派出市第一教育局副局长贾宗毅及市区有关部门的干部、医务人员20余人陪同前往。至此，该市1965年赴甘肃的社会知青与应届毕业生合计已达3000余人，与1964年合计，则已达5000余人。

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这一动员仍在进行，从当年7月至12月，又有几批知青到达。

山东前往甘肃农建师的人数，与天津大体相仿，都是1965、1966两年从济南、青岛、淄博、济宁等市动员的，每市人数都在千人上下，此外，枣庄市也动员了几百人。据统计，1965年山东省到甘肃支边的知青总数是4229人，1966年为2544人，两年共计6773人^①。

2. 农建师第12师

这是1965年在青海省原格尔木农场的基础上，以山东知识青年为主体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最初叫农建师第4师，1968年改为12师，归兰州军区领导。

1965年9月，山东省济南、青岛、烟台、淄博、枣庄、潍坊、济宁、德州等8个城市的3002名知识青年，首批获准到青海参加边疆建设；第二年在这8个城市动员了4529人，使两年赴青海兵团的知青人数达7531人。他们当中，初、高中毕业生占总人数的62%，从年龄构成上看，15岁至17岁的占56%，18岁至20岁的占14%，其余在20岁以上，男女性别之比为1比1，素质是较好的。

^① 《中国人口·山东》引自省劳动厅：《山东省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

除山东知青以外，青海省西宁市也组织了1200余名城市知青，加入了这支队伍^①。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样，这个农建师也实行军队建制，采取供给制，青年们刚到时热情很高，但不久“文革”就开始了，场内无论经营管理还是青年的思想状况都是一片混乱，生产长期上不去。在1965到1981的16年间，这个场仅仅生产了4.65万吨粮食，平均每年4255公斤，而国家16年来供给农场的粮食却有3.78万吨，平均每年2363公斤，是农场所生产粮食的81.3%。在这期间，国家给农场的累计投资将近2亿，仅场办企业的亏损即达1.4亿。1980年平均每个职工生产粮的价值只占农工工资的7%，从始至终未能自给，每年大量靠国家补贴，得不偿失。

从1976年开始，大批知青陆续返回山东，在1979年知青大返城的背景下，青海省政府决定将3500名农建师知青分配到青海各地工作，以后又与山东省协商，于1980到1983年，将3502名知青调回山东，20余年的辛苦付于流水，这个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由此宣告终结。^②

2. 宁夏13师

兰州军区所属的生产建设兵团，所辖共3个农建师，其中甘肃为11师，青海为12师，宁夏为13师。宁夏13师是以北京、天津的知识青年为主体的。

北京的动员工作从1965年6月开始。中央原来的计划动员人数是4500名，但实际动身的人数仅有2800名，他们中绝大部分是历届高、初中毕业生和肄业生，其中有从1958年毕业就一直留在家中的，由于未完成计划，结果到9月，又动员了800多名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分两批前往宁夏。

^① 田方等：《中国人口迁移新探》，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三章。

^② 《中国人口·青海》。

由于是第一次组织这种大规模活动，北京这次的宣传动员工作做得很细致，有具体的宣传提纲，有详细的远景规划，社会青年报名前，都曾在区属各办事处组织的青年学习班短期学习，其中有一批还在行前“火线入团”。这对于在家多年，备感前途茫茫的社会青年，有很大的感召力，报名十分踊跃。北京市还派遣了护送干部数十人，随他们同车去宁夏，市安置办公室也派出了工作组，准备较长期留在宁夏，协助当地党和政府作好北京知青的安置工作。

当时生产建设兵团尚未组建，这些知识青年，都被分配到贺兰山下和六盘山区的国营农场和林场。后来，这些农、林场被编入宁夏13师下属的3个团：1团驻平吉堡，西城区知青主要集中于此；2团驻贺兰县暖泉，海淀区知青和门头沟区的矿工子弟都在此团；3团在西大滩，北京青年很少。条件最差的，是位于六盘山的搞水土保持工程的水保师，以天津知青居多。^①

这批被送往宁夏的社会青年成分较复杂，很多是因家庭出身问题而屡次投考大学而不中的，还有些有小偷小摸等不良行为，说是中学生，其实也有高小毕业的。总之，以政治上“不可靠”者为多。到达宁夏后，生活条件的艰苦、干部对他们的管理不力甚至粗暴不公，使他们中很多人产生一种发泄欲，是北京到外地的知青中出现问题最多的一部分。“文革”期间北京知青中返城风闹得最烈的，也是他们，以至人们谈起宁夏13师，都有谈虎色变之感。

天津市动员知青到宁夏也自1965年始，但人数不多，前后共有两批，人数为几百人。

① 《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宣武区六百青年赴宁夏农村》，《北京日报》1965年6月6日；《立志做农业战线上的闯将，本市第二批知识青年昨去宁夏》，《北京日报》1965年6月15日；《抱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志愿，本市又一批知识青年赴宁夏》，《北京日报》1965年7月2日；《从宁夏来的消息两千多北京知识青年在劳动中初显身手》，《北京日报》1965年9月15日。

三 东北农垦总局

黑龙江省的“北大荒”在新中国几十年的历史上赫赫有名，它始终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事紧密相关，甚至已经成为一个象征。1955年杨华率领的第一支北京青年垦荒队，踏上的就是这块黑土地，他们虽然大多是青年农民，但却被人们一再误认为是知青的代表，也足可证实此举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影响。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正式建立于1968年6月，此后知识青年遂大规模进入兵团，而在此之前，这片土地归属于东北农垦总局下属的各国营农场，早在1963年，北京市已经计划将“北大荒”作为安置本市知青的主要地区之一。1963年10月，第一批174名北京知青前往北大荒的853农场，其中有应届初、高中毕业生84名，其余是社会青年，平均年龄19.6岁。

853农场座落在北大荒东北角的虎饶县境内，原是一片渺无人烟的大荒原，1956年由复员转业官兵建立起国营农场。这里天气寒冷，交通不便，对于刚从城市下乡的知识青年，确实有很多不习惯之处。但由于是第一批试点，北京市和农场领导都给予了非同一般的重视。农场没有立刻把他们分到生产队，而是分配到4个分场，在分场部成立“北京青年队”，进行3个月的集中学习。在由轻到重、由简到繁、逐步参加劳动的同时，向他们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阶级斗争教育、国营农场农业生产基础知识教育、防寒过冬知识教育，以及青年生活、理想和晚婚教育等。北京知识青年就这样比较顺利地北大荒渡过了第一个冬天，并经过了春播、夏锄、秋收将近一个生产周期的劳动考验^①。该农场有个全国著名的雁窝岛，是个三面环河的荒岛，当地群众称它“大酱缸”，转业

^① 东北农垦总局国营853农场团委：《我们是怎样做好农场知识青年工作的？》，载《国营农场工作经验选编》，农业出版社1965年2月。

官兵经过艰苦奋斗将它开发出来，对到场的北京知识青年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纷纷要去雁窝岛劳动。在此期间，北京市一直对他们进行着不遗余力的宣传，不仅报刊不断发表有关他们情况的报导，1964年还组织毕业生到那里参观，并举办了展览会，参观展览的应届高中和初中学生达万余人。

1964、1965两年，北京市又陆续动员了几批青年奔赴北大荒，分配在290、597、855和雁窝岛等国营农场。每批人数都在八九百人左右，使“文革”前北京市前往“北大荒”的知青人数达到2000余名，但尚未完成中央原定3000人的计划数。

总之，这一时期北京市对于动员知青到“北大荒”一事，重点一直落在大造声势之上。1965年，该市曾特地组织了一批1963、1964年到“北大荒”的知青家长到那里访问，他们一行13人，在20多天的时间里访问了5个农场的19个生产队，与600多名知青见了面，举行了十几次座谈会。回京后，他们举行报告会，述说他们亲眼看到了孩子们在劳动的熔炉中锻炼成长，受到了极大鼓舞。这使即将走上这条道路的青年颇为向往。

毋庸置疑，这一切宣传，都在“文革”期间的中学生心中播下了种子。

四 其他

兵团战士的足迹，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甚至踏上了僻远的西藏高原。

早在1965年，就有来自北京工读学校、北大附中、师大女附中、107中、96中等学校的知识青年100多名，前往西藏的国营澎波农场^①。据当时负责此事的安置办公室干部回忆，他们大多是

^① 《在西藏高原生根开花结果》，《中国青年报》1965年11月20日；《在西藏高原向首都亲人汇报》，《人民日报》1966年1月27日。

高中毕业生，本来是要送到那里作为干部培养的，所以政审和体检都很严格，动员工作进行得也很谨慎。1966年1月，又有山东省支援西藏建设的200多名知识青年到达拉萨，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①。

在1966年2月中南海总理办公室召开的一个会议上，有西藏同志说，知识青年愿去新疆，却动员不到去西藏的。于是，周总理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筹建一个由1000多知青组成的团前往西藏。当年除新疆兵团抽调了部分干部、工人之外，还有北京、河南、天津的大约2000名知识青年，自愿报名到西藏农垦战线参加了工作^②。新疆兵团前去援藏的职工，于1969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又全部撤回新疆。

此外，1964年3月，北京32所大中学校有256名知识青年踏上“开发海南、建设海南”的征途，在海南岛万宁县兴隆农场落了户^③。1965年，还有重庆、天津、武汉、上海等大城市的数千名高、初中尚未毕业的知识青年、社会青年和自愿到云南的财贸职工迁居云南。^④

1966年2月，华北农垦兵团、内蒙古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开始筹建，并且于“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秋天，从北京招收了第一批社会青年；3月，沈阳军区也组建了生产建设兵团农建第一师和第二师。这两处，后来也都转成了生产建设兵团。

这一工作虽然在几个月后，就因“文革”的爆发而一度中断，却为1969年以后生产建设兵团的大规模推广和大量吸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① 《山东四十年纪事》，第557页。

② 《中国人口·西藏》。

③ 《斗争的十年，胜利的十年——记战斗在海南岛的一批北京知识青年》，《北京日报》1974年12月22日。

④ 《中国人11·云南》。

五 军垦战歌

无论是“文革”之前还是后来下乡的知识青年都承认，在所有关于上山下乡的宣传中，最能打动他们的，不是报纸上的文章，也不是各种各样的报告会，甚至也不是很多知识青年下乡的行动——当然这些也是必不可少的——而是文艺作品。

一代青年的理想、热情、兴趣，甚至他们的用语、表情、服装、习尚，都受到文艺作品包括小说、电影、戏剧的深刻影响，都可以从这些作品中，寻找到最初的范本，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那种封闭的社会中，文学作品几乎成了青年认识人生的唯一窗口，在校学生尤其是城镇的中学生，就是通过文艺作品来认识上山下乡的。

这时的“知青文学”（如果可以称得上是知青文学的话），作者绝大多数并不是知青本人，写作的目的也不是抒发知青对那段人生道路的感怀，而是非常明确地为了配合党的上山下乡政策而进行的政治宣传。在那个时期独特的背景下，这些作品必不可免地带有虚假、夸张、空洞的特点。但对于生活于其中，已难于分辨个中滋味的青年，其感染力已经足够了。

我们在第二章中，谈到过前苏联小说《勇敢》给予当年青垦队员的鼓舞。60年代给予青年影响较深的有关知青的作品，有如下几部：

一 《朝阳沟》

这是由河南豫剧院三团于1963年推出的一部表现青年学生到山区参加农业生产的大型现代戏。在“文化革命”前为配合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编排演出的大量戏剧中，这是影响最大，从艺术角度看水平也较高的一部，一度曾达到脍炙人口的地步。

该剧描写城镇高中毕业生银环响应党的号召，与她的同学、未婚夫拴保一道，回到拴保在山区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故事。她虽然怀着满腔热情，但面对生活的艰苦和劳动的劳累，一度想打退堂鼓，甚至已经卷起铺盖动身回城，但在回城的路上想起自己的决心和乡亲们的期待，又返了回来。她闹情绪的时候曾对拴保说：“我一切的一切都完全放弃了，一心一意来为你们服务！”拴保回答说：“俺爹俺娘俺妹妹，全县全省全国的农民又是为谁服务哩！”拴保娘也教育她说：“啥叫屈材料？走遍天下，千家万户，大人小孩，谁不吃，谁不喝，谁不穿，谁不戴？天大的本事，地大的能耐，他也不能把脖子扎起来！”这几句话一时成为尽人皆知的名言。银环的母亲，镇上的一个小市民，曾坚决反对自己唯一的女儿下乡，甚至一直追到山里，在拴保娘和贫下中农的教育下终于被说服，甚至打算自己也随女儿在山里落户。

这部戏由于“比较真实、朴实和生动地表现了知识青年下乡后的思想变化和成长过程，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活泼，而且带有喜剧色彩”，因而受到官方的肯定。它气氛轻松，唱腔活泼，不像当时一般戏剧那样充满死板说教或“火药味”十足的阶级斗争内容，加上著名豫剧演员、在河南极有影响的常香玉也参加了演出，所以也颇受青年欢迎。

1964年元旦，毛泽东与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康生等一同观看了此剧并接见了全体演员，这意味着中央最高领导层对此剧的最大肯定和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支持态度，从此《朝阳沟》风靡全国，并被拍成电影。各地在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下乡之前，都要以此剧作为进行宣传教育的教材，组织青年和家长观看并进行讨论。如天津市1964年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到新疆支边时，即由市妇联邀请部分家长观看这部影片，然后举行座谈，这批青年从天津出发前夕，市委又组织他们观看并座谈观感。南京市这一年动员应届初中毕业生下乡插队时，采

取的也是这种形式。这些本来是为配合某项政治任务而编写出来的东西，却反而被当成真事让人进行讨论学习，这在如今看来很荒谬的作法，当时却习已为常，如《中国青年》就曾若有其事地讨论“银环给我们的启示”，用以教育青年。

二 《耕耘记》与《耕耘初记》

1964年全国掀起学习董加耕的热潮，董的家乡江苏省更是不甘落后，除了由党政各级组织层层布置学习任务，由各种报刊、杂志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以外，文艺团体也配合这一形势，编排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各种文艺节目。3月，在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宣传和学习董加耕的通知之后不几天，扬剧《耕耘记》就在南京的人民剧场公演了，这是一出以董加耕的事迹为素材编写的大型现代戏。

这出戏以高中毕业生田嘉玲立志回乡务农为开始，作者借助“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手法，通过她要回乡的消息在群众中引起的议论、惊喜以及初中毕业生汤振霞身在农村心在城市的落后表现，极力烘托田的革命形象。第一场，以田嘉玲家也不回，水也不喝一口，就立即赤脚下田的做法刻划她“坚强的革命意志”；然后是描写她如何虚心拜老农为师，如何与她的姐姐、姐夫为代表的各种旧思想、旧习惯进行斗争，最后改名为加耕，以模范行动教育了她周围有不同缺点的人们。

这出戏的出演受到好评，据说它就好在“并没有为了挖掘人物的‘内心冲突’而去渲染田嘉玲内心的矛盾和思想的动摇，而是从正面着手，写她如何以坚定的志向和顽强的毅力去克服重重困难，而使这个人物得到成长。这种在塑造正面形象时正确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这正是大演革命现代戏和大批“中间人物”的时期，任何艺术作品都只能按这个框架去套，当然这出戏本身就是为当时形势需要而写的。

6月，江苏省京剧团以这部扬剧为基础加以改编，在南京演出了现代京剧《耕耘初记》，内容是表现知识青年田志耕和她的同学梁志耘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的经历，这出戏当时得到肯定的原因，除了配合上山下乡运动的宣传以外，一是运用喜剧手法来展开戏剧冲突，“使观众既感到这出戏中的斗争，而出现在舞台上的形象又让人觉得可爱”，因为该剧反映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以喜剧形式的明快、健美和幽默风格，才能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二是“在运用、融化、革新京剧传统和创造新的京剧程式方面也取得一些可喜成果，如在花旦唱腔中运用融化了小生唱腔，比较确切地表达了田志耕这位抱有远大理想和意志坚定的女青年的坚强性格；唱词、念白也尽量做到通俗易懂，字正腔圆”。

这出戏进京参加了当时在京举行的全国戏剧观摩会演，周扬、陆定一、林枫等领导人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全体演员，这在当时是肯定的表示。《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还分别组织了京郊西山试验林场和四季青人民公社部分知识青年观看演出并组织了座谈，知青们一致表示，原来没看过京剧，以为看不懂，没想到这出戏一下子就把他们打动了。这出戏对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 《边疆晓歌》

这是以1955年第一批到云南澜江坝垦荒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员的劳动和生活为脚本写成的小说，曾在当时青年中引起很大反响。我们在第三章曾经提到，直至1971年，当正在组建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到四川成都去招收应届毕业生的时候，还曾用这部小说进行动员并且颇有效果。

四 《军垦战歌》

数万知识青年去新疆兵团，在当时的上海引起巨大的社会反

响，文艺界也配合上海市委积极参加了对知青的动员，全市的文艺团体曾联合举办“把青春献给祖国”的文艺演唱会，对激发青年的热情起了不小的作用。

1964年10月1日，一部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映上海知识青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生活的大型彩色纪录片《军垦战歌》在全国上映。这部影片所着力渲染的如上海市敲锣打鼓热烈欢送知青离开家乡、新疆人民热情欢迎支边青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到石河子看望知青等场面，“边疆赛江南”的富饶美丽景色和绚丽多姿的少数民族风情，都给了当时的城市知识青年强烈的感染，影片中充满激情的主题曲“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山迈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立刻就唱遍了全国。与上述几部作品一样，当时各地中学都组织学生观看了这部影片并在观后“畅谈”观感。很多“文革”期间下乡的知青都谈起过这部影片给予他们的影响，甚至一些迄未下乡的青年也说，一谈起“屯垦戍边”，谈起上山下乡，就以为是《军垦战歌》那个样子的。

文章至此，已经叙述到了1966年，如果把“文革”之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算作第一个阶段的话，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小结了。

将这个阶段的知青上山下乡称之为安置工作，而不称为运动，也许更确切些，它曾经是国家劳动力调配工作的重要一环，旨在为青年开辟新的就业道路。它与当时国家的几乎每一项政治、经济、教育制度都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说，它正是当时各种政策失误的产物。但是，就这项措施本身来说，至少从决策者的主观愿望上看是积极的，是力图对这些失误给青年造成的后果进行弥补。客观地说，在大背景不能改变的情况之下，也找不到比让农村知青回乡、让城市中不能升学就业的青年上山下乡更好的解决办法。

经过多年积极探索，在“文革”之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

为国家的一项正式制度，规模已经基本奠定，它包括：

一、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健全的、常设的领导机构，即安置工作办公室，以及专职负责的干部，还有国家每年固定拨付的安置经费。

二、一整套成熟的宣传模式。

三、几条明确的安置方向，主要有三条：1. 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当农民；2. 集体到边疆的生产建设兵团当战士；3. 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到国营农、牧、林、渔场当农工，或组织上山开荒建立青年农场。

四、与安置工作互相配合、互相补充的教育、管理措施，诸如“城来社去”、“社来社去”的半工半读教育制度，街道、学校、农村“一条龙”的管理措施等。

这个几经挫折、波动之后才逐步建立起来的堪称积极稳妥的运行机制，已经使60年代中期以后的知青安置工作初步踏上了正轨，但就在它尚待取得实践验证和完善的时候，“文革”开始了。“文革”最初将这一切作为刘少奇的黑线加以全盘否定，可是当以各种“左”的做法进行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走入死胡同的1973年以后，这一套运行机制便又被重新运用起来。我们敢说，“文革”期间有关知识青年工作的一切政策、措施，都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曾被“彻底”打倒的“文革”前安置工作的翻版。

即使那些政治口号，也并非“文革”的产物。我们上面提到，从1964年开始，知青的安置工作，在指导思想和宣传用语上，已经带有越来越浓重的政治运动的色彩，“文革”只是将其更加夸大、绝对化了而已。

总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无论从指导思想上，还是从具体的运行机制上，在“文革”前与“文革”期间，都是有其明显延续性的，对于那些将二者割裂开来，甚至对前者予以肯定，对后者加以否定的见解，我们不敢苟同，

第十一章

第一次返城风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国家、民族乃至每一个人的命运，都由此发生了突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概莫能外。可是，当“文革”前的几乎一切制度，尤其是由刘少奇主持制定的一切制度都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而被打倒之后，惟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却从整体上被肯定下来。

知识青年们进行了第一次公开的抗争，他们的呼声立即就被“文革”中兴起的其他狂潮淹没了，很少受人重视，几乎无人倾听，更没有人记起。但是，从这些呼声中所暴露出的问题是深刻的，它被如此漠视这一现象本身，也颇为发人深省。

一 余 波

“文革”狂飙于6月份的突起，并未使国家一切工作的运行立即中断，在全国，形势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来说，由于1966年的安置计划在上半年迄未达标，所以一度反而十分抓紧，尤其是刚刚着手建立的生产建设兵团，一直在各大城市积极地进行着招收知青的工作。

不仅在受“文革”大潮波及较晚较少的地区，原有的知青安置工作还在按照惯性延续，即使在风暴的中心北京，组建华北生

产建设兵团的工作也还在进行。“文革”的爆发一度使青年的革命狂热发展到极致，也曾将知青安置工作推上一个高潮，虽然这个高潮为时极其短暂，但也足以改变几万人一生的命运了。

天津市动员知青到甘肃农建师屯垦的工作一直在继续。在“文革”爆发的6月，就有600多名知青奔赴甘肃，市委提出的口号是让这些青年“以实际行动回击反革命黑帮的罪行”^①。两天之后，又有600多名社会知识青年奔赴宁夏13师。当月，还有800多名知青前往新疆。7月底，又有一批社会青年和在校学生开赴甘肃的武威和张掖，其中有些是尚未从中学毕业的在校生，小的年仅十四、五岁。到此时为止，该市动员到新疆、甘肃、内蒙古的知识青年，已达10500人^②。直到12月，仍有一批天津知青被送往甘肃，其中以社会青年居多。

1966年夏季，从北京开始，各大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刮起了“破四旧”等极左风潮，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对城市中的“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分子采取行动，将他们从城市“遣返回乡”。他们的子弟，有的跟随父母下乡，也有的则被红卫兵以“上山下乡”为借口，从城市清理出去。如广州市就曾在这一年的9月将一批出身不好的青年遣往农村，这批人后来还以他们下乡的时间为名，成立了一个叫“66—9”的造反组织。北京则于是年将清河、团河、天堂河等劳改农场的4400多人迁往新疆，其中有劳教所的少年犯800多人。这与广州下乡青年的性质虽然不同，但将“上山下乡”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则是相同的。这是“文革”初始阶段的一种特殊的上山下乡形式，其中与父母一道被“遣返”的知青，从全国范围来看，为数颇巨，这是一个至今尚未引起人们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① 《知识青年听毛主席的话走革命的道路》，《天津日报》1966年6月11日。

② 《天津日报》1966年8月2日。

此后的形势发展越来越混乱，被“揪出来”的干部和群众也越来越多，已有一批青年自愿下乡，是希望为自己寻找一个避风港，还有些出身不好或父母挨整的青年渴望换一个环境，在农村或边疆向人们证实自己是革命的。北京在当年11月动员几千名社会青年前往新组建的华北建设兵团时，就有不少青年抱有这样的动机，他们中有人回忆说，到山西以后（华北建设兵团最初设在山西北部）环境相对于北京，的确平静得多。上海市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也持续到1966年底，在9月到10月之间，有为数不少的知青被送往崇明县的新海、东方红、红旗等国营农场。此外，河南省于1966年11月也动员了一批知青去西藏军区的军垦农场。与此同时，全国范围的“大串连”已经开始，原来的下乡知青已经开始波动，其中一部分已经动身返城了。

这是“文革”前上山下乡安置工作的余波，它最终平息于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引发的夺权风，夺权导致各级党政机构职能的瘫痪，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安置办公室也随之名存实亡了。

二 返城风潮

1966年下半年，就在一些城市敲锣打鼓欢送又一批知青下乡或支边的同时，已经有些下乡知青陆续返城了。

一 参加“大串连”

动荡始于“大串连”。1966年9月5日，继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两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规定凡革命师生来京，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都由国家财政中开支，这使串连获得了合法的名义和必要的经济保证，标志着“大

串连”这个“文革”中参与者最广泛、为社会造成震荡最强烈的运动的正式开始。

中央发动这场大串连的最初动机，是想借助这一形势，将革命的火种撒向全国，但大火一旦在全国熊熊燃起，就不可能完全按照播火者的一相情愿发展，火苗一下子就窜向了那些中央绝对不想让其燃到的角落。

知青问题就是这样的角落。

串连的参加者很快就从大中学校的师生扩展到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刚从学校出来不久，仍带着学生气的知识青年，也是热情的参与者。

最初，他们与在校学生一样，是出于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熱情与好奇而投入进去的。毛泽东既然说，每个人都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知识青年当然也不能例外。最早动起来的是在大城市郊区插队的北京、天津等地知青，他们信息最灵，而且插队不比在农场，少有纪律的约束。他们想到城市去了解究竟。有些离校仅一两年的知青，想回母校去参加“文化革命”，与那些留在学校的同学一道，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

除了单纯的革命热情之外，与当地干部社员的矛盾，尤其是与“四清”工作组的矛盾，往往是导致知青起来造反或返城的直接原因。

许多知青最初曾与当地社员或农场职工一道投入到了当地的“文化革命”之中，结果或是触怒了当地的有权有势者，或是因过激行动触怒了当地群众。这里反映出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有的还渊源有自，矛盾冲突从“四清”就已开始，其中一类情况是，一些知青的处境与自身政治条件较好，于是以为只有自己最革命，眼里不揉沙子，不断向当地干部和社员发难，反对“三自一包”，反对“瞒产私分”，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遭致地方干部和社

员的反感，有的在“四清”中就与工作组站在一起整过当地干部，也有的被工作组作为新鲜血液、依靠对象，在当地干部被打倒后上台^①，“文革”开始，被整干部和社员将怒气发泄到他们身上，他们被逼无奈，只好回城。

也有的地方情况恰恰相反，如我们在上一章谈过的那样，知青因出身不好，早在“四清”时就被工作组划到阶级队伍之外，“文革”爆发后更进而受到当地贫下中农组织“贫协”的排挤。如1965年从北京到内蒙古临河插队的几个女知青说，队里“有人借口我们出身不好，不让贫下中农与我们接近，甚至把知识青年在社会上担任的职务全部取消”。即使有的知青出身并不属于“黑五类”，但他们毕竟是从“修正主义的旧学校”出来的所谓知识分子，既然“文化革命”的矛头首先对准的就是“旧学校”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那么从这种“黑校”、“大染缸”里出来的，当然不会是好人，当然要受贫下中农的管教和批判；再加上前面多次谈过，有些城市将一些小偷小摸等毛病的社会青年甚至劳教分子混入知青中一起送下乡，这一切已经导致了知青在农村地位的下降，一逢“文革”这种特殊环境，潜在的矛盾便一下子形成冲突，农民对知青的歧视、反感便无所控制地发泄出来了。有些地方一贯将知青与地富反坏右同等对待，“文革”爆发后更是有恃无恐，如湖南零陵地区有个公社在1967年初张贴一份布告，宣称春节期间，凡地富反坏右与上山下乡知青未经允许一律不得离开工作岗位，否则交由贫下中农批斗；广东增城县一个生产大队每召开群众大会，都要宣布知青和“五类分子”一律不得参加；1965年到安徽黄山茶林场参加建设的上海知青，到场不久就赶上场里“大

^① 如1965、1966两年到上海市郊金山县某大队插队落户的50多名知青中，有的一下乡就担任了政治队长、团总支副书记等职，结果“文革”一爆发，就遭到当地群众的批斗。参见《活跃在广阔天地里的一支突击力量》，《文汇报》1968年9月10日。

抓阶级斗争”，一大批知青竟被农场公然开除回沪。这类纯因政治原因产生的矛盾，与当时整天高喊的与工农结合口号，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尖锐的讽刺。知青在农村既然无法再待下去，又适逢“大串连”这样难得的时机，便纷纷回城去“闹革命”了。

也有的知青并未立即返城，而是在当地扯旗造反，四川合江的插队知青曾这样叙述他们当年的那段经历：

离我们不远的北碚境内，几所大学里都闹起来了，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四川外语学院等高校的红卫兵在北碚街上撒传单，贴大字报，搞大辩论，搞得不亦乐乎。我们农场有知青去北碚，捡回一些传单传阅后，摩拳擦掌，意欲起来造反了。工作组见此，意欲拉拢部分知青，便急忙刷出大标语：只许红五类造反，不许黑五类翻天。一面表态支持原来为工作组最卖力的几个知青成立红卫兵，意欲操纵农场的红卫兵组织。但事态不但没照这位湖北佬的意思发展下去，而且连农场里原先那个工作组的贴心豆瓣——打斗知青和农场当权派（场长和指导员）的打手对工作组也倒戈相向了。工作组见情况不妙，便连夜烧毁材料，摸黑逃下山去……

此时农场知青已迅速成立了一支有好几十人的红卫兵队伍……几天后，在草街地区，以我们知青农场造反团为首，串联当地各工矿单位的造反组织数千人开了大会，成立了草街地区联合造反司令部，我们农场知青刘某任总指挥。……之后，知青造反团就离开草街，浩浩荡荡开进县城，参加县里更为轰轰烈烈的“革命”去了。时在1966年秋。^①

可见造反最初的动机，是与工作组的矛盾，像这类情况在当时是很多的。

还有大批的知青动机更为简单，他们对“文革”、对造反并无兴趣，与当地干部也谈不上水火不相容的矛盾，不过是借此“千

^① 戴克学：《老知青文革读书梦》。

载难逢”的时机，免费乘车回家而已。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那些刚刚下乡不久的知青身上。再说中国的农村实在是太大了，有的是“天高皇帝远”的偏僻角落，意识形态问题并非在处处都像上述地区那样严重。到甘肃的天津知青回忆说：“（到甘肃后）每天就是开沟、挖大、小渠，平整土地，下过雪也让干活，用镐刨冰土，有些人受不了了，就开始嚷‘回城闹革命’，跑回了家。一开始连里干部还派人去追‘逃兵’，后来干脆就不管了。”有的地方两派互斗，下乡不久的知青成了局外人，工分口粮一切无人理睬，也只有回城一途。

还有的知青，参与了当地的群众组织，因为他们毕竟是城里人，见过世面，与仍然在城里的同学、家长，保持着各种联系，比当地人能听到更多的“小道消息”^①，这些知青因此而在群众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有的互相进行串连，有的则以这种身份进驻到城市，在城市设立了“联络站”。

各地农场或农村人民公社对知青的态度，同样也是形形色色的。有的地方党政机构已经瘫痪，对知青已经无暇顾及；有的摸不准中央到底持什么态度，唯恐知青将火烧到自己身上，而有意放纵甚至动员知青回城。城市的当权派，因未得到中央的明确表态，也不知对这一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才好，只能以支持群众造反的总方针笼统待之，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总之，当时敢于劝止或“阻挠”群众进行“革命串连”的领导，是极其罕见的。

这种支持，当然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许多地方的知青，合法地取得了与在校师生一样的串连待遇。例如当中央于1966年11月16日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徒步串连的通知》时，广西自治区的

① 笔者当年曾在河北省宝坻县一个从天津高中毕业后到那里插队的知青炕头，见到厚厚一叠北京各大学的油印小报，据他说，都是他那些考上大学的同学寄给他的。这在当时是至关重要的，有时甚至是某派能否取胜的关键。

“党委群众接待站”就曾拟定了一个计划，规定凡学校师生、下乡知青、或机关干部参加长征串连的，每人每月都由自治区补助7元人民币和45斤粮票^①；再如插队知青相当集中的上海郊区金山县，曾从地方财政中一次签发“串连费”50多万元；很多地区发给知青路费，予以各种方便，如据黑龙江省巴彦县的知青说，“文革”一开始，当地的“一小撮走资派”就煽动知青回城串联，还发给每人300块钱，让他们回城另找工作。这些钱，正如中央所要求，都是从国家或地方财政中开支的。

最甚的是新疆。新疆为参加“大串连”的师生和群众所发放的补助都堪称优厚，并不是仅仅对知青才是如此。乌鲁木齐市有中学生描述当时情形说：

从去年（即1966年）12月开始，新疆地区出发的长征队很多，尤其今年以来更多。不少地区给长征队发了许多东西，如上好的皮大衣、皮帽、鞋、棉衣、棉裤、水壶、裹腿、手电筒及各种补助费等。由于长征人数很多，沿途每隔二、三十公里就设有接待站，每个接待站各有几十床以至上百床新棉被等，并派专人接待……有的地方接待不了那么多人，就想办法用汽车送往别处^②。

很难想象远离家乡的上海知青能抵御这种声势和诱惑。

满怀献身热情的上海知青到新疆之后，才发现边疆并非尽如《军垦战歌》描述的那般如诗如画，他们抱怨说，兵团的劳动非常繁重，到摘棉花的时节，每人每天要完成定额100多公斤；有的师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根本不适宜开垦，结果苦苦干了几年，却发不出工资；兵团中有的干部对知青十分粗暴，甚至私设公堂，有

^①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 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六六·八八”战斗队造反长征队：《打回老家来，就地闹革命》，《新疆日报》1967年1月17日。

40多种刑法；女知青的人身安全、婚姻自由得不到保证，有的人竟公然提出“兵团姑娘对内不对外”的口号，很多知青感到后悔，想方设法要回上海去。“文革”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新疆农垦系统的“走资派”最初是极力阻止知青串连出走的，据驻在南疆喀什的农三师知青回忆说，当时兵团领导在沿路设卡，查验通行证，没有通行证，谁也走不了，但当“大串连”风潮终于掀起的时候，他们再也无法抵挡了。1966年底，他们发出了一个《处理支边青年回原籍搞文化大革命的四点指示》，据当时报刊的批判，这个指示“煽动支边青年离开新疆回原籍，还勒令回原籍搞文化大革命的青年统统把户口带回家去”^①。

从《新疆日报》后来刊登的一些批判稿所透露的情况，可以窥见这场返城风的凶猛程度：

阿克苏丰收农场7连“革命造反团”的部分支边青年说：“地委利用了部分群众的革命热情，开证明，给路费，给皮大衣和毡筒，放走了大批支边青年。许多不明真相的青年见到如此容易外出，以为中央有了指示，于是大批大批的人都走了，仅元月1日至5日的5天内，地委就给我们农场要外出的人发放经费2万多元。大批人一走，有的连只剩了二、三十人，各连负责人一个个跑到阿克苏，饱食终日，消闲无事，地委的问题也无人去追了……”^②

新疆八一农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说：“畜牧厅农场有380名支边青年，这次外出‘串连’和‘告状’的就有253人（其中有31人是不告而去的）。农场的当权派给他们发路费和生活费（补助费）共计27000元。农田9队原有80人，现仅剩十几人，生

^① 《新疆日报》1967年2月1日。

^② 《坚守岗位，就地闹革命，打退经济主义的猖狂进攻——致全疆支边青年的一封信》，《新疆日报》1967年1月19日。

产完全停顿。这是经过畜牧厅某副厅长、自治区党委农工部某副部长层层请示，最后由自治区副主席田仲批准走的。再如水利厅牧区水利队400人仅剩80人了。有的单位连锅炉工、炊事员都走了……一些人领上串连装备后把钱花了，甚至戴上新买的手表，穿上新衣新鞋，回家‘养神’去了。”^①

1966年9月才到新疆的上海“半工半读支边青年”说：“去年11月初，走资派非法批准我厂291名上海半工半读支边青年返沪，美其名曰‘恢复学生身份，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厂内开支车费16200余元，行李费19500余元，伙食补助费1800余元。……（后来）仍继续允许我厂57名上海支边社会青年带薪回沪串连，发给串连费4400元，至今未返回。在东方红高炉劳动的113名上海青年已走了73名。”^②

本来是由中央正式发文件发起和允准的一场运动，在控制不了的时候，就又归咎为“走资派”别有用心地捣乱，这是“文革”时期司空见惯的做法。

这场知青返城风，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混乱，不仅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他许多国营农场和农村，也因大批知青的离去，而使生产几乎陷于瘫痪。如浙江温州市永嘉区龙湾公社金乔大队部分下乡知青在报上发表文章说：“文革”开始后，温州地委和温州市委精简安置办公室的老爷们蒙蔽部分青年，为他们大迁户口，让他们离开农村，回到城市，又签发大批支票，开出大批证明，使青年大批外出。目前整个温州市的下乡知青在农村的已经寥寥无几。上海知识青年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崇明县各农村和国营农场也纷纷告急，说因大批知青和工人离开岗位，使大批棉花至今无法入库，大批水稻急需脱粒，田间管理和春耕备耕工作严重脱节，等等。

① 《无情揭露经济主义，坚决打倒经济主义》，《新疆日报》1967年1月19日。

② 《揭穿煽动支边青年回沪的大阴谋》，《新疆日报》1967年2月1日。

当然，因“大串连”失控而引起的问题是多方面的，绝不仅限于知青的返城。早在1966年11月，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大串连”正式开始后的两个月，中央就已意识到对这一做法必须有所限制，规定从11月21日起，全国水陆交通，只负责免费输送各地到北京或外地进行串连的革命师生返回原地，和北京去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返回北京。这也就是说，国家不再为到处串连的群众提供免费运输了。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补充通知》，要求外出串连的师生在12月20日以前必须返回原地，从12月21日起乘车不再免费。但这些限制，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总之，在这场运动刚刚兴起，大批知青或投身运动，或随着“大串连”之风返城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单纯和盲目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更没有明确提出任何与知青自身利益有关的要求。

二 知青的组织

无论出于什么样的情况和目的，知青大规模返城这一行为本身，已经表现出对上山下乡这一做法的一种无言的不满和抗议，而随着返城知青的越聚越多，他们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他们最初、最直接的发泄对象是各级安置办公室，连中央安置办也未得幸免。早在“文革”爆发不久的1966年8、9月间，从广西等地赴京的70多名下乡知青，就占领了中央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办公室：

“宣布他们夺了中央安置办的权。他们砸开了档案柜，使档案大量散失，公布了某些奸污迫害下乡女青年的案例。他们相继召开大会，对中央安置办领导人进行批判。他们占据办公室后，中央安置办的工作人员被迫转入‘地下’办公，以保持上下的联系。为了接待日益增多的‘造反人员’，又不得已把接待站从砖塔胡同迁到万寿路国务院

农林办公室大院。在上访人员中，更多的人是想把户口迁回城镇。对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革命路线并无多大兴趣^①。”

具体负责安置工作的各地的街道干部更是首当其冲，知青认为自己是被这些干部骗到农村去的。如很多地区的知青批判安置办的干部用物质刺激的方法欺骗他们下乡，对他们说：“你们好好干吧，你们中的一些人将来可能是省长、市长、书记、妇女主任……”要不就“某某农村是鱼米之乡，吃的全是大米饭，又有鱼，有肉，有电灯，有瓦房……是个极富裕的地方”，还组织青年去参观，给青年大摆酒席，灌输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毒素，等等。他们斗争这些干部，大多只是为出出气。在“文革”最动荡的两年中，各大中城市的街道、里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闹得最凶的，当推到新疆兵团的上海知青。

1966年底，刘少奇的问题在全国公开，他被定性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照当时最习惯的思路，他所做的一切，都该被“批倒批臭”，那么他奉行最力、发表讲话也最多的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两种教育制度”，当然也要列在狠批之列。就在这时，知青中一些较有政治头脑的人意识到了，这可能给了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机会：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决策归咎于刘少奇，从而予以彻底否定，那么，他们回城的希望也许就不再是梦想了。知青的反抗，由此而深入了一步，其标志，就是成立了大量独立的组织，提出了知青自己的要求。

这样的组织一度遍及全国各地。有的知青是按下乡地区组织的，如上海到黄山茶林场的知青组织了“抗大造反兵团”，要回沪造市委和农垦局的反；也有的则基于共同利益，如有个组织叫“六——一、二、三”，参加者是广州市1961至1963年的下乡

^① 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86页。

知识青年，这是较早响应号召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的城市青年。由于当时这一工作尚处于试点阶段，中央对具体措施并无一致要求，所以当时以陶铸为首的广州市委曾允许他们在农村劳动2至4年以后，俟国家形势好转，予以回城安排工作的机会，为此还发给每个下乡青年一张日后准许回城落户口的“户口保留证”。1963年，周恩来提出把安置城市知青到农村去的工作作为15年不变的方针，广州市委的允诺落空了，这引起这批青年的强烈不满，他们也希望凭借自己较为特殊的条件，从一般知青中区分出来，得到些特殊的照顾。前面提到的“六六——九”，也属于这类组织。很多地方的知青家长也组织起来，不仅在城市活动，还到知青下乡的地方去进行串连，如上海知青的家长就曾组织“支边青年家长代表团”，到新疆兵团的农一师“点火”。在长沙、武汉、上海等城市，知青和家長还举行了全市性的集会示威，控诉刘少奇及其“黑爪牙”对知青的迫害。

有的知青组织积极到农村知青中去发展势力，并在城市中设立造反总部。他们喊出“回城闹革命”的口号，批判“黑暗的上山下乡运动”，揭发控诉知青在农村的悲惨处境，揭露那些名噪一时的先进知青如邢燕子、董加耕、周明山等人是“假典型”、“黑样板”，文革前树立的知青典型几乎无一不受到冲击，有些因此而一蹶不振，永远地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这些知青组织的本来目的，其实是明确的，那就是“回城”，是在城市安排一个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作。事实上，十余年后知青大返城的浪潮虽然惊天动地，提出的要求也不外乎此。但是，越是这种很低也很实际的要求，就越是与当时的大环境不合拍，也就越无法直截了当地提出来，知青们能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否定这场上山下乡运动，这是“返城”唯一的、必要的前提。而否定它的唯一理由，就是它是由刘少奇提出来的，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为了使自己的要求得到中央的认可，并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同情，自1966年下半年开始，大量知青云集北京。当年年底广州市的知识青年到国务院，要求中央给予他们回城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农业部和农垦局的有关领导接待了他们，但拒绝了他们的要求。1967年初，广州又有知识青年到京，专为来批判中央负责安置工作的谭震林；湖南长沙知青派出“汇报团”，拟向中央汇报湖南下乡知青的情况；上海到新疆支边的青年也纷纷前往京城，并着手筹办全国性的“农村地区革命知青总部”。

5月，广州知青和家长3000人举行集会控诉市安置办公室对知青的迫害，会后进行了三天绝食静坐活动，广东及南方一些省城知青的返城活动，也是从此时起至六七月份，又一次达到高潮的。

知青们的活动，尤其是他们对知青下乡后真实情况的披露，在社会上，尤其是有知青下乡的家长心中，引起了一定的震动和反响。

三 参与地方“文革”

很多知青都曾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文革”。尤其是1967年春季到夏季，当“文化革命”进入了“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阶段以后，各地开始爆发大规模的武斗，形势越来越混乱，又有不少知青参与其中。知青们年轻，无家口拖累，很多人因处境的不如意而产生强烈的发泄欲，这都是容易为人所用的因素。据说仅广州市，就有百余名知青死于这种武斗之中；而武汉市在一次知青与“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冲突中，知青一次就被打死十余人。但是，尽管有很多材料和当时人的回忆，但对这些事件的叙述或过于简略，或仅是一面之辞，或不过是些道听途说，由于无法核实，这里几乎没有哪一件可以拿来列举，如据说宁夏13师的北京、天津知青中，有相当一批人在武斗中身亡或失踪，但我们既无法

查实其准确人数，也无法找到较为翔实的文字记载，轶闻传说难得入史，这里便只能从略了。

可以证实的是，全国兴起武斗的第一声枪声，就是从知青集中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部所在地石河子响起的，当时整个中国都为之愕然震惊了，时间是1967年1月26日。

石河子是建设兵团农8师的驻地。农8师在“文革”爆发前的1964年到1966年3年间，共接收从上海、武汉、天津等地前来的知青2700余名，人数远不能与农1、2、3师相比，但这个新兴城市是兵团总部所在地，驻有兵团武装部队——独立团，以及工2师、汽车2团、毛纺厂、农学院等17个单位，近30万人。从1966年底，北京和其他城市就有红卫兵到这里频繁串连，上海支边青年的家长也到此来串连点火，使它成为新疆地区风暴的中心。

从1967年1月开始，石河子地区以兵团农学院“革命造反团”牵头的一派和以兵团汽车2团“八一野战军”牵头的另一派，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纷纷夺权，从17日至1月27日，先后有7个“造反团”冲击了武装部门，8个单位造反团强行接管了武装部门管辖的通讯总机。1月25日下午，毛纺厂等8个单位造反派2000人进入汽2团配合该团造反派夺权，汽2团掌权派请独立团支援，独立团92名指战员赶到汽2团，被造反派夺去枪支弹药若干。1月25日下午7时，造反派增至4000余名。1月26日零点双方开枪，11人伤亡（5死6伤）。当日农8师武装处将部分部队调进师部，造反派要进入师部，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死2人，伤27人。在公共汽车站等处又进行枪战。双方共打死24人，伤71人。

新疆军区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简报》，说法是完全相反的。军区认为是镇压歹徒，文革小组认为是一起镇压群众的严重反革命事件。2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文件，作出对新疆兵团进行军事管制等十二项决定。结果

是有1000多人被株连，6人被逼死，几十人伤残，农8师216名团级干部，靠边被斗的就有165人，占总数的76.3%，直到1979年才被平反^①。据说曾经有知青多方调查，想了解事情真相，结果被打成反革命，却直到1979年尚未正式平反^②。

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的短短几个月间，据国外观察家宣称，从各地返回城市的知识青年已达120万，仅广州就有3万知青回城，约占知青总数的2/3。但这个数字显然有所夸大，因为各地情况是不平衡的。到华北兵团去的北京知青、到甘肃兵团去的天津知青都谈到，当时“回城闹革命”只是出身好的青年的专利。出身不好的，有的不敢折腾，有的在城市的家已经被抄，父母被斗、被关，回城也没什么意思；还有很多本来就是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或家庭关系不和而下乡的，回城也没有活路。更有不少本来就是没家的孤儿。很多人一直留在当地，有的认为因此而免去了“文革”的折腾，像躲进避风港，倒也不失为一件幸事。总之，就“回城风”而言，南方比北方刮得厉害些，尤以广州、上海、湖南为甚。

三 反对经济主义

从1966年底到1967年初，不仅城市下乡知识青年，还有大量农村青年以及农民，也都在“立即取消城乡差别”的要求之下，成批地涌入城市；卷入这股浪潮的，还有要求转正的临时工、合同工，三年灾害时期被动员下乡或支援“三线”建设的内地、城

① 参见《农八师垦区志·石河子市志》，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史志丛书，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第202--203页等。

② 《风刮不倒的红柳——记支边青年黎明》，《新疆青年》1979年第2期。

市工人等，中央将这股浪潮，统称为“反革命经济主义”。据揭发，这股浪潮的兴起，是由于江青的暗示与鼓励。但实际上，这正是解放多年来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各种后遗症的一次总爆发。但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不是这一类问题。这些人四处建立群众组织和联络站的活动，不仅使已经十分混乱的城市更加混乱，而尤为严重的是，他们的矛头所向和提出的各种要求，与当时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完全不合拍，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发动一场打击“经济主义”的运动，制止这一倾向的继续发展。

知青的活动也被划入经济主义范围而加以制止。事实上，早在1966年底，经济主义的浪头还未涌出的时候，中央对于知青的各种做法就已有所警觉，尤其当他们越闹越甚，竟至要建立全国性知青组织的时候，中央已经感到了真正的危险。周恩来敏锐地看出了，这类组织和他们在社会上所造成的影响，足以使中央苦心经营多年的安置工作毁于一旦，而无论革命如何发展，上层领导如何变幻，大批城市青年不到农村去，又能到哪里去呢？对于知青的组织必须取缔，对他们的要求必须回绝。他们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回到农村去。

1966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有人问到他能否建立全国性组织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很策略的，只是说，现在还是串连时期，就是全市的组织看来也只是部分的组织，这样的时期要经过一个时期，一派不能自命地代表全市，更多的意见现在不好提。12月，尚未被“揪出来”的国务院负责知青安置工作的副总理谭震林则劝告知青不要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他说，你们的总部就是全国安置工作办公室，还有总理办公室，是总理任命的，你们能取代他们？实际上，你们这些人决不可能控制100多万人。他的劝告，当然被知青当成了耳旁风。而此时的中央安置

办公室，也已经被一批又一批心怀怨愤的知青们连砸带打，搞得一片狼藉。

知青的活动，知青在城市建立的一切组织，都被作为经济主义的内容之一，划入打击的范围之内。

1967年1月18日，周恩来等人接见首都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代表，提到北京有一些冒充欺骗人的全国性组织，他们的目的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我们要限令他们投降，宣布他们的组织是反动组织。他在这里所说的那些全国性组织，就包括了知识青年成立的组织在内。22日，在接见各地驻京群众大会上，周恩来指责各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玩弄经济主义，用一种恶劣的手法，就是发钱、发车票，收买人心，鼓动人上北京，把矛盾上交，对中央施加压力，使得大批合同工、临时工退出工厂，下乡知青大批上京。他要求这些人尽快返回原地，同时强调，现在各个革命组织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机构的条件还不成熟，建立和参加这些机构的人员也应该回到本地去进行革命斗争。26日，周恩来接见工交、工青妇等系统革命造反派时，有人提出希望中央发通知，宣布全国性组织为非法，周恩来又一次强调，我根本不赞成建立全国性造反组织，全国性的组织我们都没有承认。2月1日，他又敦促人“回去检查一下，任何全国性的联络站都不能成立”。

各地都开始取缔知青在城市的组织，并动员知青回乡闹革命。

上海在“文革”中一直扮演着独特的、先锋的角色。尤其是“一月风暴”之后，更成为全国造反派的表率，加之上海在“文革”前跨省安置的知青人数最多，仅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就达9万余人，“文革”一开始，就有几万知青返回上海，他们所描述的兵团生活实况，他们的情绪和痛苦，已经成为该市一个牵动了千家万户的敏感社会问题，要解决知青问题，首先而且必须从上海着手，而上海那些刚刚夺了权的踌躇满志的造反派，也正需找到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开始了。

第一步，是将“文化革命”开始之后知识青年发泄的不满和提出的种种要求，一概归结为是“走资派”为干扰运动的大方向所大搞的经济主义的阴谋，知青返城是受到了走资派的煽动。就像我们上面讲到新疆知青的返回上海，被归咎于新疆农垦系统的“走资派”恶意煽动一样。

1967年1月18日，《文汇报》发表社论《坚持上山下乡、支援外地建设的正确方向》，说：经济主义的一个恶毒做法，就是煽动前几年下放或支援农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工人和支边青年回到上海，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还煽动支援边疆建设的家属，离开工作岗位，上北京告状，或挑动他们去斗争里弄干部。这样做，造成了一批农业人口流向城市，直接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安置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应该造反，应该揭发，应该批判，应该改正，但不要离开生产岗位。这篇社论还强调说，到农村去的大方向是不可动摇的。

接着是在报刊上大肆宣扬这一精神如何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据《文汇报》报道，社论发表的第二天一早，就有数百名静安区的革命家长结队到该报社门前报喜，支持社论观点，并表示要教育子女坚守边疆的生产岗位。据他们说，旧上海市委在支疆工作中一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是用物质刺激、欺骗、压服等手法动员青年去新疆，以致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恶劣的印象。前些日子上海广大支疆青年的革命家长造了他们的反，使他们大为惊慌，于是煽动和批准部分家长离开工作岗位去新疆访亲，提出支疆青年几年“服役”期满也应“复员”回上海等不合理的要求。如今，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的启示下，该区广大革命家长的革命组织——静安区支疆青年革命家长造反总部，已经提出了“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口号，动员青年回疆。

1967年1月25日，“上海市支疆青年革命家长造反司令部”

也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支持这篇社论，题目是《坚决支持青年在边疆革命一辈子》，控诉上海市委与新疆兵团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对支边青年进行欺骗、腐蚀和摧残，以经济挂帅、物质刺激来代替政治挂帅。“文革”开始后，他们又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制造白色恐怖，对知识青年进行政治迫害和人身迫害。2月底，上海市虹口区支疆革命家属造反派总部赴疆调查团在《文汇报》发表《坚守生产岗位，就地大闹革命——致支疆革命青年的公开信》，说新疆的走资派大搞独立王国，挑拨新老职工的关系，还给支边青年乱开证明，乱发路费，使大批青年离开生产岗位。可是大家都走了，走资派由谁来整呢？

1月29日，上海和外地驻沪的33个革命组织发出《紧急通告》，要求知识青年坚守生产岗位，同贫下中农一起就地大闹革命。2月9日，上海又召开了誓师大会，会上通过了《坚决走上山下乡支援外地支援边疆的正确道路——告上山下乡支边革命青年书》，声称少数走资派煽动青年倒流城市，任意安排工作岗位，肆意变更所有制关系，制造矛盾。这次大会，粉碎了他们的一次新反扑。大会还郑重宣布，这类签字，自即日起一律作废。

针对支疆青年和家长将一肚子怨气都撒到街道干部身上的问题。2月9日，上海工总司等23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出了《关于街道里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通告》，警告知青们不要把事态扩大。同日，《文汇报》也发表了《斗争里弄干部，大方向就是错了》的社论。

与上海的行动相呼应，新疆也开始采取措施，由于当时新疆自治区尚无上海那样新成立的权力机构，一切通令只能以革命造反组织的名义发出，无论声势造得多么浩大，也只是声势而已。1月20日，以新疆革命职工第一造反司令部为首的27个革命造反团体联合发出《紧急通告》，勒令自治区下属的各级当权派必须暂停办理一切出疆串连（包括徒步串连）的手续，停发外出串连物

资，并立即追回未出发人员的出疆手续、串连费用以及一切借用的物资^①。2月5日，新疆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也发出《紧急呼吁》：“凡是受党内走资派蒙蔽、离开生产岗位流向城市和内地的社员、国营农场职工和支边青壮年，应立即返回原地，参加农村文化大革命，参加农业生产。支边青年要扎根边疆，建设边疆，革命到底。同时，反对任何人拦截汽车，堵塞交通，严禁一切组织用任何借口开车到农村去胡乱拉人……”

在此前后，一些由上海知识青年组成的团体也不断地发出紧急呼吁书、公开信，要知青们坚守岗位，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②，农垦部的革命造反委员会也发出紧急呼吁，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体人员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二、一一”决定，所有外出串联的职工和知识青年，要立即返回本单位；安置在国营农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安心农场的生产建设，要坚决揭露一小撮走资派玩弄的“矛盾上交”的把戏。但这些呼吁既然并无权力做后盾，也只是呼吁而已。

与此同时，江苏、浙江、贵州、宁夏、黑龙江等省的革命造反团体，也都发出了类似的《紧急通告》，敦促前几年已经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心农业生产，积极参加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要听信坏人的挑动和欺骗，盲目流入城镇，以免使农村的革命和生产受到损失，如宁夏以“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第二号通令，其中提到：“一、财经大权，一律由革命造反派掌管，严禁乱批条子，乱许愿”。又及：“一、严格控制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镇。前几年下放农村已经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级当权派擅自决定供应粮食的规定立

① 《新疆日报》1967年1月20日。

② 参见《新疆日报》1967年1月19日、20日、2月14日等。

即作废”。^①

这些都不过是表面文章，因为事实上各地返城知青和家长对此并未予以多少理解，更谈不上支持。实质性的是第二步 1967 年 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告》；同日，还下发了《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联、请愿、上访的通知》，全文如下：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新阶段，广大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已积极返回本单位，参加夺权斗争和农业生产。但是目前还有一小部分人，以种种藉口长期在城市逗留。为了妥善处理这一问题，特作如下规定：

一、凡尚在外地进行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农场职工，所有人员应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搞好生产。所设联络站，一律撤销。

二、有些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影响，做了一些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只要他们回到本单位认真检查，勇于改错……

三、还要出外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中，有少数行踪诡秘，不报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到处招摇撞骗，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国家财产分子，要彻底查清，依法惩办。

四、对于安置工作的问题，应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令”第三条“前几年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安置工作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执行。

五、前几年精减下放、现居城镇的人员的安置问题，也应按上述第三条的精神执行，不得回原工、交企业和事业单位强求复工。此通知可在农村和城镇张贴。

^① 《宁夏日报》1967 年 2 月 5 日。

这一通告与差不多同时发出的要求外出串连的学校师生返校参加军训和“复课闹革命”等措施一起，表示了中央决定将这场运动限制到一定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社会秩序的心愿。点火的目的已经达到，不能再让火漫无边际地乱烧下去了。

北京的军管会宣布了一批非法组织的名单，一个全国性知青组织也被列入其中，这标志着对知青组织采取行动的正式开始。

在上海，通知下达的第二天，市革命委员会就对该市的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等组织发出了紧急通告，要求凡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的单独组织与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的联络站应立即停止活动，并要求有关单位停止对这些组织的物质、资金供应。从即日起，清查这些组织的所有财产和资金。其银行存款也由人民银行冻结，停止支付，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转移、隐匿、挪用、私分。然后，由公安机关出面，取缔了“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第三纵队”等组织。知青的返城活动，由此进入低谷。

在自上而下严厉镇压知青组织的同时，各地都着手进行了遣返知青回农村和边疆的工作。2月20日，《人民日报》第四版以通栏大标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刊载了黑龙江“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革命造反派”、“上海下乡知识青年革命造反总部”以及山东单县谢集公社56名知识青年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说：

煽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批地离开生产岗位，涌到城市，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又一种形式。这一阴谋诡计已经被彻底揭穿了，许多受蒙蔽的知识青年坚决表示：立即打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革命造反派应当热烈欢迎和坚决支持他们这一革命行动。当前，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蓬勃兴起，春耕生产高潮即将到来，在这关键

时刻，知识青年更应该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坚守岗位，坚持战斗。已离开农村的要迅速返回，杀它一个回马枪。

1月底，上海市曾举行了成立华东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革命委员会的誓师大会。据说，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下达之后，该组织即宣布撤销设在上海及华东各地的全部机构，以便使其人员一个不留地返回农村。自2月起，在沪的华东地区知识青年陆续返回农村的已达8000多人。其中如上海农业建设队和黄山茶林场等地有1000余知青返回。此外，据《文汇报》报道，自2月中旬起支疆青年中也有人开始陆续返回新疆。如2月16日，闸北区的天目西路和汉中两个街道就欢送了5个回疆青年；20日，南市区也有5个青年回疆。3月5日，南汇区140名支疆返沪青年从上海启程，他们都是1966年才从上海赴疆的。仅从这些公开发表的数字就可看出，实际返疆的青年是微乎其微的。

四川省动手较晚，3月2日，该省召开三级干部会，会上提出，凡外出串连或到县、专区、省和赴京上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立即回到本地区，本社队，所有农业劳动力，都要坚守岗位，不得随意离开。3月15日，该省又以生产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了《关于动员目前尚在外地的革命师生、内迁职工和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迅速返回本单位的紧急通告》，通告要求：“一、凡尚在外地、外单位的革命师生、内迁职工和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在3月20日前返回本地区、本单位，积极投入本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学习、生产劳动；”二、要求各级生产委员会、各革命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各接待单位，对目前尚未返回本单位的上述人员，应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反复地向他们宣传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动员他们尽快返回；三、交通运输部门应妥善安排运力，帮助旅程较远的上述人

员解决乘车乘船问题^①。

从这一通告也可看出，该省对知青采取的措施并未如上海那样严厉，事实上，当时全国的情况是极不平衡的，还有许多省市，甚至连四川这样的官样文章也没有做。

四 “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1967年春季到夏季，“文化革命”进入了“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阶段，与之相伴随的是各地日益升级的大规模流血武斗，形势越来越混乱。大多数知青仍然滞留在城市，也有些曾迫于年初的形势而返回农村，但从当时几乎空无一物的报纸上也透露出，农村的混乱使他们无法立足，有的知识青年一返回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坏分子；有的被取消了自留地和口粮，他们只有再次回城这一条路。在上海、四川等城市，有部分社会青年“非法地强行把户口迁回城市”，在市内安排了工作，更引起不少已经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思想波动。很多城市中的知青组织本来就未因一次打击经济主义的运动而得到彻底清理，至此就又一次趋向活跃了。据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6月29日向国务院的报告：

“5月以来，下乡青年又大量进城，估计已达40万人以上。北方挂锄期近，有大批进京趋势。据来访青年反映，现在中央各机关所设接待站的下乡人员，以新疆为首串连700人，将于7月3日到中南海门口静坐，要求解决具体问题。四川、湖南等省一些下乡青年正在省内串连，成立了几十个组织，准备7月份大批来京。广西的下乡青年也在城里建立了组织，并要求来京造谭震林

^① 《四川日报》1967年3月15日。

的反”^①。

中央再次采取了行动。

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全面阐述了中央对这一问题的态度。这是“文革”期间中央关于知青问题所发表的最重要的一篇社论,它表明了,尽管“文化革命”已经将“文革”前17年的几乎一切方针政策都予以了否定,但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刘少奇确实插手甚多的政策,却采取了坚定不移的立场,这使已经下乡,并将这次“文革”视为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机会的“老知青”,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这篇社论首先赞扬知青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革命”中,革命知识青年在农村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大造地富反坏右的反,他们同广大贫下中农一道,成为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强战士。然后进入正题:

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对于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党内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长期以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散布大量毒剂,贩卖吃小亏占大便宜的生意经,到处封官许愿。……他们对起来造他们反的知识青年,进行了种种政治迫害,特别恶毒的是挑拨知识青年与贫下中农的关系,采取欺骗利诱、甚至克扣口粮等毒辣手段,煽动大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离开生产岗位,拥向城市。

一切革命的知识青年,必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对于做知识青年安置工作的干部,应该相信他们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绝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们。

①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文章敦促一切还在外地串连和逗留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都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投入三夏战斗，搞好生产。文章还教导知识青年说，应该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有些人回去可能会遇到一些实际困难，应该从全局出发，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城市中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坚决支持他们，绝不许走资派经任何借口对重返农村和边疆的知识青年进行打击报复。

社论发表之后，再无任何知青组织和个人敢于公然提出回城要求了。

中央继续行动。10月8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了《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回城知青立即解散设在城镇的知青团体和联络点，不准城市的群众组织接收知青为成员。同时，这个通知也要求各地改变对知青的恶劣态度，强调下乡知青与当地社员、工人应该享有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不得降低他们的工作岗位，不得对他们进行打击迫害，也不得将他们赶回城镇。在秋收时一定要安排好知青的口粮，对他们的住房也应予以适当解决。

各地对中央这一精神立即作出响应。9月8日，江苏省军管会就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动员逗留城镇的下乡、支边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下放人员返回农村、边疆的通知》^①。10月8日的中央文件下达后，四川省则由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出面，召开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座谈会，参加的有宜宾、凉山、自贡等11个专区、州、市的有关工作人员和部队代表，讨论贯彻中共中央10月8日紧急通知的精神，动员返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农村，要求各地对知青不得歧视，不得压低工分，不得因观

^① 《江苏省大事记，1949—198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点分歧而刁难，迫害或撵知青回城镇，还强调知青即使被打成反革命的，也应返回农村，就地平反。会议发出了《给全省下乡上山知识青年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文革”一开始，就有知青被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也有一些知青已经“非法地强行把户口迁回城市”，公开信将这些账都算在了四川省委和李井泉身上。同时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强调用办学习班的办法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①。

11月24日，周恩来再次强调，对返城知青问题，一定要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办事。他说，上山下乡方针是正确的，是主席定的。要动员他们回去，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安排好他们的生活。

为了将青年尽快动员回边疆和农村，在1967年，上海等地的接待单位曾采取过为支疆青年代购直达车船票的办法^②，结果有的知青钻了这个空子，或利用公费多次往返于新疆和上海之间，或将车船票私自倒卖，然后仍然滞留上海。还有的以为在新疆的同伴带东西为名，骗取支边青年家长的财物。因此到1967年11月，根据中央通知的精神，各地都停止了这种做法，要求返疆知青凡能自己解决的，一律自己解决。

知青的返城行动和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抗争，事实上至此已经失败了。即使有的组织还不肯立刻解散，他们也改变了原来的宗旨。但是，在社会仍处于大动乱的形势下，任何通告也不可能真正奏效，绝大多数知青并没有立刻返乡。直至1967年底，当“文革”期间毕业的三届中学生已经开始酝酿上山下乡的时候，

^① 《当代四川大事辑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

^② 见《国务院关于支援内地、边疆建设的职工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回原单位的路费问题给上海市革委会后勤组的复电》：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原单位的路费，自己能够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确实有困难的，也可以由接待单位代购直达车船票。所需费用，如果本人归还有困难，可由所在地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开具证明，由接待单位报销。1967年2月27日。

仍有不少“文革”前的老知青在城市游荡，他们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回到农村。如上海闸北区新疆路街道干部称：“我们街道前几年中支边青年受新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煽动，不少人返回上海，至今不归，有的人已经成了十足的逍遥派”。这些知青自己，则有的仍不服气：“动员我们支援新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想再拖拖看，“我们是要回去的，但是要再等待一段时间”；还有的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我们现在准备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也有一些则找借口，说是要留在上海，学习上海的先进经验，以便回去更好地战斗。据说，他们中有人已被一些坏人带上了邪路，沾染上了流氓阿飞习气；有的家长纵容子女在沪逍遥，要子女寻找对象结婚，幻想在上海安排工作。

五 返城风的平息

1968年，中央又一次对他们采取坚决行动了。这已经是最后一次，因为由红卫兵席卷起的新一轮上山下乡大潮已开始进入高潮，“老知青”留城不归，已明显是“逆潮流而动”了。

仍有些组织不甘心失败，典型的如湖南的“省无联”（全名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据当时文章批判说，这个组织是由三种反动力量组成的，一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指刘少奇）和陶铸的黑爪牙，一种是彭德怀的死党，还有一种，是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文章说：“他们与全国许多地方的反革命势力勾结，妄图在湖南打开一个缺口”，“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宣传，有行动，有反动‘纲领’的”^①。这个组织印发名为《衰亡中国》的刊物，提出上山下乡是“修正主义运动”的观点，还号召

① 《精神抖擞，心明眼亮，彻底摧毁“省无联”》，《湖南日报》1968年2月3日社论。

继续革命，建立非官僚机构的公社。从他们的纲领来看，这是个极左派的组织。

当时中央提到，对这个组织提出的纲领必须批判，因为这个纲领在一部分工人、青年人和学生中，特别是在上山下乡知青中有影响，有些知青进入了这个组织。1968年1月这个组织被取缔，《衰亡中国》也被列为反动刊物。

2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工交、财贸、农林三口军代表、领导干部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时发表讲话，强调了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有一个与工农结合的问题，上山下乡，不仅要动员青年，这是毛主席的路线。他说，有些青年乱说还要回到城市，不想下乡上山，说下乡是刘少奇的黑线，那是错的，连我们机关都要做（下乡上山）的准备。这段话的意思十分明显，在当时的情境下，上山下乡已经是大势所趋。

广州市从1月份就着手这项工作了。1月19日，广州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协商小组联合发表了《致逗留广州市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及家长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广州毗邻港澳，地处国防前线，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所以对于策动和指挥打砸抢抄抓的少数坏头头和混入群众组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定要采取专政措施。信中要求至今仍逗留广州市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根据去年10月8日中央文件精神，立即主动地撤销各种组织，要求各革命群众组织都不要吸收下乡知青参加，还要求知青家长不要再组织什么家长造反组织^①。

上海市是动员知青返回农村、边疆的任务最艰巨的城市，从1967年初开始打击经济主义开始，动员工作就迄未停息。这一攻势一直持续到年底，也就是新一代的知青即“文革”期间的在校中学生也几乎下乡殆尽时才告终止。

^① 《南方日报》1968年1月29日。

2月23日,《文汇报》在报道支疆返沪青年回疆一事时发表编者按,说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表示要坚持支援边疆、支援农业、支援内地的革命大方向。文章说:

盲目返沪的支边青年们,你们受骗了,应当反戈一击,“杀”回新疆去。如果有人硬要拖住你们的腿,唆使你们赖在上海,那么,必须擦亮眼睛看一看,他究竟是什么人?革命的家长都要以革命为重,教育返沪的子女立即返回新疆,如果再把他们拖在身边,实际是把子女拖到资产阶级那一边去,是害了他们。

25日,该报又进而发表答读者问,把知青下乡引起的一系列问题都归咎于“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身上。针对有的青年“我们返疆若受到歧视和打击报复怎么办”的问题,该报轻飘飘地回答说:“相信广大群众会正确对待的,决不能因为害怕打击就不返回原地。”有的青年问,支边青年如果不愿意返回新疆,是否可以到江西、安徽等地的乡下务农,回答是否定的。该报一再强调,中央的有关通知和通告已经明确规定,坚决逗留城镇不走的,不予落户,“原调出地区和单位,对于从内地和边疆自动回来的职工,一律不得安排工作”。在断绝他们回城之念的同时,警告各群众组织不准拉他们参加什么“小分队”、“联络站”的活动。

除了造成浩大的宣传攻势之外,找出一些特别活跃或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作为“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阶级敌人、坏分子”,予以严厉的镇压,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做法。

街道里弄干部一直首当其冲,虽然从上年年初开始,上海市革委会就一再制止知青们将斗争矛头对准他们,但看来收效甚微,这些人还是不断遭到批斗甚至殴打,如普陀区的“部分革命群众”提到:“今年以来,发生好几起殴打里弄干部的事件,有时挑

动一些觉悟较差的支疆青年家长出场挑衅，有时唆使一些流氓阿飞充当打手。有个里委会的党员生产主任在最近半个月里竟连续4次被打”^①。广州也存在类似现象，一些知青“冲击街道革委会，绑架、殴打革命干部”^②。

上海市从5月底开始，就又一次着手处理这一问题。先是在各街道里弄召开斗争大会，如徐汇区枫林路街道曾连开两个斗争大会，斗争一个“破坏支疆工作的坏家伙”，据说这个坏家伙在历史上就曾参加过反革命组织，祖父是个被管制分子，哥哥也被政府镇压，所以他对党和政府有刻骨的仇恨。“文革”中他打着造反旗号上窜下跳，煽风点火，印发了大量反动传单，造谣说街道和里弄干部动员一个青年到新疆去，可以捞到800到1000元的钞票；一个家长还揭发他说：“这个十恶不赦的家伙曾经诬蔑造谣，说我的儿子在新疆被活活钉死在木板上，急得我们精神失常，影响了生产。不久我的儿子从新疆寄来了家信，说他在新疆一切都很好，我们才识破这个坏家伙的真面目。”^③

面对家长的不满和压力，该市革委会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文汇报》曾借一位支边青年的口揭发她的父亲破坏她上山下乡的罪行：

我父亲是地地道道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文革期间混入“支疆青年家长造反司令部”静安区愚园路街道造反派，煽动受蒙蔽的群众殴斗里弄干部。我是在他的唆使下于去年10月返沪的。“支疆青年家长造反司令部”停止活动后，他龟缩家门，伪装老实，背后恶毒谩骂里弄干部，要我耐心等待，到文革后期想法留在上海……还要我跟丈夫

① 《警惕坏人再把矛头指向革命的里弄干部》，《文汇报》1968年3月25日。

② 《南方日报》1968年8月22日。

③ 《坚决打击破坏支疆工作的坏家伙》，《文汇报》1968年5月26日。

在如此反复宣传，反复向“坏人”施加压力的同时，上海市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于6月7日凌晨“发动强大攻势”，将“一小撮一贯扰乱社会治安，破坏支援内地、支援边疆、支援农业工作的罪犯”一并逮捕。据说，这一小撮人中，有些是混杂在群众中的地富反坏分子，他们制造事端，煽动闹事，纠集歹徒殴打准备返回农村的人员，寻衅冲击车站、码头，打着造反旗号殴打里弄干部，进行打砸抢，严重地破坏社会治安和革命新秩序，他们之终于落入群众专政的法网，实乃大快人心。

上海这一做法并不是孤立的，这年夏季，对于返城知青来说，形势是益发严峻了，许多大中城市都开展了类似的打击“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坏分子的活动。

这一活动是与整顿城市治安、制止武斗升级的措施结合在一起的。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了关于制止广西两派群众组织武斗的“七·三”布告，这个布告据说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批准，像当时一切中央文件一样，布告不是针对广西一地，而是针对全国的。布告要求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革命大好形势，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并特别要求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挑起武斗、破坏交通、制造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的罪恶活动，要求对这些人实行群众专政。这个布告的第四条又一次重申：“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半个月后，又一个与其内容大致相同的《七·二四布告》出台，此时“文革”爆发已经两年，形势却仍然十分混乱，流血、屠杀事件层出不穷，连续发

① 《威胁利诱全不怕，“杀”回新疆干革命——支援返沪青年何爱之与反动家长一刀两断》，1968年6月21日。

布两个布告，既透露出形势的严重程度，也透露了制止这场混乱的极大难度。

为贯彻中央的“七·三”通告，广东省革委会、广州市革委会发布了一个《告外地来广州市人员书》。书中提到很多下乡上山人员“以种种借口，擅离岗位，长期插手广州地区文化革命，甚至干了一些违法乱纪，危害群众利益的犯罪行为”。它还特别嘲骂了有些上山下乡人员是“打着造反旗号，披着革命外衣，装出一副受害者的脸孔，公然污蔑下乡上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对返城知青和他们的处境谈不到一丝一毫的同情。该布告要求返城知青立即返回本单位，并且强调说，对这个布告采取什么态度，是对广州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一个考验，这是在对那些吸收了知青的组织施加压力^①。紧接着，一场“群众专政的革命风暴”就在广州市街道兴起了。在解放军部队的配合下，各街道都“狠抓阶级斗争”，动手进行对倒流城市的支农青年的政治思想工作，许多知青被迫撤离了据点，拆除了武斗工事，交出了凶器和抢来的物资，纷纷检举坏头头，退出了组织。

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各大中城市在1968年下半年，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以“群众专政”的形势，在城市中进行着“政治大扫除”，这种做法到当年的国庆节前达到高潮，如上海市就曾宣称由“公检法机关、文攻武卫战士、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对社会上所有的阴暗角落进行了一次全面大冲刷，割除了社会毒瘤……”^②所扫除的对象，就包括了知青，他们还每隔几日，甚至天天在夜间突然到车站、码头、各公共场所甚至居民家中去“查户口”，给返城知青和他们的家长，造成了莫大的压力。

^① 《南方日报》1968年7月20日。

^② 《政治大扫除好得很！》，《文汇报》1968年9月21日；《本市文攻武卫战士今晨再战告捷，一小撮犯罪分子一个个束手就擒》，《文汇报》1968年9月23日。

返城知青至此，已不可能再对留城抱有任何幻想，返乡已经是唯一的出路。到这年年底，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之后，即使是在校的中学生（也就是如今所说的“老三届”即六六、六七、六八届高中、初中生）想要留城尚且不得，更惶论这些早已失去城市户口的知青了。针对他们的措施都极其严厉，有的城市甚至曾统一收走这些知青家长的户口本和粮本，知青不返乡，粮本就不发回，全家没粮吃。于是，到1968年底，各地知青都陆陆续续地返回了他们下乡之地。

这场知青返城风就这样很快夭折了。它的水平、规模、对社会的影响和结局，与10年后的知青大返城都不可同日而语。但它所反映出的问题，却是十分深刻的。

知青的返城已经预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是根据不足的。它压抑个人选择生活道路的机会，将众多劳动力强制束缚在已经饱和的有限的土地上，在反复不断大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背景下，无端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视与矛盾，下乡知青不可能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更不可能在“亲不亲，阶级分”的冷酷环境中与农民“结合”，因为结合总是需要感情的。

但是，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抗争和思考，都没有引起社会应有的重视。

那些红卫兵也就是在校青年，对于他们的先行者，因地区的不同，采取的态度也是不尽相同的，但其中大多数，尤其是北京等城市的学生，态度是相当地冷漠无情。当他们又一次豪情满怀地迈上这条道路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想到，他们将重蹈这些先驱者的复辙。他们甚至忘记了在他们之前，早已有一百多万知识青年踏上了这条道路。直至今日，他们还不无骄傲地宣称，是他们

的下乡，卷起了全国知青运动的大潮，是他们为中央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路。

不是没有人注意过这个问题，有些红卫兵参加过对知识青年组织的批判，指责他们是“为私造反”；也有些比较认真的学生投身到农村，对知青的状况进行过调查，但他们中的有些人却将知青的种种不满和苦闷归结为“素质差”。应该承认，“文革”前刘少奇搞的“两种教育制度”以及因此而造成的青年中的不平等，在在校学生，尤其是重点中学学生的头脑中是有深刻影响的，“文革”初期对“红卫兵小将”的吹捧，更使他们对自己的估价高到极致。他们带着一种优越感看待比他们先行一步的老知青，心里并不认为自己与他们是一种人。这就是知青这次返城风的悲剧。

六 先 驱 者

知青们为返城进行的第一次抗争终归失败，他们偃旗息鼓，再次回到广阔天地，再次去当有文化的新农民了。

但是，“文革”的这段经历对他们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毕竟是“文革”，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在正常运行的社会中不可能提供的天地，经历过与他们同龄的大中学校学生未曾经过的大起大落的人生，看到过那些叱咤风云的“红卫兵小将”看不到的社会角落的这批知青的优秀代表，对于自身，对于中国社会和农民，有着更成熟，更认真的思考。在南方一些省市如广州、湖南、四川等地，老知青在思想、理论等方面的探讨是尤为突出的。这些地区“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比例较大，素质较高，其中不乏出色的人才。一位四川的当年在校红卫兵回忆说，他当时的感觉是，老知青在思想上比他们更活跃，更成熟，也更激进。学生们当时关注的，多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如两条路线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但老知青则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经济方面，他们中很多

人熟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后来才明白，他们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他们反复地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论证‘文革’前中国社会的种种不合理，其实是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的，只有论证了这些不合理，才能证明上山下乡措施是错误的，他们才有改变命运的可能。”

即便是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的，他们的学习和探索，他们的目光所及，毕竟达到了当时的在校学生不可能达到的深度，于是，这个时代最震聋发聩的思想解放的号角，最夺人眼目的思想解放的先驱，既未出现于“红卫兵小将”之中，也未出现在当时的社会精英集团中，而竟然就在这些从未引起人们重视的知青中脱颖而出。

我们在这里指的，是遇罗克的《出身论》和张木生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

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都不得不承认，即使有的人比他们的思想更深刻，更完满，更走在时代前面，但却没有什么能比他们的思想更尖锐，更大胆，对一代青年造成的影响更强烈了，无论从哪种角度，他们都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高峰。

然而，即使承认这点的人，也几乎都未曾想到，他们都是“文革”前下乡的老知识青年，是那个至今仍被人漠视的群体的成员；而且，那段经历，对他们思想的形成，都起到过不可忽略的影响，尤其张木生，他对中国社会、对农民问题的思考，是直接从他农村的实践中生发的。

一 遇罗克与《出身论》

在第八章中我们已经叙述了遇罗克的人生经历。到“文革”爆发时，他已经不再是知识青年，但当知青的坎坷道路无疑对他思想的形成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出身论》发表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的创刊号

上，这份报纸只出了这一期就停刊了。“文革”是思想专制最严酷的时期，却同时也是对民间各种思潮、各种言论一度失控的时期，只要打着拥护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号，往往可以有意无意地干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单纯的青年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看到了许多在正常社会中也许永远看不到的东西，这成为他们进行自我教育的途径之一，也成为日后思想启蒙的土壤。《出身论》就是在这种特定环境下，虽然看上去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其实却是理所当然的。

文章开宗明义就提到出身对青年造成的危害：“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三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我们不能不予以揭露、批判……”对于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正是这篇文章最具特色，最富战斗力，也是当时最为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之处。

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作者敢于公开地大胆地宣称，盛行一时的那副著名的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是真理，而是绝对的错误。他说，它的错误在于，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而实际上，社会影响也罢，家庭影响也罢，都是外因，而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

第二部分：重在表现问题。这段是全文的重点，也是篇幅最长的部分。作者在这段文章的批判中充分展示了他的锋芒。首先

他明确指出，出身和成分截然不同，关于党的阶级政策，当时最权威的解释是“一我们有成分论，二不唯成分论，三重在政治表现”。甚至不少高级领导人谈到出身问题时，也以这段话教导青年，遇罗克却指出，这是不看对象，是把对背叛本阶级的个别分子讲的话，用在这些分子的子女身上了，而成分和出身，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哪里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其次，他提出，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他揭穿了当时最流行的“既看出身，也看表现”这一观点的虚伪，他说：“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最后，他又指出，出身好坏与保险与否毫无关系。针对一些人常说的“黑五类子女不保险”的问题，他批驳说，这貌似立场鲜明，貌似有阶级观点，其实，这是阶级偏见：“按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

第三部分：受害问题。这里说的“受害”，指的是“文革”开始后很多出身好的青年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控诉，其内容如“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大学里出身好的青年功课不好，大受教授白眼”；“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做干部”，的确如遇罗克所说，这是颠倒黑白。我们在前边几章已经阐述过，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国家就一直在教育部门大力贯彻阶级路线，为工农子女入学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做法到60年代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已达到极点，真正被拒之门外的，是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遇罗克在这段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了这种做法对青年身心造成的伤害：“‘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

人，都能比我们举得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都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

最后，他呼吁：“受压抑最深的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这声呼喊即使今天看来，也太“大逆不道”了，其实在那样一个时代会有这样的文章出现，本身就几乎是一个奇迹。

正如今天一些谈及遇罗克的文章所说，《出身论》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就当时来说，大多数人，尤其是青年，并不都是支持它的，即使觉得它说得有道理，却也如一个干部子弟所说，认为遇罗克的心理“太阴暗了”，这是当时社会最普遍的反映。的确，在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批得臭不可闻的时候，在整个社会将阶级斗争之弦绷得紧而又紧，官方媒介反复强调不同阶级之间不仅谈不上什么平等和爱，甚至也绝不能存有一丝调和和温存的时候，遇罗克却敢于公开宣称：人的政治权利，应该是平等的，这实在是太超前了。然而，这也正是这篇文章的真正价值所在。

所谓反响，其实也是极其有限的，看过《出身论》，知道遇罗克的，仅限于北京部分中学生这样一个狭小的圈子。

遇罗克则因此而被逮捕，并被枪决，他为自己这篇思想解放宣言，付出了所能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生命，以及全家的被株连。

一代青年同样为此付出了代价：“文革”使唯出身论的做法变本加厉。“文革”之前，总还有个“重在表现”的政策，“文革”却连这一政策也撕毁了，当“文革”期间在校的“老三届”学生再次大规模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在校期间付出的一切努力，包括学习成绩和政治表现，都被一概抹平，他们都“平等”地成了新农民、兵团战士，但是，这种平等实际上孕育着最大的不平等，因

为几年以后，当他们面临着招工、招生、参军的机会时，被选择的唯一条件就是：出身。

于是一切才华，一切努力，一切表现都付诸东流。

在建国以后的几代人中，知青一代（这里指的是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知青一代）就这样面临了人才选择上最大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对个人来说，是使很多优秀的人才丧失了发展的机会；而从国家来说，则使这一代的精英集团从整体上降低了素质。

10年后遇罗克终获平反，他的《出身论》和他后来的遭遇也被公诸于世，这一切对那些心头从未笼罩过“出身”阴云的青年一代来说，恐怕并无出奇之处，但对于曾在那种气氛下生活过的人，却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绝大多数人是到此时方才知道，早在10年之前，就已经有人为消除这种不公平发出过呼喊，成为思想解放的殉道者。

遇罗克被誉为“划破夜幕的陨星”，“黑夜中一道刺目的闪电”，无论怎样赞扬都不为过，他是这一代知青的骄傲。

二 张木生与《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

遇罗克阐述的，是人的政治权利的平等，而张木生关注的，是“体制”，二者都触到了当时中国社会中最要害、最敏感的问题，也就同样具有震聋发聩的力量。不过，张木生并未遭到遇罗克那样的厄运，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的出身有关系。

在第八章，我们专门阐述过“文革”前下乡知青中那些高干子弟的某些特点，张木生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成员。无论他在校时的表现，下乡后的经历，还是“文革”中的实践，在他那个时代知青中的干部子弟中都非常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们不惮篇幅，在这里详细地叙述他的经历。

他原是人民大学附中学生，1964年初中毕业，1965年7月作

为北京市集体组织的到外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同陈伯达之子陈小农等人一起，下乡到内蒙古临河县狼山公社。据他本人回忆^①，作为高干子弟，他们当时已大体得知毛泽东与王海容、毛远新关于教育革命谈话的一些内容。毛泽东对王海容说那个上课睡大觉、考试抄别人的学生“有出息”的话，给他的影响很大。从在校时起，他就大量阅读马列著作，课内学习倒被置于次要位置。他们一心效法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也坚信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可以改变农村面貌，这就是他们主动要求下乡落户的思想动力。

他回忆当年的生活说：“开始真是苦学苦干……下去前想的是改造自己，然后改造整个农村。吃三睡五千十四，剩下两小时抓大事，一天只睡5个钟头，苦干14个钟头，真是脱胎换骨。陈小农干活好几次累得晕过去。我倒没晕，长了一身虬虱子，还鼓吹这是革命虫。刚下乡，表个决心，就是当时写的一首诗：

耕云播雨塞疆，沙漠变成粮仓。
绿波依依草地，白云缕缕绵羊。
野坳处处绿装，层林处处果香。
任它个血汗滴滴，待它个白发苍苍。
平生志已足矣，换得人间天堂。

陈小农还批这首诗意境不够高，政治性不够强，没有‘赤遍全球是我家’的精神。”

“当民工挑泥、一担200斤左右，27天压得我拉了26天稀，膀子全压破了。海碗盛的面条一顿吃四五碗。农民呢，出工是摇，干

^① 本段内容，部分来自笔者1994年春节与张木生的谈话，部分摘自吴思的《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年。张木生认为吴思这部书的记述大体属实。

活是聊，收工是逃。我们对他们看不惯，批评他们晚出工，早收工，不到时间就听打钟。其实农民比我们难，我们是配给，饿不着，他们没吃的。我们当时就认为农民有反动思想。农民中间尽是这样的话：‘想社会，盼社会，社会来了更受罪’。当地把社会主义叫社会。还有，‘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破小袄。十六七年过去了，让人咋说共产好。’”

拼着命干了一年，他们所在的大队分值更低了，几位知青大惭，发起一个救济贫困户运动，把挣来的那些钱粮都捐了出来，衣服、被子、现金、药品，能捐什么就捐什么，只留下口粮，结果“杯水车薪。再说小惠未遍，人家也不念你好。去的时候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按这里可能是回忆之误，因为这个提法是1968年底才出现的），骨子里却觉得大干一下，改变一个小队还不容易？实践证明，别说无力补天，就是补一个小队也补不好。还赤遍全球呢，连这一个队都越过越不像样。一年结束后，内心有了很多矛盾和动摇，心里打了一个大问号，只是不敢往下想”。

“文革”爆发后，这几个知识青年也回到了北京，与其他一些对上山下乡怀有一腔怨愤，一心回城“造反”的知青不同，张木生等人满心里渴望的仍是进行革命实践，仍然抱有一腔热情和理想。他回到母校，却没有斗争老师的心思，而是与一些在校学生一起，组织了一个红色少年公社，想仿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办讲习所，搞共产主义实践。至少，可以认认真真地读些书。他们的想法得到了当时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讲习所几乎就要在湖北农安办起来了：“我们动手太晚了。1967年1月，‘红色风暴’在全国掀起，各级组织一下子瘫痪了，学校根本无法再办起来。其实，按那时的条件，早上半年，没准真能搞成。”

1967年冬，张木生去了大寨，然后在北京待了一段，春天回到他插队的临河，他还想圆那个办讲习所的梦：“我仍不死心，于是又拉了一批人，有知青，也有北京的学生，觉得在城里折腾得

没劲，就来了，一共有六七个人吧。我们理解毛主席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革命总是从最落后、最偏僻的地方最先燃起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五星公社的五家村大队，这是全县最穷的公社中最穷的大队。这次与在湖北红安那次相比，条件可差远了，我们把牲口圈什么的全利用起来。闻风而来的知青一共有三、四十人。我信毛主席的话，组织起来是办成事的第一步，我们就搞大组织，这个组织不参加造反，只是想搞讲习所，想读书，大纲编出来了，课也排了，算是热闹了一阵子。”

“从春折腾到秋，足足闹了大半年，钱也没有，权也没有，知青们觉得还不如在生产队，什么名堂也闹不出来，心就冷了。我真正死了心，就在这时候。”

回到村里，他却发现了一个奇迹：与他一起下乡插队的同学李秋梦，在五星公社的讲习所只待了一个月，认为没什么意思，就回生产队去了。那时各级组织都瘫痪了，没人管，李就毛遂自荐当了队长，他小打小闹地试着搞了小型的包干制，增加了各户自留地的面积，还组织了泥瓦匠、皮匠、鞋匠等等出去搞副业，还在队里办起磨坊、油坊，结果到秋天张木生回队时，队里竟增产了十几万斤粮食。

这件事对他震动很大。他开始拼命读书，读马列和毛著，也读当时的“禁书”，包括当时供内部批判用的国际共运史上的一系列灰皮书，如布哈林、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的著作，也有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还有当时内部发行的右派言论集，等等。他与后来也到临河插队的几个同学一起，常常彻夜讨论读书心得。他说，这时他已经想到了体制问题。

在大量读书和思考的基础上，1968年秋，张木生写了一篇长达3万字的文章：《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

全文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从批判斯大林开始。斯大林一生的事业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三位一体，集体化、工业化和肃反扩大化就是三位一体。要成为强国就必须搞重工业，搞工业化要搞原始积累，就必须剥夺农民，搞集体化。遇到任何阻力都要粉碎，于是就有了肃反扩大化。他要从肉体上消灭富农，总共60万富农，让他杀了40万，剩下的“自行消灭”，弄到最偏远最贫困的地方去，他做到了这一点，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可是苏联的粮食产量到了50年代还赶不上1913年的水平，这难道是马列所说的社会主义吗？当然，在当时话还不敢说得太直露，只是客观地进行了描述。

第二部分论中国的农业发展史，将合作化之前与大跃进作了一个对比。他发现毛泽东在不同时期说的话也不一样，三年灾害后为了尽快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他一度也同意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三自一包”措施；毛还说过“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违背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张木生抓住了这句话，明确提出：我们现在就存在着列宁批判过的那种主观社会主义的、民粹派的、乌托邦的东西。

第三部分是针对学大寨运动的。当然不能把这场运动说得一无是处，只能说学偏了，说大寨那种评工分的方法是奖懒罚勤，不符合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第四部分分析1957年以后说假话说空话的根子。

第五部分论机械化和农民积极性的问题。要消灭城乡差别，病根是积累问题，剥夺农民问题。农民的一切都统购统销，统收统分，哪有价值规律？农民永远低收入、低效益。

张木生最后写了从1956年起反反复复在农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的要求，他说：“包产到户证明了一点，农民能够增加产量。我们不拒绝更好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在哪儿呢？”他没敢说包产到户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他指出了一个事实，即所有搞包产到

户的地方都是“产量上升，方向不对”。

他也怀疑到了知识青年在农村接受再教育问题，他说马克思早就说过，如果不从外面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就有自发地走向工联主义的危险，工人阶级尚且如此，更何况农民，毛主席不是也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吗？

作为干部子弟，他比一般青年能够接触更多的书籍，了解更多的信息；作为“文革”前的下乡知青，他比在校的学生乃至当时的知识分子，能够换一个角度和环境，从底层来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而“文革”的爆发，又曾给予他一个检验自己理想成败的舞台，这几环中缺了哪一环，也许都不会有《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诞生。

张木生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他在北京的同学李小峰，并附了一封写得更为直露的信。反响是十分强烈的，很快就出现了手抄本，然后又有了油印的小册子。他一下子收到了二百多封信，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认为看过这篇文章后很受启发。当然批判的文章也不少，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在内蒙古突泉县（今属吉林省）学田公社插队的一批北京知青，他们在所编刊物《广阔天地》中组织了一批批判《中国农民问题学习》的文章，有意思的是，这些批判文章所指，并不仅仅是张木生的这篇论文，而且是针对当时知青中存在的种种现象的：

那个打着《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招牌，到处妖言惑众的张木生，给我们很多重要启示：资产阶级在千方百计地、顽强地、巧妙地争夺着这一代青年；修正主义拼命地侵袭着青年的灵魂，企图占领思想阵地。而张木生、李木生，还有那个装乞丐调查社会阴暗面的徐浩鸳及写了篇狗屁洋文《历史哲学》的赵金星之流，已成为他们的俘虏……

研究马列主义经典，苦钻大部头，却对毛主席著作不感兴趣，大读封资修小说《麦田守望者》（美国）、《向上爬》（英国）、《怎么办？》（俄国）、《安娜·卡列尼娜》（俄国）之类；欣赏星期音乐会，唱黄色歌曲、

黄色小调……很多鬼事鬼现象，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总之，在意识形态方面，青年中存在着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好像见过了世面，好像看破了红尘，好像国家前途、人类命运，没有关心的必要了，好像工人、农民不如自己高明，没有什么接受再教育的必要。看不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看不到生气勃勃的大好形势，在思想空虚、情绪消沉之中放纵自己，寻求刺激。对毛主席著作、报纸、红旗杂志不感兴趣，却津津乐道于封资修的腐朽文艺。对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修正主义的人性论，明知不对，却共鸣为快。

透过这篇空洞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有些知识青年已经开始厌恶盲目、空洞的极左说教，而兴起了一股要求对社会、对人生进行独立思考，对中国现实问题作出自己解释的思潮。

总之，这篇文章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那个文化专制统治最严酷的时代，在思想界一片荒芜的情况下，这些青年的思考，就像冰封着的大地下涌动着的春意，“文革”结束后，它终于一发而不可收，生长成一片蓬勃的浓绿，汇合成一股澎湃的春潮^①。

还要提到的是，遇罗克、张木生等人与后来下乡的“老三届”知青，毕竟是同时代的青年人，在“文革”中他们曾一同活动，也一同思考过，这使“文革”前后的两代知青之间，在思想上存在着某种延续性，关于这点，我们还要在下一章中详谈。

^① 张木生并未如如今一些文章所说被打成反革命，他的论文的确曾被人写成内参告到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陈伯达等人那里，但据说周恩来读后，批了一段话，大意是知识青年自己探讨一些问题，不要简单地当成反革命来对待，这使张木生得以平安无事地过了好几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1972年，张木生还从插队的临河被招工到呼和浩特市，但就在这时，他自己说，不知赶上了哪个浪头，却被逮捕了，在呼和浩特的监狱关押了半年多。1973年出狱后，他见到尚未被“解放”的胡耀邦，胡耀邦说他看过这篇文章，认为写得很好，表示同意张的看法，并且支持他回京，搞有关农业的研究。后来，张木生果然一度成了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

第十二章

从红卫兵到知青

从1967年10月始兴起的最汹涌的一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淹没了老知青为返城而掀起的小小波澜，中国知青的历史，由此翻到了最有声有色、精彩纷呈的一页。它改变了一代人的生道路，也扭转了整个民族正常的历史发展进程。

在既专制又失控，既混乱又单一，既变态又集中的这样一个独特的时代，知青的上山下乡也呈现着同样矛盾复杂的特征，国家已经不可能像“文革”前一样将它置于严格的计划管理之下，纳入正常的运行轨道之中。在大方向由国家严格制定的前提之下，它的走向，就更取决于知青这个群体的自发意识，而它的具体操作，则更取决于执行者的素质和对这项运动的认识水平。

它已经从“上山下乡的安置工作”，发展成为一场“群众运动”了。

这段激情震荡的时期并不长，仅限于1967到1969这几年，也就是“文革”期间在校的六六、六七、六八届中学生（即如今所说的“老三届”）下乡的时期。

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们为知青运动涂抹的色彩却太浓烈，太鲜艳了，几至掩盖了这一长达20余年的运动本来的暗淡颜色，以至于直到今天，人们还都以为，这种明艳的色彩就是它的本色。

一 十七年的教育

新的知青群体，主要是由“文革”期间在校的六六、六七、六八届中学生组成的，他们对于上山下乡的态度和表现，追根溯源，与他们下乡前所受的学校教育紧密相关。

为简便和准确起见，我们以今天的习惯用语“老三届”来称呼他们。当时全国城乡的在校中学生约有1250万人，其中高中生137万人，初中生1113万人。他们大多出生于新中国建立前后的1947到1952年间。到1966年“文化革命”爆发时，他们的年龄都在14岁到19岁左右。

“老三届”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是完全由新中国培养出的青年一代，也是从建国到“文革”这十七年的教育成败得失的具体体现者。在他们身上，这种教育中积极的、进取的一面，与盲从、狭隘等消极的一面，都表现得非常鲜明，并在“文革”中以夸大、扭曲的形式充分地表现出来，国内外研究中国“文革”问题的专家，都认为“文革”期间红卫兵的种种非同寻常的表现与这十七年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影响，甚至认为这种教育是引发这场大动乱的重要原因；如今的人们，也仍在从老三届学生的人生道路中，不断反思17年教育的经验教训，希望从中探索可资发扬或引以为戒的一切，这是一个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但却未引起教育界、学术界充分注意，更未曾认真加以清理和总结的问题。

我们这里谈到的17年教育，将以其中的最后几年，也就是60年代的教育为主，这是“老三届”学生上中学的时期，这时期的教育，是典型的政治化、革命化的教育，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执行得最彻底的时期。

1. 理想主义与集体主义

无论对十七年的教育持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态度，有一点是为

世所大致公认的，那就是它比较成功地达到了自己培养“革命接班人”的目标：即忠诚于党，忠诚于领袖，甘愿为理想而奋斗，而献身。从一解放就已注意对青少年进行的革命教育，经十几年的摸索实践已经日臻系统和完备，它包括经常的大量的政治学习，包括多种多样的诸如听报告、上团课、下乡劳动、参加军训等活动形式，尤其包括英雄事迹的感染和熏陶，向英雄那样生活，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如此浓烈的政治气氛下，“老三届”学生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这种忠诚已经到了盲目的程度，因为当时的教育是要求青年对于党和毛泽东无条件信仰的，其口号就是“做党的驯服工具”。

这种教育还特别注重培养青少年的集体主义精神。国家是大集体，所在的班级、少先队中队、小队以至团支部、团小组，是小集体，在这种教育下，不仅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甚至个人的爱好、兴趣，也要服从集体的纪律。于是，万事依靠集体，万事服从集体，唯恐被集体所不喜，甚至时时担心为集体所抛弃，就成为这代人至今仍具有的鲜明特征。不是如今还有人在极力赞扬这代人的“团队精神”吗^①？

这种对党对毛泽东的忠诚和服从，以及强烈的群体意识，是这一代青年满腔热情投入“文革”，成为冲锋陷阵的急先锋的基础，

① 更多的知青已经开始反省这种团队精神的另一面了，如一位知青女作家说：“我们失去了个性，我们变成了群体，一片忠诚不二，我们的幸福观、理想观、是非观失去了一切个性特征，这就是毛泽东的孩子们最统一的素质”，见张蔓蔓，《并非丑陋的一代》，再如有人这样评论：“这一代人的社会化，已经无可挽回地朝着‘团队主义’的方向演进，他们之中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同自己一代人的命运相联着，一代人的幸运就是一个人的幸运，一代人的缺陷就是一个人的缺陷。作为个人，这种定向的社会化过程留给他们发展独立人格的余地如此之小，以至于他们自己在今天都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他们为成长所付的代价。”张永杰：《成长与代价》，均载《苦难与风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也是他们一旦在政治上失势而被成批抛到乡下时，仍能够义无反顾的原因。在从1968年7月中央提出大中学校学生毕业分配的“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开始迄至1969年初的短短半年时间，在“文革”那种混乱无序的情况下，多达400余万的大中城市的中学生们，竟然可以说是井然有序地迅速地分散到了全国最偏僻的山乡、最遥远的边疆，这在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这实实在在地是世界人口迁移史上的一个壮举，一个奇迹。

这首先就要归功于他们所受的教育。虽然如今很多文章谈到当时“工宣队”、“军宣队”采取办学习班、吊销城市户口、由家长的工作单位施加压力等一系列强制性的动员方式，而且说的都是事实，但是，这些措施针对的，其实只是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显然，单凭这类强制手段，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对于上山下乡，大部分中学生并不是被迫的，除了少数先锋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确有过犹豫，有过不甘心、不情愿，感到过无奈、“想不通”，但他们还是不顾家长的阻挠，自觉自愿地踏上了这条道路，尤其是在1968年底毛泽东一声令下之后。“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才有出路，才有前途”，已经成为他们的思维定势。他们极其蔑视那些留在家里拒不下乡的青年，而有胆量这样做的青年，在当时是极少数，他们最难承受的压力，未必来自政府和街道，而是来自这个群体，他们要冒被这个群体所抛弃的危险，只有个性极强，或者早已因政治、出身等各种原因被这个群体所抛弃的人，才敢于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

这种群体意识当然有它积极的一面，正是靠着这种意识，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才能够在从大城市一下子被抛到莽莽林海、茫茫草原和荒野山乡之后，互相扶助着走过那段艰难的岁月。

2. 道德品质教育

在以阶级教育、革命教育为主的前提下，十七年的教育还注

重培养青年勤奋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质。须知即使是“文革”前的所谓“贵族学校”也就是重点中学，也并非像“文革”时所批判的，以及今天许多人所理解的那样在培养“少爷小姐”，而是的确在按照当时的模式塑造“革命接班人”，它们在培养学生的这些品质方面，往往比一般学校更严格。

一个“老三届”学生这样回忆中学时代的教育：

学校不是只抓分数。学校开设劳动课，坚持每周半日劳动，这在北京当时全日制中学里是独一无二的（著者按：此话并不确切，当时中学已普遍开设劳动课）。从初一入学到高三毕业，第一节和最后一节都是劳动课，这叫作“以劳动开始，以劳动结束”。学校的厕所都是学生自己动手掏，每日三餐，必有一顿是窝窝头。吃饭时要整整齐齐地排队唱歌，饭盆内所有的饭粒都要刮干净……（到兵团后）我不怕艰苦，分我到后勤，我不干，坚决留在农工班……不仅自己必须咬牙坚持干，还要照顾好班里的小妹妹们。我觉得，我在中学受的那些思想和品格方面的教育，这时起了作用^①。

他们受的教育让他们视怕苦、怠惰、娇气、软弱、享受为可耻，他们自觉地磨炼自己吃苦耐劳的品质，很多人甚至经常地“自讨苦吃”。上山下乡以后，他们的吃苦精神往往使当地农民为之咋舌，他们中出现了那么多的“铁小伙”、“铁姑娘”，还有那么多人为救火、抗洪、救人、救生产队的物资，甚至为救一头牛、一根电线杆子，而付出了最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他们在道德上具有很强的自律意识。“文革”前学校中近乎禁欲主义的管理和教育，以及当时宣传媒介“净化”的宣传，的确导致了不不少人人生悲剧，关于这个问题，已有为数不少的“知青文

^① 王江：《劫后辉煌——在磨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

学”作过生动的描述。但就那个非常特殊的年代来说，在正值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被置于朝夕相处甚至相依为命的环境中，又往往并无任何管束，而且因前途茫茫而备感精神上的空虚和失落的时候，他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却能够自觉地约束自己而未曾发生道德上的堕落^①，也是应该归功于当时在这方面严格的教育的。如果没有这种自律，仅仅青少年在道德上产生的问题，对于社会造成的危害，就会可怕得多。

这一切素质、品德方面的教育，使老三届知青中的很多人在经历“文革”及以后上山下乡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能够以坚强的意志与命运抗争，而且在面临恶劣的环境和精神的失落时能够不甘沉沦，这是他们至今仍引以为骄傲的一点。

无论哪里的农民几乎都公认，“老三届”这批知青要比后来的知青表现好，他们能吃苦，能与农民较好地相处，即使在完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他们干的“缺德事”也要相对少些。

这是十七年教育的真正成功之处。

他们无疑是最富于献身和牺牲精神的一代人，如果当时的社会对他们这种品质，这种精神稍微重视一些，珍惜一些，如果他们以超出常人的坚忍意志所付出的辛苦和汗水不是消耗在无谓的

^① 这种自觉甚至在老三届之后的“小知青”也就是70年代从中学毕业下乡的知青身上也同样存在。笔者曾于1992年8月到内蒙古额尔古纳左旗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进行民族调查，这是位于我国极北的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现存唯一仍使用驯鹿、保持着原始狩猎状态的游猎民，然而就在这样原始、封闭的深山，竟也曾有知青前去集体插队！从旗里带职下放在该乡任乡长的奥华，就曾于70年代在此插队，他向笔者谈到，当时他们学校下到该乡的知青，共8男8女，也像鄂温克游猎民一样住在山林上的“撮罗子”（一种非常简陋的）中，女孩子们害怕，不敢单独住，最后只得与男孩子们合住在一个大帐篷里，就这样同吃同住了一年余，竟没有发生任何男女之间的事，一次男孩子们唱电影《上甘岭》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因唱到“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女孩子们竟生气而几天不理他们。奥华一再说：“这些事，给今天的年轻人说，他们都不会相信。”但凡是当过知青的人，肯定会承认这是真实而且自然不过的事。

毁坏生态的劳作之中，而是流洒在有益的建设、科研、文化等事业上，他们所创造的业绩，该是何等的辉煌！

可惜这一切只是“如果”！

3. 狂热与偏执

如今已经有人开始对十七年教育的成败得失进行严肃认真的反思。

谁也不能否认，“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出现并非事发突然，他们正是十七年教育之树结出的果子，也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结出这样的果子。

谁也无法否认，这种教育使受教育者存在着严重的人格缺陷。

最明显的、最为世所公认的，是“盲从”。具体地说是领袖的盲目崇拜，是将领袖的话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盲从领袖之外，还盲从群体，盲从“形势”，由盲从发展而来的，就是“文革”时的狂热。

他们虽然整天高喊大批判，但对是非却缺乏最基本的批判能力，对一切流行的理论和口号缺乏批判精神。他们用作批判的标准，只是毛泽东的语录，而不是实践和真理，他们就这样用简单的、一元化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二者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他们都批判过描写“不好不坏，亦好亦坏，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的“中间人物”的文学理论，于是在他们心目中，不是同志，就是敌人，同志就要“高大全”，达不到这个标准的，就该批判，该打倒，就是敌人，即使他是自己的师长、同学，甚至亲生父母。由此便发展出了他们的偏执。

对待“坏人”、“坏事”，对待一切“封资修”的东西，这种教育只教他们去仇恨，去打倒，于是他们就认为只要是敌人，无论怎样残忍都不过分，甚至唯恐自己不够残忍，以为不残忍就是对敌人“恨得不够”，就是“缺乏阶级感情的表现”。用“文革”初起时由清华附中红卫兵创作的极为流行的《造反歌》为例：“忠于

领袖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就集中体现了他们当时的精神风貌。

结果是教育者自己首先尝到了这种教育的苦果，当被教育者发现他们的师长、上级也不过是普通的、有七情六欲的凡人之后，立刻就把批判的利剑，把仇恨的矛头对准了他们。早在“文革”尚未爆发之前，北京一些重点中学激进的中学生们就已经开始批判课本，批判教师，以及罢课、罢考了。

“文革”爆发，他们更是变本加厉地打、砸、抢，捣毁一切与革命不相容的文物、书籍，毫不留情地揪斗自己的长辈和老师，批判自己过去亲密的伙伴和同学，而毫不在意对别人造成的伤害。

他们讳言“爱”字，爱只能与“热爱”联在一起，那是用在毛泽东，用在党身上的，此外，可以爱同志，那叫“阶级友爱”，但这里所谓的同志只是个空洞的泛指，而阶级友爱，对于幼稚的青少年来说，不过是个“互相帮助”的代名词。爱父母，则是出身好的青年的特权，而随着“文革”的展开，享有这一特权的青年也越来越少了。至于同情、怜悯以及如今青年最爱说的理解，还有宽容、温存，这些本属于人类非常美好的感情，则一概视之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被归在应该唾弃之列。

4. 愚昧与无知

真正的批判精神，真正的独立思考不会是凭空产生的，它要有一些前提。前提之一，是至少要掌握一定的知识，就以当时的话来说，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没有最基本的把握和理解，又如何将其作为批判的武器来运用？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没有起码的认识和了解，或者说根本不知其为何物，又谈何批判？

十七年的教育在这方面给予学生的知识是极其匮乏的。这代中学生，尤其是城市中重点中学的学生，在理科方面的确曾受过比较扎实的基础训练，这一方面是由于“革命”的矛头更多指向的是文学、语言、历史等人文科学领域，对于基础的数理化，还

少有触及；另一方面，也应该归功于刘少奇等人对这些学科的一再保护，他们反复强调要保证和提高的教学质量，主要就是指这些学科而言的。

但是，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方面，这代中学生所学到的知识，却是相当地支离破碎，尤其到60年代上半期，思想理论界极为封闭，观点日趋偏激，青年学生除了被动接受之外并无鉴别、思考的余地，表现出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对人类文化价值的极端的无知，这直接导致了“文革”时的种种暴力和破坏行为。一位老三届出身的学者这样回顾自己一代人当年的教育：“批‘封’，割断了他们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使他们很少懂‘国学’，成为没有家园的文化‘孤儿’和‘浪子’；批‘资’，割断了他们与西方文化、现代文明的联系，使他们很少懂‘西学’，成为流不进大海的文化‘内陆河’和‘沼泽地’；批‘修’，割断了他们与世界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使他们只能教条地理解‘老三篇’、‘老五篇’、‘毛主席语录’，形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文化心理和民粹主义的道德伦理心态。”^①

敢于承认这点，是需要一定的自省精神和勇气的。

“文革”中断了他们的学业，使他们中本来极有希望攀上科学高峰的人才，在10年后重返校园时，面对世界科技的突飞猛进和受到过系统教育而且才气横溢的新秀，唯有徒唤奈何而已，特长变成了“特短”。而让他们至今感到骄傲的，是他们中出现了一大批作家、学者，但我们这里却强调了，他们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的基本训练，竟是这样欠缺，这一点在“文革”中已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而如今他们之所以能崭露头角，只是因为他们的上一代在这方面也同样欠缺而已。当他们之后更年轻的一代崛起之后，他们因这一缺欠所造成的后劲不足，便开始显露，以

^① 王东成：《“老三届”的文化历史命运》，《中国青年研究》1994年第3期。

后还将会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特短”实质上也变不成特长。

前提之二，在知识欠缺的情况下，可以以丰富的人生经验作为弥补，而在校园中长大的十几岁的中学生，又哪里会有什么人生经验？所以，“文革”中表现最狂暴、最过激的，多为中学生。大学生则相对少些，而在中学生中，又以初中生为更过分。

上山下乡，却使他们成为社会经验、人生经验最丰富，从而精神世界也变得丰富的一代人。上山下乡多少弥补了他们所教育的某些不足。他们的偏执、狂热，是在那些最偏僻的山村，在那些最贫穷、最没文化的农民中，逐渐冷却下来的。他们的人格缺陷，也在那种严酷艰苦的环境中，多少得到了改变和纠正。

不是像当时宣传的那样，贫下中农比知识分子更革命，更高明，而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越是偏远的山村，所受政治风浪的波及就越小些，那里人们的生活，也就越正常、越接近人生的自然状态一些——这些我们还将在后文加以详述。这是扭曲的时代才有的扭曲的纠正方式。

最重要的前提，还是独立思索的精神，我们上面已经谈到，十七年教育所最不赞赏最不提倡的，就是这种精神。“独立思考”这只是在做数学题的时候才用得到。

10年之后，当这一代诗人终于喊出了“我——不——相——信”的诗句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正是一代人从盲从到觉醒的宣言。

5. 心口不一

总之，盲从产生的原因是知识和精神的匮乏。这并不仅仅是这一代人的缺陷，教育本身是具有连续性的，这一代人的缺陷，正是上一代人教育的结果。将责任一概推到果子上，不仅不公平，更是不负责任的。

这并不是说“老三届”人就不该忏悔和自省。将一切归咎于盲目、狂热、听话，甚至无知，总还是容易的，难的是承认

在这种表现的背后，他们与其他任何一代人一样，存在着人性中的另一面。

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片面与夸大宣传，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虚伪^①。这种违反一般人本性的过高要求，使不谙世事的青少年以为即使是正常的为自己，也是与“革命”不相容的，他们只知牺牲自己是美德，不知自己的生命同样是应该珍视的，更不知道个人的权益，也同样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他们尤其不知道，追求名利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也并不反动，只要不损害国家和他人的利益，这种追求就应该受到鼓励。

然而，人的欲念，人的追求是客观存在，是无论怎样教育、怎样改造，也压抑不了的，无论是不敢正视，还是明明知道却设法掩饰，它还是要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从“文革”到上山下乡，这代人的各种表现已经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本性中同样存在着自私、贪欲、卑鄙、冷酷等恶的一面，理想主义之下，有为一己出人头地的私欲；革他人之命的行为，掩盖着某种出卖别人保全自己的丑恶，这本来并不奇怪。

问题在于，一旦这些欲望通过正当的渠道无法伸张的时候，它就要以扭曲的、不正常甚至不正当的方式发泄出来，由此就出现了自觉或不自觉的虚伪。

这代中学生中很多人从小就会写思想汇报，写给组织、给教师，而不是给自己看的日记，他们中许多人会巧妙地将自己“偷偷”做的好事，以各种方式告诉别人，也会以靠拢组织、要求进步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打别人的小汇报，一些恶劣者还会以此来诬陷别人。

^① 已经有很多老三届人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个时代在培养了许多真诚的时候也培养了同样多的虚伪。”见毛时安：《那年夏天》，载《苦难与风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凡此种种，在不同的青年中，程度是有差异的。大体上说，出身好的青年，尤其是高干子弟，为人处世要直率、坦诚一些，因为他们不需要费尽心思去掩饰自己，即使他们有些“出格”的思想，有些不良表现，也往往会被视为“认识问题”。所以，最具批判精神、敢于进行独立思考的人，往往出在他们中间。在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中，他们曾有过突出的表现。而越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为了摆脱在群体中被人歧视的地位，就越要千方百计地表白自己的“革命”，表现自己的“积极”，他们的人格被扭曲、被蹂躏的程度，比起一般青年，就更严重，一些相当卑劣的行为^①往往出现在他们中间，并因此而愈加被这个群体所歧视，他们其间在精神上的痛苦和伤害，是具有强烈优越感的出身好的青年所难以体会和理解的。他们心头被笼罩的阴影，甚至到“文革”结束、新时期到来之后很久，还难以抹去，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种烙印也许将伴随终生。

总之，对于“文革”中红卫兵由于狂热、愚昧而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所造成的严重的、不可弥补的损害，十七年教育是难辞其咎的；而紧随而来的几百万塞在城市的青年之能够被基本顺利有序地导向农村和边疆，而未曾像决堤的洪水冲向社会，为社会造成更混乱、更可怕的动荡，也没有因环境的急剧改变而造成一代人整体的堕落，则也要归功于

^① 一位1965年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边的北京知青曾向笔者谈到，她在赴疆的火车上结识了一个资本家的女儿，长期受压的境遇把这个女青年锻炼得十分老练，她在出发前就买了一批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在列车上便将其一本本送到各车厢，受到带队干部的注意和表扬，她每晚不断地找干部汇报思想，或者只是去“聊聊”，结果，当其他青年都被分配到基层连队劳动时，她却被送到了农学院读书。这种例子事实上是不胜枚举的，“文革”中主动跳到台上揭发检举自己父母、带领红卫兵到自己家中抄家，甚至与别人一道动手殴打侮辱自己的父母亲人的现象，实在是太普遍了。

十七年教育中那些积极的因素。

整个民族都应该为此而感到庆幸。

二 真诚的探索者

与前面章节都不同的是，对于“文革”这样一个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十分罕见的时期，我们却几乎找不到可以作为史料的凭据。当年的官方媒体只用一个声音讲话，讲的又多是空话假话，从中不仅看不到一丝一毫有关当时社会情况、人们的思想感情的动态，甚至对于引起全社会震惊的许多重大事件，媒体也没有任何反应，总之一句话，只凭当时的文件、报刊，人们根本就不会知道中国每天在发生什么事。

的确，红卫兵、各个造反派组织出版的小报和各种各样的宣传品多如牛毛，但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气氛之下，在这些小报中除了也像官方媒体一样充斥着空洞无物的口号和批判稿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负责任，哗众取宠，断章取义，攻击、漫骂甚至造谣，不一而足，这样的材料，如果不加搜剔分析，当然不能直接引以为据。

在不断地抄家、批斗，不断制造文字狱的环境中，甚至人们那些敢于披露真实心境的私人信件、日记、笔记，也难以保存下来，我们知道太多因为在私人信件日记中说了几句实话而付出沉重代价甚至付出生命的事实。

可资利用的，还有当时人的口述。虽然口述史在如今的史学界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可和重视，但有关“文革”时期的口述，却也无法尽信。首先，时隔30年，即使不掺入出于各种动机的隐匿、歪曲和篡改，许多回忆也已经变形。何况那场“触及灵魂”的运动曾使众多的人冲动、变态、疯狂，如果不是后来在精神上、思想上达到一定境界的人，未必肯于正视这一切，未必能够客观公

正地陈述当时的事实。

于是，立志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便陷入一种颇为难堪的境地。在一个与今天如此之近的年代，作为史学研究主要依据的史料却如此缺乏，而进行口述史研究，这个时代距离今天，似乎又太远了。

所以关于“文革”，不仅在学术研究中，即使在文学、在回忆录，甚至在人们的回忆中，都留下了诸多空白。

当年大中城市的中学生们是怎样完成了从红卫兵到知青这一角色转化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空白。如今笔者只能以当时的官方文件，结合一些小报，而更多的是以当事人的回忆，三者进行对比，费力地搜寻一些脉络。而在体例上，与前面诸章也便有些出入了。

早在“文革”爆发之前，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容等人发表的抨击“旧教育制度”的几个谈话，就已经在北京等大城市的部分中学生（主要是干部子女）中暗暗流传，这些谈话抨击“旧教育制度”，说它摧残人才，摧残青年，害死人，这使正在沉重严酷的升学压力下苦苦喘息的中学生看到了“解放”的希望，备感欢欣鼓舞；毛泽东还提出，学校要以整个社会作为工厂，要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这对终日生活在相对封闭单调的校园和枯燥无味的书本中，渴望刺激和新奇的青年人来说，更像是打开窗户吹进一股清新的风，他们再也坐不住了。

毛泽东不愧为杰出的革命家，鼓动家，再没有谁像他那样深谙青年心理，再没有比这两点，更触及到当时学生的兴奋点、敏感点，因而更能激起充满幻想的青年的激情的了。

“文革”狂飙突起，旧教育制度顷刻之间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文革”爆发后不几天，1966年的6月18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3日发出的《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

举行。同日，该报还刊登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学生写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公开信，信中强烈要求废除旧的升学制度：

现行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正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彻底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我们将从这里着手，对整修旧的教育制度实行最彻底的革命。

他们未曾逆料，高等学校的招生，竟因此而一直到1977年才再度恢复，其间整整停止了10年！满怀豪情向旧教育制度宣战的小将们，大部分最终被拒之于大学门外。总之在当时，那些几天前还在为高考孜孜苦学的青年人，发现仅仅过了一夜，他们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就成了现实，过来人几乎都承认，他们曾为此感到过一种解脱，一种轻松，可是很快，他们又同时感到一种失落和茫然：不考大学了，不读书了，那么干什么呢？就这么一路冲杀过去，杀到哪里去呢？当然，这种失落，有人已经意识到，大多数人却没意识到，他们只是觉得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而已。

在领导、教师、父母都丧失了权威，社会上一切都乱了套的独特环境中，十几岁的中学生们只好自己为自己安排生活的方向——他们冲出了校园。但是，我们在前面提到了，在这个貌似无序其实又受绝对权威严格控制的社会中，中学生们无论怎样乱冲乱撞，在大方向上却不会越轨，也想不到要越轨，这个“轨”，就是“毛泽东思想”与“革命”。

部分思想激进，以革命为己任的干部子女，对于无法上学，其失落感一般不像普通学生那样严重，他们的父兄，当年就有过辍学或为学校开除后投身革命的经历，对于以这种方式投身革命，怀着一腔兴奋。即使同是干部子女，他们理解的革命，也各各不同，对于一些人来说，只是夺权、造反，对另一些更有远见与头脑的

人来说，则是要将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也就是革命接班人。

培养要有培养的途径，这个途径不可能凭空产生，对于年仅十几岁，除了自己的校园、课本，以及当时媒介的相当空洞的绝对一元化的宣传之外，简直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生活模式，也不知道人生有多种多样活法的中学生来说，这个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与工农相结合。”他们相信自己在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榜样也只有一个，那就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不仅是干部子女，即使是一般家庭的子弟，面对停学停课也打倒了教师的现实，意识到原来考大学、当专家的道路已被否决之后，也对于探索新的人生道路，表现出很大的热情。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讲述有关他青少年时代生活的文章，以及他的大量未公开刊行的早期文稿，被红卫兵公布出来，这些文稿最初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在大学校园里，从各地到京城串连的青少年们冒着酷暑，虔诚地抄录下来，再将这些在京取得的“真经”流布到全国；后来，各地红卫兵逐渐拥有了印刷器材，这些文稿就被冠以《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泽东文选》等各种名目刊印成册，得到更广泛的流传。

处在盲目的崇拜热狂中的青少年学生，很少有人能像张木生那样，看到毛泽东早期这些思想与后来作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区别。张木生说，他看出毛泽东早期思想中有杜威的东西，也有空想社会主义如康帕内拉《太阳城》的影响；同时，中学生们也不知道中央与毛泽东本人并不愿意这些东西在社会上这样流布，不知道这种流布其实是混乱中一度失控的结果。

20多年后张木生仍说，毛泽东的这些东西写得实在太好，太感染人了。事实的确如此，对于充满激情的年轻人，毛的这些早期文稿不仅与正式发表的四卷《毛泽东选集》一样是绝对真理，而

且更富于吸引力，更符合他们的口味。

最吸引他们的有两点，一是极富浪漫气息的使命感：“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世界者我们的世界，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携来百侣重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种激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从红卫兵到知青，社会地位、人生道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没有变的就是这种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使命感，这使他们将诸多艰难困苦看作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而必然要经受的磨炼，这无疑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承受力。

承担重任的前提是思想和身体各方面的准备。思想方面，就是认识社会、了解社会，这就是仿效毛泽东“让我们迈开双脚”，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的行动。毛在长沙读书时脚穿草鞋、手拿雨伞到农村各地搞社会调查的形象广泛深入到当时青年之心，他们认为这是走向革命的第一步。至于体力方面，则是登山游泳锻炼自己，中学生们都读过毛泽东早期的著名作品《体育之研究》，体育可以改造世界，改造人类，这点为青年所接受并深信不疑。再下一步，应该是身体力行，也就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到农村去，与工农相结合，按照当时那套理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大串连为他们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机会，这是失去课堂的中学生踏入“大课堂”的开端，或者说是前奏，他们是满怀兴奋与好奇，兴高采烈地跨入这个新的、广阔的“课堂”的。虽然串连对每个人产生的影响各有不同，但这毕竟是中学生真正接触社会的开始，那些自愿上山下乡的知青中的先行者谈到自己的下乡经历时，无不追溯到串连的影响，也就是从这层意义上，他们将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理解为红卫兵运动的继续。

串连使中学生接触到农村的某些现实，其中有些人由此而产生了留下来“战天斗地”改变“一穷二白”状况的豪情。“文

革”时期被作为下乡知青的榜样，一度宣传得家喻户晓的北京长辛店铁路中学学生蔡立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966年底，她与伙伴们步行长征到延安串连，途经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西河大队所属一个叫杜家山的小村庄，这个小村位于榆次、太谷、和顺三县交界之地，周围是连绵几百里的高山峻岭，远离县城七八十里，只有5户人家，16口人，非常贫困偏僻。村民对她们的到来十分热情，她们离开时村民送出几十里，并一再表示农村十分需要像她们这样有文化的人，这使她颇受触动。不久，据当时报道说，在继续前往延安途中，她听到了1967年《人民日报》发表的元旦社论，社论提到：“要大力提倡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于是她告别了伙伴，只身转回了杜家山，决定与那里的贫下中农一起留下来务农^①。可这时中央发出了停止串连，学生要一律返回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她也被学校召了回去。直至一年以后的1968年3月，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涌起之时，她才再次作为先进典型正式到杜家山落户，成为“新社员”。

在周总理支持下首批到云南西双版纳安家落户的55名北京知识青年，也有过曾到该处串连的经历。云南迤逦的自然景观与多彩的民族风俗，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更多的人则还停留在“探索”的阶段。他们真诚地想利用串连的机会，仿效当年的毛泽东，搞社会调查、办讲习所，探索与

^① 《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人民日报》1968年7月4日。这段历史至今仍不断被各种媒介提起，只是说法有异，如1994年第12期《中国农民》刊载的《人过留名——山西老乡话“老插”》这样谈到：“蔡立坚他们那早离开杜家山，从太谷过祁县，穿贾令来到了文水县云周西村。一路上，杜家山和杜家山的乡亲们一直悬在蔡立坚的心上。现在来到刘胡兰就义处，面对烈士英勇不屈的塑像，她泪如泉涌，勇气倍增。从汾阳到孝义的公路上，她终于下定决心要重返杜家山，把自己的青春献给杜家山……”本文以当年的官方报道为准。

工农结合的道路。我们上一章谈到张木生曾试图到湖北去搞“红色少年公社”，与他一起的，大多数就是当时还在校的中学生。即使中央下达了停止串连，要中学生重新返回课堂“复课闹革命”的命令，也未能束缚住这些中学生的脚步：没有书本，没有教师，只有军代表和学习班的课堂，对他们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串连和社会调查虽然使中学生大大拓宽了眼界，比以往在校园时更多地了解了普通中国人尤其是农民的生活，但是十天半个月的接触，毕竟是太短促了，何况又是在那样一个扭曲的、人人不讲真话的时期。更何况，中学生本来就是带着各种“框框”，也就是预先在学校被灌输，后来又被“文革”所强化的一大套革命理论下去的，他们只能看到一些表面现象，甚至这些表面现象也是虚假的，即使见到一些真实的东西，他们也很难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它。因此，串连并不可能一下子打破青年们在学校受多年教育所形成的那套概念，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少数的青年，或因偶然的机缘，或因特别敏锐的观察力，开始接触到了社会的一些真相，感觉到了他们在书本上所学的知识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异。曾有北京中学生回忆，在贵州他们看到了尚未解散的因三年灾害而建的孤儿院，从而窥见了1958年“大跃进”的真实情况，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这是他们思想发生根本改变的开始。他们开始清醒地、尽量独立地思考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村问题，然后他们带着这些问题下乡，又结合农村现实继续着对这些课题的探讨，他们是那一代人思想上的先驱，许多人成为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坚，在知青运动中也别具光彩，对于他们，本书后面还要详述。

总之，中学生进行串连的指导思想与他们后来到农村插队的思想一脉相承，串连是后来上山下乡的准备和前奏，上山下乡则是串连的必然结果。更有一批中学生，早就自觉地将串连与日后的上山下乡联系在一起了。

在了解社会、了解工农的同时，未来的知青对于他们的先行者，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特别的关注与好奇，他们有些是有意，有些是偶然地，与老知青们有了接触，其中一些人甚至主动地到“知青点”去进行过调查和体验。

北京钢院附中的李志伟回忆说，申连时他到了河北易县，开始想的是搜集有关抗日战争的革命传说，深入下去后听说那里有不少保定地区的下乡知青，就去那里搞调查，共调查了三个公社，写了一份调查报告。结论却是乐观的，他认为与那些在城里折腾的学生相比，这些知青更贴近农民，贴近生活，过得更有意义，更充实。当然，这是把知青的生活理想化了。

北京一〇一中一批中学生（其中包括了相当数量“出身不好”的）在1968年夏季，两度前往曾出现过著名知青典型邢燕子、侯隽的河北省宝坻县，专门调查知青问题。在与青年点的天津知青共同生活劳动之余，他们向这些知青提出过诸如“在偏僻的农村怎样关心国家大事、怎样参与路线斗争”一类大而无当又颇具当时青年思想特点的问题。当然，除了从这些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小青年口中听到各种被他们视为“落后”的牢骚抱怨之外，不可能听到任何实质性的答复^①。

外语附中的几个学生也曾于1967年底到天津宝坻、香河、武清等县进行过关于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专项调查，去调查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已经意识到自己早晚也会下乡，想事先有些准备。我们前面曾提过，这几个县在1964年曾接收过大批天津知青，属于工作做得好的样板，在社会上颇有影响。但这几个中学生经过调查，却发现虽然农民一人干活，却能养活一家子，而知青自己却

^① 笔者曾参加了这两次调查中的第二次，时值1968年麦收，在与一个知青点的5个知青共同生活的几天中，他们只是闷头吃饭干活，竟没人肯与笔者讲话，当然他们之间话也极少，而当时毫无与人交往经验又颇为笨拙的笔者，则只好一无所获地逃之夭夭。

养活不了自己，于是得出了插队这条路行不通的结论。据他们回忆：“回京后，我们写了一个报告，送到国家计委，一个姓余的副主任接见了我们，我们说不能下乡，他说还得下，因为知青在北京就已积压了几十万。”30年后的回忆也许不够准确，但至少透露出中央那时已经下定了决心。而这些认为下乡之路走不通的青年，也还是踏上了这条“走不通”的道路。

就这样，大多数没有生活经历的中学生，不可能对知青上山下乡这一政策和行为进行理智的思考，他们那些带着框框的调查，也不可能有多少真实的结果，即使其中那些先知先觉者已经看到了上山下乡的问题，而当自己面临这一事实时，也不可能有的选择。

三 从天安门起步

红卫兵肩负神圣历史使命叱咤风云的日子，算起来不过几个月。

1966年“文革”爆发后，最先冲上前台的，是以北京清华附中等一些重点中学高干子女为主，也包括一些工农与其他出身的青年组成的红卫兵，他们写出一论、再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高唱“造反歌”，在校园内批判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同时，冲上社会大破“四旧”，这些做法都曾受到中央文革的热情支持和鼓励，“八·一八”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是他们的发展达到高潮的标志。此后，“红卫兵”组织便迅速发展到了全国。

不能否认这个组织强烈的血统论性质，也不能否认在他们的权力已经达到顶点，任何法律都无法限制的时候，发生过多起草菅人命的事例，他们斗争的矛头，也绝不仅仅限于当时的所谓“走资派”也就是革命老干部。当然，这些并不在我们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我们这里要涉及的只是，这些做法使他们的同学，那

一大批与他们同龄的，出身不像他们那样“响当当”的青年感到压抑，因为他们也是要造反要革命的。

1966年10月，在中央文革的扶持下，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红卫兵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崛起了^①。人们一般将其称为“造反派”以与“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相区别。这个组织的主旨是反刘少奇，攻击的矛头之一，是刘少奇在“文革”初期向各学校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施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这些罪行中有一条，就是推行反动的血统论。对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动血统论的批判，使那些备受压抑的学生如沐春风，他们纷纷加入造反派，成立了各种各样的造反组织。当然，这些组织也都叫红卫兵，这使红卫兵这一名称大大复杂化了，它几乎已成为“群众组织”的代名词。

然而仍是好景不长，造反的瘾还未过够，中央却打算将学生们重新拘回校园了。在干部、教师都已经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千万只脚”的情况下，中共决定派军队进驻校园。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转过年的2月，又再次强调了要对中学生进行军训的问题。军队奉命进驻了校园，却遭到部分造反派学生的抵制反对，于是在北京的中学生中，围绕对待军训的态度及其他一些问题，又分裂成了“四·三”、“四·四”两派，势同水火。大学的造反派也呈不断分裂之势。

无论派别如何复杂纷纭，青年学生们却一样地单纯幼稚，一

^① 1966年10月6日，由三司发起，有10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在京召开，江青在会上讲话，这是三司崛起的标志。

样地偏执狂热，他们任何一派的行为，也一样不能脱离当时的大背景，到了造反派不断分裂的时期，整个红卫兵运动已经明显呈现颓势，一部分人还执迷不悟，积极投入武斗和派争，但相当一批有头脑的青年，已经感到了迷茫与失望。

从1967年下半年以后，中学生们的状况十分令人忧虑，强烈的造反欲、破坏欲、领袖欲一旦被激起，就无法轻易压回。当下一步的政治斗争已经不再需要他们的时候，稍有常识的人都能推断出，麇集在大中城市的这几百万无所事事，却又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少年，对于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社会，都将是一股极其可怕的破坏力量。何况他们虽然年幼，精神上却已伤痕累累，或是父母被杀、被关、被管，失去了家庭和亲人，或是自己因“站错队、说错话”或因出身问题被批斗，打骂、歧视，很少有哪一代人在尚未成年的时候，如此普遍地受过这样深刻的精神上的伤害。他们空虚、苦闷、颓废，有些已经走上犯罪道路，其中不乏“文革”初期奋起造反的精英们，他们偷窃、抢劫，结伙打架，“拍婆子”，甚至组成流氓集团，造成严重治安问题。1967与1968年前后，北京街头曾发生过多起大规模群殴事件，表面上看是红卫兵与“街头小流氓”产生矛盾，实际上已无多少政治动机，往往纯粹出于无聊。

一些大学生在校园中贴出要求尽快进行毕业分配的大字报，但中学生没有这份“特权”，他们处于无学可上，无业可就，甚至无家可归的尴尬境地，可悲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军训并未收到明显效果，而且效果即使再好，也不可能将中学生无限期地在校园中留下来，最高决策者已经认识到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由此说来，“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在最初，虽然表面上采取了由北京市一些中学生自发组织的形式，而实际上，却并非纯

自发的行动，而是官方因势利导的结果。

我们拟将“老三届”的上山下乡运动分成三个阶段叙述：从曲折等人1967年10月到内蒙古牧区插队开始，可视为第一个阶段，我们将其称之为自发的上山下乡阶段；“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的正式提出，标志着第二阶段的开始，而第二阶段的结束，则以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为标志，从这时起到1969年春，“老三届”剩余的毕业生大部分已被送到农村。

在从1967年10月至1968年12月的一年之中，也就是在我们所划分的前两个阶段，“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的特点表现得最为鲜明，这些特点构成了这一时期知青上山下乡与以往和以后上山下乡的明显区别。也是我们在本书中叙述的重点。

再度掀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路先锋，是北京25中高三学生曲折等人。他与当时北京市中学红代会的主要负责人李冬民是同班同学，他也是红代会政治部的负责人，主管着红代会的报纸《兵团战报》，在当时属于中学造反派中“四·四”一派的领袖人物，下乡之前在中学生中就颇有名气。

曲折后来这样回顾这一段思想经历：

1967年夏天，“文革”已整整一年了，国家混乱，学校停课，武斗内战困扰着一代热血青年，中学生已无大学可升，无业可就。总不能一辈子呆在学校闹革命吧？该向何处去？没一人能回答。尽管不少人坚信中国将走进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但谁也说不出明天会是什么样……由于江青4月3日和4月4日两次讲话的挑动，北京中学生分成两派大打派仗，我感到十分无聊。以后想起来，当时的确有不断革命、不断探索前进方向的热诚，但潜意识中是不是也有摆脱困惑、寻找出路的渴望呢？总难以说清。……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也都开始对“文化大

革命”感到厌倦，认为自办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新型大学可能是条出路……①

可见他与他的同学，原来也是上述那些热情、单纯的探索者中的一部分。他们的想法，都离不开当时固定的一套模式，即办红卫兵大学，进行有关教育革命的尝试等等，只是他们并未停留在这一点上，如曲折所说，他们在此期间学习了毛泽东有关青年运动的论述，按当时特有的思维方式去分析，认定学生的阶级属性是没有进行彻底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必须实现思想革命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这是早在“文革”之前就由中央明确地为知识青年指出过的革命道路，我们在第七章第四节曾引述过团中央书记路金栋的讲话，既然革命的道路只有这一条，青年们也不可能脱离这一前提去寻找出路，但曲折等人之能够成为一代青年的开路先锋，也自有其不同寻常之处，那就是在实现从红卫兵到知识青年的角色转化时的那种思想上的自觉，以及跨出第一步的勇气。当然，他们能够跨出这一步，是与他们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分不开的，他们的自发行动从一开始就得到北京市的支持和大力宣传，这保证了他们这一步迈出的成功，也使它能立即在全国造成影响。

此时距知识青年下乡上山高潮的掀起，还有整整一年。

“理想主义加青春的浪漫，当然唯恐走得不远”。他们沿中国地图上的边界线，找到了新疆拜城，却被北京市劳动局的同志劝阻，建议他们去内蒙古，并出面为他们与内蒙古联系。

1967年10月9日，曲折一行10人从北京动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专门报道了他们离京的消息，充分肯定了他们选择的道路，还特别强调说，他们“有的是学校

① 曲折：《发端：1967年10月9日》，载《草原启示录》，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

革委会成员，有的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有的是学毛著积极分子，都是在文化革命运动中锻炼出来的革命闯将”。“他们的这一革命行动，代表了革命知识青年的方向^①”。《北京日报》发表了短评，号召全市知识青年向他们学习，中学红代会机关报《兵团战报》高呼：“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市、全国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正在轰轰烈烈地兴起。”虽然后来曲折一再强调“这是我们10个人谁也没有想到的，27年前，我们10个北京中学生奔赴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行动，竟会成为那场‘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开端^②”。“当我们非常真诚地踏上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时，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会为上千万中学生的安置工作提供了思路，更没有想到在我们身后，是10年间1700万知识青年离开城市上山下乡……”^③但仅从当时的报道也可看出，他们不可能完全没意识到这一行动的意义，而安置工作的思路，也不能说是由他们提供给中央的。实际上，在那样的一种政治背景下，并不存在任何“自发”行动的可能性。

“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由此拉开。

他们落户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的白音宝力格公社，这是纯牧区，语言、风俗，一切都与汉族地区迥异，比起到一般内地农村插队以及到农场的屯垦，更平添几许浪漫。从北京到当地举行的一系列欢迎仪式，使他们激情难抑，并受到相当多中学生的钦慕。仅仅在他们出发后的一个月，又一批近400名北京知青接踵而至，其中包括在北京中学生中颇有影响的师大一附中、女附中等学校的学生造反派领袖陈永康、何方方、何铁军等，有一些是当时北京中学红代会的常委或校革委会成员。随后，一批又

①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北京一些革命小将自愿到内蒙古当普通社员》，《人民日报》1967年10月11日。

② 《历史一页，1967年10月9日》，《中国农民》1994年第12期。

③ 《发端：1967年10月9日》，载《草原启示录》。

一批的北京中学生前往锡盟牧区，据1968年9月统计，已达2900名，到1970年为止，北京、天津、呼和浩特等城市到锡盟插队的知青，更达到9000名之多^①。美丽富饶的自然条件，尤其是纯朴温厚的蒙古族牧民，把这里的知青滋养成得天独厚的一群，他们中的大多数对草原、对牧民至今怀着眷恋不已的情结。在近年兴起的“知青文化热”中，他们是人数不多，但能量极大而且最投入的一群。

李镇江等55名中学生南下云南的行动，与曲折一行大同小异，只是在时间上比曲折晚了一步，他们并不是受曲折等人行动的影响，这说明不仅仅是曲折10人，想到并敢于跨出这一步，更说明这一从红卫兵到知青的转化，在当时已是大势所趋。

这55人来自北京20所中学，大部分是干部子女，上面提到，他们中有人在1967年串连到云南的西双版纳搞过社会调查，深深爱上了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回京后，便酝酿着到那里去干革命。他们没有曲折等人那样接近市革委会领导的特权和机会，但当年的干部子女有他们特有的一套思维和行动方式——当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的一次会上，他们赶到现场，把自己的要求写在一页从笔记本撕下的纸上，传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当然支持，他作了批示，转交给副总理李富春具体处理。他们的要求被正式批准，是在1967年11月27日，由于云南当时还处于动乱之中，他们只得延至第二年的2月出发，落在了曲折他们的后边。^②

西双版纳的热带密林比内蒙古的蓝天白云更富于吸引力。云南成为继锡林郭勒草原之后的又一块磁石。一年之后，在这里的

^① 《锡林郭勒日报》1968年9月1日、1970年6月26日。

^②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

国营农场基础上组建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到1970年10月为止，已经吸收了北京、上海、四川和昆明的知青共9万余人。但是，云南的环境远比内蒙古严酷，在此后的10年中，知青上山下乡史上出现过几次堪称大地震的事件，这里则无一例外地都是震中。

与曲折等人下乡几乎同时，北京还有一批中学生前往黑龙江的北大荒参加农垦^①。这时的东北农垦总局还未改成生产建设兵团。回忆当年的动机，他们大部分人都说，呆在学校实在没意思，也有的说，父母挨整，家破人亡，急于换个环境。

这在北京的中学生中造成了一定震动，中学生突然发现，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要离开校园，已经有些军队干部的子女去当兵了，这使当时的中学生们羡慕不已，但却可望而不可及，另一条干革命的道路，就是上山下乡，虽然大多数人对前途还不愿多想，但的确已有许多人，开始认真对待这一问题，也有一些陆续动身了。

其他省市的中学生也有反响。“文革”时期，各级革委会组织，包括省市一级的革委会机构中，都有中学红代会的代表参加，使这些未成年的学生不仅有了与省市级党政领导接触的机会，还有了参与重大决策的可能，这在一般的社会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些红代会代表，大多只代表了中学生中的一部分人，或者说是某一派，不可否认他们是中学生中的特殊人物，当国家准备再次掀起一场上山下乡运动以解决迫在眉睫的城市中学生积压问题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确是最先领会这一意图，并付诸于行动的人，对推动这一运动的进行，这些先锋功不可没。曲折如此，上海市红代会一批“革命小将”同样是如此。

① 这次的声势远未如曲折等人下乡时造得那么大，只是在一年之后，《人民日报》曾为他们刊发了一组照片：《广阔天地炼红心——记在黑龙江七星农场参加建设的北京知识青年》，1968年8月11日。

早在1967年的7、8月份，与北京相呼应，上海市陆行中学等校有一批学生步行前往江西井冈山的拿山等公社进行社会调查，曲折等人到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的消息传出后，该市闻风而动，由革委会出面组织中学红代会的“革命小将”举行座谈，并要求有关部门有组织有计划地做好这一工作。

1968年2月19日，山东省济南市的260多名“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的高初中毕业生前往革命老区沂蒙山区插队落户^①。规模仅次于北京，是“文革”期间组织知青到农村插队动手较早的省份。

不过，在这一时期，上山下乡中学生的行动，采取的还都是自发的形式，国家只是在报刊等新闻媒体上大力宣传，大多数学校还没有着手组织动员。更多的中学生，还没有认真考虑跨出这一步的问题。

四 吹响上山下乡运动的号角

曲折等人下乡，得到的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大力支持，而李镇江等人则走的是直接请示中央领导人的路线，无论哪一条路，结果是一致的，这说明这一问题在中央已经达成了统一的认识，或者更明确地说，是毛泽东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

1968年4月，毛泽东在对黑龙江省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批示中，提出了“四个面向”的原则，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这并不仅是针对大学毕业生，同样也是针对积压在中学的六六、六七届高、初中毕业生而言的。这一批示标志着“文革”爆发后第一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二阶段，也由这里发端，这是各省、市、

^① 《济南一批知识青年奔赴农村落户》，《人民日报》1968年2月24日。

自治区有组织地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的阶段。这一运动也就由此而走向高潮。

说是“四个面向”，实质上对于中学毕业生来说，主要是面向农村，面向边疆，这在当时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原则上，是家在农村的学生全部回乡，家在城镇的，除少数进入工矿企业或参军以外，大多数人上山下乡，就北京市中学的情况来说，自1968年春开始，除了有很少数到京西煤矿当采煤工的指标之外，其他指标就都是上山下乡了。

各省市自治区紧锣密鼓地逐级召开毕业生安置工作会议，仅以接收知青最多的内蒙古为例，1968年5月22日锡林郭勒盟革委会、军分区召开全盟知青安置工作会议。4天以后的5月26日，乌兰察布盟革委会发出了组织中学毕业生下乡的通知，7月5日该盟召开会议，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同样的六六、六七届毕业生分配工作会议于6月14日到28日也在呼伦贝尔盟召开，7月28日到8月2日，全自治区又在丰镇县召开了全区中学毕业生分配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现场会议。在这期间，内蒙古接收了北京、天津、南京、杭州等全国大城市的十数十万名知识青年。

对应届毕业生的做法，则仍是“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动员。山东省济南市革委会早在4月就为中学生举办了二期动员上山下乡的学习班，一些学校也由军训团出面纷纷举办学习班。继济南之后，天津、河北及全国各地的中学，都纷纷组织起以毕业生分配为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据报道河北邢台市革委会短短一个月内在全市12条街道办了40多期学习班^①。此外，是由各省、市召开大规模的誓师大会，如上海市革委会组织召开上山下乡誓师大会，由市革委会领导成员主持，解放军驻沪三军负责人和“工总司”（上海受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头头等纷纷出席。该

^① 《人民日报》1968年7月22日。

市还决定当年（即1968年）高中、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不放假，以加紧对高中毕业生进行安排。广州市甚至要中学红代会的小将组织“表忠队”向毛主席表示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的忠心^①。

大规模的宣传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效果，据当时报刊报道，到1968年6月底，河北省已有两万名城镇知青到农村和边疆落户；贵州省到达农村的高、初中毕业生有6500多名；北京市仅到内蒙古插队的知青就达1.1万余名；天津市到8月底为止也已经动员了第三批中学毕业生到内蒙古农村和牧区插队落户。截止到12月23日毛泽东发布“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之前，河南全省下乡知青为22万，湖南省长沙市达20万，广州市为6万，甚至人口稀少的甘肃省也达近万。当然，这个数字恐怕是将家在农村的回乡知青也算进去了。

对于毛泽东及其他所代表的中央在“文革”期间何以会作出动员百万知青上山下乡的大胆决策，多年来人们有过形形色色的探讨和猜测，也过有不同的说解。

最早的说法，偏重于从政治上的解释，认为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曾对革命小将寄予很大期望，他们却使他大失所望，他深切地感到他们由于受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的毒害，本质上已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而无法承担革命接班人的重任，他们需要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改造的道路，只有到农村去，这就是毛主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思想的由来。这实际上仍是“文革”前所谓“知识青年革命化道路”思想的夸大和延续。

其次，很多人相信这是中央的一种军事部署，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战备的需要”，大城市的知青被大批送往“反修防修”的前线如内蒙古、黑龙江、新疆以及“抗美援朝”的前线如云南。

时至如今，几乎已没有人会否认，动员大量城市知识青年上

^① 《南方日报》1968年10月12日。

山下乡的起因，与“文革”前一样，主要是经济原因。换句话说，上山下乡大潮的再度兴起，与“文革”前的几次大规模动员一样，都是被动的，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滞留于城市的青少年就像潮水，越积越满，若不及时疏导出去，也许顷刻之间就会决堤，而谁都知道决堤的后果有多么凶险。到了这个关头，决策者已经来不及细想太多。“文革”期间有过主要从政治目的出发组织的运动，如城市各级机关和大学的干部、职工、教师被统统赶到“五七干校”进行改造，但仅仅两三年以后，随着社会秩序的初步稳定，他们都陆续迁回到城市，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却仍是高潮迭起，整整持续了十余年，直到“文革”结束、新时期开始，还有人坚持要将这一措施进行下去，这足以解释这场运动的深层原因并非政治的了。

至于知青因自以为被赋予神圣使命而干出的种种举动及其造成的种种恶果，我们在下面还将详细论述。

“文革”后的知青上山下乡，原因与“文革”前并无两样，思路也仍然沿袭以前，不同的是，“文革”前安置工作的推进，靠的主要是国家的严格计划和严密组织，而“文革”之后，则主要靠政治渲染，靠采取非常手段，此外，不过是波及面扩大得多，造成的恶果也大得多而已。

我们说过，“文革”前每年安排多少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在何处，国家计委都要经过严格的规划和审定，但在1967、1968年间，很多省市还处于武斗的混乱之中，有的尚未能建立起革命委员会，也就是尚未建立起能够正常运作的政权机构，对于知青的安置接待，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建立起政权机构的地区，也不可能腾出很多精力来对知青进行安排和管理，因此，这一时期对知青的安置，只能是粗线条的。多采取各省之间进行协商的方式进行。曲折曾这样回忆1968年夏天北京市革委会召开的一次知青安置工作会议：

北京市革委会召集有安置北京学生任务的几省劳动部门的同志开会。其间，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站起身来，双手抱拳，作揖请求：“各省来的同志们，都请帮帮忙，各自再增加些人，刚才东北的同志已表了态，他们再多接收400名，看看哪个省还能再多安排些？求求在座各位了……”这场景，这番话，不知会让当时正豪情满怀的红卫兵小将们做何感想，我却一下子感到了一阵被当作“剩余劳动力”、“处理品”而被拍卖的深深的悲哀……

别知识青年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些内幕也就当然是“豪情满怀”，而曲折本人，不论内心怎样想，在公开的新闻媒介中，他仍然是一面旗帜，他被评为全自治区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然后，在10月，锡林郭勒报还用整版篇幅报道他和他的同伴们的事迹。

具体到各学校，由于原有的管理机构、校长教师统统被打倒，在学校掌权的是军训团，以及受到他们信任的一部分教师与学生。在处于一团散沙状态的学校里，军训团的官兵们不仅无法像当年中学的教师那样熟悉和了解每一个学生，甚至对有些学生，他们一面都未曾得见——因为这些人根本就不回校。而被结合进革委会的师生们，至多只在一部分学生中有威信，并不具有过去学校对学生的权威，于是，毕业生分配也就同样只能是粗线条的。

具体地说，以北京市为例，每当市革委会与某处协商下来一些名额之后，便会层层分配到各区各校，接下来是学生们酝酿并自愿报名、组合的阶段。一般地说，到边疆军垦，对学生的吸引力最大，报名者既多，要求条件也就相对严格。这期间人为因素不少，与军训团关系较好的，与校革委会当权者一派的，往往可以优先。到内蒙古草原，由于其浪漫，也吸引了不少学生，但由于是边疆，对政治条件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一般农区虽然

影响力不大，但政审较宽松，一些出身不好自知政审通不过的人，知道再留下来也未必有什么好出路，情愿找几个情投意合者一道下乡，所以也欣然报名前往。总之，这个时期下到各校的名额，相对于学生总数，还是很少的，报名者常常超额，而学生们也有较大的选择余地。

如果将第一阶段称为知青自发上山下乡阶段的话，那么这个第二阶段，就是国家有目的宣传组织与知青自发上山下乡相结合的阶段。

1968年10月千名南京中学生到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的经过，就是这种国家组织与知青自发行动相结合的典型例子。

南京市本没有组织中学毕业生到内蒙古插队的任务，1000名知青到内蒙古鄂托克旗、乌审召旗插队落户一事，是由南师附中、九中、二女中等学校一批中学生发起并得到江苏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各级领导的支持，以及国务院的认可。

发起者提到当年的动机时如是说：

1968年8月上旬的一天傍晚，李兵、华沙两位女生拿着一份报纸来找我，我们都被那篇北京知识青年李萍萍奔赴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的报道所感动、所启发，萌生了到内蒙古边疆去插队落户的愿望。当时工宣队已进校，有关方面开始进行“四个面向”的宣传，明确指点出路。8月18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社论，形势的发展使大家都有一种坐不住的感觉。^①

我们了解到当时成立了革委会的边疆地区除了内蒙古以外还有贵州……在贵州和内蒙古之间我们选择了内蒙古。一来因为内蒙古已经开始接洽知识青年，并有专门的办事机构；二来杜红月的姨夫高锦明当时是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希望他能帮助我们；三来当时认为中

^① 黎亚明，《起步》，载《难忘鄂尔多斯》，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苏之间将有一场恶战要打，极富牺牲精神的我们，希望站在反修前沿，一有战争便可捷足先登。^①

其后，几所学校的中学生分头行动，九中学生的做法是先选择了内蒙的7个旗县（选择标准是“专挑那些分布着沙漠的地方”）寄出决心书，同时利用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出席南京市一次群众大会的机遇，设法把决心书递到主席台上。结果是许世友委托当时的南京市革委会主任彭冲接见了他们，对他们的革命行动予以高度赞扬。内蒙的7个旗中也有两个回信表示同意接收。而南师附中的学生则兵分两路，一路去呼和浩特找高锦明，一路则直插科尔沁草原，那里的负责人也同意接收他们。省、市有关领导认为南京知青还是在一起插队比较好，后来经过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和江苏省革委会的多次联系和国务院的协调，决定安排1000名南京中学生到伊盟插队。鄂托克旗要求迫切，给了800名，还有两百名被乌审旗抢走。

可见，南京中学生中的这些“开路先锋”无论从插队动机，还是从选择插队地点、动身经过等各方面来看，与北京的曲折、李镇江等人都是异曲同工的。

除了像南京知青这种大张旗鼓的行动之外，更多的中学生采取的是小集体行动。当他们看中某个上山下乡地点而或因名额有限或因政审未通过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会自作主张，只身跟随正式分配下乡的大队人马前往该地（颇有些已经上了火车又被轰下来的），再在那里软磨硬泡；也有些就结伙到当地，请求安置办公室将他们留下来，为了提高成功率，他们甚至采取步行的方式。

继1966年步行串连兴起之后，中学生已惯于以此作为表示革

^① 戴佐农：《“始作俑者”自述》，载《难忘鄂尔多斯》。

命决心的方式。北京通县的5名中学生，在通县革委会常委、通县三中学生王佐清的率领下，步行900里到内蒙古凉城县，要求在那里插队落户，5人中年齡最小的还不到16岁。据当时报刊报道，王佐清等人本来已经被批准下乡到通县郊区的兔子店，正要动身时，听到通县知青也有“支边”的任务，是到内蒙古的凉城，他们约好重新写了申请，然后，在8月24日晚，秘密集合，步行前往凉城。到凉城后，受到县革委会和当地军民的隆重欢迎。县革委会决定将他们安置在著名劳动模范郭老虎所在的金星大队。乌兰察布盟革委会还作出了“向通县人民致敬，向王佐清等革命小将学习”的决定^①。这段报道，如今看来有些矛盾之处，例如王佐清等既然再次写了支边申请，又何以要秘密集合出发，既然秘密，沿途又何以惊动了那么多人，等等。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行动像曲折等人的行动一样，对当时推动知青下乡是有促进作用的，因而才能受到如此的重视与宣传。^②

表现特别积极的，还有少数是农民子弟。按照当时的宣传，“贫下中农子弟回农村生产是‘归队’，是革命，不愿回生产队务农是忘本，是不革命的开始”^③。在如此绝对的安排下，一些不甘心于回乡种地，渴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年轻人，便与享有城镇户口的同学一起积极要求到外地农村或边疆去，各校一方面出于宣传

① 《乌兰察布日报》社论：《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向王佐清等五位革命小将学习》，1968年9月28日。

② 笔者插队所在大队的北京知青，也曾采取了这种步行方式。他们都是北京当时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成员，来自不同的中学，大多数人的家庭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1968年夏他们决定步行到内蒙古东乌旗去“投奔”在此之前分配到那里插队落户的同学，于是乘火车从北京出发，在张家口下车之后，步行经坝上草原徒步走到锡林浩特，在锡林浩特得知阿巴嘎旗有个大队已经将接待知青的一切都准备好了却未分配到知识青年故而意见很大，便决定改道到阿旗去。另有一名锡林浩特知青得知此事后也自愿加入他们的队伍，他们终获当地安置办公室正式批准并在那个大队落户来。

③ 《文汇报》1968年8月9日。

的急需，另一方面，军训团与农民子弟的关系往往比与城市青年在感情等各方面更易亲近，因此有意无意地将一些农民子弟树立成上山下乡的带头人，并允许他们与城镇青年一起上山下乡，这种现象，在“文革”前是少见的，从中也可看到农村与城镇的鸿沟扩大之一斑。

在第一、第二两个阶段率先下乡的知青，不仅在所去地点和所去地方的性质（如是集体所有制的农村社队还是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抑或是生产建设兵团）等方面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在同伴的选择上也有一定的自由度，一般采取自愿结组的方式。当然，他们所选择的，正如上面所述，往往是那些最艰苦、最边远的地区。而伙伴，一般是选择“志同道合”的，至少也要“合得来”才行。这就使这一时期下乡的知青，特别具有了一种群体性的特点，即以北京知青为例，不同类型（这里所说的“类型”，指的是中学生中因出身、当时派别等差异而分成的不同的小群体，“文革”使这种差异变得非常明显）的学生，对不同的下乡地点（如云南、内蒙、黑龙江等）、不同的下乡方式（如兵团，插队或农场），选择的取向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甚至在今天由知青集体写成的回忆录中，也有痕迹隐隐呈现。当然，不是有亲身体会的人，很难感受到这一点。

这里要强调的是，这种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当运动发展到第三阶段，知青被大批轰到乡下的时候，这些区别更是变得十分模糊，即使在我们所述的这个阶段，它实际上也更多地是存在于北京等大城市的一些学生，尤其是重点中学的学生和高中生中间。

概括起来，这一时期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文革”前以及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相比，显出了一些特点，例如在地点和人员的选择上似乎有更大的自由度，例如部分小将的“通天”使他们显得非同寻常等等，并因此而使这一轮上山下乡大潮在开始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气势，但实际上，这一切丝毫也未

曾使这批知青的真实处境和地位有任何改善。

五 最初的实践

在上山下乡的两个方向即插队落户与到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二者之间，区别其实很明显。一般地说，插队为知识青年提供的天地似乎更广阔些，无论在身体和思想上，比起兵团战士来，他们所受的管理和束缚都要宽松得多；他们与农民、与当地社会的接触也要广泛和深入得多；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他们生活更艰苦更无保障，地位更低下，在地少人多和特别贫瘠的地方，由于与农民争利的情况严重，所处环境也更恶劣。结果是，同为知青，到这两种不同去向的人，经历和感觉是有很大差异的。

对于插队知青，可说的似乎更多一些。

动员知青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从“文革”前起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工作中的难点，“文革”期间中学生中的大部分，也同样更愿意去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但“老三届”中确实有相当一批人，尤其是那些“开路先锋”们，却心甘情愿选择了插队。这也是这一时期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突出特点。

这当然首先与中央的政策与宣传紧密相关。以到农村生产队插队作为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方向，这是早在1963年就已为中央明确过的，“文革”大革一切的命，这个方向却被明确无误地继承下来。1969年中央安办一位负责同志在讲话中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搞插队这条路子是肯定了的。同志们来搞插队工作，就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不能得到胜利，这是一个战斗任务。大家感受都很深，有不少人就是不愿下去，不愿搞插队，反映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也是刘少奇反革命路线的干扰……办国营农场也是个办法，但主要形式还是搞插队，办农场有它的优点，但也有不足，花费太大，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到的……办一个机械化的

农场，每人得平均 3000 元，现在有很多农场是赔钱的，不赔钱的农场不多……”其口径显然与“文革”前中央谈到这一问题时是一致的，虽然讲话中一再强调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实质上起作用的仍是经济原因，与工农结合、改造一代人的前提，在这里倒被挤到后面去了。

也与“文革”前的做法一致，对于插队知青的宣传，其声势要远远大于对到国营农场的，最明显的就是上面所提到过的，曲折等人到内蒙古牧区插队前后，还有一批北京知青前往黑龙江的国营农场（即俗称的“北大荒”，当时尚未改为黑龙江兵团），但前者被宣传得家喻户晓而后者却几乎是默默无闻的。上海市于 1968 年 8 月动员了 1 万名六六届高初中毕业生到边疆参加农垦。与此同时，还有 45 名“革命小将”自愿前往江西井冈山地区插队落户。上海市对后者的宣传声势，造得也比前者更大。据这些青年称，从上海到江西时，曾有部分人主张自己办农场，对于插队落户思想准备不足，经过插队前到当地的实地调查和锻炼，才知道自己办农场的想法之不现实，从而“深刻体会到”要走插队落户的道路。

尽管如此，不能否认的是，仍有相当一部分中学生自愿选择插队。这其中又可大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充满政治抱负的，可称为主动型；第二种则可称为躲避型，他们大多是“文革”中因出身或因自己“站错队”等原因而在精神上深受伤害，向往“天高皇帝远”的“自由”，他们是一些希望摆脱“被人管”处境的人。当然，作这种区分只是为了使我们的阐述更简明，而实际上，很多人身上是二者兼而有之的。

就第一种来说，他们选择插队这条道路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了解社会，磨炼自己，为有朝一日登上政治舞台做好准备。

“文革”唤起了这代青年对政治的空前热忱，对于绝大部分干部子弟和“文革”期间作为学生领袖登上政治舞台的青年来说，他

们简直就不知道除了政治还有什么可以称为事业，值得为之献身，能够体现人生价值的东西。既然成名成家都已被作为资产阶级白专道路堵死了。

献身政治，此时也不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经历了“文革”的中学生小小年纪就看准了权的价值，他们对权看得很重，认为掌权是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必经阶段，这显然是受了当时广为流传的林彪语录“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失去了一切”的影响。很多青年已经为自己设计了非常具体的掌权步骤。在这里，掌权代替了“文革”前夕下乡的干部子弟相对比较模糊的概念——接班。

虽然很多干部在“文革”时受到严重冲击，但这种冲击反而更刺激了他们子女的从政欲望，这体现在北京干部子弟中非常流行的“20年后谁掌权”的说法上。为了这一理想，他们甘愿到农村去卧薪尝胆，为将来走上政治舞台作充分的准备。

具体的内容，从主观上说，是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为着将来而磨炼自己。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那个睡在钉子床上的职业革命家的形象，成为很多青年的表率。

从客观上说，他们第一步是了解农村，了解社会，为将来掌权积累材料，很多知青都模仿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搞社会调查，这些调查有的还颇具规模，后来的确为文革结束后的农村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但这些调查者由于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也没有任何指导，加上当时那种极左的政治空气，往往没有太多实用价值，青年的大量精力和热情也都被白白浪费掉了。

还有具体的掌权实践，有些青年制订了先掌生产队的权，再一步步上去的计划，也的确有些人获得了成功。

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先觉者，看清插队这条道路无法走通并不能使他们避开这一命运，他们还是选择了结伙插队，70年代以后以“白洋淀诗群”之名崛起的文学群体，

就是从当年自发到河北徐水插队的一群北京青年为核心形成的。徐水距京不远，又是南来北往的通衢，各地回京探亲的知青常常聚集于此，日久成为知青互通情况，交流思想和探讨问题的中心。当然他们与上述那些一心献身政治的以干部子女为主体的知青还有不同，后来他们的侧重，主要在文学方面^①。

上述两类人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在农村期间始终未曾放弃学习和探索，表现得十分活跃，办刊物、搞学习小组、研讨会，与其他公社甚至其他地区的知青联络。他们还常常回京了解国家的动向，并在京城搞起了诸多的“沙龙”。甚至在生活上，也搞“共产主义”等等。

也有不少知青是做着纯粹的诗人梦、作家梦下乡的，他们中有些人始终未曾放弃自己的追求。

不容否认的是，这一切对于国家日后的政治、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些有着充分准备的人，一旦条件允许，就向世人展示出，他们的准备并没有白作。

可是具有如此自觉和自信的，即使在自愿到农村插队的知青中，也只是极少数人。而日后有机会在政治舞台上施展的，甚至也还不是这极少数的全部。尤其是其中那些当年的学生领袖，很多人迅速地沉沦了。

后来，当几乎滞留城市的所有中学生都被迫下乡的时候，其

① 如今已有学者注意到这样一个已多年为人所忽视的群体，并为他们冠之以“六八人”之称，说他们当年曾以贫弱的学力、旺盛的体力，以非知识分子身份，在私下场合思考和热烈争辩那些正常环境下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思考的问题。认为这当然是历史的扭曲，但也捶打出了这一代人的思想生命。文章一经发表，便在当年知青和学术界的一部分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见朱学勤：《风声·雨声·读书声》三联书店1994年版）。须知该文作者曾为上海中学生，所述的是上海及南方知青当年情况。也就是说，“六八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中条件较好的，大多被生产建设兵团选中，其余插队的，便与那些开路先锋大相径庭，由此，插队知青便明显地具有两极分化的特点。当然，下乡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实际地位的一致，他们也不不同程度地合流了。

对于绝大多数知青来说，动乱中局面的失控加上他们自己由盲目狂热所生发出来的激情，为他们带来的是一言难尽的苦果。“文革”前由国家有计划进行的安置工作，在插队地点的选择上注重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当地生产的需要和农民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是城市知青是否能在那里长期生活。所以，凡是特别偏远穷困、自然条件特别恶劣的地方，一般是无安置任务的。“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却一味强调“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使得这一政策先天就存在的与农民争地、争利的矛盾愈形突出，许多地区不仅偏僻艰苦，而且疫病流行，造成大批知青的“病退”，70年代之后国家只好以并点（点指知青下乡组成的“青年点”）、转点、撤点等方式加以解决，不仅造成大量人力物力上的浪费，更严重的是使不少知青身体受到摧残甚至精神受到伤害。

再者，“文革”之前经过长期摸索总结出来的“集体户”、“青年点”等经验，已被事实证明是较为妥当的形式，此时却被批判为刘少奇阻挠知青与贫下中农结合的阴谋（参见本书第七章第五节“从集体插队到‘集体户’”）。连中央安置办公室的干部也公开提出，是否肯于把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的大权交给贫下中农，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过去（指“文革”前）的安置工作，就是不敢把权交给贫下中农，安置办公室成了知青的直属户，把问题大包大揽起来，结果很多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干部忙得团团转，贫下中农有意见”，现在交给贫下中农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干部的指导思想如此，知青自己也将“完全、彻底”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当成宗旨，加上在“文革”那种混乱失控的状况下，对于下乡知青进行像“文革”前那样细致周到的组织、安排，事实上也不

可能，结果是这一时期的插队知青，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状态，问题几乎是立刻就暴露出来。轻者如因年龄小、生活自理能力差，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出现各种工伤及事故，重者则是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尤其是各地都有发生的女知青被奸污、逼婚、诱婚等案件。到1970年中央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发出26号文件进行大力整顿的时候，许多知青所受的摧残、伤害已是无法弥补的了。

大城市的红卫兵运动趋于低落，热情不减的年青人便把农村当成了新的战场，确曾有相当一批青年坚信毛主席号召他们上山下乡，就是为了以他们为动力，将文化革命进一步推向农村。而当他们上山下乡之时，各地的运动也正在“深入开展”，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内蒙古，当几万名京津杭等大城市知青踏上草原的时候，那里的揭批乌兰夫“黑线”、“挖肃”（即挖“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以及划阶级斗牧主的“红色风暴”正刮得如火如荼^①。很多不明底里的知青，拿出当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劲头，参与了这场运动，在当地干部群众普遍“手软”、“有顾虑”的情况下，的确有人利用了他们的盲目和激情。到内蒙锡盟草原落户的知青们，在当时权力机构盟革委会的通告“把隐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把反党叛国集团及变种组织彻底摧毁”的号召和“让‘挖肃’斗争的十二级台风来得更猛烈吧”的鼓动下，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斗争中：

我们和广大民兵、贫下中牧一起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斗牧主、清队运

^① 据《内蒙古日报》，1968年5月30日到6月14日，全自治区革委会和内蒙古军区召开现场会，要求各盟旗将“挖肃”斗争推向更深的阶段，要以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在内蒙古的代理人乌兰夫和本地区本单位内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为主要目标，这场运动由此被推向高潮，这是林彪、四人帮在内蒙古制造的一起大冤案，已被彻底否定。

动，把暗藏多年牧主、富牧、蒙修特务、土匪头子一个个地揪了出来，实行了群众专政^①。

我们的老阿爸，犹如当年战场上的指挥员，率领我们这支红卫兵小分队，挥鞭策马，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大牧主的家，把他隐藏的变天账、凶器全部抄了出来，就地审判了这个害人虫、吸血鬼^②。

到呼伦贝尔盟插队落户的天津知青也不甘落后：

到队第二天，我们就批斗了十余名反动民族上层、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牧主、富牧、反坏右，有个家伙极不老实，有个明目张胆地抵赖，我们对他们进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相继多次召开批斗会。有个牧主有意识地用叉子扎伤一个同学，我们当即批斗了他^③。

无庸讳言的是，知青们不仅是如上所述一般地参加批斗，还有不少人直接参加了专案组并成为骨干。这些做法极大地伤害了当地干部、牧民对知青的感情，在很多社队，知青与牧民的关系因此而一直未能融洽，甚至处境维艰。虽然最后饱尝苦果的也是他们，但并不能因此就说这些知青是完全无辜的。

出现这种问题的，当然不仅是内蒙古牧区一处。“文革”前老知青因参加“四清”而导致与当地干部农民关系恶化的悲剧，又一再地在各地重演。不过，也有很多知青逐渐省悟并自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

① 《锡林郭勒日报》1968年9月1日。

② 《战友们，快踏上革命的征途！——给即将奔赴祖国边疆落户的革命小将的一封信》，《锡林郭勒日报》1968年6月18日。

③ 《呼伦贝尔日报》1968年12月22日。

六 殊途同归

“文革”期间毛泽东经常发表“最高指示”，时间基本都在晚间，指示一旦发表，群众便在夜里敲锣打鼓地游行欢呼。1968年12月22日晚上发表的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情形也是如此。

这条指示是通过《人民日报》有关甘肃省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报道的编者按传达的：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①。

简明扼要的三句话，是对城市学生、家长以及农村干部与农民这三部分人所分别发出的不容置辩的命令。“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则是这条指示的核心内容。

“再教育”三字，最初出现于当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其中援引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短短几个月后，这一原则便从知识分子延伸到初中、高中的青年学生身上。

^① 即使笔者那样已经落户到偏远牧区的知青，也感到了这条最高指示的强烈震撼。一批自行到该地投奔同学或兄弟姐妹想一道插队的中学生，因当地安置办公室以牧区容纳不了过多人口为由拒绝接受，已在旗所在地滞留多日，一俟这条最高指示发表，安置办便无条件地将他们统统留了下来。

有头脑清醒者在当时就已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那就是农民，即使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并非是先进阶级的代表，他们拿什么来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呢？何况，即使是工人阶级，还需要从外部将马克思主义“灌输”进去，而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先进思想，这一点早就为经典作家所指出过了。

不过，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氛围之下，探讨任何理论问题，显然都是不合时宜的，这条指示应该被理解成是一个战略部署，一个战斗号令，而不是一个概念和理论才对。当时上上下下的各级干部、群众，包括知识青年本身及其他的家长，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理解的。他们的直接反应就是：上山下乡已是大势所趋，谁也不必再观望、再迟疑了。

事实上，这条指示之所以在此时发表，正是因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经遇到重重阻力难以推进的缘故。虽然宣传媒介动辄宣称某某城市、某某省已有数万、数十万知青“满怀豪情”地上山下乡了，但是且不说这些数字往往大有水分，至少是将大批回乡青年包括进去了，即使都是准确的，相对于当时滞留在校中学生的多达1200万的数字，也仍然是个小数。在激情洋溢的开路先锋身后，是人数比他们多出几倍几十倍的仍然观望不前的青年。个别已经“结合”进各级领导班子的红卫兵（更准确地说是造反派）领袖以为凭借自己的表现可以留城，如当时内蒙古海拉尔市就曾有中学生揭发说，市革委会部分领导人散布：“结合到革委会的可以不下乡”、“造反派同学可以晚下乡”，甚至“现在咱们掌权了，将来还怕找不到工作吗”等等言论，导致该市市管的三个中学中，已上山下乡的中学生还不到40%，参加造反派组织的500多学生中，只有40多人下乡，连10%都不到^①。在各地尤其是中小城镇中，这种现象当不是个别的。

^① 《呼伦贝尔日报》1968年12月29日。

社会上相当多的人分析，即使存在一时的积压，但国家工业和城市各方面建设已经因“文革”停滞了两年多，不可能永远不补充人力，文化事业、服务行业早晚也要补充年轻的人才，他们认为动乱引起的这种现象并非正常，一切终将会调整，会扭转，所以劝自己的子女再等等看。

一些有病的、为独生子女或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学生和家长，总以为还会像以往一样得到组织的照顾。

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将各种人的各种幻想一概打得粉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是从这时起，才以“文革”时特有的速度，掀起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潮。

早在最高指示下达之前，北京市就已开始进行知青到山西插队的动员，一些知青已在途中，但大多数却是在最高指示发表之后才报名的，准备时间极其短暂，只有三天，到12月25日，北京全市就有3000名高初中毕业生前往山西插队落户，加上已经进行行动身准备的，已达35000人^①。仅仅几天之后的12月27日，动员首都知青到革命圣地延安插队的工作就又开始，十余天之后的1969年1月10日，第一批到陕西延安地区的知青已经踏上征程。

上山下乡的自愿原则已为强制所取代，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在大会上公开说：“我告诉你们，等到什么时候也得走，十年不招工，十年不当兵，等也是白等。”

各地都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措施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据河南省的经验，第一是依照惯例大造声势，如郑州市第一批上山下乡知青只有72人，市里却召开了有20万人参加的欢送大会，第二天出发时动员了32万人欢送，省革委会主任带领领导成员，与知识青年坐在一辆车上送出郑州市，从此成为惯例。第二便是办学习班，首先将已结合到学校以上各级革委会领导班子的学生都集

^① 《北京日报》1968年12月27日。

中到省办班，让他们带头上山下乡。第三是将“文革”前下乡又造反回城的知青集中起来办学习班，提高认识后让他们再回到知青中去“现身说法”。

作为上山下乡最大阻力的家长，也被送进各单位举办的学习班，往往是不点头同意让孩子下乡，就不能出来，有的地方还采取了停发家长工资，停止供应口粮等强迫手段。

作为安置知青的较好方式，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工作早在“文革”前夕即已展开，1966年已经规模初具，1967年各省“夺权”开始后一度停顿下来，如今为了更多更快地安置大城市的知青，又受到中央的特别重视。1968年6月，在一系列筹备工作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建立了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并于6月30日召开了成立大会，兵团由此取代了以往由东北农垦总局所属的黑龙江各国营农场。

1969年1月，北京军区所属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文革”前夕华北农垦兵团的筹建基础上，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这是个几乎全部由城市知青为主组成的生产建设兵团。此外，在1969年短短大半年的时间内，就还有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4月）、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4月）、安徽生产建设兵团（9月）、江苏生产建设兵团（9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0月）以及福建生产建设兵团、江西农建师等相继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被划归新疆军区领导。

生产建设兵团归军区领导，采取军队中师、团、连的组织形式，与国营农场不同的是，兵团战士在经济上实行供给制，待遇低于农场职工的工资制。

生产建设兵团一经组建，便显示出远远超出农村生产队和一般国营农场的巨大的容纳能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到1968年底就已接收了各大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3万余人，到1969年底，更达到18万。新成立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当年也接收知青5

万，仅北京市到内蒙古兵团的就达两万余人，形成继赴山西、陕西插队之后的又一次上山下乡高潮^①。“文革”期间，全国的12个生产建设兵团和3个生产师，一共容纳了140余万城市知青（不仅仅是“老三届”），作用不得小觑。

学校的停课停课、父母的被关、管、杀，将大量无所事事的青少年抛上街头，加上动乱期间已经将几乎所有的社会道德规范尽数毁弃，使相当一批无知的青少年染上了流氓盗窃、打架斗殴、溜门撬锁各种恶习，成为城市治安的一大难题。据上海《文汇报》披露：

近一时期一小撮阶级敌人勾结流氓阿飞，蒙蔽一部分青少年，大搞打砸抢，公开侮辱妇女，偷窃扒拿，聚众打架。六七月份就有一小撮流氓阿飞分子蒙蔽一部分青少年，手持铁棍、木棒、匕首等凶器，在康乐路、海宁路、浙江北路一带多次打群架，使交通堵塞，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我们吴淞地区流氓阿飞活动很猖狂。上海安装机械半工半读技术学校有个流氓阿飞集团，私设公堂，绑架毒打学生、教工，暗藏大量凶器，还在附近农村偷鸡、抢西瓜，侮辱女同学；另一学校的流氓阿飞一贯偷窃，把学校一座楼房的玻璃窗几乎全部打碎，毁坏大量仪器，严重破坏吴淞地区的复课闹革命。

在我们北蔡地区，一批流氓、阿飞用鞭子、弹弓、棍棒大搞打砸抢，成群结伙到生产队破坏农作物，用小刀遭塌（糟蹋）了400多斤冬瓜，毁坏许多辣椒田……^②。

所谓阶级敌人勾结云云，实乃言过甚其辞，这些都不过是百

① 参见何岚、史卫民：《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

② 《严惩首恶分子，教育受蒙蔽者》，《文汇报》1968年8月4日。

无聊赖的青少年搞的恶作剧，这类恶作剧的严重程度，只要看看北京各中学那些几乎没有一扇完好窗户的教学楼，就可略知一二。

对于这些青少年，各城市都采取了强硬手段，先是在城市中以“文攻武卫小分队”进行群众专政的名义，进行“政治大扫除”，如上海市在1968年国庆节前夕，即组织了“公检法机关、文攻武卫战士、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对社会上所有阴暗角落，进行了一次全面大冲刷，割除社会毒瘤，挽救一些被阶级敌人毒害、腐蚀的青少年^①”。天津市要求有关部门“要广泛发动群众，对于流氓、盗窃集团展开全市大揭发、大检举活动，建议每个街道、胡同都组织起群众专政队伍，向毒害青少年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②。广州市这一行动开始较晚，方式也是举行几万群众参加的镇压反革命宣判大会，正告那些“沾染了流氓习气，做过一些坏事的青少年，要幡然悔悟，回头是岸，反戈一击”^③。与此同时，北京、天津各大城市都开展了类似的运动。

镇压之后，问题严重些的青少年，被送进拘留所，够不上犯罪的，一般就进学习班，北京当时的“不法分子学习班”，就收罗了一批这样的中学生。学习班出面为他们在学校报名，然后便从学习班被直接送上上山下乡的征途。与一般中学生不同的是，他们没有选择去处的余地，像生产建设兵团等处当然不会接收他们，他们基本上也都去外省农村插队了。

总之，到1969年初，老三届中学生已经基本离校，在“文革”十年上山下乡的1700余万知识青年中，大约有“老三届”学生400余万人。

① 《“政治大扫除”好得很！》，《文汇报》1968年9月21日。

② 《迎头痛击腐蚀青少年的阶级敌人》，《天津日报》1968年12月10日。

③ 《南方日报》1969年3月24日。

满怀革命豪情且自视甚高的知青中的“精英”们，就这样在他们插队的村子里，无奈地迎来一批批当年的同学们。据当时报刊报道，只身从北京到山西杜家庄插队的著名知青典型蔡立坚，在几个月后便在村里迎来了17名从北京、太原等地到这个仅有5户人家的小村插队的大学、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其中有的还是她在学校时的“对立派”同学，据说在短暂的尴尬与不快之后，二人终于“紧紧抱在了一起”。曾任上海市造反派头头、区革委会常委，后来到内蒙古呼盟布旗插队的一名女知青也提到，1968年5月她带头下乡插队时，原是想找上十几名“造反派战友”，“人合心、马合套地大干一场”的，可是后来却来了一批“不怎么样的”，他们一度想不通，打算与这些人分家，学习了毛主席语录后，才改变态度，“满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结成了‘一对红’”。

上山下乡使这些城市学生站在了同一道起跑线上，不能否认的是，这种表面上的平等曾相当有力地促进了上山下乡动员工作的开展，也构成了“文革”期间的知青与“文革”前的知青群体最主要的区别。“知青”这个新的、共同的身份，一度泯灭了至少是大大减弱了他们过去的差距和界限，那些中学生曾经非常看重的高干子弟与平民子女、重点中学高材生与普通学校甚至半工半读学校的一般学生、共青团员与落后群众、尖子生与“小痞子”、“文革”时的造反派与“老红卫兵”，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在过去几乎是不可逾越的一切鸿沟，倏忽间就烟消云散了。他们只是相同的一类人——知青。还没有其他的哪一代人，曾经有过这样“殊途同归”的经历与体验。

即使他们后来又重新分流，重新回到社会的不同层面、不同位置上，“知青”这一特有的印记也会伴随着他，让他铭刻终生。

更不要说在10年以后，当知青大返城开始时，绝大多数知青，又经历了一场这样的“殊途同归”了，无论是兵团的连级甚至团级干部，或是公社的党委书记甚至县委、地委领导，都与仍在最

底层默默无闻当农民和农工(因这时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取消了)的人一样，一无所有地以“知青”的身份回到城市，再一次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10年之内的两次从头开始，就这样耗尽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像一股潮水，更像一阵飓风。它的猛烈曾震撼过当时中国的几乎每一个家庭，曾波及几乎所有偏僻穷困的山乡，并一直触及一代青年的灵魂深处。西方学者直到1977年还在断言：“彻底废除下乡计划似乎是最不可能的选择”，但仅仅两年之后，潮退风平，“文革”结束后的新一代国家领导人，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决定将这场长达20余年的活动停止，这正是新时期开始的一个标志。

前几年常有人说，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做出评价，现在还时为过早。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它与如今的距离，的确还是太近了。但在社会变革与科技发展都如此急剧、如此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它所表现的内涵，却显得那么陈旧，那么遥远，竟像是个古老时代的故事，以致如今十几岁的青年，已经颇有些人不解“知青”为何物了。

后代如何评价是后代的事，但用我们自己的笔，把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感受，尤其是我们对这一运动的评价记录下来，则只能是我们自己的事，没有任何人能代替我们自己。当然，我们的评价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它也许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那么，就将它留下作为史料，哪怕只是心态史的史料也好。

虽然上面已经谈到，本书的主旨，是研究上山下乡这一政策，但笔者还愿在这里换一个角度，以这场运动的亲历者的身份，再补充几句话：

上文已经提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解放以后所实行的各种革命的、激进的措施中的一项。它与建国以来的几乎每一个重大政策、每一起重大事件都紧密相关；它的起因，涉及到国民经济、农业问题、教育制度等方方面面，它的结束，是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新时代的标志，不能脱离这个时代孤立地来谈知青问题。

但是，这场运动又是诸项激进措施中最革命、最激进的一项。当年的宣传媒介一再用“一场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与传统观念最彻底的决裂”一类词句形容它，并不为过。它的激进不仅指它当时采取的做法和方式，还尤其指它所造成的后果，它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人们观念的震撼和触动，它的影响之深远，都是其他运动所无法比拟的。

人们今天喜欢将这场运动称之为“一场伟大的实验”，它曾经是一场组织得很成功的实验，西方学者谈到它时，虽然也怀疑它从长远看来的可能性，但多少都带有对它的几分赞许，认为在第三世界国家普遍面临城市失业人口剧增、农村贫困长期得不到解决且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盲目流动的危机的情况下，中国这一实验和它一度取得的成效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如今，实验失败了，于是，这场实验当初的开展是否有其合理性，实验本身具有多少意义，它的失败是否是历史的必然，今天对我们是否还有启示，便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

然而，对于已经在这场运动中销蚀了无价的青春的知识青年来说，实验一词，未免太轻飘飘了。是的，他们非常关心对这场运动的评价，因为这在过去关系着他们的切身利益，现在又关系着他们对自己人生价值的认识；但是，谈起这些，他们的心态又十分复杂：在乡下时，希望对这场运动全盘否定，他们认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合理合法地回到生身的城市去；但回城之后，他们中很多人又游移不定了，因为否定这一切，无异于否定了自己。青

春只有一次，当人过中年，生活已不可能重新开始的时候，谁愿意否定自己的青春呢？何况这批人是从小就受着“不要让青春虚度”的教育长大的青年，不虚度的唯一标准，就是要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

既是知识青年，那就意味着这是一场青年的运动，是与青春联系在一起的运动，它使这场运动带上了只有青年才有的感情和色彩。青年永远与热情、欢悦、友谊和爱情同在，早已不是青年的知青们，如今回顾往事，更热衷的是用略带感伤但更具这代人特色的自豪心情去怀旧，人们习惯将这种情感称之为“知青情结”。笔者认为，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这种青春主调，或可解释为什么“右派分子”少见“右派情结”、下放干部少有“干校情结”，唯有知青的情结如此地“剪不断，理还乱”的原因。

且不说感情与历史是两码事，单就知青来说，有这种情结的也只是一部分人，或者只是人们心中一时的情感。上面说过，回乡知青中，很少有人表达出这种思绪，那些已经将生命献给荒山、草原的人，那些仍然留在当地的人，那些至今仍在为生活、为工作、为子女苦苦奔波的人，他们也默默无言。

少小离家的知青，难忘当年父亲的白发、母亲的眼泪，多少本写知青的书，都是献给知青母亲的。但我敢说，对于这场运动，他们无论是怀恋也好，诅咒也罢，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再有这样的知青生涯的心愿，却是一致的。那么，就让我将这部书，献给所有知青的后代吧。

但愿历史不再重演。

附 录:

一九六五年安置计划执行情况统计表

地 区		北 京	河 北	山 西	内 蒙 古	
计划数		3000	18100	9500	8290	
完 成 数	合 计	4757	16880	8360	10401	
	下 乡	4756	14150	7769	9179	
	回 乡	1	2730	591	1222	
完成%		108.56	93.25	88.00	125.46	
市、镇 下乡人 数	城 市	3762	8911	4073	4554	
	县 镇	994	5239	3696	4625	
下 乡 对 象	知识青年	4756	7851	5799	6480	
	退伍兵	—	473	20	14	
	闲散劳力	—	1894	1233	1062	
	家 属	—	3932	717	1623	
下 乡 人 员 的 安 置 方 式	人 民 公 社	集体插队	1221	6866	2989	4847
		单身插队	—	229	473	86
		成户插队	—	4288	1038	2234
		新建队	—	1731	763	1322
	国营农林牧场	3535	1036	928	77	
	水土保持队	—	—	1578	613	
上 山		1111	4024	2014	1725	
支援外省、区		9494	10391	--	--	

一九六五年安置计划执行情况统计表(续)

地区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计划数		40400	18000	25000	14500	
完成数	合计	45578	24403	34483	14692	
	下乡	37703	23254	31262	8815	
	回乡	7875	1149	3221	5877	
完成%		112.81	135.57	137.93	101.32	
市、镇 下乡人 数	城市	24215	7413	16525	8541	
	县镇	13488	15841	14737	274	
下乡对象	知识青年	32270	15783	18631	8815	
	退伍兵	30	10	—	—	
	闲散劳力	2943	2434	3902	—	
	家属	2460	5027	8729	—	
下乡人员的安置方式	人民公社	集体插队	30239	13981	13106	—
		单身插队	548	1479	1974	274
		成户插队	4393	7189	11490	—
		新建队	2134	605	4692	57
	国营农林牧场	389	—	—	8484	
	水土保持队	—	—	—	—	
上山		8443	8766	899	—	
支援外省、区		—	—	—	14795	

一九六五年安置计划执行情况统计表(续)

地 区		江 苏	浙 江	安 徽	江 西	
计划数		26000	30000	36000	22080	
完 成 数	合 计	19230	41099	39660	22242	
	下 乡	18016	30091	24621	18026	
	回 乡	1214	11008	13239	4216	
完成%		73.96	136.99	110.14	100.73	
市、镇 下乡人 数	城 市	5004	9139	6427	6460	
	县 镇	13012	20952	19994	11566	
下 乡 对 象	知识青年	13738	22224	5387	10619	
	退伍兵	411	17	92	39	
	闲散劳力	2578	5908	9749	5118	
	家 属	1289	1942	11193	2250	
下 乡 人 员 的 安 置 方 式	人 民 公 社	集体插队	5217	19168	1721	868
		单身插队	2070	6407	1288	1988
		成户插队	3399	2977	22481	3402
		新建队	300	1539	931	6717
	国营农林牧场	7030	—	—	5051	
	水土保持队	—	—	—	—	
上 山		126	1042	9595	11135	
支援外省、区		10014	1079	—	—	

一九六五年安置计划执行情况统计表(续)

地区		福建	山东	广东	广西	
计划数		20000	33000	29200	15500	
完成数	合计	19246	36200	33951	15966	
	下乡	15760	30027	32331	15130	
	回乡	3486	6173	1620	836	
完成%		96.23	109.69	116.27	103.00	
市、镇 下乡人数	城市	7651	21913	17712	4363	
	县镇	8109	8114	14619	10767	
下乡对象	知识青年	10797	7327	21219	12929	
	退伍兵	30	32	24	—	
	闲散劳力	3672	9614	10824	2102	
	家属	1261	13054	264	99	
下乡人员的安置方式	人民公社	集体插队	1870	9032	16067	6900
		单身插队	4244	1331	2228	13
		成户插队	2208	19220	424	1537
		新建队	5498	464	2447	6634
	国营农林牧场	1940	—	11165	46	
	水土保持队	—	—	—	—	
上山		12600	3297	7952	—	
支援外省、区		—	7291	—	—	

一九六五年安置计划执行情况统计表(续)

地区		湖北	湖南	河南	四川	
计划数		24000	25000	20000	15100	
完成数	合计	18003	22174	20856	12382	
	下乡	16441	21118	18009	12064	
	回乡	1562	1056	2847	318	
完成%		75.01	88.69	104.28	82.00	
市、镇 下乡人 数	城市	6521	11391	3343	7365	
	县镇	9920	9727	14666	4699	
下乡 对象	知识青年	12401	17929	6896	10891	
	退伍兵	28	12	32	1	
	闲散劳力	2534	2041	5552	1011	
	家属	1478	1136	5529	161	
下乡人员的 安置方式	人民公社	集体插队	11345	8017	7052	3418
		单身插队	—	72	—	224
		成户插队	2672	1760	10957	348
		新建队	2398	8924	—	8074
	国营农林牧场	26	2345	—	—	
	水土保持队	—	—	—	—	
上山		2293	8537	2849	—	
支援外省、区		4079	—	—	2197	

一九六五年安置计划执行情况统计表(续)

地区		云南	贵州	西藏	陕西	
计划数		2000	6800	—	12500	
完成数	合计	5018	3362	177	14376	
	下乡	4948	3110	177	11012	
	回乡	70	252	—	3364	
完成%		250.90	49.44	—	115.00	
市、镇 下乡人 数	城市	3921	573	177	2314	
	县镇	1027	2537	—	8698	
下乡 对象	知识青年	4611	2350	177	6393	
	退伍兵	—	—	—	43	
	闲散劳力	301	613	—	1940	
	家属	36	147	—	2636	
下乡人员的 安置方式	人民公社	集体插队	2166	2000	—	164
		单身插队	109	83	—	52
		成户插队	—	636	—	3176
		新建队	376	391	—	3860
	国营农林牧场	2297	—	177	2521	
	水土保持队	—	—	—	1239	
上山		148	1391	—	1329	
支援外省、区		—	—	—	—	

一九六五年安置计划执行情况统计表(续)

地区		甘 肃	新 疆	宁 夏	青 海	
计划数		18826	15000	8000	—	
完 成 数	合 计	19177	19232	10057	5056	
	下 乡	17076	19232	9270	5056	
	回 乡	2101	—	787	—	
完成%		101.86	128.21	125.71	—	
市、镇 下乡人 数	城 市	12610	16378	6879	3203	
	县 镇	4466	2854	2391	1853	
下 乡 对 象	知识青年	12061	10864	6944	3203	
	退伍兵	40	—	1	—	
	闲散劳力	3086	8368	883	590	
	家 属	1889	—	1442	1263	
下 乡 人 员 的 安 置 方 式	人 民 公 社	集体插队	274	—	631	—
		单身插队	510	262	727	—
		成户插队	3153	7970	1732	1853
		新建队	207	—	257	—
	国营农林牧场	12176	11000	5435	3203	
	水土保持队	756	—	488	—	
上 山		2884	—	110	—	
支援外省、区		—	—	—	—	

一九六五年安置计划执行情况统计表(续)

地 区		新疆生 产兵团	东北农 垦总局	中侨委 直属场	省份总计	
计划数		43000	3000	1500	543296	
完 成 数	合 计	57206	2030	880	597134	
	下 乡	57206	2030	880	520319	
	回 乡	—	—	—	76815	
完成%		133.26	67.66	58.66	110.00	
市、镇 下乡人 数	城 市	42298	2030	880	276546	
	县 镇	14098	—	—	243773	
下 乡 对 象	知识青年	23227	2030	810	325412	
	退伍兵	20664	—	3	21416	
	闲散劳力	1908	—	65	91925	
	家 属	12007	—	2	81566	
下 乡 人 员 的 安 置 方 式	人 民 公 社	集体插队	—	—	—	169159
		单身插队	—	—	—	26671
		成户插队	—	—	—	120517
		新建队	—	—	—	60321
	国营农林牧场	57206	2030	880	138977	
	水土保持队	—	—	—	4674	
上 山		—	—	—	92270	
支援外省、区		—	—	—	59340	

责任编辑：郭沂纹

封面画：秦立生

封面设计：鹿耀世

ISBN 7-5004-2187-7



9 787500 420743 >

初澜荡起——

几叶扁舟寻向那理想的彼岸

洪涛骤兴——

时代的音符汇成上山下乡的主
旋律

ISBN 7-309-04187-7/K·203 定价：20.00元